学习交流材料

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本书编写组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前言

阶级社会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作为这段历史的分水岭，改革开放标志着党内走资派的暂时胜利和资产阶级复辟时代的到来。

改革开放以来，走资派利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重塑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一方面扶植城乡私人资本，另一方面对国企进行资本主义的改制。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各阶级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走资派在复活城乡资产阶级的同时，也逐步腐化党政军高级干部，使其蜕变为了压迫人民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1]。于是，中国形成了两大资产阶级集团，一个是以人民的名义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一个是按自己投资占有生产资料的私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而无产阶级内部新工人代替老工人成为主体。城乡小资产阶级再次兴起，作为传统小资产阶级的自耕农和城市小业主，在资本的夹缝中艰难生存，作为新兴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上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2]，也受着资本主义体制的压迫。

2008 年的金融危机，是新自由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集中爆发。危机以来，中东战乱、拉美动荡、西方列强国内矛盾频发、以美帝为首的西方世界不断出现裂痕，原有的世界秩序受到冲击。在金融危机导致欧美经济停滞不前的同时，中国采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弯道超车、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这也造成了巨大的过剩产能和债务负担，导致矛盾进一步积聚。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一方面维

1 此处的官僚资产阶级既区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官僚资产阶级，又区别于西方国家的官僚集团。详见《中国当前各阶级规模和结构》。

2 企业管理人员阶级划分详见《中国当前各阶级规模和结构》。

持民生底线，试图延缓经济危机爆发；另一方面加强社会管控，试图将一切反抗扼杀在萌芽之中。

但是，阶级斗争是遏制不住的。如果说 80 年代的学生运动还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前奏，那么 90 年代国企工人的斗争则已经奏响了阶级斗争的华章。国企工人气壮山河的斗争，展现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也延缓了私有化的进程。作为曾经的社会主义时期的主人，他们在资产阶级全面复辟之后，唱出了悲壮的挽歌，同时也吹响了新时期斗争的号角。接过枪的是新工人，他们从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压迫。2003 年开始，新工人的斗争就不断增加，2010-2012 年，爆发了新工人的第一轮工潮，他们在这轮工潮中建立了数十个工会，这是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起点。这轮工潮是新工人第一次无组织的但规模庞大的冲锋，这次冲锋已经被官僚资产阶级瓦解了。资产阶级再次迎来了和平，但和平只是暂时的。面对高度组织起来的敌人，无产阶级的斗争还只是零星而散乱的，真正的大军还在集结。斗争还在继续，因为导致无产阶级发起冲锋的根本因素——雇佣劳动制——并没有改变。2018 年全国范围的塔吊司机斗争，仿佛预示着下一轮风暴即将来临。

一切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而这一切必然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自从马列主义被清除后，民族主义就填补了空缺。伴随着中国资本的全球扩张，民族主义情绪更是不断高涨。当局试图用革命烈士的鲜血来装点自己的门面，但国内不断爆发的阶级矛盾，却让越来越多的人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社会已经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事实。有人在高呼爱国，有人在咒骂社会。矛盾着的意识形态，恰好是矛盾着的各个阶级的反映。

如何认识这个时代的特点，如何认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性质，如何看待已经发生并将不断发生的阶级冲突，如何看待各阶级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进而如何选择

自己未来的道路，这一切都是马列主义者急需回答的问题，这一切也都是当代青年所需要思考的问题。

这本小册子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小册子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从考察社会的经济结构入手，分析经济结构中的各种矛盾，分析与这个经济结构相对应的各个阶级，分析各个阶级必然爆发的阶级斗争，并分析与整个社会存在相适应的社会意识，进而对上述问题得出一些结论，这就是这本小册子所做的工作。小册子还注意到，应该在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中去研究上述问题，因此小册子还考察了世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变迁以及中国资本输出等问题。

小册子在理论工作上迈出了一小步，也希望有更多的同志能够加入其中，这样我们社会主义的事业才能迈出一大步。

由于水平所限，小册子在论述和结论方面，难免有所疏漏，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编写组
2019 年 12 月

目录

前言 I

第一章　经济篇 1

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及趋势 1
第一节　中国经济研究方法 1
第二节　不同阶段中国经济的表现 8
第三节　当前阶段生产相对过剩的形成与发展 .. 18
第四节　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分析 32
第五节　结论与展望 41
中国房地产问题 47
第一节　中国房地产的各阶段 47
第二节　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几个特点 60
第三节　小结 72

第二章　阶级分析篇 76

中国当前各阶级规模和结构 76
第一节　中国各阶级规模估算 76
第二节　中国各阶级结构说明 79
第三节　小结 91
中国资产阶级分析 95
第一节　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 96
第二节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构成及占有剩余价值的特点 110
第三节　私人资产阶级的构成及占有剩余价值的特点 119
第四节　私人资本家的政治行为 124

第五节　资产阶级两大集团的关系及其对无产阶级的态度 136
新时代的新工人 142
第一节　新工人诞生和分布 142
第二节　新工人劳动力再生产 147
第三节　新工人的斗争 154
第四节　新工人的未来 164
历史变迁中的国企工人 176
第一节　引言 176
第二节　国企工人的基本情况 177
第三节　国企的历史变迁 183
第四节　新一轮下岗潮 191
第五节　国企工人的意识与集体行动 199
第六节　未来发展趋势 202
第三章　阶级斗争篇 204
国企工人一场漂亮的狙击战：通钢事件 204
第一节　改制前的辉煌 204
第二节　建龙蚕食通钢 207
第三节　通钢事件：矛盾大爆发 222
第四节　通钢斗争成就 233
南海本田罢工事件始末 240
第一节　罢工的背景 240
第二节　罢工的原因 241
第三节　罢工的准备 242
第四节　罢工的过程 243
第五节　罢工的意义 248
第六节　本田事件后的连锁罢工 249
沿海工厂工人斗争近况介绍——以兴隆厂为例 254
第一节　兴隆厂情况介绍 254

第二节　兴隆厂工人斗争过程 255
第三节　工人维权斗争情况分析 257
第四节　启示 259
新经济平台从业工人的状况和集体行动趋势 260
第一节　第三产业劳动者的数量和来源 260
第二节　新经济下第三产业劳动者的基本处境 262
第三节　第三产业工人的集体行动特点和趋势 269
新时代的新斗争：塔吊司机的全国罢工 278
第一节　塔吊行业基本信息 278
第二节　外部经济环境 280
第三节　全国塔吊工人罢工 283
第四节　建立组织——以 H 省 H 县塔吊司机为例. 287
第五节　基本结论 294
第四章　时代篇 296
世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发展现状 296
第一节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297
第二节　不同阶段经济危机的表现 299
第三节　当前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 303
第四节　当前的危机进程 311
第五节　结论与展望 332
我们的时代与中华帝国主义的命运 335
绪论：把握时代特征 335
第一节　“帝国主义”与“中心国家” 337
第二节　阶段论、政策论、体系论 340
第三节　中国：未老先衰的末代帝国 346
结语：衰朽与希望并存 355
资本输出与全球争霸 358
第一节　中国对外投资的历史过程 358

第二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和在各地区的影响力 366
第三节　冲突加剧，军备扩张 371
第四节　未来：看得见的硝烟 374

第五章　思潮篇 377

改革开放年代的思想斗争 377
第一节　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377
第二节　其他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意识形态 395
第三节　老左派思潮 398
第四节　新时代泛左翼思潮 406
第五节　马列毛主义思潮 412
当代中国左翼思潮中的民族主义 415
第一节　何为民族主义 415
第二节　民族主义在中国的起源及演变 416
第三节　左翼民族主义思潮的主要观点 420
第四节　左翼民族主义批判 424
第五节　结语 427
红色中国网部分错误思潮批判 428
第一节　对时代特征的错误认识：否定帝国主义论 428
第二节　对工人力量的错误认识：利润挤压论 433
第三节　对群众组织的错误认识：工会无用论 437
第四节　对未来斗争战略的幻想：地方割据论 444
第五节　对群众工作方法的错误理解：反对灌输论 446
第六节　结语 448

第一章　经济篇

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及趋势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是“美国消费—中国投资”。中国作为生产方，其经济增长逻辑与现在的美国截然不同，却与 1929 年时的美国极为相似，表现出鲜明的生产相对过剩特征。在 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中国实施了 4 万亿人民币的财政扩张计划，形成了 2009—2013 年的经济过热周期，同时刺激起房地产市场。2014 年后，当经济步入紧缩周期后，私营部门缩减生产、步入萧条，各类资本先后进入股市、P2P、房市，出现了明显的脱实就虚特征。伴随着城市化的速度放缓，生产相对过剩的后果也将愈加明显。

第一节　中国经济研究方法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资本利润生产完成了统治中国社会的大业。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不仅如此，中国社会化生产的范围从 2001 年加入 WTO 之前的一国扩大到了全球，十几年来社会化程度显著提高。中国的经济已经同全世界结成统一整体，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和“中美国经济体”的重要一环。同时，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性质并未改变，少数垄断资产阶级垄断了绝大部分生产资料、生产活动、财富、知识产权和社会权力[1]。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以普通民众消费的一般商品为主，富人消费的奢侈品单价高，但总量很小，对全社会生产的拉动作用很有限。由于两极分化

1 吴辉. 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与社会主义前景[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1(9)：17-21。

程度较为严重（中国基尼系数高于美国），同时财富效应[1]又不如欧美明显，总体上全社会的消费能力相对较低（见图 1. 1 和图 1. 2）。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包括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从 80 年代初的超过 50%下降到 2010 年最低为 33.8%，近年来又逐渐回升，到 2016 年为 39.3%（见图 1. 3）。这一比例在全球都是比较低的，目前全球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例平均为 58.3%，美国为 68.8%，拉美平均为 65.0%，英国、希腊等都超过 60%，印度、印尼、土耳其等国也都超过 50%（见图 1.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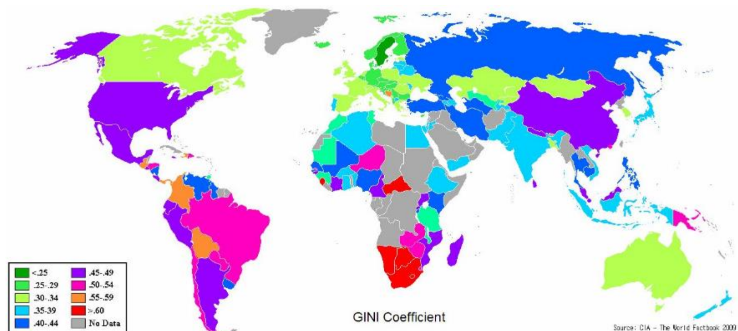


图 1. 1：2009 年全球基尼系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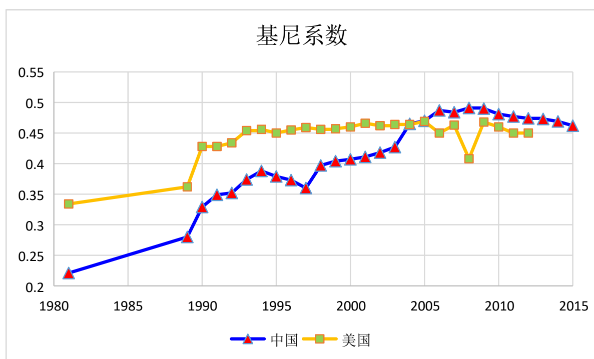


图 1. 2：中美收入基尼系数变化情况

1 因资产（房产、股票等）增值而增加消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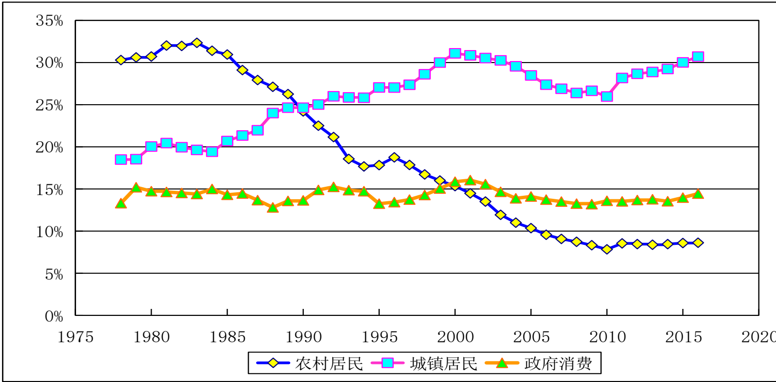


图 1. 3：中国三大消费占 GDP 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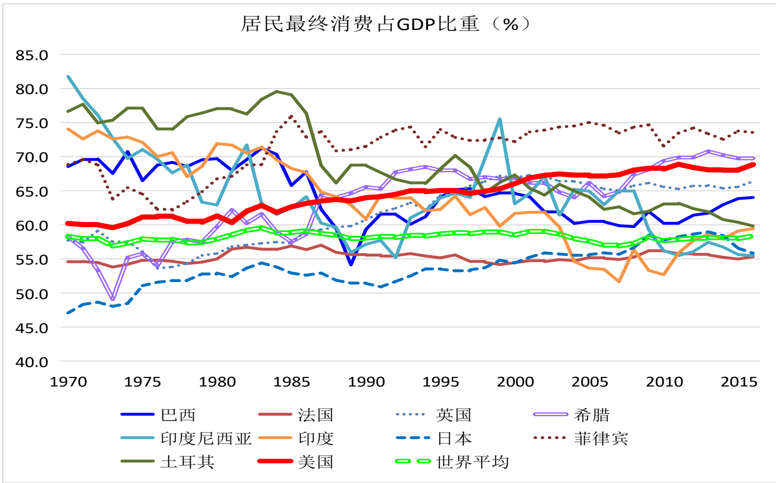


图 1. 4：各国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边是堆积如山的产品，一边是消费能力严重不足的老百姓。资本无止境地追逐剩余价值，使生产力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但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是无法克服的。工农是社会消费的主体，正常情况下，如果居民

消费需求相对较低，意味着国内市场空间相对较小，资本主义无限发展的生产力与工人阶级有限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很难拉动经济长期增长。但中国已经经历了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单纯的消费不足论解释不了这一现象。马克思早就指出："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1]。工人阶级消费不足只不过是资本主义流通过程的一种表现，但是其根源已经存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投资本身也是一种需求，当两大部类的再生产保持一定比例，在工农对生活资料消费不足的条件下，也是可以保持扩大再生产的[2]。

《资本论》二卷中通过如下公式对两大部类再生产进行考察[3]：

第一部类 $I_c + I_v + I_m = I_c + I_v + I_{m/x} + I_{\Delta c} + I_{\Delta v} = I$

第二部类 $II_c + II_v + II_m = II_c + II_v + II_{m/x} + II_{\Delta c} + II_{\Delta v} = II$

式中 I 表示第一部类，II 表示第二部类；c、v、m 分别表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m/x 表示剩余价值中资本家用来消费的部分，x 为大于 1 的系数，Δc 和 Δv 分别表示剩余价值里，在扩大再生产时追加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量。

其中各部分既代表价值，也代表实物。例如 I_c 表示第一部类中补偿生产资料的部分，既可以代表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也可以代表需要更新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买回的设备、

1 马克思. 资本论二卷 第二十章 简单再生产. IV、第 II 部类内部的交换。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

2 方敏，庄麟升，胡涛. 消费不足论：基于马克思再生产模型和斯威齐模型的讨论[J]. 经济科学，2016(4)：43-53。

3 无基础的读者，可参阅徐禾《政治经济学概论》相关部分。第一章的第一节至第六节，第二章全部，第三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第五章全部，第六章第一节至第四节。

原材料（实物）。这部分价值是在第一部类中生产出来的，也是在第一部类中消费掉的，属于第一部类内部交换。同理，$I_{\Delta c}$、II_v、$II_{m/x}$、$II_{\Delta v}$ 都属于部类内部交换。而 I_v、$I_{m/x}$、$I_{\Delta v}$ 属于第一部类生产出的价值，分给了第一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用于消费，第一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只能到第二部类中购买消费品才能完成价值循环过程；相应的 II_c、$II_{\Delta c}$ 属于第二部类生产出来的、但要到第一部类中交换的价值。于是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的平衡公式就是：

$$I_v + I_{m/x} + I_{\Delta v} = II_c + II_{\Delta c}$$

其中 $I_{m/x}$ 代表着资本家用于必需品和奢侈品的消费，这部分在全社会中占比很小，可以忽略。上平衡关系意味着第二部类扩大再生产受制于第一部类工人工资和工资增量。而第一部类是最终服务于第二部类的，在一定时期、一定技术条件下，第一部类扩大再生产需要同第二部类扩大再生产保持一定的比例（见图 1.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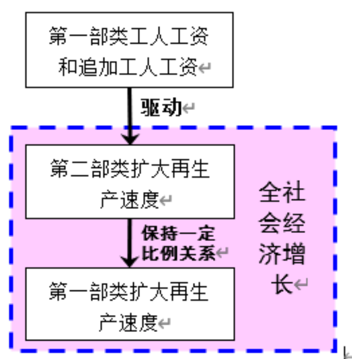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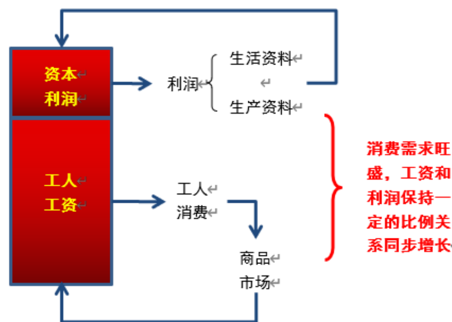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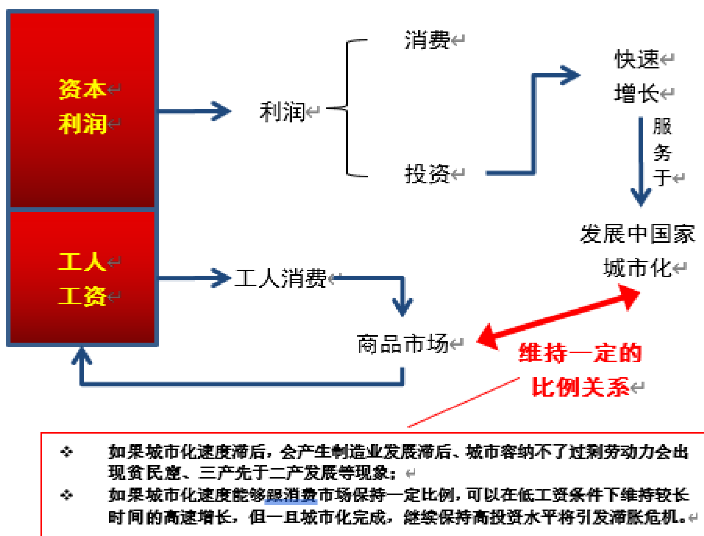
图 1. 5：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的平衡关系示意图

第一部类工人工资和追加工人工资增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实际工资不断提高，比如工人同资方谈判能力比较强，工会通过集体协商保障工资同资方利润、社会经济同

步增长；二是工人数量在不断增长，尤其是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农民大量进入城市，也会导致第一部类工资总量增加。



（a）　在高工资标准条件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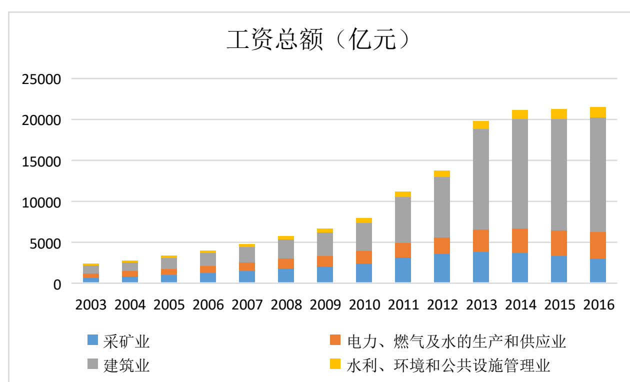
（b）在低工资标准、高利润条件下

图 1.6：不同条件下商品价值实现过程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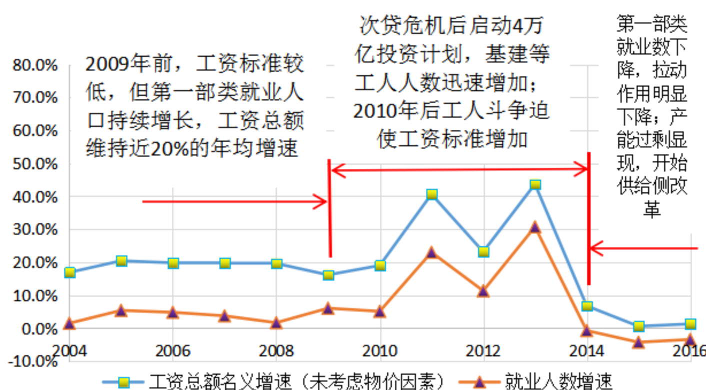
改革开放 40 年来，这两方面的作用均有体现，但主要

是依靠后者。一旦城镇化速度放慢，农民能进城的都进城了，如果还要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目标，就只能转而依靠前者，靠显著提高全社会工资水平、创造强劲的国内消费市场才能实现，但这又同维持一定资本利润率的要求形成矛盾。工人不斗争，资本家不会发善心去提高工资标准，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经济增长换挡，GDP 增速显著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们选择采矿业、能源业、建筑业、公共设施业作为第一部类的代表（这些行业仅能表达趋势。除这些行业外，还有制造业中的重工业等其他行业也是第一部类，但统计局数据中未将制造业按照轻重分开），计算第一部类工人工资总额增速。如图 1. 7 所示，第一部类工人工资增速同国民经济增速之间具有很好的对应关系。在 2001 年加入 WTO 后，中国步入了重化工业化时期，城镇化速度加快，农民工进城人数与日俱增。2009 年前第一部类就业人数年均增速 3.8%，工资总量增速年均为 18.8%，尽管农民工工资水平较低，但依靠第一部类工资总量仍能拉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2009—2013 年是中国的经济过热时期，国家启动了 4 万亿投资计划，铁公基大量上马，第一部类工人总人数暴增，这一时期第一部类就业人数年均增长 17.5%；同时 2010 年本田事件后，工人斗争迫使工资标准迅速提高，两者叠加，导致第一部类工资总额年均增速达到 31.6%，中国经济重回两位数的增长。2014 年以后，第一部类工人就业数量变为负增长，平均为-2.8%，同时工资增速并未出现显著变化，导致第一部类工人工资总量增长停滞，相应的中国经济进入消化过剩的时期，经济增长低迷，开始搞供给侧改革。



（a）工人工资总额增长情况（以采矿、能源、建筑和公共设施作为代表）



（b）　工人工资总额名义增速与就业人数增速

图 1. 7：第一部类工人工资总额增长情况

第二节　不同阶段中国经济的表现

生产相对过剩由“可能性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1]，包括以下三方面的条件。第一，机器大工业的确

1 资本论一卷，第三章 货币或商品流通，2、流通手段。

立及其所特有的物质技术关系；第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第三，信用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从公有制为主的计划经济时期过渡到市场经济时期，上述三个条件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第一个条件是在 1992 年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建立的；第二个条件是十四大后大力开展城市商品市场建设后建立的，到 1996 年以全国性生产资料批发市场为枢纽、区域性市场为基础的生产资料流通网络和各类消费商品市场体系基本形成；第三个条件是 90 年代初覆盖城乡的商业银行体系建立起来之后具备的。因此综合判断，中国发生全面的生产相对过剩只能是 1996 年之后。

(一) 酝酿期（1996 年之前）

在市场经济未成熟之前，随着商品经济改革，各地逐步恢复追求利润的生产目标，基本矛盾就以诸侯经济、重复建设等形式体现出来。从 80 年代中期财政分灶吃饭[1]开始，指令性计划逐步缩小，基本矛盾以中央－地方矛盾表现出来，各地重复建设、盲目投资，如汽车、机械、电子、烟酒等行业纷纷成为地方财政支柱。1992 年南巡以后，中国资本主义大跃进，社会出现剧烈的分化，生产力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各地争相上项目，各地经济结构的相似度在 90％以上。例如全国有 22 个地区把汽车制造列为支柱产业，24 个地区把电子工业作为支柱产业，23 个地区把石化列为支柱产业。到 1995 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我国 82％的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低于 75％，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 60％以下。生产能力闲置严重的主要是家电

1 1980—1984 年，我国在多数省份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称之为“分灶吃饭”。其基本内容和做法是： (1)划分收支。(2) 分级包干，执行划分的收支范围，地方预算实行分级包干。(3) 中央对地方专项拨款。这个制度的弊病是地方往往重视本地区局部利益而忽视全局利益的倾向，在建设上产生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助长地区之间经济上的互相封锁等。

产品、机械产品、轻工产品、纺织产品等行业，到 90 年代中期以后，很多轻工企业纷纷限产、半停产、甚至停产，其中家电行业市场饱和，电视机、空调器、洗衣机等一批工厂面临关停窘境。

(二) 第一轮普遍过剩（1997 年—2001 年）

在 1996 年以前，我国社会总供给一直小于总需求。1996 年上半年总供给大于总需求 3391 亿元，供大于求 9.8％[1]。此后中国经济告别"短缺经济"进入过剩时代，生产能力利用率下降，工商企业库存积压，市场上商品销售困难。到 1997 年，全国 600 多种主要商品供求基本平衡的占 67％，供大于求的占 32％。朱镕基打响国企改制攻坚战，国企职工大量下岗、失业，职工下岗后消费需求急剧萎缩，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工人们说："现在孩子上学学费越来越贵，看病花费越来越贵，百姓有钱也根本不敢花。国家总盯着个人储蓄，想掏出来，但大家只能把口袋捂得紧紧的[2]。"1998 年生产设备大量闲置，其中金属切削机床生产能力 54％闲置，电子家电业中空调器生产能力闲置率达 67％，中小型电子计算机生产能力闲置 87％，化工业中油漆生产能力闲置率 51％。到 1999 年对 605 种主要商品调查显示，供过于求达 437 种，比 1998 年下半年增加 38％。

同期，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东南亚各国货币争相贬值，中国同类水际制造业[3]出口受阻。面对上述几方面因素，国家开始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重点投资能源、交通、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行业，集中建设了一大批重要基础设

1 王雅君．当前中国结构性生产过剩的实证分析[J]．求是学刊，1998(1):46-48。

2 中国工人研究网．改革开放年代的资本运动——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M]．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

3 "水际制造业"，是指依赖于外国资金、外国技术，面向外国市场的制造业。为了方便外资进出，这些制造业一般集中在沿海，所以叫"水际制造业"。

施项目。从 1998—2002 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 6600 亿元，每年拉动经济增长 1.5～2 个百分点，累计创造就业岗位 750 万个，有效拉动了社会需求，2000 年起社会消费实际增长率为 13.3%。同时，由于居民储蓄率相对较高，虽然国债负担有一定增长，但仍处于可控范围，通货膨胀总体水平不高[1]。

(三) 面向全球市场扩张时期（2001—2008 年）

伴随中国加入 WTO，中国经济步入新的高涨期。这一轮经济增长主要靠重工业投资带动，用电量也不断攀升，很多地方开始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2006 年甚至出现了广泛的电荒和油荒。还有民营企业“大炼钢铁”热，钢铁投资年增速高达 100％。2005 年投资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 53％[2]。由于开拓了国际市场，巨大的需求创造了巨大的利润空间，各类市场主体都快速扩大产能（见图 1. **8**—图 1. **10**）。在 2004 年的总投资中，65％来源于非国有投资主体，2005 年一季度该比例上升为 71％。

但私有制生产能力的扩张速度仍超过需求增加的速度，过剩状态如影随形，2005 年全国 600 种主要消费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有 172 种，占 28.7%；供过于求商品 428 种，占 71.3%，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

供过于求的商品中，饮料、服装、纺织品、家电、家居用品等的比例较高。2006—2007 年，在 300 种主要生产资料中，供求平衡的占 72.7％，供过于求的占 23％，供不应求的占 4.3％。供需偏紧和供不应求商品主要集中在能源、有色金属和木材市场。

1 温桂荣. 关于 1998-2002 年积极财政政策效果的评价与思考[J]. 福建江夏学院学报, 2003(1): 12-14。

2 黄蕙. 生产过剩矛盾已开始酝酿[J]. 金融博览, 2005(8):34-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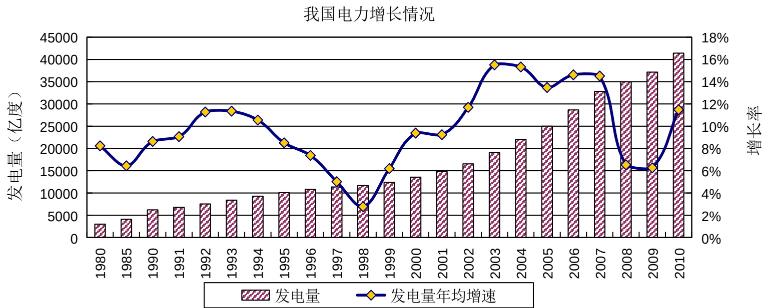


图 1. 8：加入 WTO 后中国电力迅猛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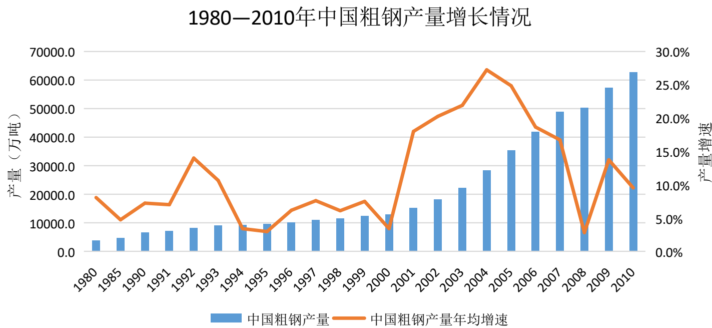


图 1. 9：加入 WTO 后中国钢产量迅猛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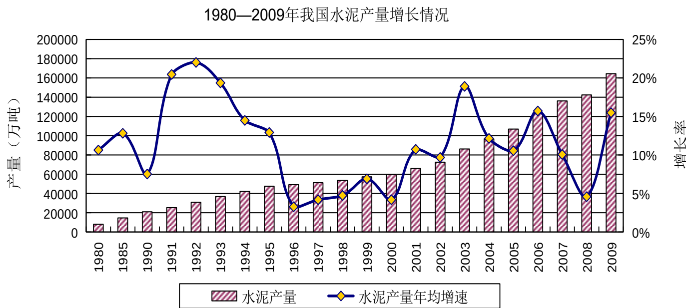


图 1. 10：加入 WTO 后中国水泥较快增长

90 年代后期以来，长期依赖投资拉动，货币发行量较大，

从 2001—2008 年 M2 年平均增速为 17.1%，远超 GDP 增速（见图 1. **11**）。两位数的货币增长累积下来，加之国际油价快速上涨推高石油输入国物价、大量热钱流入形成输入型通货膨胀等因素影响，物价必然难以控制。2007 年、2008 年连续两年 CPI 超过 3%的控制目标，食品类 CPI 更是超过 12%（见图 1. 12）。同时，金融市场也开始飙升，出现了股市泡沫，房地产进入升值的快车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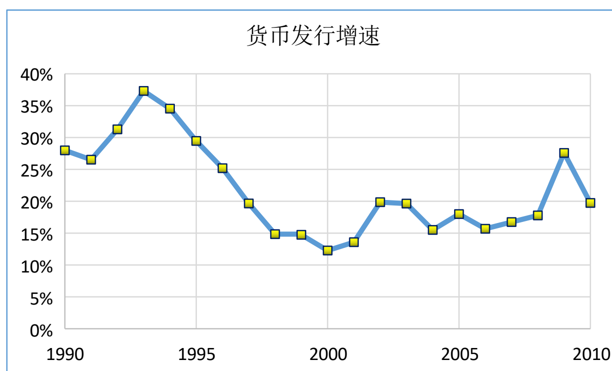


图 1. 11：中国货币发行长期维持两位数以上增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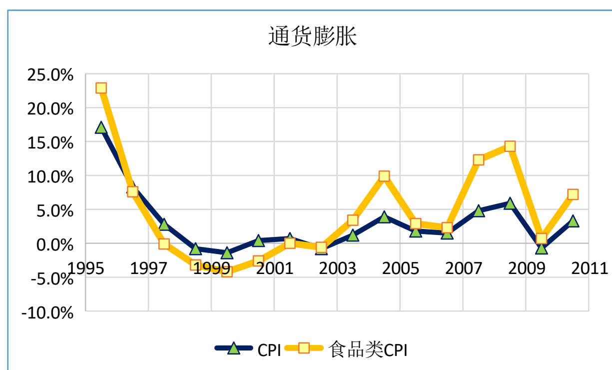


图 1. 12：2007 年开始物价快速上涨

(四) 救市过热时期（2009—2013 年）

次贷危机发生后，外向型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出口出现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失业大量增加。为了应对这种危局，中国政府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即“四万亿计划”。凯恩斯主义的引导和带动作用持续显现，对拉动全社会投资和稳定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2013 年国家预算内投资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部分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24.3%，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从 25.0 万亿元增长到 49.2 万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 GDP 的比例从 72.2%上升为 83.4%。利用这笔投资，建设了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高铁建设和水利、公路、机场、城市电网改造、农田基本建设等快速推进，为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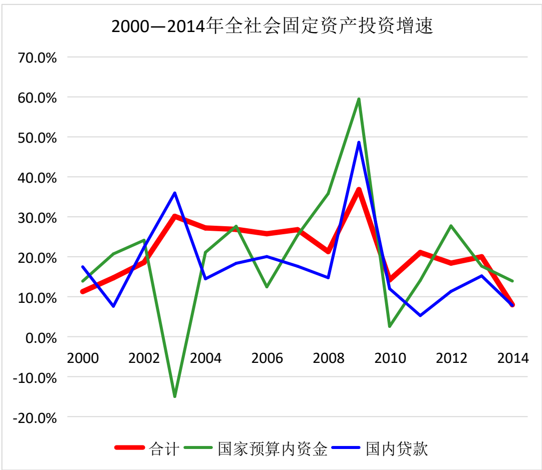


图 1. 13：四万亿投资计划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

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仍然是采用资本方式运作的，是通过立项、招投标等途径，由资本家承接实施的；另

一方面，基建有很强的周期性，项目结束后基于该项目而产生的对生产资料和工人的需求就会消失。这就造成了钢筋、水泥、煤炭等领域的老板手中有大量利润，而工人在工程结束后就会回家，第一部类工人工资没有能形成持久的增长，所以经济增速会随着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的结束而下滑。老板手中的大量利润有几个可能的去向：一是自己花掉，买耐用品和奢侈品；二是继续扩大产业，增加钢筋、水泥、煤炭等工厂规模；三是投资于金融领域，炒房地产、股票。第一种不可能，因为资本家的消费能力太小；第二种也不可能，因为 2009—2013 年之间四万亿投资计划已经将产能拉动到一个空前的水平，一旦国家退出投资计划，马上形成严重的过剩，这时还去扩大再生产只能是找死；所以真正精明的资本家都把钱投向了金融领域，尤其是房地产。在城市化发展时期，房屋供不应求肯定会涨价。于是，伴随着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从一二线城市到各地的县镇，房地产遍布人口集聚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资产泡沫[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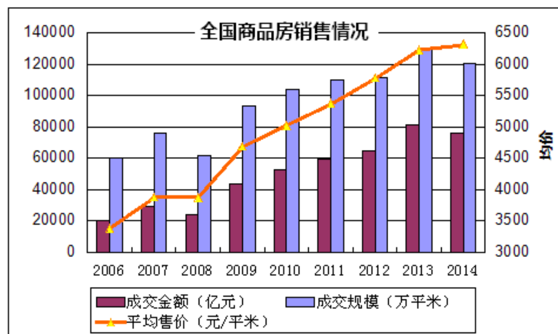


图 1. 14：2009—2013 年房价和成交规模均直线上升

1 利润流向房地产有三个渠道。其一、直接用于买房，在需求端促进房价上涨。其二、投资房地产开发，促进土地价格上涨，在房地产成为投机商品的情况下，促进房价上涨。其三、存入银行，由银行通过贷款将资金出借给开发商、政府或者购房者，从供需两端哄抬房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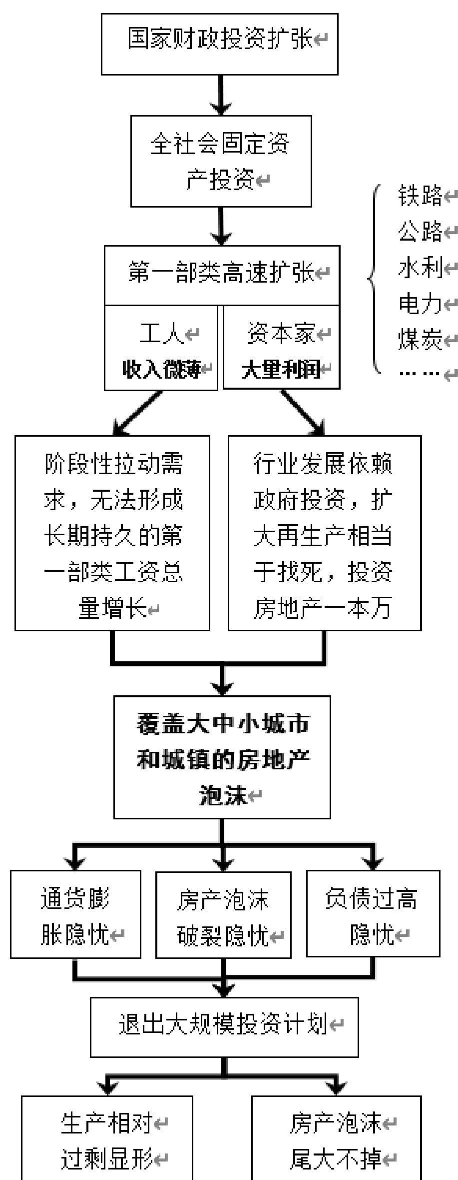


图 1. 15: ：市场经济条件下四万亿投资计划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五) 去产能时期（2014 年以来）

2014 年投资过热时代结束，第一部类企业马上陷入过剩危机当中。钢铁价格一路暴跌，以前钢企每吨钢利润在 1000 元左右，相当于一部手机的价格，到了 2015 年上半年，每吨钢铁净利润才仅有 0.43 元[1]，到 2015 年螺纹钢的价格跌到了 1900 元/吨，跌破了 1 元/斤的白菜价[2]，三分之二以上的企业亏损。煤炭产能从 2008 年的 24 亿吨/年增长到 2014 年的 47 亿吨/年，产能过剩直接导致煤价下跌，到 2015 年底，中国全社会存煤已经持续 48 个月超过 3 亿吨，90 家大型煤企的利润减少 500 亿元，同比下降 91%，整体行业的亏损面达到 95%。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如此感叹："卖一吨煤的利润买不到一瓶饮料[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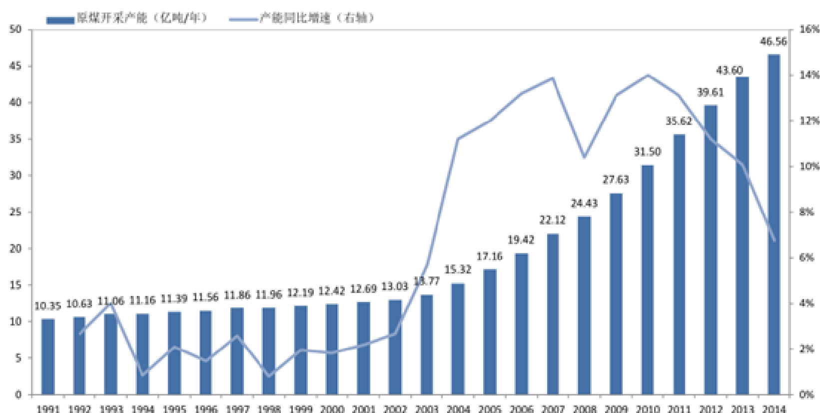


图 1. 16: 2003—2014 年煤炭产能高速增长

---

1 钢铁第三季出炉 钢铁每吨净利润还不如白菜价！[N]. 中国回收商网，2015-10-16，http://news.huishoushang.com/61841.html.

2 钢铁泡沫被捅破 螺纹钢 1900 元/吨 面临白菜价[N]. 中国证券报，2015-07-13, http://qd.ifeng.com/jinpaicaijing/jr/detail_2015_07/13/4103354_0.shtml.

3 顾静芳. 产能过剩煤价下跌，山西书记王儒林：卖一吨煤买不到一瓶饮料[N]. 澎湃新闻，2016-02-25, http://news.huishoushang.com/61841.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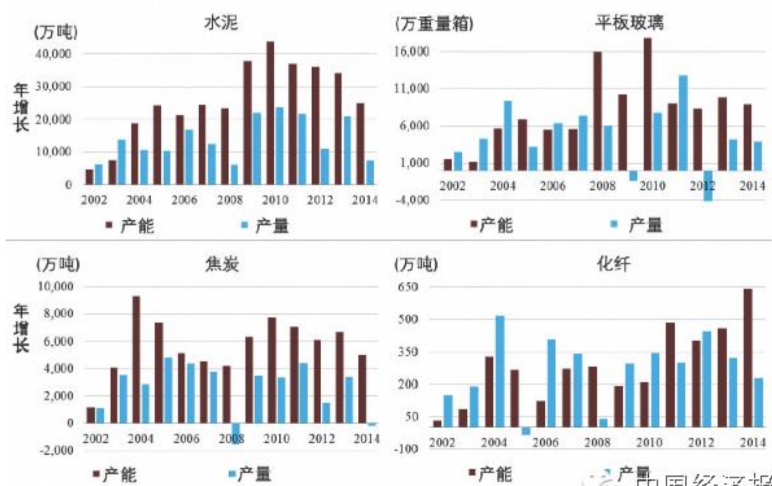


图 1. 17: 2002—2014 年四行业产能增长和产量增长[1]

四万亿投资计划推出后，地方政府的造城运动就像数十年前的大炼钢铁一样突飞猛进。但随着四万亿投资计划戛然而止，地方政府很难获得新的中央投资和新增贷款，完全陷于应付存量贷款利息的窘境之中，各地地方官没有其他办法，只能熬过一天算一天。

2016 年 1 月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开始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内容是采用行政化手段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工作，加速淘汰落后产能、清理僵尸企业，加快企业兼并重组。此后生产资料价格逐步恢复，钢、煤等产量增长，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也继续突飞猛进。

第三节　当前阶段生产相对过剩的形成与发展

在资本主义经济周期中，上一轮的过剩在这一轮的高涨

1 特伦斯・斯图尔特，樊瑞. 中国产能过剩的成因和影响[N]. 华尔街见闻，2016-06-11. 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247333.

期被消化掉，并产生更庞大的过剩（见图 1. 18）。从上世纪末，中国就出现了广泛的生产相对过剩现象，但到了2001—2008 年的周期中，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市场从国内变成了全球，原有的过剩很快被巨大的市场吞噬。同样，次贷危机前后的生产相对过剩在四万亿的投资计划中被消化掉。资本扩大再生产一再膨胀，最后终于要面对一个问题：中国已经占领了全球的市场，资本主义已经将市场经济可以吞并的地区全部纳入囊中，面对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工厂的全球生产能力过剩，资本主义还能在哪里找到空间去容纳这个快速增长的生产力呢？一国之内的矛盾扩展到了全球，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无法控制和解决，最终必将冲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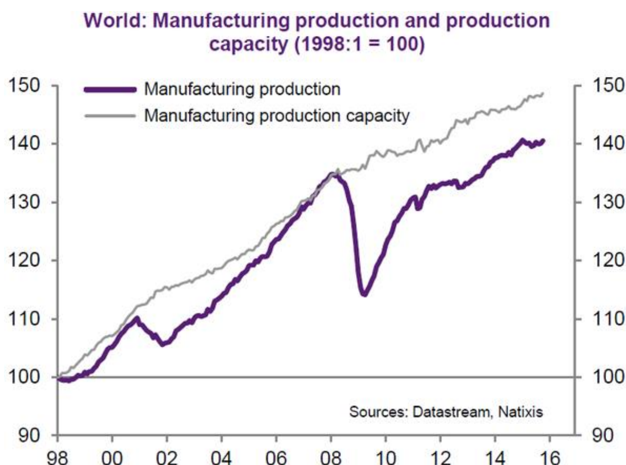


图 1. 18：全球制造业产能和产量关系（两者都以 1998 年为 100）[1]

1 林建建．产能过剩是中国的 也是全球的[N]．华尔街见闻，2016-01-14. 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228684.

(一) 总体情况

当前的过剩局面主要是 2009—2013 年生产过热时期造成的。受 2009 年政策大刺激和短暂经济效益鼓舞，企业在 2010、2011 年前后投资过大、过猛，在资本家看来，那时候干什么都赚钱，所以即便借助高杠杆也要拼命扩大再生产。房地产投资 2010 年暴增 33%，制造业投资 2011 年增长 32%，消费 2010 年因通胀增长 19%，也带动相关投资。中国还出现了跨行业投资、盲目投资，典型例子是房地产和煤炭。投资扩张很多依靠举借杠杆，房地产、制造业部门的高负债率，很多就是那时形成的，2010、2011 年兴起的民间高利贷也是那时的产物[1]。

例如，台州一变压器老板，在 2008 年底大肆扩张囤货，从日本大量吸入 4000 台二手变压器(核心部件是矽钢片，新货卖 5 万元，旧货卖 3 万)，相当于囤积了 5～6 年库存。然而没想到事后国内矽钢片价格下跌过猛，囤积的二手变压器连 4000 元也卖不出，身价从 2 亿元掉至 8000 万。而圈子内通过借贷囤货的，因为资金压力，则出现了 5、6 个跑路现象。江苏北部一实业转型的地产开发商，2009 年拿地，当时和区政府合作搞开发区，所以配套拿到商业用地，地价便宜，一平米三四百元，看上去利润空间很大。但是实际操作下来，从开发到销售一直依赖民间资金，月息 1.5 分，四年算下来复利就快 100%了。至 2014 年底楼盘才全部销售完毕，但只收到 30%的首付款，剩下的按揭贷银行一直批不下来。所以还是需要社会资金，但民间资本已经不好借了，只好转借信托，一年 20%成本。老板最后评价，现在已经到了盈亏平衡，相当于白干了，替资本打工。如果还不解决资金问题，估计甚至会亏损。

1 陈瑞明. 一份民间调查报告告诉你实体经济有多难[N]. 新浪财经，2015-09-15. http://finance.sina.com.cn/zl/money/20150915/143623252087.shtml.

最大的过剩出现在房地产行业。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巡视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仁忠接受澎湃新闻网采访时透露，在国务院一个关于全国城镇体系的规划中，一个涉及 12 个省会城市和 144 个地级市的调查显示，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城市规划 4.6 个新城（新区），地级城市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 1.5 个新城（新区）。某个西部省会城市提出建 3 个新区、5 个新城，总面积是现有建成区面积的 7.8 倍。郭仁忠指出，“全国新城新区规划人口达 34 亿，这是严重的失控。”还有“环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在对全国 288 个地级市调查中发现，有 164 个城市建有环路，然而有些地方原本没有环路，却把几条道路连接起来成为环路，好像“无环不成市”[1]。一些中小城镇迫切希望加速发展，纷纷提出 2020 年、2030 年人口倍增的目标，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6 年 5 月，全国县以上新城新区超过 3500 个，规划人口达 34 亿。西部、西南部几个地市规划部门负责人明确表示：“我们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抢人”。以“小吃之乡”福建沙县为例，县城新区数十个楼盘在促销，已经售出的商品房入住率却并不高。2016 年沙县楼市均价每平方米四五千元，相对于高峰期房价已接近“腰斩”。沙县全县人口 26 万多，按照规划，到 2030 年城关人口要达到 35 万，但“现在四分之一的人口都外出从事小吃行业，人口不净流出就不错了[2]。”

(二) 城镇化热潮结束后的形势

新世纪以来，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长期保持 20%以上的年增速，2009 年甚至超过了 30%；全社会住宅投资增速也维持在 20%左右的水平；银行贷款增速也是两位数，

1 新媒：中国新城区规划人口 34 亿 专家称严重失控[N]. 参考消息，2015-09-22 . http://news.qq.com/a/20150922/001086.htm.

2 乌梦达、董建国、徐海涛. 规划 3500 个新城容纳 34 亿人口，谁来住?[N]. 新华网，2016-7-13. http://news.qq.com/a/20150922/001086.htm.

2001—2014 年金融机构贷款平均增速为 16.3%（见图 1. 19）。随着城镇化热潮的结束，长期以来以投资为主拉动经济的模式暴露出严重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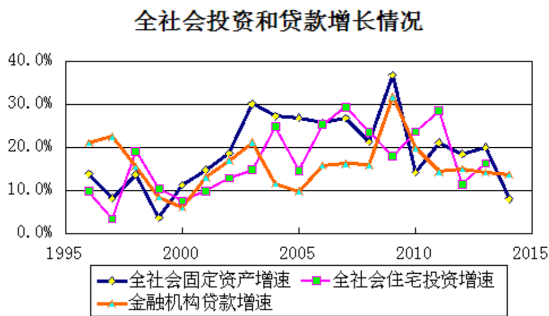


图 1. 19：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和房地产投资年增速长期保持 20%以上

第一，银行放贷过高。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信贷（间接金融）为主，信贷在社会融资总量中占比最大。2014 年以后，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规模和放贷规模依然在快速增长，2016 年分别达到 150.6 万亿元和 106.2 万亿元，贷款总规模仍以年均 14%的速度持续增长（见图 1.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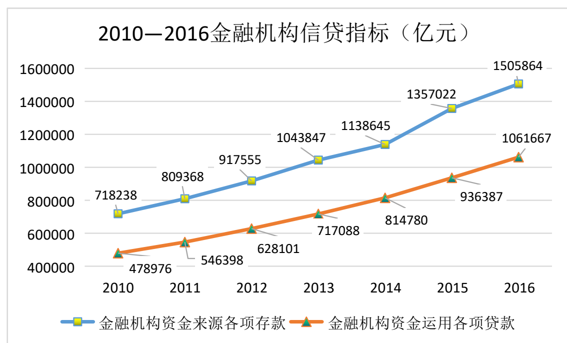


图 1. 20：中国金融机构的存款和贷款

银行本身是个杠杆，银行从存款人吸收资金，投放给资

金需求方（包括申请贷款的企业和居民）；企业向各银行借了钱，用于生产经营，本身也是一个杠杆。这就形成了一个资金链条，其中银行、企业两个环节都形成杠杆（见图 1. 21）。随着经济下行，企业经营风险加大，银行不太敢再给企业放款，出现“惜贷”现象。银行转而寻找一些相对“安全”的借款客户，即“信用中介”，包括有政府背景的部门（国企、融资平台等）、房地产、非银金融机构（含各类资产管理产品）等。信用中介借钱无法监管，可以给“两高一剩”企业（高污染、高能耗的资源性的行业；产能过剩行业）放高利贷，导致信用链条变长，提升了金融系统风险（见图 1. 22）[1]。



图 1. 21：银行杠杆和企业杠杆形成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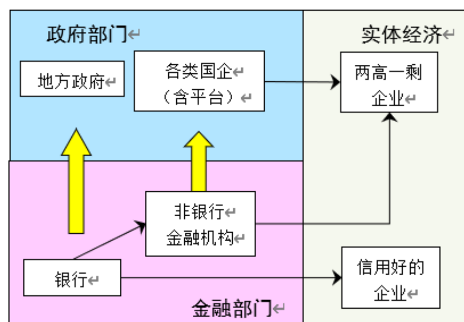


图 1. 22：银行放贷链条延长和风险增加示意

第二，政府债务迅速增长。依据《人民日报》的报道，截至 2016 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15.32 万亿元，控制在年度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7.19 万亿元以内，地方政府债

1 国泰君安银行团队. 银行视角：一篇最透彻的金融去杠杆报告[N]. 凤凰财经综合，2017-05-08. http://bank.jrj.com.cn/2017/05/08083622440457.shtml.

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为 80.5%，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90%～150%的控制标准参考值。如果加上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 12.01 万亿元，我国政府债务为 27.33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36.7%，低于国际公认的政府债务负担率 60%的警戒线[1]。但真实的情况不仅应看地方政府债务率和政府债务负担率，还应分析地方政府的隐含债务规模和债务用途。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负债实际上是地方政府负债，但并未列入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统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有息债务（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应付债券）从 2011 年末的 20.64 万亿元增至 2016 年 6 月末的 43.28 万亿元，规模翻番，2014 年以来的年均增速仍在 10%以上。平台债务原来主要向银行借贷，现在仍以银行借贷为主、债券比例有所上升。以城投公司为例，2009 年 100%向银行借款，到 2015 年银行借款占比 65.9%、发行债券占比 27.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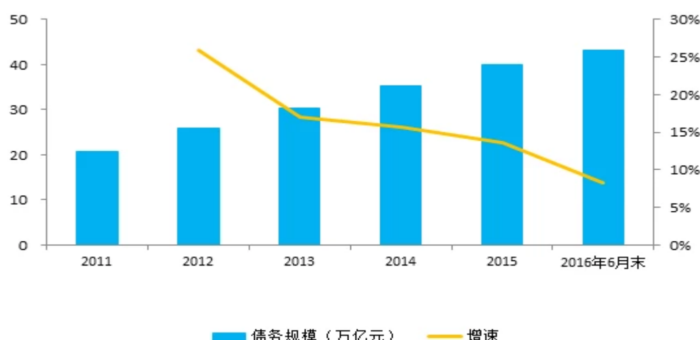


图 1. 23：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有息债务快速增长

---

1 陈龙. 人民日报|疏堵结合强化管理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N]. 人民网—人民日报，2018-01-11. http://www.cfacn.com/bigdata/show.php?itemid=153.
2 赵卿. 一文梳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情况[N]. 苏宁财富资讯，2016-12-16. http://36kr.com/p/5059438.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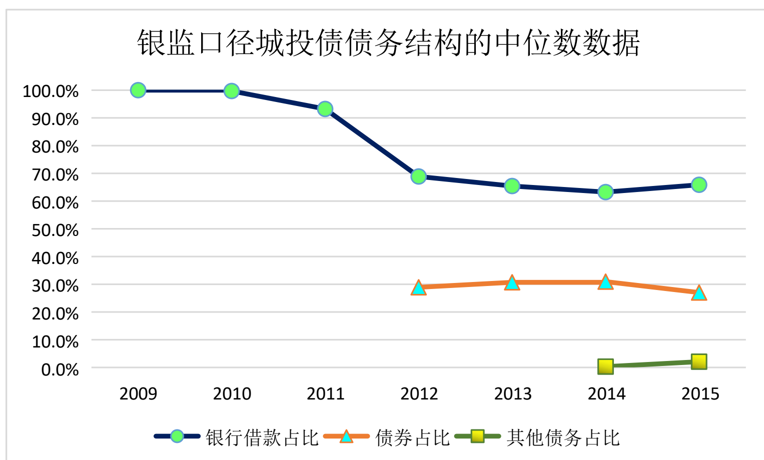


图 1. 24: 城投债债务结构以银行借贷和债券为主

事实上，纯平台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就是财政资金，没有自己创收的机制。一旦整体债务负担超过财政支付能力，纯平台公司就会迎来系统性的风险。

第三，存在恶性通货膨胀隐忧。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不算太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 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1.6%。2017 年 12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8%。其中城市上涨 1.9%，农村上涨 1.7%；食品价格下降 0.4%，非食品价格上涨 2.4%；消费品价格上涨 1.1%，服务价格上涨 3.0%。但受房地产价格上涨影响，2017 年以来 PPI 指数（工业品价格指数）大幅上涨，平均增速 8.1%。工业品生产价格表征生产资料价格，如果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迟早会传导到消费品价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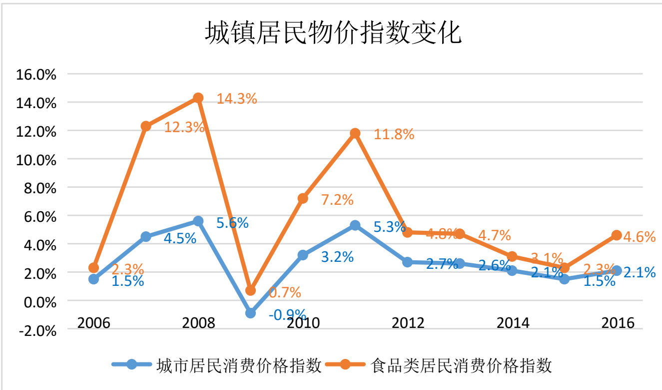


图 1. 25: 2006—2016 年城镇居民物价指数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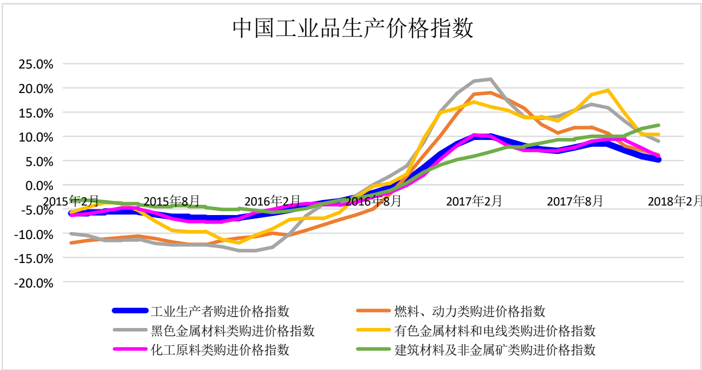


图 1. 26: 2015—2018 年工业品价格指数变化

多年来，由于货币发行增速始终维持 2 位数，2011—2016 年 M2 平均增速为 13.5%，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见图 1. 27）。正常来讲，货币发行增速和经济增速的差值应该差不多就是物价上涨速度。但中国有快速增长的金融市场，多出来的票子有两种选择，要么去购买房地产、股市，要么去购买商品。之所以近几年物价水平较低，是因为大家都去炒股、炒房了。如果金融市场发生波动，这部分天量资金释放出来，形成商

品市场的抢购风潮，那么必然形成恶性通货膨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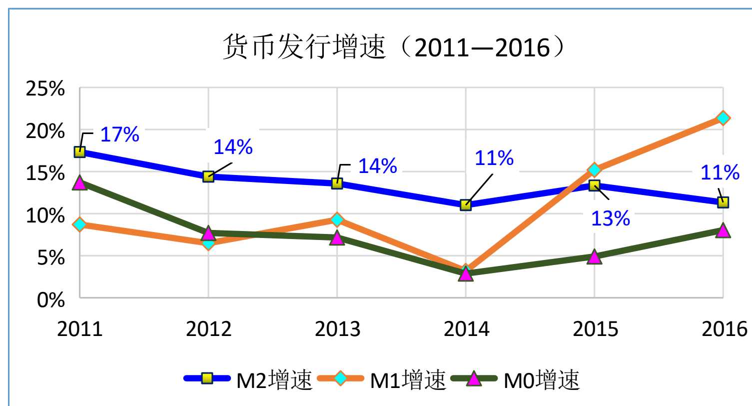


图 1. 27: 2011—2016 年货币发行增速

第四，企业产能扩张过快，负债率过高。在 2009—2013 年过热周期中，工业企业负债快速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负债增速年均 15.3%，其中大型企业达 22.1%，中小型企业平均 11.2%。到 2016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负债达到 60.7 万亿元，其中 9631 家大型企业负债 29.6 万亿元，5.3 万家中型企业负债 14.3 万亿元，31.6 万家小型企业负债 16.8 万亿元。按照大型企业债务利息 5%、中型企业债务利息 7%、小型企业债务利息 10%估算，2016 年仅偿还利息一项，大型、中型、小型企业分别要付出 1.48 万亿、1.00 万亿、1.68 万亿元，与当年企业税前利润总额的比值是 0.55:1、0.51:1、0.65:1[1]。如果在经济上升期，高负债率并不会成为问题，但一旦遇到经济下行，市场萎缩，高负债率马上就会演变成大范围的企业破产潮。

1 按会计准则，税前利润已经扣除了支付的银行利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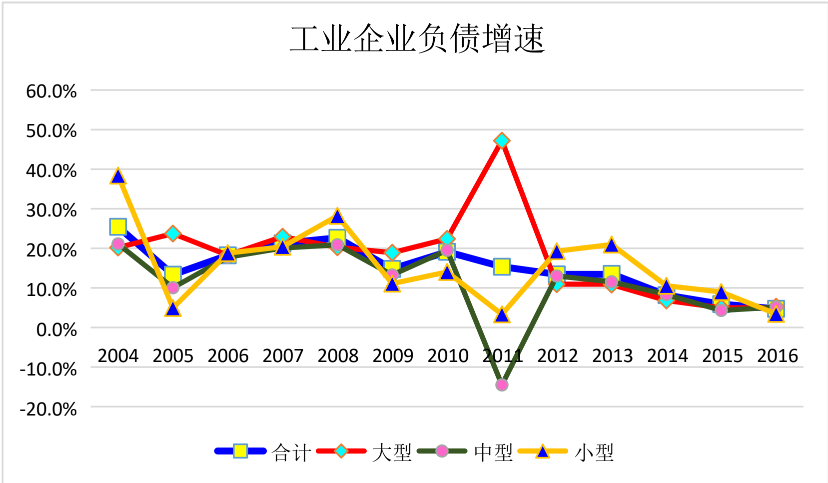


图 1. 28: 2004—2016 年债务增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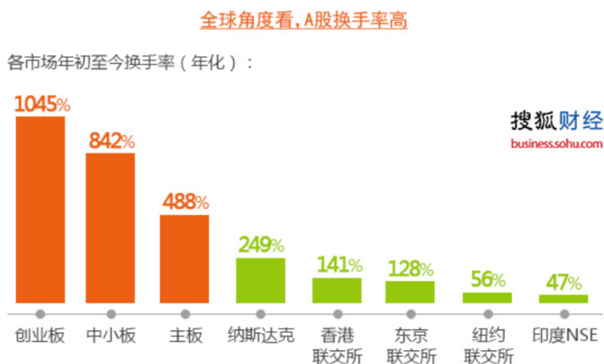
(三) 国家干预的措施与结果

随着经济增长进入低谷期，刚开始李克强瞄准了社会上巨额的过剩资本，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60 号)，想吸引民间资本广泛投资航空、石油、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部门。但民间资本不是傻瓜，这些重工业领域都被垄断资本控制，自己投资了以后连董事会都进不去，而且基础设施都是不赚钱的，投资基建还不如投资房地产。所以这个意见出台以后，基本上没有得到什么响应。

李克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想出了吹金融泡沫来吸引社会投资的办法。由于中国的股市一直是“慢牛”状态，大家投资股票的热情高涨，几十万亿的剩余资本都进入股市。这对拉动经济有三大好处：一是企业从银行等机构融资是债权融资，需要还本付息，但通过股市融资是股权融资，不仅不需要偿还，还能降低企业的负债率，避免实体经济因负担高额利息被掏空利润，进而避免出现实体经济倒闭风潮并引发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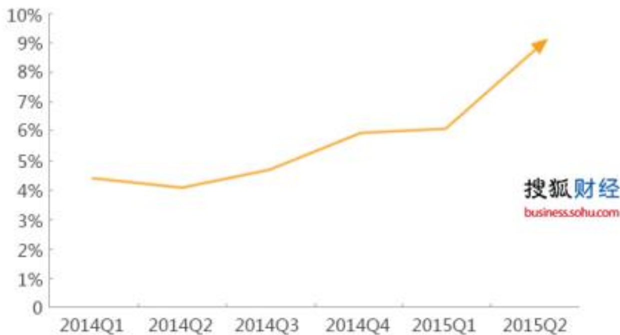
济危机；二是现在信贷链条被人为拉长，很多信用中介干着高利贷的活，抬高了实体经济融资利率，而通过股市融资可以直接获取社会资本，有效缩短信贷链条，避免信用中介带来的风险；三是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很大，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通过股市融资，可以获取大量不用给回报的资金，降低地方政府的债务率和偿债负担[1]。

但历史进程总是无情地撕破“一股就灵”的慢牛美梦。中国的股市既不是“牛市”，也不是“熊市”，而是上蹿下跳的“猴市”。中国股民发财致富的心愿非常迫切，不愿意长期持有获取股息，而是通过低买高卖投机赚钱。中国股市主板年换手率高达 488%，也就是说一支股票平均一年交易 5 次，而纽交所换手率仅为 56%，也即一只股票平均两年才交易 1 次。大量新韭菜疯狂涌入股市，泡沫吹得太快，最终在 2015 年 6 月，泡沫难以支撑而破裂了，中小股民又一次被无情收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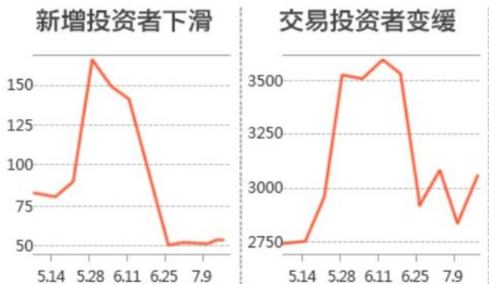


（a）中国股市换手率远高于美国

1 国家允许城投上市融资，但目前纯城投公司上市基本不可能，因不满足监管条件。



（b）2015 年 6 月股市暴跌前中国家庭的股市参与率增长情况



（c）2015 年 6 月股市暴跌后股市新增投资者骤减

图 1. 29: 2014—2015 年股市暴涨暴跌

此后过剩的资本难以找到好的投资去处，只能投资于房地产，导致一二线城市房价出现又一轮大涨（见图 1. 30）。由于实体经济已经深陷泥潭，债务过高、融资困难、利润微薄等，资本不可能再去投资实体经济。相反，实体经济中的资本也向金融领域转移。东莞某灯饰厂老板说：“忙得焦头烂额收入还不够给员工发工资，一句话，早上岸早解脱。”最好赚钱的还是买房子，他在两年前将工厂关闭在广州买了 4 套

房。“幸运的是买了房，不幸的是没买更多[1]。”房地产、P2P等先后火爆起来，形成脱实就虚的大形势。2016 年 7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4636 亿元，远低于市场 8000 亿元左右的预期，同比少增 1.01 万亿元，创近年来新低。其中住户部门贷款增加 4575 亿元，几乎全都是房贷撑起，企业新增信贷为负增长。截至 2017 年 4 月底，A 股共有上市公司 3223 家，其中金融类上市公司 70 家，占比仅为 2.17%，但这些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占所有上市公司的 76.91%，净资产占比 39.98%，净利润占比 52.84%，尤其是 25 家上市银行的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占比分别高达 68.81%、32.24%、45.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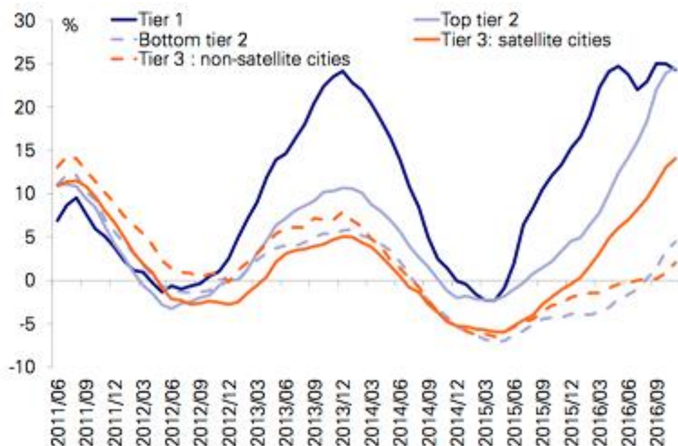


图 1. 30: 不同城市房价上涨情况[3]

1 汇智投资俱乐部. 别再聊奥运了，该看看经济有多糟烂了！[N]. 搜狐财经，2016-08-25. http://www.sohu.com/a/111982177_473247.

2 蔡咏，吕海，刘涛，等. 我国社会资金“脱虚入实”的困局与对策[N]. 券商中国，2017-05-31.
http://finance.sina.com.cn/wm/2017-05-31/doc-ifyfuvpm6900814.shtml.

3 欧薏. 一二线沉寂之后 轮到三线楼市崛起了？[N]. 华尔街见闻，2017-01-26. 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287135. 注：对对二线顶级城市、二线底部城市的界定参考《China’s property bubble》（2016 年 9 月 28 日）；三线卫星城市、三线非卫星城市的界定主要是看半径是否达到 200km、或是否拥有 1h 的高速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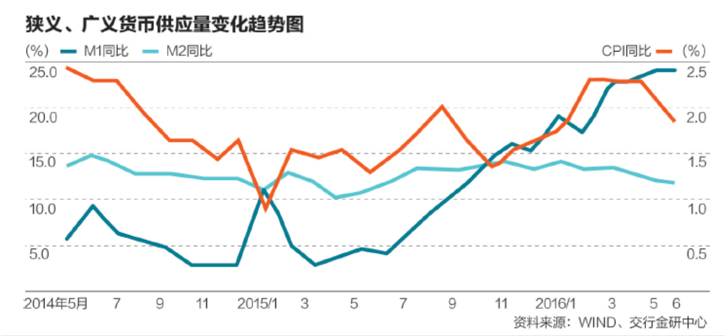


图 1. 31：企业资金趴在活期账户没有扩大生产形成 M1 和 M21剪刀差[2]

但金融领域是不创造价值的，实体经济构成金融领域的基础，如果这个基础越来越萎缩，可以供给金融领域炒作的利息就越来越少，金融领域的泡沫破裂就是迟早的事，所以股市、P2P、数字货币等都如同夜空中的流星，转瞬即逝。如果最后房地产的泡沫也破灭了，资本就将彻底迎来自己无处安放的青春。

第四节　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分析

(一)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预测

在城镇化已经实质完成（第一部类工人总数负增长、工资总额增长停滞）的情况下，当前能够真正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只有房地产。但由于中国已步入老龄化时期，未来也不可能出现像 2009—2013 年以及 2015—2018 年那样覆盖大中

路里程。

1 欧薏．一二线沉寂之后 轮到三线楼市崛起了？[N]．华尔街见闻，2017-01-26. 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287135.

2 M0：流通中现金，即在银行体系以外流通的现金；M1：狭义货币供应量，即 M0+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M2：广义货币供应量，即 M1+企事业单位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

小城市和城镇的房地产全面上涨。根据相关研究成果（见图 1. 32），房地产价格高峰同逆抚养比密切相关。以 2010 年人口数据为基础进行预测，我国人口高峰期将出现在 2020—2025 年之间，人口峰值不会超过 14.3 亿。未来劳动人口比例将持续下降，18～60 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持续下降，从 2010 年峰值 66%将一路降低，到 2030 年降为 56%。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5-64 岁人口在 2010 年达到峰值 74.5%，相应的抚养比达到最低点 0.34（见图 1. 33），到 2040 年将达到 0.56，也即一个就业人员养活的老人和小孩个数从平均 0.34 增加到 0.56 个（见图 1. 34、图 1. 35）。购房的主体是 25～44 岁青壮年人口，这部分人口从 2005—2014 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约为 4.45 亿人，对应这一段也是中国房地产建设最多、房价整体上涨最快的时期。但目前，25～44 岁人口已经开始持续下降，到 2020 年下降到 4.25 亿人左右（见图 1. 36），到 2030 年将继续下降到 3.69 亿人，青壮年持续减少决定了买房群体不会继续增长，未来全国房价不会出现全面性的上涨，尤其三四线城市，将长期处于消化 2009—2018 年房地产过剩的状态当中。但有一些城市的房地产泡沫仍会继续膨胀，由于全社会资本严重过剩，一二线城市房产仍将是资本热捧的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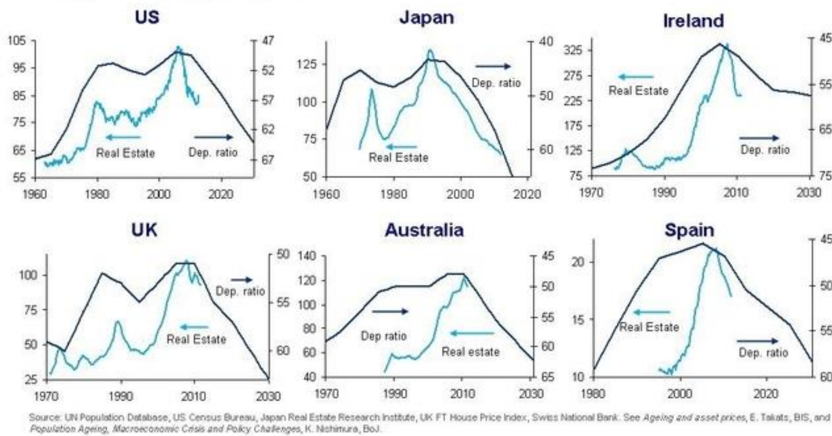


图 1. 32：房地产价格同逆抚养比峰值基本同步[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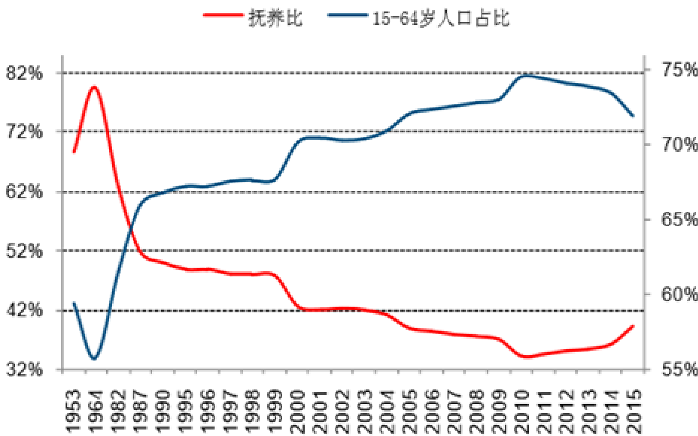


图 1. 33：中国人口红利在 2010 年完全释放[1]

1 人口因素与房地产泡沫[N]. 华尔街见闻，2012-12-07.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4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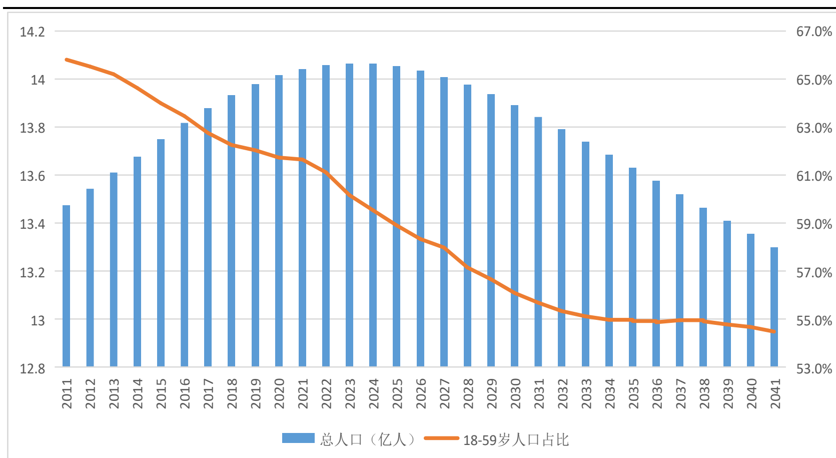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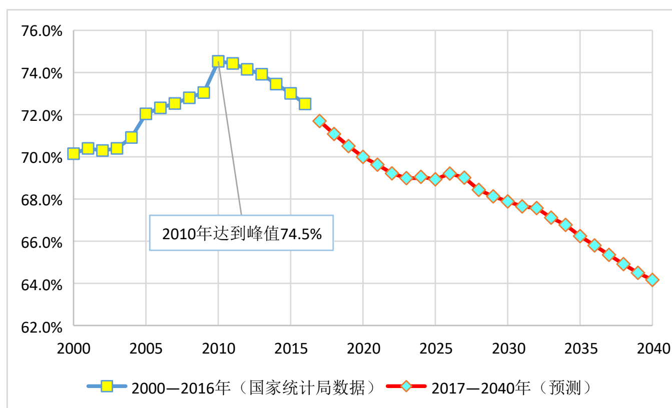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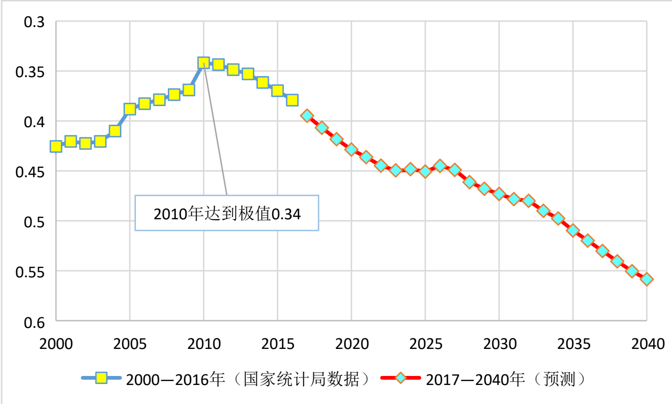


图 1. 34：按照分年龄的总和生育率模型预测的人口增长（以 2010 年为水平年）



（a）15-64 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1 2017 年中国人口结构现状及人口年龄结构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分析[N]. 中国产业信息，2016-10-19. 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610/458481.html.



（b）人口逆抚养比

图 1. 35：劳动人口比重下降，由人口红利走向老龄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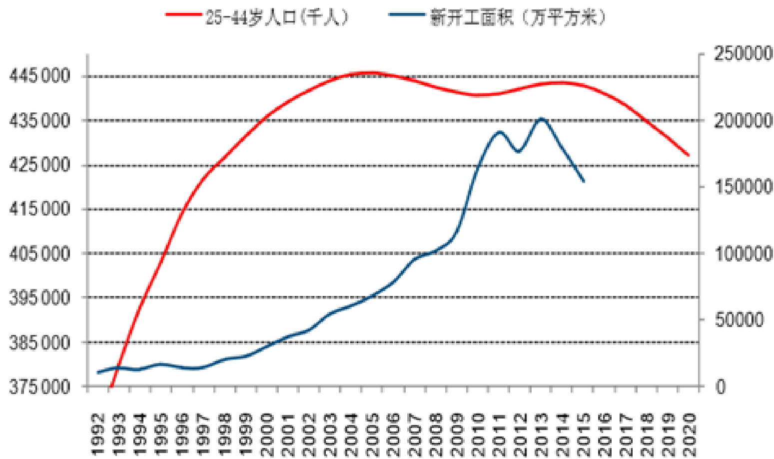


图 1. 36：25～44 岁人口规模和新开工住房面积增长情况

除房地产外，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中，产业链条长、对国民经济有明显拉动作用、同时还在有一定空间增长的，就

仅剩汽车行业了。信息产业也处在日新月异的变化当中，但与汽车业、房地产业相比，体量太小，其产业引领作用、对经济拉动作用较为有限。而且自动化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是促进生产效率提高的，将引起部分可用机器替代的行业大规模裁员，相应的第一部类工人工资总额只可能下降，不可能大幅提升。科技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往往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在很多情况下，科技将促使生产力极大发展，最后引爆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汽车行业目前也走过了高速增长的时期，从 2009 年汽车产量第一次超 1000 万辆，经过 4 年时间到 2013 年就超过了 2000 万量，2009—2013 年年均增速 20.2%。汽车产量中乘用车产量占 85%，商用车占 15%。汽车业同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乘用车早已进入微增长时期，2016 年的高增长是受到购置税刺激[1]出现的短暂现象[2]，并不具有长期性。2018 年汽车市场 28 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而中汽协预计 2019 年汽车行业将继续负增长[3]。

1 2015 年国庆前夕，国家颁布了汽车购置税减半的政策措施，在 2015 年 10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购买 1.6L 或以下排量汽车购置税减半。

2 2018 年汽车行业投资策略：大潮退去，乘用车迎来微增长时代？[N]. 智通财经网，2018-02-08. http://auto.gasgoo.com/News/2018/02/08112853285370034140C105.shtml#SOHUCS

3 https://36kr.com/p/52751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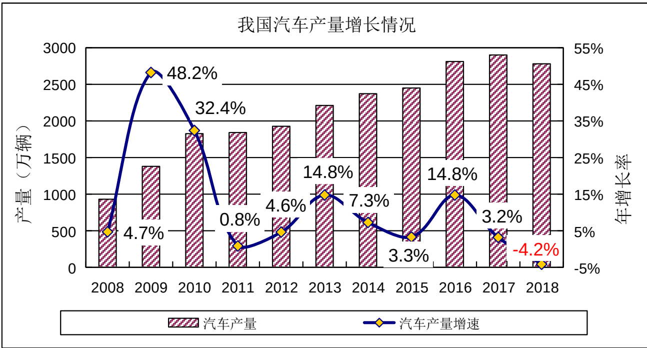


图 1. 37: 2008 年以来我国汽车产量增长情况



图 1. 38: 乘用车已步入微增长时代

结合第一部类工人工资总量的增长态势（见图 1. 7），综合上述情况，中国房地产、汽车业未来仅可能是缓增或者下降，相应的中国经济也不可能再回到高速增长时期。

(二) 危机将以滞胀的形式出现

在私有制条件下，政府采取凯恩斯主义的方式干预经济，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拉动经济的作用。但凯恩斯主义存在不治之症，发展到最后就是滞胀。国家建设基础设施项目

也是通过招投标，由资本承担建设项目完成的，建筑工人的工资在工程总造价中仅占很小比例。假定国家建设了 4 万亿的项目，但到建筑工人手中的只有 2000 亿元，相当于拉动第二部类增长的额度不会高于 2000 亿元，但 4 万亿投下去都是真金白银，流入商品市场会直接形成物价上涨，流入房地产市场会通过租金成本等间接引起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进而引起生活资料价格上涨。如果日积月累，投资规模越来越多，通胀的程度就越来越大，而真正拉动经济的消费需求却没有同步增长，那么一旦高速建设期完成，通货膨胀还在，但社会消费、经济增长却被打回原形，就形成了滞胀。

中国经济同其他国家重要的不同之处就是国家干预能力相对较强。每一任领导都不愿意危机在自己任期内发生，所以一旦出现经济萧条的危机征兆，马上会启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大规模搞基础设施建设，避免大规模失业等社会问题爆发出来。因此，中国经济第一次危机就是滞胀危机。中国会持续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直至国家干预手段无法发挥作用，也就是砸了很多钱下去依然拉动不了经济，这种干预政策的方向才可能逆转。目前城镇化尚未完全结束，一二线的房地产业和汽车行业仍将发挥一定的拉动作用，滞胀应不会马上发生，但这一时期也不会太长。2014 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了下降周期。未来在美国周期性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还会重启大规模财政扩张计划，此后危机爆发的时间可以按照一个经济周期，即 5～10 年进行估算。我们也可以按照完成城镇化到滞涨发生所用的时间进行估算。美国城镇化率在 1960 年达到 70%，基本完成城镇化（相当于中国 2014 年以后第一部类工人总数停止增长），此后到滞胀发生大约有十几年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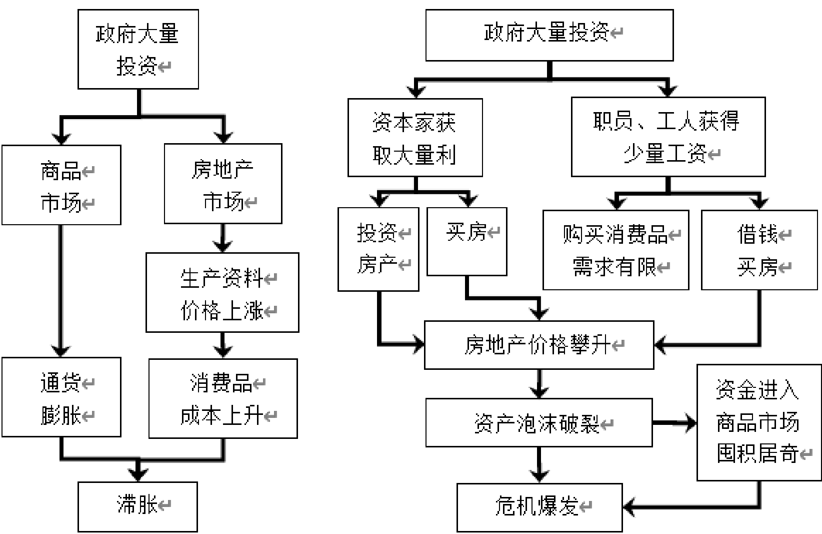


图 1. 39：中国滞胀的形成机制

(三) 垄断资本加速发展

在实体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一方面是流动性宽裕，但资金宽松的企业不愿意投资；另一方面是资金紧张的企业融不到资。资产荒同资本过剩纠缠在一起，再加上高企的融资成本，三者共同成为阻碍资本增殖的拦路虎。小企业接到单子也高兴不起来，以广西一家电缆制造公司为例，面对一笔 1 亿元的电网需求订单，“我们电缆厂只有 2000 万元的流动资金，如果接下这个单子，我们很可能会倒闭。”因为这笔生意至少需要超过 2000 万元的原料，而上游的原材料生产厂家一般不赊销，而不赊账的原因也在于害怕“资金链的断裂”。“作为小企业，当地的银行是不会借贷给我的”，而银行借贷利率也在 10%～12%，随着银行借贷困难，民间借贷的成本

也水涨船高[1]。2017 年再次出现了企业倒闭潮，企业债违约从私营企业扩展到了国有企业。加上 2017 年煤、钢、水泥等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众多中小企业面临原材料紧缺、环保去产能、外贸环境更加复杂、资金及产品滞销等综合性危机[2]。

伴随着小企业破产，垄断进一步形成。并购市场延续着以往的火爆。2015—2016 年，以人民币计价的股权转让交易金额达 4885 亿元，要约收购中要约总资金为 124 亿元，资产重组交易金额达 2343 亿元。以药房产业为例，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益丰药房、老百姓、一心堂分别拥有直营连锁门店 903 家、1122 家、3142 家。“上市公司集体大量收购兼并的现象像是一股潮流席卷了药品流通行业，在这场并购的潮流中，在 A 股上市的一心堂、老百姓大药房以及益丰药房成为主力军[3]。”而近几年来中国互联网业的并购现象越来越多，更有长期血拼、势不两立的巨头频频宣布合并，让人跌破眼镜。

第五节　结论与展望

第一，以雇佣劳动制度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必然爆发经济危机。在“美国消费-中国投资”的模式中，中国表现出典型的生产相对过剩特征。“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4]。”中国长期依赖低工资塑造竞争

---

1 保交所. 中国的钱都去哪啦？ [N]. 搜狐财经，2016-08-11. http://www.sohu.com/a/110136738_473726.

2 2017 下半年，新一轮涨价潮，中小企业倒闭潮？[N]. 搜狐财经，2017-07-19. http://www.sohu.com/a/158371893_463916.

3 中国上市药店打响并购战 安徽等多省药店被席卷[N]. 搜狐财经，2015-09-07. http://www.sohu.com/a/30915403_114967.

4 资本论三卷，第三十章 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

优势，即便 2010 年工人工资有了明显提高，现在的农民工也就每月三四千块，仍旧低得很。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居民难以产生长期稳定增长的消费需求，只能走美国老路，靠提升居民负债水平和房地产来拉动经济。面对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凯恩斯主义改变不了市场经济的命运，宰相经济学也改变不了；靠民间资本拉动不起来，靠股市更是饮鸩止渴。

第二，中国经济表现出明显的国家干预特征，未来必然以滞胀作为结局。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当中，中国经济表现出了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特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较强，通过建设统一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市场、建设国企私企统一的廉价劳动力市场、稳定市场价格、兴建有利于资本发展的基础设施等措施，国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发展繁荣提供了物质保障。中国通过凯恩斯主义建立起全球生成能力最强的"世界工厂"，也成功消除了 2009—2013 年的次贷危机影响，但滞胀是凯恩斯主义的不治之症。资本过剩积累是滞胀产生的基础，滞胀是资本过剩积累的现代表现形式，随着商品过剩和资本过剩同时发生，滞胀最后成为现实[1]。投资拉动一直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中之重，一旦遇到经济下滑风险，政府马上启动投资计划刺激经济，直至最后爆发滞胀危机为止。中国的第一次危机不会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直接就是滞胀。

第三，滞胀是未来全球经济的共同结局。随着未来大萧条的爆发，新自由主义以来全球的过剩资本将对全社会形成剧烈的冲击，各国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将飙升，深受新自由主义之害的拉美、苏东地区将更为严重。不仅如此，全球资本主义还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老龄化。资本主义

1 李成鼎. "滞涨"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今天的表现形式[J]. 理论月刊，1987(9)：52-55。

是无法在雇佣老年人的基础上重获青春的，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繁荣靠的都是残酷压榨心灵手巧的打工妹、打工仔实现的。但整体上，全球的人口红利已经结束，未来人口老龄化将不可避免。如图 1. 40 所示，1950 年全球人口结构仍然以年轻人为主，新生人口很多；但到了 2010 年，人口红利已经释放，青壮年最多，新生人口出现了不足；到 2050 年，全球老年人口规模很大，中青年和新生人口都会出现明显不足。1950 至 2010 年间，发达国家的老年人口从 8%升至 17%，发展中国家也由 4%升至 6%。而到 2050 年，全球将有 60 个国家和日本一样，人口中 60 岁以上的人数超过 30%，其中就包括中国。老龄化将成为资本主义的又一个不治之症，进而导致社会消费需求下降、债务风险爆发。以中国为例，2014 年中国职工养老保险抚养比由 2.97:1 降至 2015 年的 2.87：1，也就是说，不到三个人就得“养”一个人[1]。到 2050 年，中国 60 岁以上人口占 30%以上，我们就按照 30%计算，假定 100 个人中有 30 个老年人，15 岁以下未成年人 15 个，那么成年人为 55 个，也即职工养老抚养比将降至 2：1 以下。按照当前的工资水平，退休职工的工资大约为 2200 元，普通职工工资大约 3000-4000 元，如果按照企业缴费 12%、职工缴费 8%的比例估算，职工每月缴纳 280 元、企业缴纳 420 元，合计 700 元。如果按照当前的三个人养一个人的比例，三个 700 元就是 2100 元，刚好和目前退休工资水平差不多，也就是说现在养老机制基本能够持平，还过得去。但如果到了 2050 年，如果仍按照这一比例缴费，老年人就只能得到不到 1400 元，相当于降低了老年人的养老金水平。但老年人一般是惹不起的，养老金由企业发放转为社保发放就是上世纪末东北的老头老太太堵高速争来的，如果仍然保

1 人社部报告：每三个年轻人养一老人[N]. 联合早报，2016-08-15. http://www.zaobao.com/news/china/story20160815-654185.

持老年人工资水平，那年轻人和企业每月就要多缴纳400-500元。如果企业多缴社保，就将降低利润率，现在企业已经负担很重了，而且国家的政策导向是给企业减负、增强剥削的灵活性，所以最后应是工人承担这一损失。如果工人每月再多交几百块社保，其消费能力会进一步下降，指望打工者借钱买房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经济也会长期保持低迷。更进一步说，工人是不会一直默默无闻的，这种转嫁措施连同工人身上的各种盘剥手段最终会促使工人走向成熟，到时这个负担也未必能加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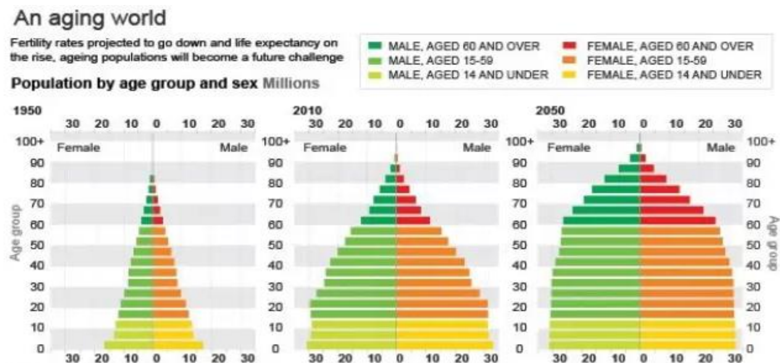


图 1. 40: 1950 年、2010 年、2050 年全球人口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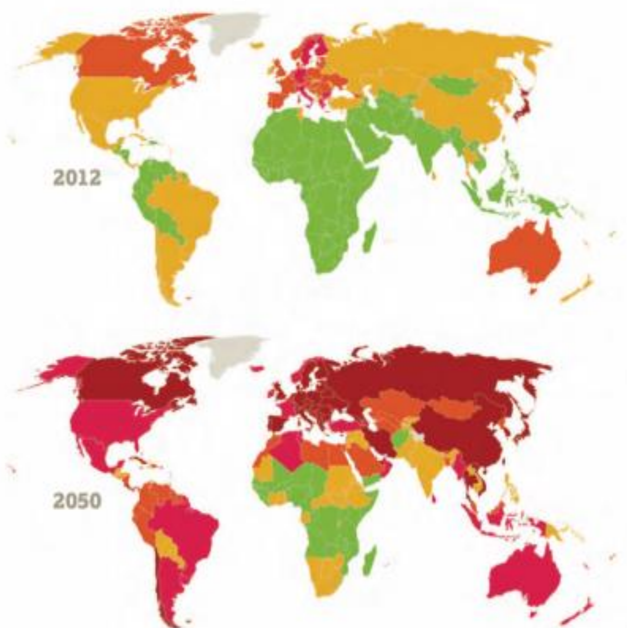


图 1. 41：全球老龄人口比例变化[1]

通过上述分析，对于老龄人口超过 30%的国家，想同时让退休工人、青年工人、资本家满足是不可能的，最后很可能就是大家都割肉、都酝酿不满。因此，对图 1. 41 中红色和深红色的国家（包括美国、拉美、欧洲、中东、苏东、中国、日本、北非和部分东南亚国家）而言，如果到 2050 年，这些国家仍然在搞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不会是生机勃勃的，而是各种矛盾交织、摁下葫芦起来瓢的状态。再看印度、巴基斯坦、中非、南非，这些国家现在就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又屡经战乱、恐袭所困，类似于百年前的中国。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壤滋

1 英媒称中国未富先老 提高退休年龄成必然趋势[N]. 参考消息-北京参考，2014-10-03. http://news.hexun.com/2014-10-03/169051644.html?from=rss.

生了一批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其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 20 多年时间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 21 世纪，信息传播速度和觉悟程度都比百年前中国封建社会要强多了，估计从现在起经过 20 多年时间这些国家也基本都能建立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到 2050 年只可能存在两类国家，一类是资本主义搞得很烂的国家，一类是社会主义有可能成功的国家，不存在市场经济繁荣昌盛的国家。当代的每一个青年都将见证赤旗插满全球的历史进程。

中国房地产问题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地产资本从无到有，发展成了无所不在的庞然大物，其触角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房价之高让人窒息。我们无产阶级关注房地产，不是奢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解决房地产问题，而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地产资本发展的整个过程，从而明确地产资本得以发展的内外部条件，并初步梳理其矛盾运行的特点。

第一节　中国房地产的各阶段

1978 年改革开放后，一系列处于计划序列的产品开始逐步进入市场流通，房屋作为最重要的生活资料，也开始了商品化的脚步。

(一) 地产资本复兴：1980-1991 年

所谓地产资本，即是以房屋作为载体的虚拟资本。

1980 年，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等商品市场，而且应当包括资金、劳务、技术、信息和房地产等生产要素市场。”这是中国地产资本复兴的宣言书。

早在 1979 年，中央就曾在南宁、柳州、桂林、梧州、西安等五市进行尝试，试图以土建价格的成本价将住房出售（房价/年均收入=5），主要对象是干部、侨胞和统战对象。然而由于当时城镇中住房几乎全是福利分房，职工只需要缴纳非常低的租金就可以使用，几乎没有人去买房，甚至觉得买房是一种奇怪的事情。由于效果太差，房子卖不动，1982 年试点停止。

1982 年，中央在常州、郑州、沙市、四平四个城市试点补贴售房，出售价仍为土建价格的成本价，政府、单位和个人各承担三分之一（个人承担房价/年均收入=2 ）。但是由于

国家要给出大量补贴，无法形成资本的有效循环，试点在1985年取消。也就是在此期间，日后在房地产领域中叱咤风云的房地产公司和银行系统，首次登上了舞台[1]。

数次试点之后，从 1986 年开始，中央规定前期的补贴售房全部取消，住宅在原则上必须按全价出售。全价房没人买，这是 82 年已经形成的共识，怎么办？中央准确地认识到，没人买房，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残余——福利分房制度下的低租金。中央决定提高租金，以此促进职工买房。为了减轻职工的阻力，中央决定在提高租金的同时，适当提高职工工资。1986年开始，提租补贴在烟台、蚌埠、常州、沈阳四城市试点[2]。

1986年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仍然很强大。工人在被增加房租的同时，几乎都要求单位增发工资。之前预想的压在工人肩上的高房租，就转嫁到国家财政和企业财政上面。

在此期间，日后土地财政的萌芽在中国已经出现[3]。

此时住宅作为商品已经正式划出计划序列，从法律层面

1 1982年为配合改革，建设银行和人民银行为购建房者提供贷款服务，人民银行提出了试办购房储蓄贷款业务，把发展储蓄同支持住房流通、促进住房消费结合起来。1984年工行成立，人民银行的业务划归工行，1987年，工行总行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直接从事房地产经营。于此前后，建行系统也建立了房地产开发公司）。1984年，国务院召开了“基本建设及建筑业管理体制改革座谈会”。会议提出，各地应组建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对城市建设实行综合开发，明确规定，认定它们“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要求建行提供周转资金。建设银行从1985年起调整信贷结构，单独划出一块资金，在全国范围内开办土地开发和商品房贷款业务。

2 以烟台为例，该市试点期直接将房租提高到1.28元/平米（之前大概为0.12元左右），使得房租大致占未增加工资前的家庭月收入的21%左右（之前2%左右）。同时，通过发放代金券等方式适度减轻职工负担，并且出台各种优惠措施鼓励职工买房。

3 1987年12月，深圳市在我国首次以拍卖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揭开了土地供应市场化的序幕。

上进入流通领域[1]。然而，经济规律不是法权的反映，而法权只能是经济规律的反映。在福利分房制度没有废除的前提下，住宅在法律层面进入流通，并不意味着在经济生活中能够获得认可。1987 年底，房价还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住宅在中国也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商品。

1988 年的中国，提租补贴已经摸索了两年，土地出让已经有了先例，商品房也从法律层面上进入了流通领域。各方面条件似乎都已经具备，于是中央开始了第一次全面铺开的尝试。1988 年 2 月，国务院颁发决定，用三至五年时间，在全国城镇把住房制度改革分期分批推开，鼓励职工购买公有旧房[2]。

正当中国房地产改革的英雄们准备抡起膀子大干一场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中国资本主义改革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

1988 年物价闯关时期通货飞涨，职工纷纷提储变现，使得居民手中的大量现金与国家财政的恶化形成鲜明对比，国家急于通过出售公房回笼一部分资金，结果造成重新回到低价出售公有住房的老路上去，提租补贴的模式就此夭折。1989 年发生 89 风波，政治环境和人民情绪的变化，试图复活房地产市场的改革全面停滞，房地产一片萧条，大量楼盘烂尾，出现中国第一次烂尾潮。

1980 年-1991 年是中国房地产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有一个重要的特征：购房者仅仅是出于居住的需求买房，而不是将其作为出租后获取收益的载体。在这种情况下，房价主要由建筑房屋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3]。

---

1 1987 年初，国家计委、城乡建设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出 16 号文件，明确规定：商品房计划作为指导性计划进行管理。

2 该政策的核心：继续提租补贴；明确将住宅划出计划序列；完善房地产市场和相关金融服务。

3 1992 年前，除少部分开发商开发的房屋外，我国房屋售价主要由房屋成本（建

此时的房价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房屋还不是投机的载体。这是一个美好的时代，没有高房价和投机，没有中介和二房东，现今一切丑陋的东西在那个年代都还难以见到端倪[1]。但这个阶段毕竟是历史的余声，是上个时代的回响，不管它多么美好，它都注定要在资本的喧嚣中落下帷幕。

1992 年是第一个分界点。南巡讲话释放了资本主义的活力，房地产也开始火爆。但这还不是真正的复苏，而只是畸形的需求，由于福利分房制度尚存，住宅市场没有发展空间，大量资金不得不涌入商业楼宇和别墅豪宅，进行击鼓传花式的投机游戏，导致数年后整个房地产市场崩盘。

(二) 第一次过热：1992-1997 年

1) 大背景

房地产的第一次停滞，是随着大的经济背景的转变而来临的；房地产的第一次大跃进，也必将随着大的经济背景的转变而到来。1991 年左右，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大方向基本确定。1992 年邓小平南巡后，资本主义迅猛发展[2]。

1992 年南巡讲话打破僵局后，中国出台大量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税收、金融政策，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迎来飞速发展时期。之前被压制住的投机风潮再次兴起。物资、股票、汽车、地皮都成了投机的载体[3]。

筑安装工程造价+开发费+管理费）和利税构成。假设土地上没有住户和农田，那么拆迁费和补偿费为零。这个时候房价包含：建筑材料的价值（建筑安装工程造价中原料部分）、设计人员工资（勘探设计费用）、建筑人员的工资（建筑安装工程造价中工资部分）和剩余价值（利润和税金）。

1 沿海城市房价也有较高的，主要卖给华侨。但整体的房价还不高。

2 1992 年 2 月 28 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中央当年第二号文件下发，并发出通知，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很多人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

3 吴仁宝一看到邓小平南巡的新闻，当晚就动员村干部动用全部资金，囤积原材料，吴本人一方面四处高息借贷，另一方面到处要指标、跑铝锭。吴协东后来透露，“村里当时购进的铝锭每吨 6000 多元，三个月后就涨到了每吨 1.8 万

在经济过热的大背景下，房地产尤其过热，房地产投资远远高于经济的增长，1993 年经济增长 13.5%，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165%，比值为 12.2。当时整个社会都在迅猛投资，房地产的投资过热仅仅是整个大背景下的一个小舞台。只是由于政策的倾斜、金融机构的支持以及房地产开发特有的杠杆效应，使得它成为了一个最闪亮的舞台[1]。

房地产的第一次大跃进，就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这一次大跃进，是在整个经济转型催生的投资和投机的红利下产生的，是在城镇职工仍然享受福利分房的背景下发展的[2]。也就是说，这次大跃进注定了只是投资推进的、没有真实需求的大跃进，最终只能演化为投机和泡沫。

2) 泡沫的典型：海南

海南的房地产泡沫，是当时中国房地产泡沫的一个缩影。

1988 年海南建省，成为全国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一大堆怀揣发财梦的人涌进海南，盛况空前，当时有一个词形容这种情况——十万人才下海南[3]。

人口涌进导致经营性物业的地租上涨[4]，进而体现为房地产价格上涨。房价一路上扬，很多带着大量资金来海南准备

多元”。炒卖地皮成为最快的暴富手段，一些从北京南下的人靠政府背景拿到一块地，仅凭一纸批文就可以获利上千万元。

1 当时房地产在住宅领域没有真实的需求，投资结构主要为高档宾馆、花园别墅。

2 城镇职工福利分房导致一般职工没有购买需求，购房的主体只可能是私人资本家、部分高收入的个体户等小众化群体。

3 潘石屹回忆说，1989 年他坐船来到海南时，天色已晚，黑蒙蒙一片，第二天醒来，发现一夜之间，岛上已经涌进了 15 万人。

4 按级差地租的理论，不同地段由于资本周转速度不同等因素，导致人口密集地段的经营性资本（商铺、KTV、大卖场等）会获取超额利润，这部分利润就转化为地租。如果土地出让，则地租以地价的形式体现出来。房地产的地租于此类似，大致可近似地看成是不同地段房屋出租后的超额收益导致的。

办实业的投资者，一比较利润，相继转而投资房地产。

各路资金涌向房地产开发，超额利润以地价的形式体现出来，土地价格开始上涨，仅 1991-1992 年，地价就从十几万元/亩飙升至 600 多万元/亩。

地价上涨，使得存量房升值，增量房涨价。海南房价均价，1988 年为 1350 元 / 平方米，1993 年上半年房地产价格高点时为 7500 元 / 平方米。

房价上涨，带动更多的资本涌进房地产市场。海南省 1989 年房地产投资仅为 3.2 亿元，而 1990 至 1993 年间，房地产投资比上年分别增长 143%、123%、225%、62%。高峰时期，这个总人数不过 655.8 万的海岛上竟然出现了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这些房地产公司却并不都为了盖房子，他们买进，再卖出。

然而，在 1998 年之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头上始终悬挂着一柄利剑——福利分房，这导致地产资本在住宅领域始终难有作为，不得不转战高档别墅和宾馆市场。90 年代初的海南，人均工资不到 300，这些高档房产的房价却高达数千甚至上万，普通人群无法企及，既不可能买，也不可能租。房地产的需求出现畸形发展，最终只能成为私人资本家和投机资金之间击鼓传花的游戏。

海南房市是当时中国房市的一个具体而微的代表。住宅领域基础需求薄弱，投资结构偏向高档别墅、宾馆和商业地产，市场参与者多是集团资金，其目的不是最终出租或居住而是倒卖获利，而资金的来源主要是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挪用的资金。一句话，当时的房地产市场就是缺少真实需求背景的投机炒作，既没有购买居住的需求，也没有一个与之相应的租房市场成为其定价的标杆。

这也就注定了当时房地产市场的命运，只要切断基础资金来源，房市就会轰然而倒。1993-1994 年，国家开始调控，首先切断资金，其后针对房地产，限制自有资金底线，禁止

银行和房管局等单位开设房地产公司。

调控迅速见效，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增长率从 1993 年的 102.5% 骤降至 1994 年的 17.92%。海南作为房地产热的重灾区，更是损失惨重。占全国 0.6％总人口的海南省，积压了全国 10%的商品房。海南房地产一蹶不振，直到 2009 年上半年商品房均价还不到 1993 年的价格。

3) 调整中的萧条

1994 年之后，全国经济都进入调整时期，面对前期过热的投资，国家开始限制调整。明确限制开工的写字楼、高档公寓和别墅项目。

1994 年，国家出台政策，明确房地产的发展方向[1]。要求控制高档房地产开发，房地产投资应向基本住宅倾斜。与其配套的是，国家大力推行公积金、个人房贷等房地产金融等制度。

各地为了响应政策，可谓各显神通。在中央政策的基础上，出台各种优惠措施。上海北京等地推出买房给户口，广州等地强行降低土地出让价格，银行体系更大力度推行按揭制度。

然而，福利分房的利剑仍然悬在头上，使得城市住宅需求依然薄弱。

(三) 泡沫形成期：1998-2008 年

1) 突围：终止福利分房

堵不住社会主义的路，就迈不开资本主义的步。有了福利房，商品房就不可能有市场，即使强制通过投资方式推动房地产发展，其后果也只能是使得脱离实际需求的投机兴盛。福利分房作为社会主义的残余，如果不连根拔掉，资本

1 1994 年 7 月国务院颁发《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

主义的房地产就无法兴起。

1998 年 7 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1998 年下半年开始，要求全国城镇停止住房分配。

至此，地产资本终于敲开了他们梦寐以求的个人住房领域，在这个新的起点上，资本大鳄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福利分房终止后，快速城镇化下涌进城市的人口不得不购买商品房或者租房。同期，国家进一步出台政策，要求金融系统全面支持地产开发[1]。

经过了长达四年的寒潮，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上，地产资本的车轮滚滚向前。

1998 年开始，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率和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全面上升。与 1992 年相比，这一次复苏有完全不同的特点。

从结构上看，92-93 年的复苏和高涨，集中在高档别墅和商业地产；98-02 年的复苏和发展，开始大规模发展商品住宅。从供需来讲，在需求端，92-93 年在最终消费端没有实质性需求，特别是从住宅看，当时尚有福利分房；98-02 年形成了实质性消费需求，个人住宅领域完全开放，再也无法享受到福利分房的人们，形成了第一波真实的刚需。

2002 年，土地招拍挂制度出台，接上了中国地产资本版

1 首先是全面放开个人房贷。1998 年，人民银行下发《关于加大住房信贷投入、支持住房建设与消费的通知》，进一步放宽了住房贷款的条件，要求 1998 年新增住房贷款按各行当年新增贷款 15%掌握（1996 年才 3%左右）。允许所有商业银行在所有城镇对所有普通商品住房办理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其后出台优惠政策，准许房贷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下浮。其次是大力支持房地产企业融资。央行在上述文件中，要求对新开工的普通住房项目，只要开发商自有资金达到 30%，商业银行均可发放住房建设贷款，符合安居工程条件且销售率(含预售)达到 75%，银行可按自筹资金与贷款 6∶4 的比例发放安居工程贷款。同时，进一步推行公积金。住房公积金是一种长期性强制储蓄制度，1992 年在上海首建。最后还给予各种税费优惠，减免部分房地产开发税费以降低房地产开发商的开发成本。

图上的最后一块拼盘[1]。招拍挂制度要求所有经营性土地都要竞价交易，土地正式成为商品，进入房地产市场交易。

1984 年，第一批房地产公司成立，于此前后，生息资本与地产结合；1987 年，住房划出计划序列；1992 年，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使得个人储蓄强制性支持地产资本，同期，银行全面介入房地产业务；1998 年，彻底终止福利分房，全面放开个人房贷；2002 年，土地招拍挂制度建立。

至此，房地产市场的主要要素，均已齐备。伴随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人口涌入城市，房价不断上涨。金融系统、房地产商、土地所有者，将在之后的多年里推杯换盏，共享地产资本的盛宴。

2003 年开始，房价开始进入飙升时代。

2) 泡沫在形成：2003-2008

1992 年前后，城镇化的速度并不快，而规模也不大，1992 年的房价高涨，更多的是投机资金大量涌入带来的。而 2002 年后，城镇化从速度和规模来看，都远超 1992 年，大量人口涌进导致租房市场形成，并出现第一批购房的刚需，这是 2002 年后房价第一次大涨的基础。

2003-2004 年，房价快速上涨，引得各路资本蠢蠢欲动。除了传统的生息资本外，海外热钱、产业资本、腐败资金纷纷涌进房地产市场，催生房价高涨，泡沫开始形成。

海外资金大致在 2002 年前后成规模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主要投资一线城市。从总体影响看，2002 年—2006 年左右，外资对一线城市的高楼价有一定影响，但整体资金比

1 2002 年，国土资源部颁布实施《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明确规定包括商业、旅游、娱乐、商品住宅用地的经营性用地必须通过招拍挂方式出让。2004 年，国土资源部颁布《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规定 2004 年 8 月 31 日以后所有经营性用地出让全部实行招拍挂制度。

例应该不大[1]。

产业资本在这期间也开始进入房地产市场。部分资本自己充当开发商[2]；没有开发能力的中小资本直接从产业中游离出来进入房地产的需求市场。在进入需求市场的产业资本，又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利用产业资本带来的利润进入房地产市场，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就是山西买房团和温州炒房团[3]。第二种是产业资本完全撤出实体行业，进入房地产需求市场。这里面有一部分是由于利润率太低而自行撤出，有一部分是由于国家整理产能过剩的小企业而被迫撤出[4]。

除了上述资金外，在房地产的需求市场中，官员的腐败或者由于腐败而得来的资金，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 2012 年的反腐风暴中，持续传出腐败官员的房产数量，一个比一个多，被老百姓戏称为房氏家族[5]。而住建部拟推行房产联网，地方政府也是一拖再拖。直到现在，我国官员到底拥有多少

1 盛阳地产发布的《2005 外资地产基金生态报告》称："像摩根士丹利、SUN-REF 盛阳地产基金、ING 地产、美林投资银行等近 100 家国际地产基金已采取多种渠道陆续进入中国，境外资金占全部房地产投资比例的 3%～5%。"

2 第一财经日报曾报道说，在宁波，"雅戈尔、罗蒙、杉杉、太平鸟、博洋、维科、洛兹、培罗成、申洲制造、爱尔妮，红帮裁缝故乡的这些服装品牌并不满足于一针一线的利润，卖房子成为短期盈利快、门槛低的一个最佳投资行业了"。而且，除了上述这些服装企业之外，"大部分的制造业几乎都开始涉足地产开发了,比如做文具的广博、做模具的海天、做外贸的布利杰以及做铜的金田铜业等。"至于央企搞地产开发更是厉害，以至于中央不得不出面叫停。

3 高和资本与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 2011 年联合发布了一系列房地产和民间资本的调查报告，报告中就提到"温州炒房参与者广泛，其中资金实力强、投资规模大的主要包括以下两类：一是太太炒房团，背后是温州大量私营企业业主的资金支持；二是海外温州商人，这部分人的购房数量占炒房量的相当比例。"

4 高和资本在报告中提到山西整合煤矿企业时，部分资本被迫游离出来转向他方，"一些失去煤矿创富机遇的中小煤炭者有可能将投资转向新兴领域或其他产业，但往往在转型中，可能持续观望或出现投资信心的动摇。"

5 "房叔"蔡彬全家有 20 多套房，"房姐"龚爱爱单在北京就被查出 41 套房子，广东陆丰市公安局党委委员赵海滨被曝出"拥有 100 多套房产"。

房产，始终是一个谜[1]。

2003-2008 年，是房地产市场成熟后的第一个快速发展期。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上涨，以及各种资金花式涌入，这也许让当局想起了不久前海南的地产泡沫。2003 年时中央试图调控房价，将房地产开发项目资本金比例由 20%提高到 35%，同时将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 0.25%。结果房价不但没降，反而快速上涨。到 2005 年，中央加大调控力度，2005 年成了首个大举“宏观调控”之年。政府先后出台调整土地供应、调节市场、信贷结构和开征交易税费等措施；但这么多政策之下，2007 年频现天价“地王”，稳房价的目标实现并不理想[2]。

面对逐步脱离普通人群消费能力的高房价，中央两次调控。然而，这一次，再也不像 94 年那样，能够轻易的调控下来了。地产资本已经完全形成，它有真实需求作为基础，它和银行的结合更为紧密，它为地方政府提供大量收入，它带动中国经济滚滚向前。

此时的房价，已经远远超过人民群众的承受范围了，坊间出现了一个颇有深意的名词——新三座大山（住房、医疗、教育）。

然而，比起之后十年房价的疯狂，此时的房价还不算什么。

(四) 泡沫逐渐成熟期：2009-2018 年

1) 第一次刺激和危机的萌芽：2009-2014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银行呆坏账有上升趋势，房地产企业感到了阵阵寒意。王石说了一句：楼市拐点到了。随后，万科开始在各个城市带头降价售房，回收现金预备过

1 当然，我们还是能从一些新闻报道中窥见冰山一角：有新闻报道称，2012 年大力反腐期间，在江苏、广东多个城市，出现了政府机构人员放盘出售房产的现象。类似的情况也在广州、中山、佛山等地出现。

2 摘自泽平宏观：《房地产调控二十年：回顾、反思与抉择》。

冬。但是王石低估了政府的决心，也料不到中央的滥发货币的大手笔。

面对万科的降价销售，2008 年 9 月 27 日，南京市政府打响“救市”的第一枪，出台《关于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意见》。11 月国务院再次把房地产作为“重要的支柱产业”提上前台。各部门出台配套政策，再加上四万亿的经济配套政策、银行宽松的信贷环境，一系列的刺激因素，使得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触底复苏，2009 年房价大幅上涨，全国平均房价增长率 23.3%，上海达到 56.7%，大幅超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1]。

在此过程中，房地产企业在全国到处拿地，包括三四线城市。2009-2013 年，开放商在三四线城市修建大量房屋，导致库存不断上升。

从海南房地产崩盘来看，泡沫形成至少有两个条件：（1）需求端。房价过高导致真实需求几乎绝迹，房地产市场中的资金全部是投资或投机资金在击鼓传花。（2）供给端。大量资金涌入，开发了远超过市场需求的商品房，形成大量库存。

2009 年后，这两个条件都在逐步形成。

2015 年初，经济增速降至 7.3%。外贸仍然萎靡，上游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稳定经济的重担落在了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的肩上。而此时的房地产，泡沫正在积聚，高房价和高库存并存，2014 年 5 月还首次出现 70 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跌。

怎么办？

房价不能掉，必须涨，只有这样才有源源不断的资本涌

1 2010 年 4 月，中央开始号称“史上最严厉的调控”（这个称号在今后会再次出现）。要求继续综合运用土地、金融、税收等手段来遏制部分城市房价的过快上涨。提高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甚至在部分城市开始限购。其结果是房地产出现分化：一方面，一线城市继续涨，特别是在 2012 年两次降准降息后，其价格在 2013 年快速上涨。另一方面，二三线城市基本不涨。

进房地产投资市场，稳定中国经济。对房价影响的两大因素，一个是房租，这是由人口决定的，另一个是金融政策，即首付比例或贷款利率。中国人口的抚养比在 2011 年后就已经逆转，这使得潜在买房需求的劳动力人口比例越来越小。

剩下只有一条路，反复靠金融政策和行政手段刺激房价饮鸩止渴。

2) 泡沫加剧：2015-2018

2015 年后，中国经济领域两大重要事件之一，就是房地产去库存。国家通过金融政策加行政手段（棚改货币化）全面刺激房地产市场，成功消化掉三四线城市的库存商品房，也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2014 年 9 月 30 号，央行和银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住房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930 新政），强有力的全国性刺激重回历史舞台。

2015 年 3 月 30 号，央行、住建部和银监会发布通知，降低商贷二套房首付比例至 40%。紧接着，央行累计降息 3 次，全面降准 2 次，释放大量货币。

2015 年 9 月 30 号，央行、银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新 930），降低首付比例。次年 10 月央行再度降息降准各一次。低首付叠加低利率，信贷处于空前宽松状态。2016 年以来，一线城市和热点二线城市（如南京、合肥、苏州等）房价暴涨、地王频出，房地产市场局部出现“泡沫”倾向。

2016 年后，棚改货币化接棒。棚户区改造不直接给安置房，而是折算成货币，搬迁户进入房地产市场买房，刺激房产交易重新活跃。配合上政府的金融政策，三四线城市房价开始上涨。几个月前还能全款买房，转眼房价就上去了，后续的搬迁户不得不贷款买房，这使得更多的资金进入房地产需求端。先是，央行 2014 年创设 PSL 并通过国开行、农发

行发放棚改贷款，为棚改提供了丰富的资金来源。棚改货币化安置直接拉升商品住房销售。根据住建部官方口径，2015年和2016年棚改去库存分别约1.5亿平和2.5亿平；按照2015年和2016年商品住宅销售面积11.2亿平和13.8亿平，两年棚改货币化安置消化商品房分别占全年销量的13.4%和18.1%[1]。

2017年以来，三四五六线城市房价频频过万。

房价疯了，中央坐不住了：限购、限售、限资金、结束棚改，一系列调控措施力度空前。地方政府一面配合中央，一面自己打小算盘，各种人才引进、快速落户政策，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支持已经虚高到天上去的房价。

此时的市场，已经失控了。严格的限价政策带来新房二手房价格倒挂，买到新房转手一卖就能赚上百万。多少人在这个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要日子里面，为买一房而丑态百出。

这一轮刺激房价，缓解了供给端库存过高的风险，但加剧了需求端房价过高带来的风险。房价快速上涨，导致三四五六线城市房价都在疯涨，完全脱离老百姓承受能力。伴随高房价，居民部门负债也严重加剧，从2013年的34%，增长到2017年的49%，挤压了居民的日常消费，加速危机的到来。

第二节　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几个特点

2008年是经济危机大背景下的第一次房地产危机，政府通过金融和财政配套刺激救市。其结果是房价大涨，销售快速回暖，居民贷款买房，负债快速上升。同时，地方政府依靠涨价的土地，以此作为抵押大量借贷，搞基建投资拉动经济。

1 《本轮房地产调控的回顾、反思和展望（2014-2018）》，任泽平。

2009 年全年，全国平均房价增长率 23.3%，上海达到 56.7%，大幅超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2010 年 4 月，中央开始号称“史上最严厉的调控”（这个称号在今后会不断出现）。要求继续综合运用土地、金融、税收等手段来遏制部分城市房价的过快上涨。提高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甚至在部分城市开始限购。

调控之后，销售增长率迅速下滑。到 2011 年底，为应对经济下行，开始宽松货币政策，到 2012 年中，央行先后两次降准、两次降息，销售到 2013 年再次回复，一线城市房价大涨。这是本轮调控中的小插曲，反映国家既想刺激经济，又不希望房地产过热的矛盾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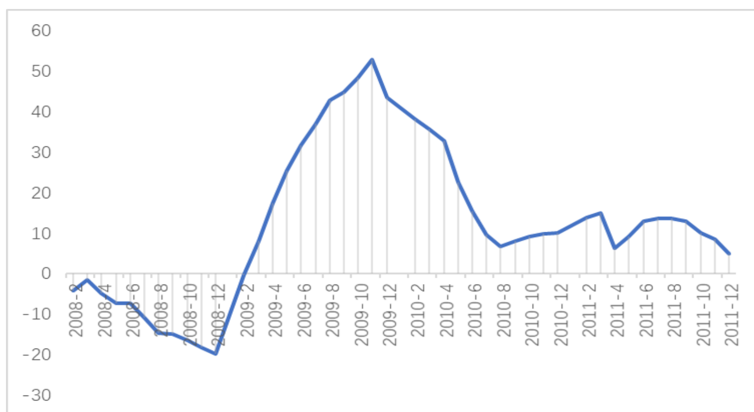


图 1. 42： 2008-2011 年全国房地产销售面积同比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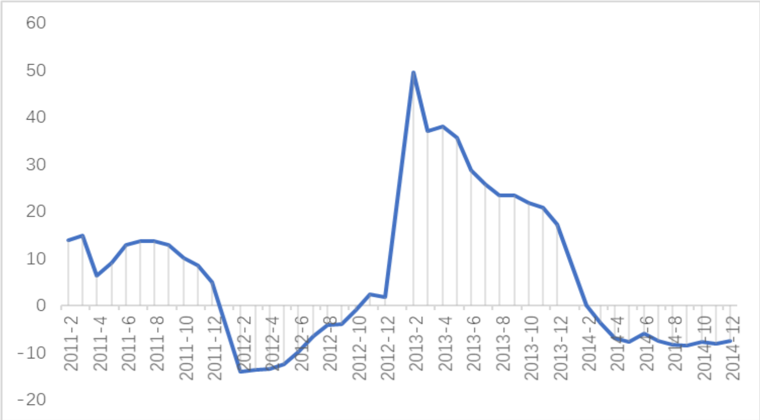


图 1. 43： 2011-2014 年全国房地产销售面积同比增长率

2014 年经济疲软，地产资本出现第二次危机，中央推出最强刺激政策。通过超预期的金融和财政配套刺激房市，同时配合棚改货币化的行政手段。其结果是房价再次大涨，居民负债升至历史高点。其后中央再次调控：限购、限售、限资金、结束棚改，各种手段齐出[1]。销售再次回落。从史上最严调控，到史上最强超预期刺激，再到史上力度空前的调控，仅仅经过数年时间。

1 2016“930”后经历了四波强调控期，调控力度空前。第一波是 16 年 930 至 16 年 12 月，主要特征是一线城市和强二线城市“限土拍”。第二波是 17 年 3 月至 5 月，主要特征是限购拓围到热点三线城市。第三波是 17 年 9 月-11 月，主要特征是二三线城市启动限售。第四波是 18 年 3 月-6 月，主要特征是非热点城市群加入限购或限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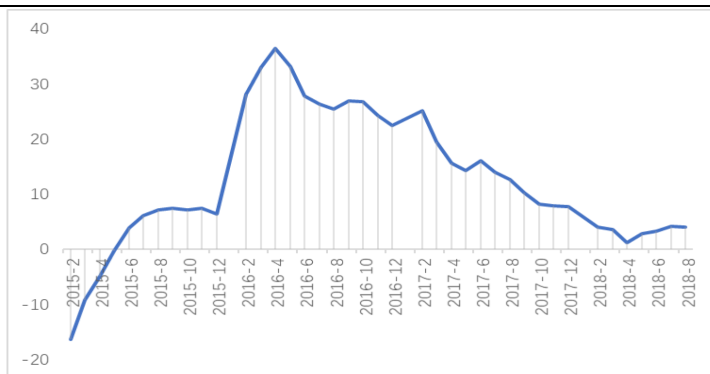


图 1. 44： 2015-2018 年全国房地产销售面积同比增长率

刺激-暴涨-调控-再刺激，中国房地产陷入了恶性循环。每次刺激之后，在极其宽松的金融条件下，购房意愿加剧，销售增加，房价上涨。为了防止暴涨，政府退出刺激政策，开始调控。但上涨的房价不会马上回来，而刚需人群进一步缩减，销售迅速回落。2009 年之后，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发动机是投资。制造业产能过剩，投资意愿下滑。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成为保经济的关键，房地产销售回落，势必影响经济大局。因此，一旦承受下行压力，政府必然再次刺激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这两次刺激房市，都是通过宽松信贷政策等金融方式吸引老百姓买房，将房地产的整体风险转化为老百姓的负债。

两次救市之后，中国地产资本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地产资本的几个重要特点。

(一) 外部条件恶化

从中国地产资本四十年发展史可以看出，地产资本得以发展有两个重要条件：（1）福利分房终止后，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刚需群体。（2）生息资本从供需两端支持地产资本。

这两个条件，都在恶化。其中，第一个条件发生实质性逆转。下面我们将重点论述第一个条件的变化。

1) 人口结构变化导致刚需实质性逆转

刚需群体由于人口结构变化，发生实质性逆转。人口的抚养比——即非劳动人口（老人和小孩）/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从 2011 年底开始逆转，潜在买房需求的劳动力人口比例越来越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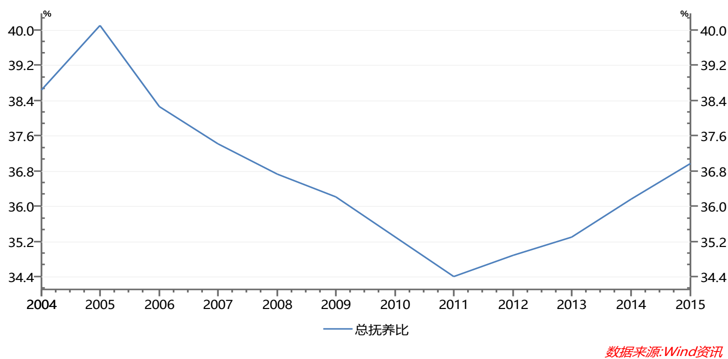


图 1. 45：总抚养比变化曲线

2) 高房价向全国扩散导致刚需群体进一步缩减

现在的房价，不是一线城市高，也不是一二线城市高，而是全国房价都很高。

2008 年前，房地产商在三线城市拿地不到二线城市的 70%。2009 年以来，房地产开发商在三线城市大量拿地，2011 年拿地数量超过一二线城市总和。在两次刺激之后，特别是棚改货币化之后，三线城市房价大幅上涨。

表 1. 1：房价收入比

深圳	39	杭州	15	苏州	12	南通	10
三亚	28	石家庄	15	温州	11	昆明	9
上海	28	南京	14	广州	11	济南	9
北京	26	天津	13	徐州	10	成都	9
厦门	25	郑州	12	廊坊	10	青岛	9
福州	19	合肥	12	重庆	10	武汉	8
珠海	18	宁波	12	南昌	10	无锡	8
海口	15	太原	12	西安	10	常州	8

上表是 2017 年底，32 个主要城市房价收入比，没有一个低于 6[1]。而且该表的房价数据是新建房屋售价，由于很多城市限价，导致新房售价低于真实房价[2]。故此，真实的房价收入比更高。这导致有能力购房的人越来越少。

2017 年底，51 个城市房价过万，2018 年 6 月，60 个城市房价过万。而就在三年前，房价能不能过万，还是二线城市的重要标志。

在房价高涨的同时，居民部门的负债也在不断高涨。

1 按照国际标准，房价收入比（房价/家庭年收入）在 6 以内属于合理区间，一般认为高于 6，则房价过高，脱离普通人群的消费能力。如果比值为 6，表明不吃不喝 6 年能够买房。

2 新房备案价格受到的管制更加严厉，相比之下，二手房受地方政策控制较少、买卖面临的约束更少、市场化程度更高，遵照市场规律涨跌，长此以往，便出现了一二手房价格倒挂现象。

3) 居民部门负债不断上涨导致信贷空间下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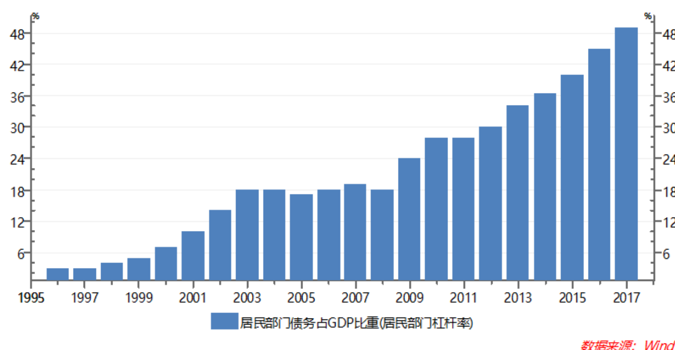


图 1. 46： 居民部门债务占 GDP 比重变化

央行统计显示，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从 2004 年 12 月的 1.6 万亿，暴涨到 2018 年 6 月的 23.8 万亿。整个居民部门贷款占 GDP 的比例，在 2006 年仅有 18%，2011 年增长至 28%，2013 年为 34%，而到 2017 年就暴涨至 49%。

2018 年上半年，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提出了一个“六个钱包买房”论。“六个钱包买房”意思就是丈夫的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加上妻子的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六个长辈家庭共同支持小辈付首付。

此论一出，网上一片哗然。很多人感受到一种由衷的恶心，政策制定者已经不把老百姓当人看了，而只是当作一个要不断榨干的海绵。

人口结构逆转，致使买房需求不断下降；而有需求的人中，有能力买房的（包括掏空六个钱包有能力买房的人）越来越少了，进一步加杠杆买房更加困难；这一切，导致地产资本赖以生存的空间不断变小。

只有真实需求有基本保障，整个地产资本才能良性发展。一旦真实需求枯竭，地产领域中要么是投机资本击鼓传

花的空转（如海南房地产崩溃前夕），要么交易大幅下降逐步引起库存升高和市场萧条（如 2014 年左右的三四线城市），这两种情况最后都会导致泡沫破灭。

面对刚需群体不断缩小的局面，地产资本可能学习香港，推行超小户型，以扩大刚需群体，这将导致底层人民居住条件进一步恶化，激化社会矛盾。推行超小户型，可能延缓地产资本本身的危机，但仍然无法避免整个经济危机爆发后地产泡沫的破灭。

(二) 潜在波及面越来越广

四十年的发展，地产资本与地方政府、生息资本、产业资本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地产资本爆发危机，将迅速波及银行、产业资本和地方政府。

1) 地产资本与政府

地方政府说得好，“吃饭靠第一财政、发展靠第二财政”。其实不是发展，是发财。地方政府靠第二财政大发横财。马克思说，资本从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也沾满了鲜血。“征地→卖地→收税收费→抵押贷款→再征地”是土地财政的典型运作流程，在这个过程中，每年因为土地拆迁而闹出的命案，频频见报。

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储备中心大规模囤积土地，并以此为抵押向金融机构贷款用于各种工程建设。地方债务问题中，土地升值而带来的土地金融就是其中重要的环节。没有房地产发展带来的地价高涨，就不会有上述的这一切，不会有政府的高额土地出让收入，也不会有政府的土地金融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基建。

直到今天，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很高。

首先是债务额度。地方债显性债务大致 17 万亿，隐性债务至少超过 26 万亿。合计占 GDP 的 50%。而这些债务，相当一部分是用土地抵押或要靠卖地偿还的。

其次是土地财政依赖度。土地财政依赖度大致可以理解为卖地赚的钱和收税赚的钱之间的比例。这个比例，在 2017 年超过 100%的城市有六个（南京、杭州、佛山、济南、珠海、武汉），超过 50%的城市，有 22 个（一线城市有北京，剩下的大部分是二线城市和出名三线城市）。这里面还不考虑因房地产的发展而形成的税收，即房地产的营业税等各项税收。从房价构成来看，这些税收合计大致相当于土地出让金 80%。这样计算，地方财政对房地产的依赖度非常高。

一旦房地产崩盘，地价必然暴跌。地方债务和财政收入，都将受到巨大影响。

2) 地产资本与生息资本

银行作为生息资本的典型代表，只有通过和产业资本结合才能分享剩余价值。哪个行业赚钱，银行就借钱给哪个行业，这是生息资本的天性。

2010-2017 年间，在房价不断上涨时期，生息资本追着房地产商放贷。即使政府面对高房价，希望收缩信贷，银行也想尽办法变着花样把钱借给房地产企业。2010 年之后，信托公司的规模之所以大规模兴起，很大原因就是因为银行需要借助信托的通道，把贷款伪装成理财产品出借给房地产公司。

在此过程中，房地产企业形成了大量负债。Wind 数据显示，2017 年全年，136 家上市房企的平均负债率达到 79.1%，创下 2005 年以来的最高位。在这 136 家上市房企中，负债超过百亿元的房企总计为 67 家，占比 49%；负债超过 300 亿元的房企有 37 家，占比为 27%，其中，万科、绿地控股、保利地产位列前三，分别为 9786.7 亿元、7550.8 亿元、5382.1 亿元，负债均超过 5000 亿元[1]。

1 房企负债率创 13 年新高，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0668288475698353&wfr=spider&for=pc.

房地产在其整个发展中，得到了以银行为代表的生息资本的大力支持。银行的生息资本，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支撑着房地产企业的发展。从需求端，银行扩大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从 2004 年 12 月的 1.6 万亿，增长到 2018 年 6 月的 23.8 万亿。从供给端，房地产开发贷款的余额从 2004 年 12 月的 0.78 万亿左右，扩大到 2018 年 6 月的 9.6 万亿[1]。二者合计，超过人民币贷款余额总量的 20%，也就是说，全社会 20%的人民币贷款，拿去支持房地产了。事实上，这个比例可能更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夏斌认为，“从银行授信的品种分析,涉及房屋贷款的有房地产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据官方统计，2016 年底，这两项贷款余额共计 26.7 万亿元，占全部银行贷款余额的 25%。2016 年新增贷款 5.7 万亿元，占全部新增数量约 45%，从字面上看存量的确不高。但银行的压力测试的结果，其反映银行能经受住房价下降 40%的结论并不可靠。理由很简单，以上所说的涉房两项贷款合计占 25%，是按银行的授信品种统计的，而实际操作中银行大量的贷款是以担保保证方式发放的。其中，用房产、厂房、土地做抵押贷款，要占整个贷款的 30%～40%；用担保、互保形式做的贷款占 30%～40%；质押贷款仅占约 10%。其中，这些通过担保及保证方式发放的贷款，其资金来源又通过同业市场，大资管业务、P2P、互联网金融等一道道复杂的环节进入了房地产投资。而真正的信用贷款，只占 20%～30%。从这个角度说，现在的银行能接受的抵押、质押和担保品主要是土地、商铺、厂房、楼房等，机器设备等基本派不上用场。因此，真正和房价、地价相关的贷款占

1 万科总裁郁亮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充分说明生息资本和房地产的关系。郁亮：“我们买地的钱哪来的？集资，投资者给我们钱或我们借钱。设计谁做？请别人做。施工请别人施工，卖房子请别人卖，物业也是请别人管理。那么我们创造了什么呢？好像没有什么。而我们的行业又这么好，会不会有人想着要取代我们？”

比约有 70%左右，甚至更高。在房产属于资产的情况下，如果房产价格下跌 20%或者 30%，意味着巨量的银行贷款将面临贬值的窘境，大量不良贷款将随之产生。”[1]

房价继续上涨，会使得有刚需的基础消费人群进一步降低，最终导致基础需求无法支撑高涨的房地产投机。房企以及很多其他企业的负债很多都是土地和房屋做抵押的，一旦房价下跌，房地产企业以及其他一些企业就会资金链吃紧，还债困难，经济势必将出现巨大震动。

3) 地产资本与产业资本

现在的情况，房价已经远远脱离老百姓的购买能力，要维持房价，只有不断进行金融刺激，也就是说，本质上要大规模发行货币才能继续维持房价。

大规模货币发行刺激房地产，往往与刺激经济的政策结合，通常会带来投资增加，继而带动重化工业产能增长。但这种增长在投资周期结束后就体现为严重的产能过剩。2009年后，轻工业出现较严重产能过剩，逐步波及到重工业。其后，靠投资拉动，延缓了重工业产能过剩。但到 2012 年，重工业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产能过剩。到 2015 年底，重化工行业出现严重过剩。这些过剩产能，与基建和房地产刺激性投资有较大相关性，很多都是建筑及房地产生态圈的产业。下表所列七个行业均与基建和房地产相关[2]。

1 具体参见 http://www.sohu.com/a/231845118_467315.

2 产能利用率低于 80%属于过剩，低于 75%属于严重过剩。而到 2015 年，我国钢铁、原油加工、平板玻璃、煤炭连 70%都不到，水泥也低于 75%。

表 1. 2：2015 年七个行业产能利用率

年份	产品	产能利用率
2015	粗钢	67%
2015	水泥	74%
2015	煤炭	65%
2015	平板玻璃	67%
2015	汽车	78%
2015	电解铝	76%
2015	原油加工	66%

2015 年的产能过剩通过供给侧改革，将损失转嫁到下游民企身上。其结果就是上游国企缓了口气，下游民企要死不活。

从长期来看，不断刺激经济带动投资形成通胀的风险，将是常态。

(三) 滞涨风险加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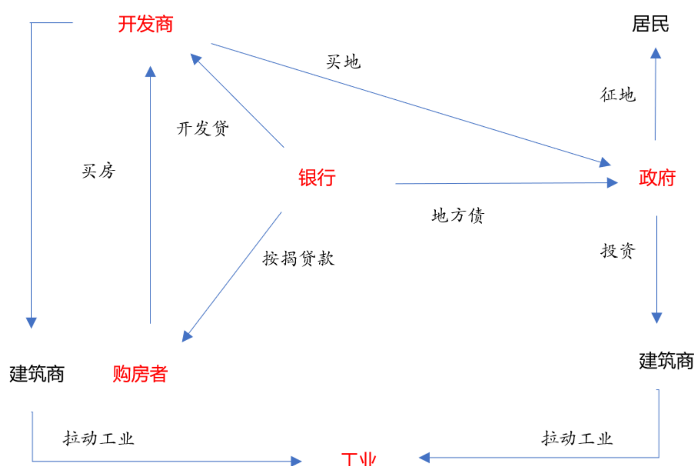


图 1. 47：房地产市场各主体关系图

开发商从银行贷款向政府买地，并将土地抵押给银行，此为房地产开发贷。然后将房屋预售给购房者，购房者购房款大部分是按揭贷款。开发商找建筑商建房，建筑商从水泥钢铁等工业领域购买原材料，拉动实体经济。政府出售土地后，所获资金用于征地。这大致就是房地产的资金循环。房价上涨还会导致地价上涨，政府会将土地抵押给银行贷款搞基建（通过城投公司），拉动实体经济，所负债务是地方债最初的来源和主体。

不论是买房、买地、房地产建设或者基建，大部分的资金都来自银行信贷。近十年来，我国通过银行信贷发行了大量的货币，但物价并没有显著上涨，因为大量资金被房地产领域吸收了。通货膨胀是什么？用资产阶级的话来说，就是“更多的钱去追逐原有的商品”。我国印出来的钱，没有去追逐一般的商品，而是有相当部分去追逐房地产领域中的房屋和土地这一特殊商品。这导致 CPI 涨幅并不大，但房价却暴涨，使得大部分人望房兴叹。到 2013 年左右，房地产实际产量开始饱和，并出现过剩，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下滑。但房地产价格还是在持续上涨，这一方面导致泡沫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又持续吸引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入房地产领域，继续催生泡沫。2015 年涨价去库存，使得房地产价格泡沫从一二线城市，全面扩散到三四五六线城市。

银行借出去的钱，不论是给开发商、购房者或者地方政府的，相当部分是以房屋和土地作为抵押品，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银行将出现大量呆坏账，金融系统可能爆发系统性风险。大量货币将从房地产领域流出，导致中国出现巨大的通胀。通胀再加上产能过剩导致的经济停滞，中国经济将出现典型的滞胀危机。

第三节　小结

地产资本是中国政府一手扶植，伴随着整个资本主义改

革和住房改革而发展起来的。在成长过程中，它和生息资本、土地垄断者（政府）形成了紧密的联系。个人住房商品化、生息资本对房地产的支持和土地财政，是中国地产资本版图上最重要的三块拼盘。而这一切，都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终结和资本主义的改革而到来的。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地产资本从步履蹒跚到具备完整的房地产市场要素，花了 22 年；从定调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1998 年）到成为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不到 10 年；从新的三座大山，到成为给中国经济续命的药丸，也就几年时间。

风险在聚集，危机的要素已经齐备了。

一旦泡沫破灭，房地产将面临崩盘，银行将会形成大量呆坏账，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会受到严重打击，与地价相关的地方债务会出现大面积违约，从而进一步打击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时，房地产带动的行业将受到影响，银行为了自保将收缩银根，中国经济会受到全面影响。

然而，在新的危机来临之前，新生的无产阶级站起来了。

“正是现代大工业把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劳动者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财产、摆脱一切历来的枷锁而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的无产者，正是这个经济革命造成的条件才可能推翻剥削劳动阶级的最后一种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可是现在来了这位痛哭流涕的蒲鲁东主义者，他哀叹工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园是一个大退步，而这正是工人获得精神解放的最首要的条件”[1]。

90 年代以来，大量的新工人涌入城市。2003-2013 年间，每年有 760 万的工人进城。他们建造了整个城市，但是城市却没有他们的房屋。他们只能居住在狭小、肮脏、满是跳蚤和臭虫的工厂宿舍、工棚或者出租屋中。大工业把他们组织

1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

在一起，磨练他们的意志和精神。2009 年以来，在危机和高涨的交替，在失败或成功的斗争中，新一代的工人阶级形成了。

现如今，地产资本经过四十年的成长，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庞然大物。它无孔不入，仿佛侵蚀着社会的每一个细胞。然而，庞大的地产资本仅仅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在房地产领域的体现而已。在这里，我们要明确指出：压迫无产阶级的（脑力无产者和体力无产者）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工人受剥削的关键是：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而资本家通过这种交易来使用劳动力，让工人生产出比购买劳动力所支付的价值多得多的价值。资本家与工人间的这种交易创造出随后以地租、商业利润、资本利息、捐税等等形式在各类亚种资本家及其仆人之间进行分配的全部剩余价值。”[1] 如果不打破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工人受到的压迫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廉租房、公租房、共有产权房，一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的改良都无法解决住房问题。就算国家提供廉租房，甚至是免费提供住宿，只要资本主义的制度不打破，还是不能减少工人受到的压迫。假如国家提供免费住房，那又如何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导致的结果不过是工人劳动力费用降低，进而工资降低。“在这种场合，这个地区的工人阶级便免费享用住房；住房费就不再算入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之内。但是，劳动力生产费用的任何降低，即工人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任何长期降低，‘根据国民经济学说的铁的规律’，也就等于劳动力价值的降低，所以归根到底会引起工资的相应降低。因此，工资下降的平均数量就会相当于节省下来的房租的平均数量，也就是说，工人住自己的房屋还是付了租金，不过不是像以前那样以货币形式付给房东，而是以无酬劳动

1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

形式付给他为之做工的厂主。”[1]

无产阶级绝不幻想在保留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解决所谓的房地产问题。无产阶级所需要的是消灭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消灭和这个制度伴生的一切资本。

1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

第二章　阶级分析篇

中国当前各阶级规模和结构

第一节　中国各阶级规模估算

截至 2016 年，中国人口合计 13.83 亿，就业人员 7.76 亿，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最多，占就业人口 43.50%。

表 2. 1：2016 年从业者按产业构成[1]

	人数（万人）	比例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	21,496	27.70%
第二产业就业人员	22,350	28.80%
第三产业就业人员	33,757	43.50%

按 2015 年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就业人员职业分 8 类，具体如表 2. 2 所示。

根据 2010 年六普的数据，单位负责人 1269 万，其中企业负责人 994 万，体制内负责人 275 万人。2016 年单位负责人 1552 万人，按同比例估算，应有 1215 万企业负责人和 340 万体制内党政事业单位负责人。企业负责人中，有约 220 万国企负责人（见下）。故此，党政事业单位负责人加上国企负责人合计约 560 万，此为国家党政企领导人。

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表 2. 2：2016 年从业者按身份构成[1]

	人数（万人）	比例
单位负责人	1,552	2.00%
专业技术人员	8,847	11.40%
办事人员	7,683	9.90%
商业服务业人员	19,556	25.20%
农林牧渔水利从业人员	21,341	27.50%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18,237	23.50%
其他	388	0.50%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 年数据显示，雇主人数约为 2,170 万人[2]，此作为私营资本家的人数。另外私企员工数与国企员工数的比值超过 10:1，按私企员工数和国企员工数比值 10:1 计算领导职位，由此计算国企负责人 220 万。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 年数据显示，专业技术人员与单位负责人合计 10,399 万人，去除私营资本家、国家党政企领导人数[3],其他均为专业技术人员（含少量中上层经理人员[4]），取整估计约 7,700 万人。

1 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2017.表 3-8。（1)单位负责人，即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包括体制内各级领导人员、企业高管；（2）专业技术人员，包括律师、会计师、教师、科研人员、护士等；（3）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包括行政人员、安保人员（含警察）、邮政电信业务人员等；（4）商业、服务业人员，包括仓储、运输、餐饮、住宿等，主要就是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员；（5）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主要就是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员；（6)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主要就是从事第二产业的人员；(7）军人；（8）无法归类者。上表中，其他一栏包括军人和无法归类者。

2 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2017.表 3-9.其中雇主占比 2.8%。

3 雇主可能被统计到单位负责人中，也可能被统计到专业技术人员中，但基本不可能被统计到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农林牧副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等其他几项。

4 中上层经理人员（如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可能被统计为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阶层，采用上表办事人员 7,683 万人。

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城乡个体工商户合计约 1.29 亿[1]，其中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约为 10,900 万人，第二产业约为 2,000 万人[2]。

根据上表从业人员数量减去各行业个体工商户人员数量，可得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人数。即商业服务业员工约 8,600 万人（从业人员 19,556 万减 10,900 万个体工商户并取整），产业工人约 16,200 万（从业人员 18,237 万减 2,000 万个体工商户并取整）。

自耕农采用农林牧副渔从业人员人数，取整估计约 21,300 万人[3]。农业劳动者有个别非自耕农身份（如农业工人，个体户等），但规模太小忽略不计[4]。

综上得出下表：

1 国家统计年鉴 2017.表 4-9。

2 2013 年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中，个体户在第二产业占比约 12%，见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12/t20141216_653709.html.2018 年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中，个体户在第二产业占比约 17%，见 http://news.chinabaogao.com/gonggongfuwu/201911/11224635162019.html. 据此取中间值 15%，估算 2016 年时个体户在第二产业的比例。个体户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可忽略不计（2013 年占比小于 0.2%）。

3 据刘守英在《中国农地权属与经营方式的变化（2010—2014 年）》中估计，农村农户中，96%左右是耕种面积不超过 30 亩的小农，耕地面积在 30 亩到 100 亩的农户约 3.6%，耕地在 100 亩以上的农户不到 0.4%。假如按 100 亩地划线，大致约 90 万人可归为农业资本家，余下约 21,150 万人是自耕农或农业工人（因为户均人数不一致，此处的估算会有出入）。注意：（1）农民工身份可能包含小农群体（务工为辅助工作），也可能被归类为商业服务业及生产运输从业人员，因此我们没用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数据进行阶层划分。（2）农业资本家已经被归入雇主群体，此处不再单独列出。（3）为方便论述，我们仍然用 19,992 万人作为自耕农的人数。(4)在本文中农业劳动者和其他身份不交叉。

4 2018 年第四次经济普查中，个体私营就业人员中从事第一产业的仅 153 万人，相对于 2 亿的农业人口可忽略不计。

表 2. 3：中国当前就业人员身份构成[1]

	人数（万人）	比例
党政及国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560	0.73%
私营雇主	2,170	2.81%
办事员	7,670	9.94%
专业技术人员	7,700	9.97%
个体工商户	12,900	16.71%
自耕农	21,300	27.59%
产业工人	16,200	20.98%
商业服务业员工	8,700	11.27%
合计	77,200[2]	100.0%

第二节　中国各阶级结构说明

根据第一节的数据我们可以大致得出中国各阶级结构和规模（见 表 2. 4：中国各阶级概览，具体分析见后）。

(一) 雇主和官员

私营企业雇主单独或按出资份额占有生产资料，亲自或通过代理人雇佣工人、组织生产，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私营企业雇主是典型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按前文估算，私人资产阶级约有 2,170 万人。私营资产阶级形成与资本主义复辟历程密不可分。考察他们实现原始积累的方式，可见大中企业主中通过下海和改制完成的达到 50%，小企业主也接近 40%。这个现象与党员在私营企业主比例变化趋势相同，在大企业中，党员比例达到 50%，1996-2005 年下海创业的私营企业主中党员比例达到 40%，而其他时期

1 专业技术人员含中上层经理人员。
2 这里去除军人等不便分类的人员约 400 万。

表 2. 4：中国各阶级概览[1]

	阶级	人数（万人）	比例
党政及国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560	0.73%
私营雇主	私人资产阶级	2,170	2.81%
自耕农	小资产阶级	21,300	27.59%
个体工商户		12,900	16.71%
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和中高层管理人员		1,150	1.49%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脑力无产阶级	6,550	8.49%
体制外办事员		6,970	9.03%
产业工人	体力无产阶级	16,200	20.98%
商业服务业员工		8,700	11.27%
体制内办事员	-	700	0.91%
合计		77,200	100.0%

一般在 30%以下[2]。这说明私营企业主阶级中很大部分由以前的官僚特权阶层转化而来，他们以前是国家干部或企业负责人，通过“官倒”、国企改制私有化等契机完成原始积累成为私营资产阶级，吮吸着人民的血汗。

资产阶级国家是管理资产阶级事务的委员会。在代议制国家，政府官员仅仅是资本家的代理人。这些国家的官员也许薪酬很高（香港政府司长年薪超过 300 万港元），以至于他们成为了资产阶级的一份子，但是他们并不构成资产阶级

1 由于存在较大争议，本文暂未将体制内办事员划归脑力无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

2 《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1978~2018）》。职业流动在同期群变化趋势.P211，表 2；政治面貌在同期群的变化趋势.P213，图 3。在本图中，1995 年前创业党员比例低于 30,1996-2000 约为 35%，2001-2005 达到 40%，2006-2010 约为 30%，2011-2014 不到 20%。

的一个特殊集团。然而，中国的官员却由于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构成了资产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集团——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主要由官员构成，即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干部，以及国企中的高层实权干部。这些人包括：中央政府各部委和直辖市中具有实际管理职权的处级及其以上级别的干部；各省市、地区中具有实际管理权限的科级及其以上级别干部；各级国企中由国家管理的干部和其他高层。按前文估算，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约有 560 万人。

在资本主义国家，官员不必然能构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中国官员之所以能构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因中国有两个特殊条件，一是中国有庞大的国企集团，且国企垄断了国计民生相关的主要行业，二是中国一党专制，并不是代议制政府。

中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不同于西方的官僚集团（主要是文官集团）。西方官僚集团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并不占有以国企为主的生产资料。德法等西方国家也有庞大的国企，某些国家国企在经济中的比例比中国更高。但西方国家的政权却是被私人垄断资产阶级通过议会或选举共同掌握，因此国有企业事实上是被私人垄断资产阶级共同占有，且私人垄断资产阶级大致按其资本体量通过国企的运营来获得收益（直接或间接）。亦即西方的私人垄断资本集团以每个资本集团的体量，按分占有该国的国有企业。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官僚集团以人民的名义占有国有企业，因此国企不属于整个垄断资产阶级，而是属于垄断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故此，西方国家有国企、有官僚，却没有与之对应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每一个个人名义上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用人民的名义通过各级国资委或其他机构，集体占有以国企为核心的生产资料，制定经济

政策、组成生产计划、管理经济运行，并且他们的行为不受人民的监督，这使得他们在事实上能够掌握生产资料、能够支配他人劳动，因此他们也必然会要求获得相应的收益。然而他们在名义上还是人民的公仆，虽以人民的名义占有了生产资料并享有生产资料的支配权，但在法律上不能享有生产资料的收益权，故此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必须通过各种违法乱纪的方式获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他们要么公款吃喝、要么收受贿赂、要么纵容子女经商，通过灰色或违法手段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是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占有剩余价值的重要特点。

官僚资产阶级垄断通过规模庞大的国企垄断了绝大部分能源供应、基础通信、金融信贷、粮食产销、几乎全部城市土地、城市公共事业和各种专有物资买卖（如烟酒等），并在运输、汽车、钢铁和建筑等上游领域举足轻重。他们控住了中国经济的命脉，因此也扼住了私人资产阶级的咽喉。私人资产阶级中的垄断资产家大部分积极融入国家战略，一带一路、5G 战略、中国制造 2025 上都有他们的身影；这些资本家中，对国家战略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已经被国家收编，成为了真正的赵家人，比如华为、腾讯和阿里，他们一方面积极参与国家政务系统等建设[1]，另一方面接受国家统一调控[2]。然而 95.6%的私营企业主是营业额不足 1000 万、雇工小于 100 的小微企业[3]，并且主要分布在竞争领域；他们在经济上孱弱，在政治上无权。

由此可见，中国资产阶级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私人

1 https://www.sohu.com/a/193016341_115239 和 http://www.sohu.com/a/128496749_465914.

2 如马云“退休”https://tech.sina.com.cn/i/2019-09-10/doc-iicezueu4734279.shtml. 任正非是党员。 http://news.ifeng.com/shendu/21sjjjbd/detail_2013_05/10/25148480_0.shtml. 等。

3 第三次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12/t20141216_653709.html.

资产阶级，一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私企雇主是私人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人员，党政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人员。两大资产阶级集团中，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

(二) 自耕农和个体户

自耕农和小业主都拥有并亲自使用自己的生产资料，生产或销售商品并获取收益，他们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

1) 自耕农

当前中国农业绝大部分是小农作业，没有形成规模化经营。农村中有约自耕农 21,300 万人，自耕农绝大部分是纯务农人员，另有少部分是以农业为主的兼业者，二者比例大致为 8:1。[1]市场经济中，小农很容易受到资本的压迫。种子、化肥、收割/播种费用等等，均会由于市场波动而涨价，挤占粮农利润。一家农户，往往也就十来亩地，一年辛辛苦苦最多也就几千块钱，抵不上打工数月所得。自耕农是农村中最底层，收入远低于其他群体。凡是有条件外出打工者，一般不会在家务农，青年务农者非常少。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的兼业者，一般也是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最后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1 《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1978~2018）》P98。

表 2. 5：农村各从业群体年均收入[1]

	2011	2015
纯务农者	7,789	8,411
以农为主的兼业者	15,923	18,382
以非农为主的兼业者	20,266	30,584
打工者	26,951	36,516
农村个体工商户	29,341	36,402
农村企业主	260,579	66,393
农村干部	18,732	31,351

表 2. 6：两类自耕农和打工者平均年龄[2]

	2008	2011	2013	2015
纯务农者	46.82	51.22	50.15	51.84
以农业为主的兼业者	44.02	43.78	46.47	48.74
打工者	35.19	33.78	35.80	37.44

自耕农在经济上的收益远不如打工，农村年轻人逐步转移到城镇，青年一代有过务农经历的人越来越少；随着当前一批自耕农逐步老去，自耕农作为一个阶级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消失。伴随自耕农消失或大幅缩减，腾出来的土地必将以某种方式集中，从事农业的无产阶级将会增多。

2) 城乡小业主

个体工商户，简称个体户，自行占有并使用生产资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中国现有 1.29 亿个体户，约 8600 万在城镇，其余在农村。

1 《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1978~2018）》P107。
2 《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1978~2018）》P101。

表 2. 7：2016 年个体工商户构成[1]

	人数（万人）
城市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	8,627
农村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	4,235

绝大部分个体户集中在第三产业。集中在第三产业的个体户，绝大部分又集中在如下五个行业：（1）批发和零售业；（2）住宿和餐饮业；（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4）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其中，又有将近一半的个体户从事批发和零售业[2]。

农村个体户的收入与农村打工人员（含外出打工）收入大致相当。城市个体户收入明显高于城市平均收入。

表 2. 8：个体工商户年工资收入对比[3]

	个体户工资	对比工资
城市	158,819	75,184
农村	36,402	36,516

中国个体户主要集中在低端服务业，靠起早贪黑挣着辛苦钱。以餐饮为例，某个做餐饮的阿姨说到，“为了买到新鲜的菜，往往早上 5 点就要起床，整理到中午 12 点钟，稍作休整之后 2 点钟就开始摆摊。一天基本无休，除了在家里备菜的时间，摆摊出来后基本上都是站着工作。直到晚上 12 点才收摊，睡下去有时候都一两点了。”

个体户作为典型的小资产阶级，靠超长的劳动时间“自我剥削”，获得稍高于无产阶级的收益。他们受着大资本的压迫，

1 国家统计年鉴 2017.表 4-9。
2 2013 年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12/t20141216_653709.html.
3 城市数据为 2013 年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数据，对比工资为城市社会平均工资；农村工资为 2015 年调查数据，对比工资为当年调查的农村户籍打工者年收入。

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地位随时可能下滑为无产阶级。

(三) 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二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成为了技术专家或位居管理职位，他们领着明显高于无产阶级的薪酬，享受着比无产阶级优越的工作环境，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比无产阶级更高。按照一般理解，专业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不占有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属于被雇佣人员，该归属于无产阶级。同时，由于他们出卖劳动力后，进行劳动的主要方式是脑力劳动，因此应归属于脑力无产阶级。然而有人提出质疑，比如企业部门经理年薪动辄数十万，在企业中有权有势，划为无产阶级似乎不太合理。怎么认识这群人的阶级属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列宁曾给出阶级科学的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从四个维度划分阶级：在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取得财富的多寡（这是由前三个因素决定的）。也即是说，不能仅从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来划分阶级。

我们以生产型企业管理人员为例。企业管理人员从低到高形成一个序列，最低的管理人员是一条拉的拉长，其次是数条拉的领班，接着是一个车间的主管，再往上是整个生产部的部长，然后是分管生产的副总，最后是公司总经理（假定是没有股权的职业经理人）。这些管理人员都不直接占有

生产资料，然而他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却并不相同，因此他们取得财富的多寡也不相同。

从列宁指出的四个维度分析，越是高级的管理人员，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所处的位置越有利、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越密切、在劳动组织中越能起到主导作用，因此获得的财富也越多。也就是说，从低级管理人员到高级管理人员，构成了一个量变到质变的序列。最底层的管理人员，不论从生产中所处地位、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在劳动组织中的作用以及取得财富的多寡，都与普通员工差异甚小，他们应该划为无产阶级，其中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群体应划为脑力无产阶级。最高层的管理人员（如企业副总经理和总经理），如果其收入多为工人的剩余价值（2017 年上市公司总经理平均薪酬 82 万），则可划为资产阶级。对于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而言，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处于这样的位置，他们不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他们却一定程度上拥有生产资料的“使用权”（部门范围内的），他们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志组织生产，雇佣无产阶级并监督无产阶级使用生产资料，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处于比无产阶级更高的地位，能够支配和占有一部分社会劳动，因此他们也获得了与自己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相适应的较为优厚的收益。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应该划归小资产阶级。一般而言，企业职能部门正副职领导均有一定的招聘权、组织生产和执行生产的决策权等等，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部门员工薪酬奖金的分配，因此企业职能部门正副职以上级别领导人员应划为小资产阶级。

同样的道理，专业技术人员也应该分情况处理。我们以专业技术人员中医护人员为例分析专业技术人员的阶级属性。医院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地方，从最底层的护士和护师，到刚执业的医生，到副主任医师，到主任医师，到科室主任，再到副院长和院长，这些专业技术人员构成一个序列等级。

院长、副院长、药房主任、科室主任等，在人事、行政、财务和药品采购等重大事项上具有决策权，能够通过各种方式获取巨额收益，他们应该划为资产阶级。医技、护理、行政等工作人员，他们是医院的主体，他们每天从早忙到晚却工资微薄，他们应该划为无产阶级，由于其劳动方式主要为脑力劳动，故此应归入脑力无产阶级。而还有一部分人，即副主任医师以上而不具有医院管理权的医生，他们也能够通过开药拿回扣，也能够每年拿科室的分红，这群人应该划为小资产阶级。

根据前文，除去被重复统计的私人业主等人员后，专业技术人员合计 7,700 万人[1]。专业技术人员中，教师、医生、技术员和经济专业人员合计占比超过 90%，其中教学人员和医疗卫生人员合计占比 62%。我们通过教学人员和医疗卫生工作人员来估算专业技术人员中小资产阶级的数量。重庆中小学教育系统中副高[2]以上职称比例大致在 15%左右[3]；医疗系统中能开药拿回扣的医生大致占医院系统的 10%-15%[4]。我们以此估算，专业技术人员中大致应有 15%的人可划入小资产阶级，即 7,700 万专业技术人员中，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有 1,150 万人，属于脑力无产阶级的有 6,550 万人[5]。

1 包含了中上层经理人员，但 7700 万人中绝大部分是专业技术人员。

2 教学人员按职称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副高、正高），每个等级里面又分成数个细项。不同等级的教学人员，在教学任务、经费申请、基本待遇等各方面都有不同。一个大学工科教授，可以通过项目申请获得上百万的经费，而他所带的研究生就成了他剥削的廉价劳动力，这些大学教授毫无疑问应该归为资产阶级。一个小学初级教师，每月薪酬数千元，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为评职称而疲于奔命，这样的人无疑应该划为无产阶级，因此劳动的主要方式是脑力劳动，故此属于脑力无产阶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些人评上了副高或高级职称，但又并不剥削他人。这些人是教学专家，在制定教学计划时有一定的话语权，可以通过补课等方式获取额外收入。

3 http://www.ccpc.cq.cn/home/index/more/u/jygk/id/208590.html

4 http://bbs.tianya.cn/post-funinfo-2145697-1.shtml

5 属于资产阶级的极少，并有可能被统计到管理人员中，估在此忽略不计。

表 2. 9:专业技术人员构成[1]

	比例	备注
教学人员	39.5%	初等、中等学校教学人员为主
医疗卫生技术人员	22.5%	医生以及医疗系统管理人员
工程、农林技术人员	17.9%	包括程序员在内
经济业务人员	12.8%	统计、会计、审计等人员
其他人员	7.3%	文体、法律、科研等人员

(四) 办事人员

办事人员由两大类构成，一是体制外办事人员[2]，二是体制内办事人员（基层公务员）。

体制外办事人员主要包括行政事务人员（文秘、打字员、收发员、制图员)、保安人员、邮政人员（分拣员、投递员等)、电信人员（营业厅服务员、话务员）等等。体制外办事人员不占有生产资料，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工资，从事没有技术含量也没有管理职责的工作，是典型的无产阶级，因其从事劳动的方式主要是脑力劳动，故此属于脑力无产阶级。这部分人员大致在 6,970 万人。

体制内办事员主要是基层公务人员，即各级党政机关公务员和行政执法人员（含警察)。按在编公务员估算体制内办事人员，规模应在 700 万人左右。

对这一部分人，应该怎么划分阶级，是存在较大争议的。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划为脑力无产阶级，因其不占有生产资料，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本文作者认为，基层公务人员是一个保守的群体，他们在本地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大小“老板”建立了各种关系。他们中一部分人掌握一定的生产管理职能（如发改委）或与生产相关的职能（如安监、劳动)，能

1 社科院历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调查数据。

2 秘书、公关、打字员、收发员、邮递员、话务员等等。

够直接或间接管理生产。他们中还有一部分人甚至直接代表着官僚体系的意志，执行着本质上是压迫人民的任务，充当官僚集团的帮凶[1]。这样的一个群体，不宜直接划为脑力无产阶级，而应该做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根据其情况作出更准确的划分。

(五) 工商业员工

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人员，不占有生产资料，出卖劳动力获取工资，从事直接操作工作或低端服务工作，技术含量低且无管理职能，是典型的无产阶级。

工业无产阶级合计 16,200 万人，主要分布在城市，少部分在农村，工业无产阶级中有约 1000-1500 万国企工人。商业无产阶级合计 8,700 万人，主要分布在城市，少部分在农村，商业无产阶级中有约 2000 万左右国企职工[2]。

产业工人中，农民工是绝对主体。按社科院调查数据，第二产业中，国企职工占比为 12.9%，其中半数以上是城镇户口工人。私企职工占比 87.1%，其中约 9 成是农民工。农民工在国有单位和私人单位的工资均高于城市职工，这和我们的一般印象不同。农民工平均教育年限很低，私企职工 7.89 年，即初中辍学；国企农民工 9.53 年，即高中辍学。城市工人平均教育年限较高，私企工人至少上完初中，国企工人平均接近上完高中。

全国商业服务业工人合计 8,700 万，服务业中农村户籍

1 中国在编警察约 200 万。

2 按统计局数据，城镇国企第二产业工人合计 564.3 万人，约 1250 万人从事第三产业（不包含医生等）。二者合计占城镇就业人口 4.38%。另按财政部发布的《2013 年全国国有企业财务决算情况》，截至 2013 年末，中央企业下辖 5.2 万家企业，地方国有企业 10.4 万户，国企职工合计 3700 万人，该数据明显高于统计局公布数据，按该数据，国企职工占城镇就业人口 8.93%。二者差异可能源自统计局口径问题，导致一些国企控股单位并未纳入统计。此处我们沿用财政部数据。

人口将近 7 成，如果仅算低端服务业，其比例更高[1]。大量私营企业或个体户，均从事低端服务业，且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餐饮住宿等行业。约有一半人从事批发零售业务，如加上住宿餐饮，比例约在 60%-70%之间。中国商业服务业雇佣规模很小，平均仅 2.5 人；2006 年后，以小旅馆、小餐厅为代表的低端服务业快速发展，从业人员比例由 1.0%，发展到 2015 年的 12.1%，并由此带动了低端服务业整体就业人员数量的增加，如饭馆、餐厅、快餐部、咖啡馆、酒吧服务人员的比例由 2006 年的 0.1%，发展到 2015 年的 4.3%。[2]

无产阶级数量庞大且相对集中，工业无产阶级比商业无产阶级的集中度更高。工业无产阶级主要集中在一些大的城市群的工业区，商业无产阶级既分布在城市主城区，也有部分分布在各城市的工业区。单个工厂或商业机构雇佣人数方面，工厂的平均人数远高于商业机构。

第三节　小结

走资派上台后，利用其政治上的优势地位重塑其经济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走资派在推行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也逐步腐化党政军高级干部，使其蜕变为了压迫人民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以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核心的中国垄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垄断一切权力，在经济上推行有利于资本不利于人民的“改革”政策。在走资派的扶植下，城乡资产阶级从无到有，重新骑在工农头上作威作福。经济上，他们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羽翼下剥削人民，政治上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附庸。

小资产阶级的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农村自耕农作为传统小资产阶级在分田单干后重新复活，但人口年龄大幅上升，

1 我国有少量高端商业服务业职位，如金融和房地产，主要被国企、外资和垄断私企把持。

2 《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1978~2018）》，P51。

且青黄不接，很可能成为中国最后一代自耕农。自耕农在政治上视野局限，往往趋于保守。但面对资本、乡村黑恶势力（宗族势力）以及乡村官僚等多种势力的压迫，他们也会反抗。城乡个体户从无到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但不断分化的群体，构成小资产阶级的重要部分。他们渴望靠个人打拼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现实又常常迫使他们不得不团结起来。2016 年温州某处 20 多名店主在翁某带领下通过拉横幅、喊口号等方式要求房东降租（最后带头人员被政府行政拘留）。2018 年，全国各地卡车司机（多是个体户）迫于垄断资产阶级的压迫（满帮集团），发起了全国性的斗争。以专业技术人员、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和公务员为主的"中产阶级"群体迅速壮大，其中少部分人属于小资产阶级，多数人属于脑力无产阶级。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专业技术人员在经济上处于更为优越的地位，但不满和不安始终伴随着他们，无产者化是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整个资本主义体制下，他们又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属于脑力无产阶级受到的压迫似乎更大，他们普遍存在加班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的情况。互联网行业的"996"（工作早 9 点到晚 9 点，一周工作 6 天）是常态，并时常发生过劳死的案例。一旦他们试图反抗，必然会遭到资本家千百倍的报复。"毕业 985,上班 996,离职 251,维权 404"[1]，这就是新兴小资产阶级和脑力无产阶级被垄断资产阶级压迫的共同写照。

工商业无产阶级从国家的主人沦为雇佣劳动者，其内部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城市国企工人从占绝对多数变成了相对少数，商业无产阶级的比例大幅上升。工商业无产阶级受到的压迫是最严重的，他们工作时间最长[2]，而工资最低[1]。

1 985，指中国著名高校的统称；996，指朝 9 晚 9、一周 6 天的工作日；251，指华为前员工李洪元离职后被羁押 251 天；404，指网站无法访问的错误信息代码。

2 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最普遍的工作状态是五天八小时，即每周 40 小时工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八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九十年代国企工人反对私有化的斗争、新世纪新工人的工潮，都是人民反抗垄断资产阶级的斗争。然而，在高度组织化的官僚资产阶级面前，人民的反抗还是零星的，真正的战士还在集结。

改革开放四十年，除培养了庞大的资产阶级外，还培养了数量远比资产阶级更为庞大的无产阶级。正如马克思所说，其他一切阶级都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而消亡的，只有无产阶级却随着资产阶级的壮大而壮大。中国的小农面临着消亡，中国的个体户每天都在分化，而无产阶级这个群体却在不断壮大。伴随着经济危机暴风雨逐渐到来，未来各个阶级都会为各自的利益而斗争，但是所有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小资产阶级也受到资产阶级的压迫，也没有民主的权力，也渴望反抗并且在反抗着。但是，他们的诉求本质上是限制资本而不是消灭资本，他们在冲锋的时候总不时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那一份家业，他们时刻动摇在革命和改良之间。无产阶级无时无刻不遭受资本的压迫，他们除了“人身自由”以外一无所有，他们没有坛坛罐罐的羁绊，他们冲锋的时候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他们必须消灭私有制本身才能获得最终的解放，他们是最革命的阶级。

斗争的风暴越来越近了，2018 年塔吊罢工和卡车司机罢工，仿佛就是风暴的前奏。在这么一个时刻，对中国各个阶级做出详细的分析是非常必要的。本文初步估算了各个阶级的规模，并大致分析了各个阶级的结构，这是阶级分析的第一步。接来下，希望有更多的同志能够参与其中，在调查研

作。但服务业工人和产业工人普遍工作状态是每周超过 48 小时。

1 从 2016 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看，全部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 57,394 元，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工资为 123,926 元，专业技术人员工资为 76,325 元，办事人员工资为 54,258 元，第二产业工人工资为 48,005 元，服务业工人工资仅为 46,742 元。

究的基础上，对各个阶级做出更准确的研究，理清不同阶级与政权的关系、对市场经济的态度、当前和未来的主要诉求，进而判断他们在未来爆发的革命中可能采取的态度，并据此制定自身的策略和方针。

中国资产阶级分析

中国资产阶级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以党政军企事业单位高级干部为主体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其二是以民营企业所有人为主体的私人资产阶级。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有如下特点：（1）在经济层面，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各行业的垄断程度很高，并且控制了国计民生相关的主要产业。（2）在政治层面，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垄断了几乎所有的政治权力。（3）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受益来看，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占有以国企为主的生产资料，并按照各自在官僚体系中的地位分享剩余价值。

私人资产阶级有如下特点：（1）在经济层面，私人资产阶级主要分布在竞争性行业，难以介入国计民生行业。（2）在政治层面，私人资产阶级不享有政治权力，仅仅能够按资本体量享受一定的政治身份。（3）从私人资产阶级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关系来看，两者间的关系因私人资产阶级资本体量的大小而不同，其中私人资产阶级中的垄断资产阶级，逐步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吸纳，成为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特殊成员。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窃取了人民的政权，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使得工农再次沦为资本的奴隶，他们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劳动人民的最大敌人。但是，由于现今无产阶级的主体已经变为新工人，他们又多数受雇于民营企业，因此当他们在斗争时，首先碰到的往往是私人资产阶级。而作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暴力工具的国家机关，有时还以一种超阶级的态度、貌似公正地处理劳资纠纷，这就会给无产阶级一种错误的感觉，即他们的敌人似乎仅仅是私人资产阶级，而不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因此，理清资产阶级两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以及他们对待无产阶级的态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一节　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以国有资本集团为主要经济基础，国有资本产出占 GDP 比例在 3 成左右；私人资产阶级以民营企业为主要经济基础，民营资本产出占 GDP 比例超过 6 成[1]。

(一) 中国垄断资本的现状[2]

不论是制造业 500 强，还是服务业 500 强，亦或是中国企业 500 强，国企均占有主导地位。

1) 制造业 500 强

a) 基本情况

2018 年，中国制造业 500 强合计收入 31.84 万亿，净利润 8177 亿，纳税 1.6 万亿，纳税额占全国税收的 11.06%。

在 500 家垄断制造业寡头中，国企占比不足 1/3，但资产占比却超过 6 成，在制造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表 2. 10：制造业 500 强所有制结构

	数量	收入	利润	资产
国有占比	32.80%	55.65%	38.22%	65.13%
民营占比	67.20%	44.35%	61.78%	34.87%

b) 行业结构

重化工业在制造业 500 强中占重要地位，排名前十的制造业企业除华为外均为重化工行业[3]，且国企占据 8 席。

1 本文分析不含外资。2016 年数据，外资和港澳台企业就业人数合计约 2700 万人，由于统计数据口径问题，实际数量可能超过此数。

2 本部分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18 中国 500 强企业发展报告》和全国工商联经济部发布的《2018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调研分析报告》分析得出。

3 前十为：中石油、上汽、东风、华为、五矿、正威国际（有声金属）、北汽、一汽、兵器工业集团、航空工业集团。

制造业 500 强中黑色冶金占 76 席，汽车及零配件占 31 家，在这两大行业中，国企均占据重要地位。

表 2. 11 制造业营收和利润前五的行业

行业	收入（亿）	收入占比	行业	利润（亿）	利润占比
黑色冶金	45916	14.42%	汽车及零配件	1202	14.07%
汽车及零配件	43187	13.56%	黑色冶金	1156	14.14%
石化及炼焦	32051	10.06%	家用电器制造	657	8.04%
一般有色	28040	8.81%	石化及炼焦	398	4.87%
化学原料及制品	14092	4.43%	电力、电气设备制造	364	4.45%
合计	163286	51.28%	合计	3777	46.20%

2) 服务业 500 强

a) 基本情况

2018 年，中国服务业 500 强利润合计 25936 亿元，雇佣员工超过 1500 万，纳税合计 18914 亿，占全国税收的 13.13%。服务业 500 强中，国企数量超过一半，收入和利润占比均超

过 7 成。

表 2. 12：服务业 500 强所有制结构

类型	数目	收入（亿）	利润（亿）	员工合计（万）	纳税（亿）
合计	500	33798	25936	1514	18913
国企	261	24234	19497	1150	13212
民企	239	9564	6439	364	5701

b) 行业结构

服务业 500 强中，利润超过 100 亿的共计 37 家，最大 37 家净利润 20998 亿元。37 家企业中，有 21 家金融机构[1]，2 家电网，5 家房地产（恒大、碧桂园、富力、龙湖、万科），2 家电信，4 家互联网（BAT+网易），以及华润、招商局和上海国际港务。

上述企业中，国企在金融、电网、电信中占据垄断地位，华润、招商局和上海国际港务亦为国企。民企在房地产和互联网行业占主导地位。但是，服务业中盈利能力最强的是商业银行。500 强中有 45 家商业银行，利润合计 14600 亿元，占服务业 500 强利润的 56.29%，而最大的六家国有银行，利润合计 10763 亿元，占服务业 500 强利润的 41.50%。可见，国企垄断了服务业中最赚钱的行业。

3) 中国企业 500 强

a) 基本情况

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合并计算，中国最大的 500 家公司控制了 52189 家全资子公司、11581 家参股子公司和 14202 家分公司，营业收入 71.17 万亿元，雇佣员工 3191.34 万人。

1 14 家银行，7 家非银金融机构，大部分为国企。

这 500 家企业中，263 家为国企，其收入和利润占比均超过七成，纳税贡献更是高达 8 成。

表 2. 13 ：中企 500 强和民企 500 强分结构对比

	收入（亿元）	净利润（亿元）	纳税（亿元）	员工数（万人）
中国 500 强	711700	32029	40200	3194
263 家国企	509008	22494	32526	2460
237 家民企	202692	9535	7674	734
民营 500 强	281932	11321	10254	951

表 2. 14：中企 500 强分所有制结构对比

	收入	净利润	资产	净资产	纳税	员工数
国有占比	71.52%	70.23%	87.39%	80.52%	80.91%	77.02%
民营占比	28.48%	29.77%	12.61%	19.48%	19.09%	22.95%

b) 行业结构

中国 500 强行业分布中，前十大行业提供了 80%以上的利润，其中前四大行业均为服务业，合计提供利润 63.27%。

上述行业中，国企在银行、金融、电网、电讯占有垄断地位，控制经济上游。

表 2. 15：前十大盈利行业数据

	企业数量[1]	企业数量排名	净利润（亿元）	净利润占比
商业银行	17	7	14600	45.58%
住宅地产	25	3	1983	6.19%
互联网	12	10	1863	5.82%
多元化金融			1820	5.68%
汽车及零配件	18	5	1197	3.74%
房屋建筑	40	2	1098	3.43%
黑色冶金	46	1	1015	3.17%
电讯服务			903	2.82%
电网			829	2.59%
家用电器制造			667	2.08%
合计			25975	81.10%

(二) 国有企业

国有资本集团分央企和地方国企两大类。

截至 2013 年末，中央企业及其下辖企业共计 5.2 万家，地方国有企业及其子公司共计 10.4 万户[2]。除金融企业外，2017 年，中央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76.2 万亿人民币，2017 年，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107.3 万亿。

1) 央企

央企是国资集团的核心，主要分布在基础行业、支柱行业和命脉行业，全面掌控中国经济的上游。

央企按归口单位分为三类：国务院直管央企、国资委直

1 企业数量仅统计前 10 的行业，另有煤炭采掘及采选 17 家，电力电气设备制造 16 家，石化及炼焦 17 家，一般有色 23 家。

2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2013 年全国国有企业财务决算情况》。

管央企和财政部直管央企。

a) 国务院直管央企

国务院直管两家央企，即中投公司和国家铁路集团，行政级别正部级。国家铁路集团即为原铁道部，下辖庞大的铁道系统，控制整个中国的铁道运输。中投公司是平台公司，除部分海外业务外，主要通过中央汇金管理中国庞大的金融国资系统。

b) 国资委直管央企

截至 2018 年终，国资委直管企业约 96 家，此为狭义的央企。96 家央企中，49 家为副部级单位，正职由中央组织部任命，领导班子由国资委企干一局管理；另外 47 家为正厅级单位，领导班子由国资委企干二局管理。

2003 年组建国资委，有 184 户央企划归国资管辖，其中将近 1/3 的央企分布在一般竞争性领域[1]，经过十多年改革，央企基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集中到基础行业、支柱行业和命脉产业中。

c) 财政部直管央企

由财政部直接或间接持股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央企称为金融央企，包括三家政策性银行[2]、五大国有银行[3]、四大资产管理公司[4]、五大保险集团[5]、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五家大型金融控股集团[6]，共计 23 家公司。

1 除支柱产业（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和高科技之外的竞争行业。

2 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进出口银行

3 工农中建交，即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

4 华融、长城、东方、信达。

5 出口信保、人寿保险、太平保险、再保险、人保。

6 中信集团公司、中国光大、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这些金融央企总资产约为 134.6 万亿元，大约分别为同期国资委央企的 4.26 倍。

2) 地方国企

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国有经济要控制涉及国家安全行业、自然垄断行业、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除央企外，地方国资亦有相关布局。

a) 省级国资

地方国企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省级国企。2011 年底，省级国企数量约为 900 家，资产总额约为 19.07 万亿元[1]。省级国资主要分布在能源资源[2]、原材料[3]、运输设备和装备、交通航运等行业。

b) 市级国资

首先，市级国资主要分布在基础行业和公共服务领域，如城市供水、供气、供热、公共交通和公共设施等行业和领域。比如武汉市近 8 成的国有资产集中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其次，地方国资一般会成立土地整备公司，囤积大量土地并出售，是房地产行业的重要一员。最后，地方国资会根据自身情况培育支柱产业。

c) 平台公司

投融资平台公司是特殊的地方国企。2009 年后地方大肆成立平台公司，至 2013 年左右，共有约 7000 个融资平台公司成立[4]。平台公司政企不分，任职人员多具有较强的政府背景，最初主要是执行政府意志，帮助政府获取资金。平台公

1 大致是同期非金融央企资产的 60%。

2 电力、煤炭等行业。

3 钢铁、有色金属以及建材行业。

4 以城投债为主体的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在 2013 年规模大致为 20.69 万亿元。

司发展极快，将近一半的地方国资都分布在来自地方投融资的平台企业中。

从政企关系来看，地方政府对地方国企干预程度要大于中央层面。地方国资管理机构的独立性较小，受地方政府影响较大；地方政府往往主动调整国有资本布局，比如将国有资产大量注入地方融资平台用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

3) 国资集团的特点

a) 垄断程度高且掌控经济命脉

i) 央企

央企通过其布局，有力地垄断了中国经济的命脉和基础。通过铁路集团及其配套企业[1]，其垄断了整个中国的铁道运输。通过其他运输集团，布局海运和航运渠道[2]。通过 9 家上游发电集团[3]、两大核电集团[4]，掌控了全国 50%以上的发电量，并通过两大电网[5]，垄断中国用电。通过三桶油[6]，垄断整个中国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并垄断了几乎全部的乙烯生产。通过中粮、中储粮，垄断控制全部粮食购销。通过移动、联通和电信，垄断通信基础领域。通过中央汇金下辖的五大行，垄断中国绝大部分的信贷资源。通过航空航天[7]和兵器工业[8]掌控或垄断和军事工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行业。通过各种

1 铁路通信集团、铁路物资集团。

2 海运集团为中海运；航运集团为东航、南航、中国航空；此为另有航空配套企业，民航信息集团、航空油料集团、航空器材集团。

3 5 大发电集团（国家能源集团、华能集团、国家电投集团、华电集团和大唐集团）、三峡集团、中煤集团、中国电力、中国能源集团。

4 中核集团、中广核。

5 国家电网、南方电网

6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

7 航天科技、航天科工、航天工业、航空发动机、商飞。

8 兵器工业集团、兵器装备集团。

专卖公司[1]，控制特殊物品买卖。

ii) 地方国企

省级国企在能源运输等行业有重要布局，是央企在相关行业的重要补充。市级国资通过公共事业，垄断了自来水、燃气、交通等多项民生产业。地方国企还通过各种土地储备公司或城投公司，垄断了几乎全部城市土地。

b) 在支柱产业和上游产业占重要地位

支柱产业，指规模大、带动性强的产业。包括机械电子、化工、建筑、汽车等行业。央企在上述行业也有相对全面的布局，汽车行业有两大汽车集团[2]、数家电子科技集团[3]、两大化工集团[4]、不少于五家的大型垄断建筑集团[5]、数家和机械相关的制造业巨头[6]。

上游产业主要是提供原材料和生产资料的行业。在竞争性行业中，央企主要布局上游产业，比如煤矿或钢铁等有色金属[7]，央企加上地方大型国企，生产了全国超过 60%的高附加值钢材。

c) 统筹协调程度高

国企虽有竞争，但并非各自为政，而是统归上级单位管理。上级单位可以根据需要，协调央企的人事和市场行为。一声令下，三大运营商即可换帅，南车北车即可合并。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央企为核心的国资集团是全球最大的单

1 比如中盐集团、中国林业集团、中国医药。另，烟草局是最大的专卖集团，但不属于央企。

2 一汽和东风。

3 电子科技集团、电子信息集团、信息通信科技集团。

4 化工集团、化学工程集团。

5 中建、国际工程咨询集团、建筑科学院、铁路工程集团、铁建。

6 一重、机械工业集团、东风电气、哈尔滨电气、船舶工业、船舶重工、中车。

7 鞍钢、宝钢、中铝、中钢、有研集团、有声矿业、北京矿冶。

一垄断资本集团。

(三) 民营企业

1) 基本情况

国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民企弥补了相应的空间。

私人经济分成两大部分：其一是个体户，中国个体户户均两个劳动力，主要靠自身劳动获取收入，属于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其二是私营企业，主要靠剥削获取收入，是典型的资产阶级。

根据 2013 年数据，个体户加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在三大产业的比例大致为 2.9%、27.33%、69.76%。

剔除个体户，单看私营企业，在三产中的分布大致如下。

表 2. 16：私营企业产业分布

	户数占比	注册资金占比
第一产业	3.16%	2.31%
第二产业	25.54%	28.73%
第三产业	71.30%	68.96%

在第三产中，私营企业经营批发和零售业的最多，户数占第三产业经营企业的 51.26%，从业人员将近 3500 万，占整个私营企业雇佣人员的 28%。

表 2. 17：私营企业第三产业部分行业数据[1]

	户数占比	从业人员占比	注册资金占比
批发零售	51.26%	27.93%	20.70%
租赁和商务服务	15.67%	9.17%	17.57%
科研服务	8.62%	4.83%	4.93%
房地产	4.81%	3.64%	10.65%
计算机软件相关	4.70%	2.62%	2.01%
金融	9.74%	0.00%	7.30%
文化体育	1.90%	0.00%	0.58%

在第二产业中，除了被国企控制的命脉行业外，民营企业均有涉及，尤其在资金和技术门槛不高的生活资料领域，民企占比往往超过一半。

下表显示第二产业部分行业民企的份额。

表 2. 18 2006 私营部分行业资产比重

	行业	人均资产（万）
50%以下	煤炭、交通设备、燃气	63.78
50%-70%	有色金属采选、黑色金属冶炼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加工	57.62
70%-90%	黑色金属采选、食品制造、饮料制造、造纸、 印刷、化学制造、医药制造、化纤制造、橡胶制品、专用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电气制造	36.44
	非金属矿采选、非金属矿制品业	23.66
大于 90%	食品加工、纺织、通信电子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	28.98

1 注：户数占比，分母为第三产业总户数；从业人员占比，分母为整个私营企业就业人数；注册资金占比，分母为私营企业总注册资金。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塑料制品、金属制品	19.03
	服装鞋帽制造、家具制造、文教体育用品制造	12.14

民企广泛分布在制造业下游，一般而言，资金和技术门槛越低，民企所占的比例越大。

2) 和国企的合作

数十年的发展中，民营企业形成了众多的垄断集团，其中最大的 500 家民企俗称为民企 500 强。2018 年，民企 500 强收入的入围门槛 156 亿元。

这些大型垄断民营集团，往往会通过某种形式和国资集团合作。

a) PPP 和混改

国企集团为了撬动更多的资本，使得更多资本服务于自身战略，也主动通过各种方式团结垄断民企，PPP 和混改就是两个重要的措施。但这些措施能否见效却很难说，比如混改的效果就并不理想，“央企及其子企业和地方企业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占股份制企业的比重还不高。不高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和民营企业的经营者对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混合所有制都还心存疑虑，都还看不准，在心理上和政策上都还存在一道无形的墙。政府部门、国资部门、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对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可能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违法违纪担心，怕惹上贪污、行贿受贿的嫌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造成对与非国有资本的混合非常谨慎，宁愿国有和国有资本的混合，反正肉烂还是烂在一个锅里；非国有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担心加入国有控股的公司后没有话语权，被

国有企业兼并了[1]。”

再比如，民企垄断集团参加 PPP 项目多有担忧，下表是 200 多家垄断集团填写的担忧原因:

表 2. 19 不愿参加 PPP 的前十大原因

担忧	比例	担忧	比例
行业准入门槛高	31%	手续繁琐	16%
融资难	30%	经济效益差	16%
投资收益不明确	27%	信息不对称	14%
配套措施不完善	23%	担心不公正待遇	10%
投资规模大	18%	没有话语权	10%

b) 一带一路

民营垄断资本会出于经济和政治的考虑，主动或被动地投身国家战略，例如华为出于发展需要投身国家 5G 战略；再如垄断民企在国内无法解决产能过剩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于是很多垄断民企为了缓解产能过剩，减少用工成本，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在沿线投资布局。截至 2017 年，共有 446 家垄断民营企业参与了各类国家发展战略，其中 181 家参与了一带一路建设。

表 2. 20：拓展国际市场动机

动机	家数	占比
拓展国际市场	350	70.00%
获得技术、人才	223	44.60%
获得原材料	113	22.60%
产能转移	113	22.60%
利用廉价劳动力	77	15.40%

1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史（1978-2018），第六章。

(四) 两大资本集团的经济关系

通过对央企、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的行业分析，以及对各种 500 强垄断资本集团基本情况和行业结构的财务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企集团在各方面均占据主导地位。

从行业结构看，国企经过 80 年代的放权让利、90 年代的所有制改革后，以 2003 年国资委的筹建为标志，以“四个集中”[1]、“五个优化”[2]为导向，全面向核心领域收缩布局。以央企和大型国企为核心的国资集团，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单一垄断资本集团。国企通过垄断金融、基础设施、电信、能源、电力、重要原材料等方面，占据了整个经济的主导地位。民营企业看似数量众多，纳税、雇佣人员、乃至对 GDP 的贡献似乎都超过国企，但民企的水、电、工业用油、相当部分重要原材料都由国企提供，与经济活动息息相关的通信全部由国企掌握，交通大部分由国企掌握，与劳动力再生产直接相关的粮食全部由国企控制，与扩大再生产关系密切的信贷资源大部分被国企掌握。民企看似庞大，却不得不仰承国企之鼻息。

从净利润看，263 家最大的国企，净利润是余下 237 家最大民企的 2.36 倍，是最大的 500 家民营企业的 1.99 倍。其中，六家最大的国有银行利润已经高达 10763 亿元，几乎与最大的 500 家民营企业的净利润持平。在前十大盈利行业中，民营企业仅在住宅地产、互联网和家电制造中占优势，

1 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仍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和未来可能会形成主导产业的领域集中，向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和大企业集团集中，向企业主业集中。

2 五个优化中，有三个关键点：在有关行业和领域的分布中，优先投向命脉部门；投向特定的产业和领域时，不应普遍投向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而应集中投向特定产业链中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或需要重点控制的基础产业、基础服务、基础设施、基础原料、关键技术、关键工序和关键零部件等；优化国有资本在企业间的分布，国有资本应更多地向主业突出的重要骨干企业集中。

而国企却垄断了银行、多元化金融、电讯服务和电网行业，并在汽车及零配件、房屋建筑和黑色冶金行业占重要地位。

从组织程度看，国企相互之间虽有竞争，但毕竟是统属官僚体系管辖的单一资本集团，国资委和财政部可协调央企的市场行为，各级地方国资委可协调地方国企的市场行为。民企没有共主，各自为政，难以统筹协调。

故此，在两大资本集团中，国企占主导地位，掌握整个经济的命脉，因而也掐住了垄断民企集团的生命线。

第二节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构成及占有剩余价值的特点

和经济基础对应的，中国资产阶级也分成两大类型：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各自占有生产资料的私人资产阶级。

民营资本家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他的产权明晰，主要通过持有公司股权占有生产资料，他应该享有多少利益，能够明确地计算出来，并且能够合法地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以官员为主体，他们名义上是公仆，却在不受人民监督的情况下拥有支配生产资料的权力，进而也拥有了占有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权力。官员按级别分享利益，通过违法或灰色的方式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

(一) 官僚集团概述

我国有公务员约 700 万，准公务员约 500 万，事业单位人员约 4000-5000 万，加上军队人员和国企公职人员等，约有 6500 万以上在编人员，此外还有大量临聘和劳务派遣人员，这构成我国财政供养人员的主体。上述人员中，在党政军、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干部，以及国企中高层实权干部，属于我们这里所说的官员。

这些人包括：中央政府各部委和直辖市中具有实际管理职权的处级及其以上级别的干部；各省市、地区中具有实际管理权限的科级及其以上级别干部；各级国企中由国家管理的干部；军队中具有实权的干部。

根据《中国当前各阶级规模和结构》一文估算，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人数估算大致在 560 万。

由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垄断了全部政权，因此中国政府首先代表着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其次才代表着整个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是由社会主义复辟而来。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府管辖经济的方方面面。走资派复辟之后，政府的性质虽然变化，但仍然掌握着庞大的国企资产以及几乎全部的城市土地，因此保留了很多对经济的干预职能。能够干预经济，就是能够支配生产资料，各级官员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人物，虽享有生产资料的支配权，但官僚集团政治上还自诩为人民的代表，因此各级代表人物在法律上不能享有生产资料的收益权。官员为了获得与其支配生产资料的权力相匹配的权益，必然会违法乱纪以权谋私。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通过犯罪或违纪的方式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重要特点。

(二) 占有剩余价值的形式

官员集体虽然占有以央企为核心的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但囿于公仆的外衣，官员只能以非法或灰色的方式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官员占有剩余价值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三公消费、职务犯罪、亲友经商。

1) 三公消费

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主义余风尚存，官员的贪腐行为尚

不严重[1]，三公消费是官员特别是中下级官员占有剩余价值的主要形式。

80 年代，国家赋予行政事业单位一定的收费项目，旨在弥补预算财政缺口，增加办公经费。这部分收入没有纳入预算管理，成为单位财政供给外的小金库。行政罚款、国有资产租赁和收费、部分国有企业利润、社会保障收入等，构成小金库的重要来源，有些地方小金库的收入占到单位收入的一半以上[2]。

上述收入中，部分收入直接源于官员对国资有生产资料的占有或支配，如某些单位通过房屋出租获取收益，或出租国有设备获利。部分收入源于官员的审批权力，如审批盖章的收费，这种审批大部分和经济活动相关。

数额巨大又不受监管的小金库，被各级官员用于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和公款旅游，这就是三公消费。

"八项规定"前，三公消费达到顶峰。《法制日报》引述，"近日有媒体称,全国三公消费总额突破 9000 亿元,相当于 2012 年全年财政收入的 10%[3]。"

三公消费第一大头是公车消费，支出占三公消费 4 成。以前只有部级干部才有专车，1984 年后取消了这个规定，现在乡镇科级干部都可以配专车。"公车变成了个人财产，司机变成了官员的家庭服务员。" 在一些地方，公车"接送孩子上学、办私事、外出旅游，司空见惯，路人皆知，甚至出现霸王车、特权车[4]"。公车私用外，还超标配备，"有的领导为了显示自己位高权重，拿公家的钱配置豪华轿车，公车更新换

1 以 1990 年为界，平均腐败交易金额 6400 元，1990 年突然上升到 48 万元，其后虽有下降，但平均腐败交易金额 14 万元。

2 《论"三公消费"与特殊腐败治理》，白贵一。

3 http://cpc.people.com.cn/pinglun/n/2013/0327/c78779-20931692.html.

4 《论"三公消费"与特殊腐败治理》，白贵一。

代的频率也高[1]。”

公款吃喝，源于业务招待。计划经济时代也有招待，当时讲究“四大”：大锅饭、大白馍、大碟菜、大杯茶。改革开放之后，“四大”成了“四要”：要食材珍贵、要做法独特、要讲究排场、要欢庆热闹。官员以招待为借口，巧立名目、大摆宴席，铺张浪费、大吃大喝之余，还动用公款置办奢侈礼物送给同僚以编织自己的关系网络，既满足了自己奢靡的生活，又疏通了关系为仕途铺路。

公费旅游，都披着考察学习的皮。领导干部学习培训的地点，非名山大川不行，动辄要住五星级酒店，甚至非总统套房不住。90 年代以来，官员已经不满足于在国内以招商引资、学习交流的名义吃喝玩乐了，出国考察成了公费旅游的大头，“根据 2000 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 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 3000 亿元，2000 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愈演愈烈[2]。”更有甚者，公费出国旅游还闹出过国际丑闻。据香港《星岛周刊》2006 年 12 月 4 日报道：我国 10 名高官手持假冒的芬兰政府的邀请函，兴致勃勃地到芬兰“考察学习”，结果被芬兰政府拒之门外。芬兰政府即时向外界宣布了自己的这一“正义之举”，并批评道：“假冒调查研究之名前往外国旅游的情况在中国很普遍。”

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身居高位者挥霍奢侈的程度骇人听闻。如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日均挥霍公款 4 万元；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在上海高级宾馆包租房间办公，每天食宿费高达一万元，提供 4 辆高级轿车给自己的情妇在北京、上海使用[3]。

三公消费的每一笔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都是劳动人

1 《我国非合理性三公消费产生的原因及治理对策》，叶勇。

2 《 “公款出国旅游”为何不算贪污》，姚丽颖。

3 《省部级一把手腐败 uuk 特点、趋势和风险防控机制创新》，乔德福。

民创造的剩余价值。对官员的铺张浪费，老百姓极端痛恨，老百姓编排民谣讥讽说：“官府一次宴，百姓一年汗……村干部一年喝头大水牛，乡干部一年喝头大铁牛，县干部一年喝座小洋楼。”

2) 职务犯罪

犯罪官员遍布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国有企业。其中，国有企业数量最大[1]，占 36.7%，其次是党政机构，占 26.6%[2]。1992 年以前职务犯罪并不多，高级官员职务犯罪更少。1992 年南巡后，中国资本主义快速发展，职务犯罪爆炸式增长，国企和党政机关犯罪强度分别是前期的 138 倍和 30 倍[3]。

中高层官员职务犯罪和经济息息相关，“经济发达地区腐败案发率相对高，西藏、青海、宁夏、内蒙、海南、陕西等欠发达地区较少；国土资源、交通、铁路、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金融、石化石油、移动、电力等垄断性中央国有企业一把手腐败案也相对较多[4]。”腐败行为已涉及经济社会生活领域深层，在土地和房地产、能源与矿产、金融投资、工程建设、企业经营、卖官买官、司法腐败等领域，腐败更为频发。

受贿罪占官员犯罪的绝大部分，十八大以来落马高中，受贿罪的比例高达 79.02%[5]。各级官员，受贿后常常通过“打招呼、批条子等行政干预方式帮助企业贷款、协调违规运营、引进工程项目、审批计划指标、违规低价批地、帮助提拔调动、庇护走私违规进口、干涉行政执法和司法案件、权色交

1 在国有企业放权让利、转换经营机制、产权制度改革、“ 抓大放小”、国退民进等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寻租机会。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腐败状况实证分析》，刘启君。

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腐败状况实证分析》，刘启君。

4 《省部级一把手腐败特点、趋势和风险防控机制创新》，乔德福。

5 《十八大以来落马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研究》，张江华。

易等[1]”。

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至 2013 年，省部级一把手受贿的主要领域，第一是房地产，占 66%，犯罪行为从土地出让、拆迁、承建、开发到销售，涵盖房地产开发的所有环节；第二是企业经营，占 63%，涉及财政补贴、项目审批、项目投资、工程承揽、企业上市收购、企业贷款，甚至走私等各个方面[2]。老百姓说：“一批工程上马，就会有一批干部下马……一批管理办法出台，就会有一批干部发财。”不论是地方大员还是局委办的官员，都有人财物的支配权，“条子工程”、“人情工程”、“关系工程”大行其道。沈阳市长慕绥新对重大项目以及大块土地批租，都由他一人自作主张，土地出让金说免就免。

整个官僚体系是按级别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因此也必然会要求按级别集体享有生产资料的受益权。腐败案中就体现为一把手带头，窝案频发。

改革开放至2013年省部级落马官员中，7成以上是窝案。“围绕 54 名省部级一把手，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贪腐团队，他们荣辱与共，互相依靠，共同腐败，先后被查[3]。”

“一查就一帮，一动就塌方”，官员以地域、校友、工作关系、亲属关系等各种纽带，形成团团伙伙，按级别集体享有生产资料的受益权。山西塌方式腐败暴露后，出现了“以白培中为金主包括白云在内的五台帮，以张中生为代表的吕梁帮、以令政策为首的运城帮等本土帮派等。其中运城帮实力最为醒目，包括山西省原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山西省原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山西省原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太原市市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太原市公安局原

1 《省部级一把手腐败特点、趋势和风险防控机制创新》，乔德福。
2 《省部级一把手腐败特点、趋势和风险防控机制创新》，乔德福。
3 《省部级一把手腐败特点、趋势和风险防控机制创新》，乔德福。

局长柳遂记等[1]。”

很多官员曾经也是有志青年，但是当他们“手握实权，却眼看着身边的商人过着比自己好百倍的生活[2]”，心理必然失衡，用权力兑换资本。云南原省委书记白恩培，在主政云南期间接触了大量的房地产商，“他们就住豪华的房子，坐豪华的车，个人还买的私人飞机。（我）也想追求像他们一样的生活，这思想就变了。”

我们前面讲过，不光是党政官员，国企官员也是贪腐的主力军，某些年代国企腐败更甚党政系统。

国企官员掌握庞大的生产资料，个人收益却远逊于同等规模的民企老板，于是他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贪污腐败，花样百出。中央巡视组曾痛斥某些国企内外勾结、明火执仗地猎取国资。“全民股东从来都是只投资不受益，而且一年到头在为垄断国企打工，忍受着他们左手要涨价右手要补贴，贡献出全球最赚钱的银行、全球最赚钱的电信公司、全亚洲最大的石化企业，贡献出动辄高达数万亿的国企巨额利润……国企蛀虫腐败之甚，是产权虚置状态下投资回报制度失灵的表现，因为理当属于全民股东的东西全民股东拿不到，高管们于是通过各种办法自己私分——如果国企巨额利润长期无需反哺于民，近水楼台者必然想尽办法据为己有[3]。”

官员享有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却不能享有生产资料的受益权，这对矛盾导致官员必然腐败，因此在现行体制下不论靠什么方式都无法解决官员的腐败问题，他们的腐败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在谈中国政府对官员的监督存在的问题时曾说：“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

1 《省域系统性腐败现象的全景透视》，陈科霖。

2 《官员腐败心理行为分析及预防对策研究》，李雪宁。

3 《国企利润不惠民难免被高管围猎》，舒圣祥。

实际上，管理体系内部，不论是同级、下级、上级还是纪委，相互之间在本质上不是监督，而是腐败共同体。

人民痛恨贪污腐败，贪腐的每一分钱都是人民滴下的血汗。通钢的老工人，一顿老拳打死了官商勾结试图侵吞国资的建龙总经理，吓得政府官员瑟瑟发抖。

3) 亲属经商

原云南省长李嘉廷的儿子李勃说：“身在侯门，不当革命接班人就当商人。”

红顶商人是一群特殊的资本家。他们通过股份公司按份占有生产资料，他们又是干部子弟或者近亲，在整个改革开放年代，通过别人无法企及的方式侵吞了巨额利益。

在改革开放的每一个阶段，都活跃着红顶商人的身影。

改革开放初期，官方汇率下人民币估值一直被高估，只要进口商品到国内转手一卖就能赚钱。计划经济时代统购统出，盈亏抵消。外贸放开后，干部子女就通过特权把持大把商品进口许可证，倒卖赚钱。80 年代，一个干部子女通过倒卖进口证，在香港购置半山别墅、赛马和游艇[1]。

双轨制时期（1984-1993），计划内商品和计划外商品有巨大价差，比如 1988 年 1 吨钢铁，计划内 800 元，市场价格 1500 元，从计划内购置商品，市场一卖就赚钱。1987 年，商品、资金、外汇的价差合计 2000 亿以上，占国民收入 20%。干部子弟利用权力大肆倒买倒卖。89 学潮最初的导火索之一，就是反对官倒[2]。

国企改制时期（主要是 1997 年后开始的大规模国企改制时期），国企从竞争性行业退出，大批国企私有化，国企资产以低廉的价格转卖给私人，干部子弟从中鲸吞蚕食，非法获取大量利益。

1 《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杨继绳。

2 《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杨继绳。

金融资本时期，即 1992 年以后，股票和房地产兴起，红顶商人在这次浪潮中得到的财富远远超过之前两次。在原始股赠送，上市指标，土地批租，城区改造等各项事情中，大肆获利。

除此外，高官子弟还成立公司在官员或其朋友管辖的领域做生意，获取巨额利益。

2014 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视频通报，“半数被巡视对象暴露出领导干部用权力为亲属、子女谋利的问题，这样的结果令人震惊[1]。” 新华社归纳了亲属经商的惯用套路：1、官商权钱利益互补型。家庭成员有人当官，有人经商，“权为商开路，商为权巩固”。2、借壳捞钱型。子女成立壳公司，虚构交易利益输送。3、利益集团交换型。官员先施惠于其他官员或商人，再打招呼让其“照顾”自己的亲属，异地交易利益互换[2]。

中国高官子女经商，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落马老虎，子女大多涉及商业。周永康的儿子周滨，经营的生意涉及水电、石油、文化旅游、投资、房地产等；苏荣的妻子于姐，染指江西的矿产资源、土地出让、房产开发、工程项目等诸多领域；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化名“王诚”，和侄儿令狐剑一起构建的财富版图涉及公关广告、私募、城市安防、网络信息安全等板块，获利以亿计。福建原副省长徐钢曾对弟弟提出两不准：做生意时不准与老家人士交往、拿项目时不准提徐钢的名字。但据原同事透露，徐的亲弟弟主做为基建项目供应沥青的生意，另一名亲戚在做筑路机械的生意，这“在交通系统不是秘密”[3]。更有甚者，南巡之后历任总理的家属均有人搏击商海，且都斩获颇丰。

国企领导亲属亦有违规经商，特点则是靠山吃山。“中央

---

1 《官员亲属的生意经：音在弦外》，周丽萍。
2 《官员亲属的生意经：音在弦外》，周丽萍。
3 《官员亲属的生意经：音在弦外》，周丽萍。

巡视组第三轮专项巡视的结果反馈，多家被巡视单位均涉及亲属违规经商等国企利益输送问题，还点了中国联通、中船集团、神华集团、东风公司的名[1]。”

第三节　私人资产阶级的构成及占有剩余价值的特点

四十年来，私人资本家从无到有，成为中国剥削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按估算，私人资本家人数大致占全国就业人数的 2-3%。

他们是工人口中大大小小的老板，他们按股份占有生产资料；他们在经济上依附国资集团或被国资集团扼住发展的咽喉；他们在政治上处于无权的地位，参政议政是他们能够获得的最高的政治待遇，他们中的小微企业老板，被地方官员吃拿卡要，上了规模的资本家和官员狼狈为奸甚至是成为高级官员的白手套。私人资本家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段，依靠血汗工厂残酷地压榨和剥削人民。40 年来，私人资本家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根据《胡润百富榜》，1999 年中国大陆有 50 人的资产超过 5000 万元，到 2017 年，有 2130 人的资产超过 20 亿元，排名第一的许家印资产 2900 亿人民币，相当于 29 万产业工人毕生积累的财富的总和。大资本家购买豪宅、私人飞机，出入高档酒店，包养情妇，过着糜烂的生活。这一切风光的背后，是工人被榨干的青春。

(一) 私人资本家的来源和构成

按 2014 年调查数据，当前私人资本家平均年龄 46 岁，男性占 85%，七成以上大专以上学历。48%曾在体制内工作，其中 82%担任中层以上负责人。家庭年均收入：中部为 109

1 《官员亲属的生意经：音在弦外》，周丽萍。

万，东部 67 万，西部 57 万[1]。

私营企业有四次发展高潮：第一次，1984 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私有企业的发展壮胆。第二次，1992 年南巡后，终止了姓社姓资的争论。第三次，十五大之后所有制改革进一步松动，国企破产大批工人下岗，私有经济进一步发展。第四次，2002 年加入 WTO 后，出口带动投资，私营经济大幅发展。

私人资本家按来源分成类："下海"型；"改制"型；"跳板"型；"跨界"型；"草根"型[2]。

四个阶段私人资本家来源大致情况如下：

第一阶段，私人资本家主要来自回城青年和其他无业人员。随着政治风险减小，专业技术人员和干部的比例增加。

第二阶段，一是下海经商人员增多[3]，二是大量国企干部摇身一变成为私人资本家。下海人员的背景对企业很重要。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4]。本阶段私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大量的权钱交易。企业主正规交易活动占 41.5%[5]，其他都是违法或灰色地带。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但是，对相当部分小型私人资本家而言，他们权钱交易的机会不多，由于权钱交易导致他们经营处于不利环境，他们对

1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 No_12(2014～2015)》，王钦敏。

2 其中，"下海"型是指在创立企业前仅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过的企业主；"改制"型主要是指在国有/集体企业工作过的企业主，也包括一部分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流动至国有/集体企业并最后创业的企业主；"跳板"型是指在"三资"/外资企业或其他私营企业工作过的企业主；"跨界"型是既经历过体制内部门，也经历过体制外部门的企业主；"草根"型包括只经历过当村干部、干个体、下岗失业、外出打工、海外留学等形式。

3 1992-1993 年，全国行政人员下海的超过 60 万人。

4 《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杨继绳。

5 《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杨继绳。

表 2. 21 五类人员分结构比例[1][2]

	小资本家	中型资本家	大型资本家
职业流动			
下海	5.77	8.21	9.21
改制	32.79	38.59	40.07
跨界	27.42	23.36	23.09
跳板	14.26	14.14	14.21
草根	19.76	15.7	13.43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28.31	38.62	50.28
民主党派	4.95	7.74	8.77
群众	66.74	53.64	40.95

此也颇有不满。按 1995 年调查显示，私人资本家对现实中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评断，排第一的是权钱交易，占 37.3%，排第二的是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占 31.4%[3]。

第三阶段，1997 年后改制的国企干部仍然是私人资本家的主要来源，事实上，“一直到 2005 年前，虽然少数年份偶有波动，改制是中国私人资本家的一个主要来源[4]。”

第四阶段，2002 年后创业人员逐步成为私人资本家的主体，特别是在 2005 年后，经历跳板的企业主“几乎占据半壁江山，成为私人资本家的主要来源[5]。”

---

1 《当代中国私人资本家与个体工商户：结构、态度与行动》，吕鹏等。
2 数据说明：《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对规模以上企业的划分标准：2000 年以前的门槛是当年营业额为 1.2 亿元，2004~2011 年为 3 亿元，2012 年以后上升至 5 亿元。本文将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企业主，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为小企业主，其余为中企业主。数据从 1978 到 2014。
3 《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杨继绳。
4 《当代中国私人资本家与个体工商户：结构、态度与行动》，吕鹏等。
5 《当代中国私人资本家与个体工商户：结构、态度与行动》，吕鹏等。

另外，私人资本家中党员比例从 80 年代开始一直保持平稳，在 25%左右；1997 年后快速增长，到 2005 年达到顶峰，在 40%左右，表明大量国企官员改制成为私企业主；2005 年后，由于体制外创业者成为主体，党员比例逐年下滑，到 2014 年时，比例将至 16%左右[1]。私人资本家的“体制内色彩”显著下降。然而，近年来两新组织搞党建，私营企业往体制靠拢的趋势又在加强。

(二) 私人资本家剥削的部分特点

私人资本大多处于产业链低端，为了获取利润，必须要延长工作时间、压低工人工资，他们不在意生产安全，与其花钱买安全的设备，还不如花钱打点官员。超长加班和工伤事故，就成了中国私人资本家剥削的特点之一。

1) 超长加班

2017 年深圳最低工资标准为 2130 元，这是大部分资本家愿意支付给普工的最高的基本工资。工资 2130 元，如果按劳动法支付加班费，按底薪给工人缴纳五险一金，五险一金合计支出大致为 360 元。假设工人一周五天，早 8 点到晚 8 点，午饭和晚饭各自休息 1 小时，再假设工人周六加班 8 小时，周日休息一天。一个月到手工资大致为 3360 元。

这样的厂，是工人眼中的烂厂，因为没有加班，没法赚钱。但就是这样的厂，每月加班已经高达 76 个小时，严重违反《劳动法》的规定。私人资本家填补的是国企退出的下游行业，多是技术门槛低，竞争激烈的行业。为了赚钱，资本家想方设法延长工人工作时间，压低底薪是主要的办法。底薪低，工人不得不“自愿”加班，资本家既可以最大限度压榨工人，还可以用加班为手段来“管理”工人。中国大部分制

1 数据指被调查群体的比例，转引自《当代中国私人资本家与个体工商户：结构、态度与行动》。

造业，不是 8 小时工作制，也不是 10 小时工作制，而是 12 小时工作制，早 8 点到晚 8 点。

资本家还通过调休、综合工时、提高产线转速、增加单位时间产量等各种办法，来变相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工人被极端压榨，每天精疲力竭，一回宿舍就恨不得躺下睡觉。

日本宪法学界有句话，“工厂大门一关，宪法就进不来了。”对资本家而言，在利润面前，宪法都不算什么，《劳动法》更不在话下。

凡是敢于反抗和挑头的工人，都会被厂方针对，其中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不给加班。这在常人看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成了资本主义对工人最有威慑的手段。资本主义的异化无处不在。

2) 工伤和职业病

如果工人是机器，那资本家还会保护他们，因为机器是资本家买的，坏了要花钱修，还要计提折旧。然而，工人不是机器，是随时可以解雇的劳动者，他们是自由得一无所有的人，当他们青春耗尽的时候，可以一脚踢开。

建筑作业中，打碎的岩石粉尘被工人大量吸入，会导致肺部患上不可逆转的绝症——尘肺病。如果工人使用水钻而不是风钻，就可以有效防止粉尘，预防尘肺病，但是，“老板们从来没提过给我们打水钻，因为打水钻进度比较慢，进度慢就影响他们的利润。我们也不想得罪老板，不敢得罪，得罪以后就失业呀，老板心太黑。”面对尘肺工人的维权，政府之间，政府和资本家之间，相互推诿，一拖再拖。

《广州日报》2005 年 4 月 8 日报道，广东省有 1300 多万农民工，珠三角企业每年发生断指事故个案至少有 3 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 4 万只。为了珠三角的工业辉煌，民工们“贡献”的手指头已经以几十万计。

工人时刻被笼罩在工伤和职业病的阴影中，下表显示，

25%以上的工人被潜在的工伤或职业病包围。

表 2. 22：2016 年目前工作有毒害情况调查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粉尘	13.38	13.08	8.42	12.21
放射性物质	1.41	0.67	0.33	0.88
化学类或腐蚀类	6.08	9.58	6.71	7.64
物理危害如高温、噪音等	3.02	3.24	3.73	3.26
生物类如炭疽杆菌	0.40	0.38	0.24	0.35
其他危害	0.68	0.94	0.60	0.77
无危害	75.03	72.11	79.97	74.89

面对工人的残躯和那些死难的冤魂，资本家没有丝毫的愧疚。1993 年的致丽大火死了 87 人，时隔多年举行纪念，纪念现场一个资本家质问工人:“那么多名人伟人最后不都死了，你们老纠缠过去干什么？”

工人当然要纪念，工人必须要纪念。纪念是为了寄托哀思，是为了揭露罪行，是为了展望未来，是为了工人逐步扩大的团结，最终是为了砸碎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

第四节　私人资本家的政治行为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的资本家，一定会要求有相应的政治地位。资本家获得政治地位，可以更好地了解政府的动向，获得项目、优惠贷款和政策支持，可以减少政府执法部门刁难[1]，并且可以请政府出面镇压工人反抗。也即，资本家关注政治、参与政治的主要目的是经济利益。那么资本家都关心什么呢？

1 1995 年调查浙江，资金困难，48.2%回答靠政府；权益受损，36.1%回答找政府；扩大经营，59.6%回答靠政府解决。有些困难本身是政府部门造成的，比如刁难企业，导致其经营困难，诸如用电、环保、交通运输，等等。

据 2018 年《人民政协报》发布新闻，归纳资本家的八大诉求：提高市场需求、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减少企业税、降低融资难度、希望政府不要不作为、减轻转型压力、提升产权保护力度、减轻行业准入和政策歧视[1]。

上述信息与近几年民营经济调查数据基本吻合。2014 年数据显示，私人资本家最迫切的诉求是“在企业开办和扩张等过程中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简化行政手续”，占 48.5%；第二诉求是“进一步地加大在吸纳就业方面的资金扶持、补贴和税收优惠的力度”，占 20.5%；第三诉求是“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占 12.7%[2]。

2013 年调查显示：在影响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中，资本家认为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技术和人才，其次是融资成本高，第三是税费重，“行业准入门槛高”排在倒数第二。在对政府干预市场方面，资本家最不满意政府重复监管和相互推诿[3]。认为执法不公的排在第三，但是比例并不高。

具体对行政审批而言，绝大多数希望简化手续，要求审批透明。

1 http://wemedia.ifeng.com/84056341/wemedia.shtml.

2 《当代中国私人资本家与个体工商户：结构、态度与行动》，吕鹏等。

3 政府部门的特点：有油水好处的事情争着管，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踢皮球。

表 2.23：2013 年被调查企业分项诉求

类型	事项	小微型	大中型
影响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	准入门槛高	23.20	21.50
	融资成本高	51.50	59.00
	缺少技术和人才	56.50	65.30
	缺乏场地和设施	25.10	23.40
	税费负担重	43.70	49.50
	其他	2.50	3.10
关于市场监管的诉求	重复监管	66.70	73.10
	相互推诿	56.50	56.80
	执法不公	28.50	26.80
	处罚轻，惩戒不足	15.80	12.60
	处罚重，影响发展	16.50	14.00
	其他	1.40	1.10
关于行政审批的诉求	减少项目审批	66.30	71.10
	公开审批标准	44.10	47.40
	简化手续	80.30	84.80
	其他	1.10	1.00

资本家希望通过影响政府政策达成诉求，但是当前情况下，资本家不能直接执政，也不能通过合法的“政治献金”培养自己的代言人，于是他们只能通过参政议政以及和官员结交来达成诉求。

一方面，资本家积极入党，参加工商联，甚至参加政协和人大，以便获取利益，寻找靠山[1]；另一方面，他们将大量利润用于公关打点以维护关系。小微企业多是临时打点，应对检查官员的吃吃喝喝，大中型企业多是长期“感情投资”，

1 2000 年前后，山东省委统战部调查私人资本家 240 人，22%想找政治靠山，20%希望发表意见保护自身权益，20%希望提高社会地位，20%觉得荣誉对企业发展有利，转引自《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杨继绳。

以备不时之需。

表 2. 24：2013 年部分调查企业分红和摊销公关费[1]

	分红	摊派费用	公关费用	分红与摊派公关比值
小微型	288	321	255	1:2
大中型	1570	77	343	3.74:1

参政议政是资本家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与官员结交属于资本家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中某些成员之间的关系。下面两部分我们将分别介绍这两种关系。

(一) 私人资本家和政府：政治参与的类型、动机和途径[2]

1) 类型

以福建私人资本家为例，我们可以窥见资产阶级参与政治的基本情况。按对政治的参与热情，福建私人资本家分成四个层次：

1、政治冷漠层

政治冷漠层大约占 10.4%，主要分布在微小企业，多为从事餐饮业、小商品批发业、家庭工厂等行业。这些行业竞争激烈，资本家挣扎在生死边缘。

2、关心政治层

该层次比例最高,占被访企业主总数的 69.7% 左右。该层多为中小企业，生存竞争激烈,但略有盈余；资本家虽忙于生意，无暇顾及政治问题，但是对关系到私营经济发展命运的政策仍十分关心。福建调研显示，福建私人资本家最关心的社会议题是“政府政策的透明度” 和“国家政策的连续性”，分别占被访企业主的 41.8%和 40.0%。

3、政治诉求层

1 以上数据源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 No_12(2014～2015)》。

2 本节参照《福建私人资本家阶层的政治参与》整理而成。

该层比例在 15.7%左右，主要是大中型企业的企业主,基本完成了原始积累,生产经营较为稳定,有一定的精力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兴趣。关注的问题集中在和企业发展相关的产业政策、经济政策、执法规范等方面。这个层次的私人资本家不仅关注政治,而且也意图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4、参与政治层

不到被访企业主总数的 2%。处于这一层次的，主要是大型或者特大型企业的企业主，企业发展十分稳定,在地方或全省乃至全国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他们与政府官员接触频繁,表达企业的政治经济主张，同时政府也通过人大政协等各种渠道吸收他们，授予他们各种政治荣誉。这些上规模的私营企业的企业主占有较多的政治资源, 基本上都是福建省省级或者市县级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1]。

2) 动机

全国范围内调研显示，私人资本家政治参与主要是为了获得资源发展企业。福建调研中，“参政动机为发展企业”的占第二位，第一位是“提高政治地位”。二者并不矛盾，获取政治资源可以更好地得到经济资源，企业主提高政治地位，拓宽关系网，和官员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都能获得更多的资讯、更优惠的政策，便于捕捉商机、获得信贷资源，并最终建立有利的市场地位。

表 2. 25：2012 年福建私人资本家政治参与动机

	提高政治地位	发展企业	保护不受刁难	公民责任	其他
大中型	35.2	26.7	21.5	16.3	0.3

1 截至 2011 年 2 月，全省共有 4648 名非公经济人士(其中包括港澳台投资经济的企业主) 分别被推选为全国、省、市、县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相对于庞大的至少 26.67 万的私人资本家总数，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所占比例不到 1.7%。

全国范围内调研显示，私企业主第二动机是“获得政治保证”，福建第三位动机是“保护企业不受刁难”，二者是一个意思。

整体而言，私人资本家对于当地政府对私营经济的良性影响和作用的认同度不高。

表 2. 26：福建企业主对政府的认可情况-1

企业主眼中的政商关系	比例
政府对企业扶持很大	19.90%
政府扶持不够，应加大	57.40%
政府干涉太多，影响发展	15.10%
政府和企业关系不大，无所谓	5.70%
其他关系	1.90%

具体而言，私营企业在市场准入、信用贷款、土地出让、招标投标、产品进出口权、征地、水、电、气、热及交通等方面存在着政策性歧视。

表 2. 27：福建企业主对政府的认可情况-2

认为有改善的事项	比例
保护私有产权	67.40%
企业主人身安全	60.80%
降低准入门槛	59.80%
简化审批流程	56.50%
建立企业信用制度	55.50%
投融资环境	52.50%
企业主社会政治地位	52.50%
三乱问题	47.30%
执法作风	44.50%

3) 途径

a) 人大政协

人大政协是资本家参政议政最主要的途径，大约 1.7%的资本家进入到各级人大政协[1]。

资本家进入人大政协最关键的因素是资本体量，“一个县级规模私营企业的企业主更有可能成为县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一个省级规模私营企业的企业主更有可能成为省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一个在国家拥有相当影响力和规模企业的私人资本家更有可能成为全国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不同体量的资本家关注的问题也不同。本地资本家更多关注本地的实际问题，人大政协中最常见的议案就是和私营经济发展相关的议案，比如，“关于加强外来务工人员引入,解决企业用工荒难题的建议，关于进一步加大对我省中小微企业培育和扶持力度的建议，关于促进企业产品开拓国内外市场的建议……”。

特大型或者大型私营企业的资本家有更大的抱负，往往通过全国人大或政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直接影响国家政策方针。他们关注的往往是更宏观的问题,比如国家对私营企业和私人资本家的相关政策和待遇等等。

另外，有一些资本家，除了关注本身利益外，还以其他阶级代表的面貌出现。比如有类提案：“关于尽快实施汽车限购令和公车限制令的建议；关于打破福州北峰山区道路交通瓶颈的建议；关于守住社会道德底线应从少儿抓起的建议，

1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 No_12(2014～2015)》调查对象多为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调查显示有一定规模的资本家 12.65%是人大代表，主要集中在地市和县级，分别占 36%和 43%。92%的人大代表都是十六大后担任的，且有约有不到 20%是人大常委。担任政协委员的占 21.61%，其中 91%是十六大后担任的，约有不到 30%任职常委。政协地市和县级比例为政协委员的 35%和 58%。

等等。”

整体而言，大多数私人资本家只是以个人地位或身份参政议政,并不能代表本阶层的群体利益,多数情况下，他们还不能协调一致，通过组织化的行动向政治系统施加压力。

由于人大政协的通道有限，现实中大部分资本家无法参与其中，于是他们通过各种办法和政府官员建立联系，试图影响政治或至少是获取利益。

b) 基层自治

比如农村的村民自治和城市的居民自治，就是资本家活跃的舞台。他们愿意当选，因为有利益，他们能够当选，因为有财力。“2003 年在浙江台州市换届中选出的 4399 名村支书中，经商办企业的有 1386 名；换届选出的 3684 名村民委员会主任中，经商办企业的有 1743 名[1]。”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 No_12(2014～2015)》在全国范围内对约 6000 名企业主进行调查，显示资本家有 4.28%的企业主在政府部门任职，其中 1.58%在村委或居委，0.83%在乡镇或街道，1.87%在政府部门。

c) 入党

资本家通过入党参与政治，是重要途径之一。577 位福建私人资本家的抽样问卷调查显示,29.3%是共产党员,其中有将近 1/3 是企业注册后入党的[2]。

对于资本家入党动机的回答中,有占被访总数 47.7%的资本家选择“为了企业的发展”。

资本家还会在企业建立党支部，其中认为建立党支部有利宣传企业的占 69.2%，有利于企业管理的占 76.6%，有利于和政府部门沟通的占 71.9%。

1 《当代中国民营资本的政治诉求》，徐蕾，易辉。

2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 No_12(2014～2015)》调查对象多为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在对约 6000 名企业主进行政治面貌调查中，党员比例 32.49%。

d) 工商联

现实中，一方面由于上述政治参与渠道有限或有一定门槛，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小微企业忙于生意，无暇参与政治，因此大部分企业主仅仅是加入工商联或其他商会获取一份归属感。福建省私人资本家绝大多数都参加了各级民间商会组织和民间团体,有的还在各级商会中担任领导职务。另外，福建大型私营企业也会通过工商联向政府提出提案，这样更容易得到政府重视。

(二) 私人资本家和官员：三种典型关系

调查显示，福建私人资本家遇到不公正待遇的解决途径，第一是通过法律途径，占 26%，第二就是找党政领导，占 25.7%。

资本家非常重视建立和维护与官员的关系，甚至直接让亲友成为官员。调查显示，福建私营资本家家属普遍具有某种干部身份,这些形成了私人资本家与政府之间进行各种联系的一条纽带,也构成了私人资本家重要的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

建立联系最终是为了获得利益。中国私营企业有五大原罪,即行贿[1]、偷税漏税[2]、虚假注册资本和抽逃资金[3]、非法集资、高利贷。地方政府往往睁一眼闭一眼，一旦资本家遇到执法部门检查,资本家与官员的关系就是最好的保护。

事实上，资本家进入人大政协的目的，整体来说也是为了更好的和官员建立联系，获取利益。

1 中国私营企业 60%左右都或多或少存在这个问题,房地产企业几乎 100%。这是一种公开的秘密。

2 中国的私营企业几乎 100% 都有偷税漏税,差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3 60%左右的私营企业都有可能涉及。

表 2. 28：福建企业主家属任职情况

单位	比例
村委或居委会	36.60%
中国共产党	19.40%
企业主协会	19.20%
政府部门	9.40%
行业协会	7.60%
民主党派	5.00%
地方人大	4.20%

资本家和官员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三种。

1) 被动打点

福建企业主认为最难沟通的部门，第一是公安和消防部门，其次是地方政府、税务部门，再次是环保、质监部门，其后是工商、物价等部门。“有的私营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受过地方政府管理部门的刁难,如有的管理执法部门工作作风差,办事拖沓,无效率;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等始终是令私人资本家们头疼的事情。如个别党政官员行为腐败、风气不正,到私营企业吃、拿、卡、要、报销各种费用的现象时有发生。”还有公务员在执法中，“滥用行政处罚权、自由裁量权,搞“议价罚款”,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等。”

小微企业人脉薄，自己经营过程中又常常违法违规，面对政府正常检查或无理刁难，只有“破财免灾”。这种代价小到请客吃饭，大到送礼、送钱。小资本家无可奈何，只能被动应对。

据调查，私营企业遇到的纠纷中,与当地政府有关管理部门的纠纷排在第三位。

表 2. 29：福建企业主眼中的政商关系

单位	比例
官员帮助企业是为了政绩	33.40%
官员帮助老板为职责	31.20%
官员帮助老板求实惠	20.10%
官员为难企业要打点	11.60%
老板结交官员求实惠	11.30%

2) 主动围猎

犯罪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参与，通过拉拢政府官员，获取经济利益。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资本家不可能直接掌握政治权力,但他们又掌握了庞大的经济权力，于是就利用经济权力交换政治权力，获取更高的收益。

小微企业被动应对政府，一定规模的企业和政府官员接触往往是主动的，一个官员的周围，往往有一堆准备围猎他的老板。这种关系往往需要长期经营，须知权钱交易很少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维系这种关系的，不仅仅是利益，还有“信任”。在西方，这种关系通过政治献金合法化，而在中国却是非法的。但是，资本家迫切需要政治代理人，更何况地方政府本身就拥有大量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是资本家天然的生意伙伴，任何资本家只要影响了政府就能获得更多的订单，与政府的代表即政府官员建立良好的关系至关重要。

“吴启柏刚调到高碑镇，好友张勇就和几个老板一起设宴庆祝。……2012 年，吴启柏看中一套价值 50 万的别墅，但是资金不足，张勇知道后从某位老板手中要了 50 万……第一笔接受后，所谓的礼尚往来便理所当然[1]。”

《2013 中国企业家犯罪（媒体样本）研究报告》中披露，贿赂型犯罪是资本家最典型的犯罪之一，国企以受贿为主，

1 《官员腐败心理行为分析及预防对策研究》，李雪宁。

民企以行贿为主。另外，资本家还帮助官员拉票贿选，提供“政治献金”，培植代言人。

私人资本家是政治的局外人。一定规模以上的资本家，他们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发展的趋势导致其必然渴望获得与之匹配的政治地位，政府虽主动提供诸如政协人大等政治安排，但一来通道有限，二来参政议政毕竟不如实权在手，资本家出于利益考虑,必然和官员勾肩搭背，贿赂官员以寻求代理人，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

3) 白手套

白手套是充当黑钱漂白的中间人，是从事非法活动的合法外衣，里面包裹着那双见不得人的脏手。

中国的高层官员，都有自己家族的白手套。身在其位的，除少数坊间传闻外，我们难以知悉详情。但是通过政治斗争落马的高官，我们还是能看得清清楚楚。

周永康的儿子周滨有三只白手套，分别是拉古娜海滩的黄家、“中旭系”的实际控制人吴兵和周滨的同学米晓东。

北京有个公司叫中旭阳光，这个公司成立后就拿下中石油旗下 8000 多个加油站零售终端信息化的单子，公司大股东是詹敏利，也就是周滨的丈母娘，其夫家姓黄，就是拉古纳海滩的黄家。

大渡河水电站的开发，是归五大电力公司之一的国电来做。但就是在这里，一家小公司拿下了其中一个水电站，这个水电站每年卖电的收入是 9 个亿。这家小公司的股东共计三个，其中两个最终控制人是詹敏利，周滨的丈母娘。而在前台跑腿的，就是中旭系的老大吴兵。

第三只白手套是周滨大学同学兼室友米晓东。在两人的合作中，9：1 的分成比例多次出现。周滨通过中石化集团公司总经理王天普，为盘锦辽河油田天意石油装备有限公司在石油系统销售顶驱设备提供帮助。事成之后，周滨、米晓东

通过北京汇盛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收受天意公司给予的4210 万元，分成比例 9:1[1]。

刘志军的白手套丁书苗号称“高铁一姐”，一度被称为白手起家的典范。某次，刘志军授意丁书苗承接高铁论坛生意。丁书苗问，这生意怎么做，赚不赚钱？刘志军骂她是猪脑袋，告诉她其他不用管，一切按吩咐办就行。丁书苗没敢再追问，只是几个月后，公司账上“糊里糊涂”多了一个亿[2]。

翻看反腐的各种新闻、纪实、监察公报之类的消息，几乎每一个落马的高官，都有自己的白手套。

第五节　资产阶级两大集团的关系及其对无产阶级的态度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3]。”

中国官僚集团，是这样的一个阶级，他们以人民的名义，集体占有全部的城市土地和国企生产资料，制定产业政策、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管理经济运行的重大事项，设置重要行业的准入标准，他们在社会劳动组织中占有支配地位，因而他们必然会要求获取和自己支配地位相匹配的收益。但是他们又是从社会主义复辟而来，他们的《宪法》写着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他们的法律禁止他们以官员的身份占有与其

1 《白手套遮不住贪腐官员的黑手》，龙在宇。
2 《白手套遮不住贪腐官员的黑手》，龙在宇。
3 《伟大的创举》，列宁。

支配地位相匹配的剩余价值。于是，现实的矛盾推动他们必然走向贪污腐败或者放纵子女经商。他们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产阶级。

对社会而言，清廉的官员是整个社会的点缀，是偶然的；贪腐的官员是整个社会的常态，是官员支配生产资料又无法合法获取收益所必然导致的，是符合矛盾发展趋势的。

在中国，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屁股大多不干净。西方多党制国家，党派之间议会斗争，往往暴露出很多资产阶级的丑态。中国一党独大，但是党内存在众多派系的相互斗争，反腐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老百姓通过落马的老虎多少也能窥见中国特色资产阶级的荒淫无度、穷奢极欲。央企华融董事长赖小民落马后，被爆出有“3 个 100”：100 多套房、100 多个关系人、100 多位情人。一个 6 旬老汉，坐拥上百套房产，藏匿数亿现金，包养了 100 多个情人，甚至还不乏家喻户晓的女明星，其生活糜烂至极。

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不被其政敌以反腐之名收拾掉，也为了晋升获取更多的利益，众多官员拉帮结派，攀附高枝。腐败案往往都是窝案，里面团团伙伙，帮派横行。宦海险恶之下，官员似乎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于是求神拜佛，大搞封建迷信，将命运寄托在虚无缥缈的风水之上。大师王林的离去，不知带走了多少官员的秘密。

他们推翻了人民政权，复辟了资本主义，和人民有着深刻的矛盾。改革开放之初，国企干部借放权让利和承包经营，大肆贪污腐败。工人说，“工人穷，干部富，车间主任万元户，厂长挣钱没有数。”80 年代中后期，双轨制下官倒盛行，成为引发 89 学潮的主因之一。90 年代中期，国企改制，员工大面积下岗，生活毫无着落，多少女工迫于生计沦落风尘，多少家庭破败，有自杀的、有病死的、有上访被关押的，官员贪污腐败穷奢极欲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无产阶级的悲欢离合、妻离子散。资产阶级手中沾满了无产阶级的鲜血。新世

纪以来，房地产突飞猛进，征地拆迁又沾染了多少血污？至于基层干部吃拿卡要、横行乡里，更是数不胜数。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乌坎事件源于农村基层干部的贪污，晋宁事件源于资本和村民的冲突，启东事件中数万市民为了保障环保安全而上街游行甚至一度占领市政府。在他们的主政下，新的三座大山压在人民身上，而曾经被人民打翻在地的资本家被请回了庙堂。

他们窃取了人民的资产，盗用了人民的名义，还想伪装成人民的代表，但是人民心中雪亮，人民说，“一等公民是公仆，子孙万代享清福；二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十等公民老百姓，失业下岗不敢病。”

有时候，他们也表现出中立的模样，在工人罢工的现场居中调停；有时候，仲裁庭也会做出有利于工人的判决。但是这一切，不过是维护资本主义生产的外部条件所必须的手段而已。对这一切，人民看得清清楚楚。2005 年，重庆特岗工人上万人游行，集体去给烈士先烈扫墓，维稳的警察劝其散去，工人说：“我们哪里都不去，我们要去给烈士扫墓，我们要去让烈士看看，他们鲜血打下的江山，今天到底成了什么颜色！”

党内资产阶级是以公仆为名掌权的资产阶级集团。1965 年 5 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跟江西省委副书记王卓凡等人谈官僚主义的问题：“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中国会不会这样？毛泽东很担心。1975 年他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这群人“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

中国资产阶级中的私人资本先天不足。国有资本控制了

经济的命脉，提供经济活动所必须的水、电、油、汽和通信；垄断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须的粮食供应；在和经济活动息息相关的运输、原材料等行业占据重要地位；在大型支柱产业如汽车、建筑等行业中举足轻重。私人资本占据优势的战略性产业如互联网产业，其互联互通的物理基础也掌握在三大运营商手中。私人资本只能在国有资本营造的平台上蹦跶，怎么跳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私人资本家在政治上处于无权状态。国有资本与国同体，是政府的亲儿子，私人资本只是复辟的走资派偷偷摸摸弄出来的私生子。多少年来，私人资本家一直要求走资派及其继承人承认他的身份。面对政权，小的资本家只能忍气吞声，坐视官僚集团吃拿卡要，大中型资本家却不甘现状，他们要发展，他们需要自己政治上的代言人，以打击竞争对手，镇压工人反抗，获取更大利益。他们围猎官员，殷勤献媚，官员半推半就，勾肩搭背。偷税漏税、抽逃出资、非法集资、贿赂公职，哪个大一点的资本家逃得脱这些原罪？更不用说私人资本家在发展过程中以及其残酷的手段压榨工人的每一滴血汗，镇压工人的每一次反抗。多少农民工背井离乡，多少留守儿童在苦难中成长。资本，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它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滴着血，然而，中国私人资本毛孔里面的血尤其肮脏。

十六大后资本家可以名正言顺地入党，但还是不能获取政权。私人资本家可以按照资本体量享有一定的政治待遇，进入人大政协，甚至选举党代表。他们在庙堂之上与官员推杯换盏，与权力勾肩搭背，看似风光无限，但充其量只能充当政治舞台的背景。人大政协与其说是资本家的黄马褂，不如说是资本家的金锁链，是代表国资集团的政府用来换取资本家长子权的红豆汤。无产阶级不能为了一碗红豆汤而放弃长子权，但资产阶级能，因为他们知道长子是国企。

上了规模的资本家中，除小部分信奉“在商言商”的资本

家试图远离政治外，大部分积极融入国家战略，“一带一路”、5G 战略、“2025 中国制造”上都有他们的身影。还有一部分资本家，充当政府高官的白手套，积极提高自己“赵家人”的含量。这些资本家中，最特殊的一部分，也就是对国家战略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已经被国家收编，成为了真正的赵家人，比如华为、腾讯。

对于整个阶级而言，大量私营资本家是中小资本家，面对政府政策上和执行中的不公平状态，确有不满。也有资本家雄心不死，试图问鼎政权。1989 年学潮时有过他们的身影，2011 年颜色革命前后他们也蠢蠢欲动。但整个阶级本身还是各自为战，缺乏统一协调，广大零散的中小企业主组织化程度低，处于政策体系的角落。即使进入政权体系参政议政，他们也主要关心各自利益，而并不能代表本阶层的群体利益，提案很少触及国计民生和大政方针，他们在对付无产阶级时体现出极强的阶级意识，他们不会轻易让任何一个工人从他们身上多拿走哪怕一分钱；但在面对同为资产阶级的国有资本集团时，他们缺乏团体意识和集体认同感，没有共主，没有带头大哥，还不能形成利益集团。2017 年以来舆论再次将其拖入风口浪尖，国进民退甚嚣尘上，似乎是生死存亡之际，也仅仅听见几声哀嚎，而看不出他们通过组织化的行动向政治系统施加压力的能力。

但是，当他们转过身来面对无产阶级的时候，又是那么地凶恶：他们压低基本工资，使得无产阶级不得不“自愿”加班，每天工作时间长达 12-13 小时，拿到手的工资却仅仅能够糊口。致丽大火的死者，尘肺病的难友，手指被切断的工人，接触香蕉水患病的白血病人……多少无产阶级被迫暴露在危险的环境下工作，多少无产阶级被榨干青春活力而仅剩一副残破的身躯。

不论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还是民营资本家，都是占有生产资料剥削人民的剥削阶级，都是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

他们仇视工人，他们恐惧工人，而他们被政府称为“社会主义建设者”，成为他们的掘墓人将是他们仇视和恐惧的无产阶级。不打倒垄断资产阶级，劳动人民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受奴役受压迫的地位。

新时代的新工人

第一节　新工人的诞生和分布

(一) 新工人的诞生

新工人生长在纯粹的雇佣关系下，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他们是被雇佣的奴隶，他们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自由地、一次一次地出卖给资本家，以换取仅能养家糊口的工资，而一旦青春不再或市场波动，就被资本家无情地抛弃。他们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因此也必将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新工人的主体是所谓的“农民工”[1]。新工人多数来源于农村，打工在城市。新工人的形成，大致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乡镇企业阶段，从 1978 年持续到 80 年代末，所谓“离土不离乡”。农民工们虽然从事非农产业，但却从没有离开农村。这个时期的新一代工人阶级，大部分在社队企业或乡镇企业兼职做工，但自身身份认同是农民，而不是工人。

第二阶段，民工潮阶段，从 80 年代末持续到 90 年代末。1984 年是一个起点，国家准许农民进入城镇务工，农民工开始快速向城市流动。80 年代末，沿海外向型企业迅速增加，“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规模越来越大，最终形成“民工潮”。1993 年跨省流动的农民工人数达到 2200 万人，1994 年离乡农村劳动力更是达到 7000 万人。

第三阶段，稳定转移阶段，从本世纪初持续至今。中国加入 WTO 后，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政府为了资本增殖的需要，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种种限制，创造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2003-2013 年，每年进城农民工在 760 万左右，其

1 本文之后的新工人主要指农民工。

后逐步下滑，至 2017 年底，农民工总量达到 28652 万人。

新工人也有新旧之分。1980 年前出生的农民工，是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大多会种地，教育程度不高，意识相对保守，并不打算在城市久居，希望赚钱后回农村盖房养老。1980 年后出生的农民工，是第二代农民工，或称新生代农民工。2017 年底，新生代农民工首次成为农民工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 50.5%。他们教育程度更高，追求自由，希望在城市定居，渴求融入城市。他们不会种地，不会再寄望于回到农村，他们不再把城市当作驿站，虽然被资本把持的城市还是把他们当作过客。

(二) 新工人的分布

从表 2. 30-表 2.33 可见：（1）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产业转移，中西部农民工增长明显快于东部。（2）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比例在减少，并且东部外出打工人数的绝对数量在下降。（3）中西部农民工越来越多在本省流动，而不再来到沿海打工。

表 2. 30：2008-2017 年农民工地域分布（单位：万人）[1]

年份	东部农民工总人数	中部农民总人数	西部农民工总人数
2017	15,993	5,912	5,754
2016	15,960	5,746	5,484
2015	16,489	5,977	5,209
2014	16,425	5,793	5,105
2013	16,174	5,700	4,951
2012	16,980	4,706	4,479
2011	16,537	4,438	4,215
2010	16,213	4,104	3,845
2009	9,076	2,477	2,940
2008	9,964	1,859	2,167

表 2. 31：2008-2018 年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人数（单位：万人）[2]

年份	农民工人数	本地农民工人数	外出农民工人数	外出占比
2018	28836	11570	17266	59.88%
2017	28652	11467	17185	59.98%
2016	28171	11237	16934	60.11%
2015	27747	10863	16884	60.85%
2014	27395	10574	16821	61.40%
2013	26894	10284	16610	61.76%
2012	26261	9925	16336	62.21%
2011	25278	9415	15863	62.75%
2010	24223	8888	15335	63.31%
2009	22978	8445	14533	63.25%
2008	22542	8501	14041	62.29%

1 数据来源：wind。

2 数据来源 iFinD。

表 2.32：2010-2018 年外出农民工分地域情况（单位：万人）[1]

年份	东部外出人数	中部外出农人数	西部外出人数
2018	4,718	6,418	5,502
2017	4,714	6,392	5,470
2016	4,691	6,290	5,350
2015	4,944	6,592	5,348
2014	5,001	6,467	5,353
2013	4,936	6,424	5,250
2012	5,146	5,995	5,195
2011	5,013	5,806	5,044
2010	4,877	5,613	4,846

表 2.33：2010-2018 年各地域外出农民工流动情况（万人）[2]

年份	东部跨省流动	东部省内流动	中部跨省流动	中部省内流动	西部跨省流动	西部省内流动
2018	17.20%	82.80%	60.60%	39.40%	49.60%	50.40%
2017	17.50%	82.50%	61.30%	38.70%	61.30%	38.70%
2016	17.80%	82.20%	62.00%	38.00%	52.20%	47.80%
2015	17.30%	82.70%	61.10%	38.90%	53.50%	46.50%
2014	18.30%	81.70%	62.80%	37.20%	53.90%	46.10%
2013	17.90%	82.10%	62.50%	37.50%	54.10%	45.90%
2012	16.30%	83.70%	66.20%	33.80%	56.60%	43.40%
2011	16.60%	83.40%	67.20%	32.80%	57.00%	43.00%
2010	19.70%	80.30%	69.10%	30.90%	56.90%	43.10%

外出农民工仍主要流向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合计占 31.2%，在地级市务工的占 35.1%。

1 数据来源 iFinD。
2 数据来源 iFinD。

随着 2009 年中国经济转型为“负债-投资”模式，大规模基建导致建筑业快速发展，而不断形成的过剩产能，又把新工人从制造业中排斥出来。从 2009-2018 年，制造业中农民工比例下降约 10 个百分点，而建筑业上升约 5 个百分点，低端服务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合计上升约 4.3 个百分点。但制造业工人仍然是新工人的核心。

表 2.34: 2008-2018 年农民工职业分布（单位：%）[1]

年份	制造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批发零售业	住宿餐饮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其他行业
2018	27.90	18.60	6.60	12.10	6.70	12.20	15.90
2017	29.90	18.90	6.60	12.30	6.20	11.30	14.80
2016	30.50	19.70	6.40	12.30	5.90	11.10	14.10
2015	31.10	21.10	6.40	11.90	5.80	10.60	13.10
2014	31.30	22.30	6.50	11.40	6.00	10.20	12.30
2013	31.40	22.20	6.30	11.30	5.90	10.60	12.30
2012	35.70	18.40	6.60	9.80	5.20	12.20	12.10
2011	36.00	17.70	6.60	10.10	5.30	12.20	12.10
2010	36.70	16.10	6.90	10.00	6.00	12.70	11.60
2009	36.10	15.20	6.80	10.00	6.00	12.70	13.20
2008	37.20	13.80	6.40	9.00	5.50	12.20	15.90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代新工人逐步老去，临近退休的人越来越多。2017 年底，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 44.8 岁，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 34.3 岁。他们不是初到城市的愣头青，而是在工厂打工多年的无产阶级。他们很多人都有罢工经历，听过、看过、经历过甚至领导过各种大大小小的斗争。工龄十年以上的人比比皆是，大部分人对上一轮工潮时的斗

1 数据来源 iFinD。

争记忆犹新。谈起这些话题，工人会兴奋地告诉你，“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游行吗？不是为了抗日，是为了涨工资！”

表 2.35: 2008-2017 年农民工年龄分布[1]

年份	16-20 岁	21-30 岁	31-40 岁	41-50 岁	50 岁以上
2017	2.60	27.30	22.50	26.30	21.30
2016	3.30	28.60	22.00	27.00	19.20
2015	3.70	29.20	22.30	26.90	17.90
2014	3.50	30.20	22.80	26.40	17.10
2013	4.70	30.80	22.90	26.40	15.20
2012	4.90	31.90	22.50	25.60	15.10
2011	6.30	32.70	22.70	24.00	14.30
2010	6.50	35.90	23.50	21.20	12.90
2009	8.50	35.80	23.60	19.90	12.20
2008	10.70	35.30	24.00	18.60	11.40

第二节　新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

(一) 工资和工时

2008 年农民工月平均收入 1340 元。2010-2012 年爆发了新工人第一次大规模工潮，资产阶级被迫做出较大幅度让步，新工人的平均工资出现较大幅度增长，到 2017 年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增加到 3485 元。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被推翻之前，工人获得的斗争成果往往是临时的、不稳定的。在 2010-2014 年间，工资增速超过 GDP 增速（未剔除通胀因素），但 2015 年后，再次落后于 GDP 增速。

1 数据来源 wind。

工人的工作时间很长，远远超过 8 小时工作制的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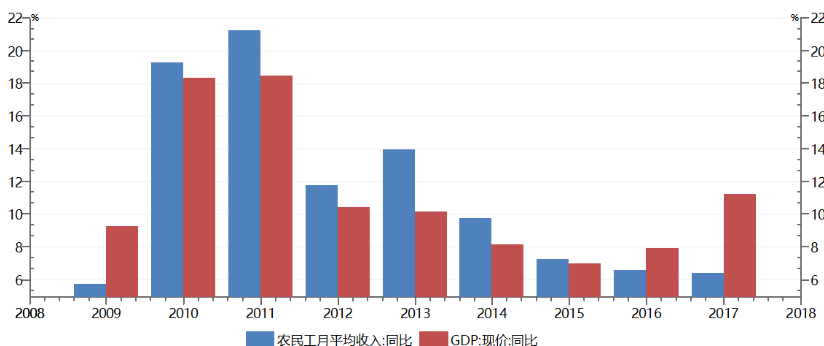


图 2. 1：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增速与 GDP 增速

《劳动法》规定 8 小时工作制，但 8 小时的工资无法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工人不得不“自愿”加班。

2017 年制造业平均工资 3444 元，大致和沿海中小城市工人收入相当，比深圳等大城市收入略低。2017 年深圳最低工资标准为 2130 元，这是大部分资本家愿意支付给普工的最高的基本工资。假定某企业基本工资 2130 元，该企业按劳动法支付加班费，按底薪给工人缴纳五险一金，五险一金合计支出大致为 360 元。如果工人周一到周五每天 8 点上班，晚上 8 点下班，午饭和晚饭各休息 1 小时，则当天加班时间为 2 个小时；再假设工人周六加班 8 小时，周日休息一天。如此，工人每月应获工资为 3700 元左右，到手工资大致为 3360 元。这样的企业是工人眼中的“烂厂”，加班少没有钱。但就是这样的厂，每月加班已经高达 76 个小时，严重违反《劳动法》每月加班不得超过 36 小时的规定。大部分没有技术含量的制造业企业，都是如此。资本家压低底薪，使得工人不得不“自愿”加班，资本家既可以最大限度压榨工人，还可以用加班为手段来“管理”工人。

因此可以说，中国大部分制造业，不是 8 小时工作制，也不是 10 小时工作制，而是 12 小时工作制，即早 8 点到晚 8 点。

日本宪法学界有句话，“工厂大门一关，宪法就进不来了。”对资本家而言，在利润面前宪法都不算什么，《劳动法》更不在话下。

资方会打击一切敢于反抗和挑头的工人，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不给加班。这在常人看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成了资本主义对工人最有威慑力的手段，资本主义的异化无处不在。

按《劳动法》规定，超过 8 小时，加班工资按每小时 1.5 倍正常工资计算。因为对工人而言，每天工作 8 小时之后，就非常累了，其后每工作 1 小时，消耗比之前更大，获得的报酬也应该比之前更高。但对资本家而言，他永远不会考虑工人“应该”获得更多的劳动报酬。

(二) 资本家变相延长工时的方法

资本家会想尽一切办法规避加班工资，从而变相延长工时。

周六上班本应给双倍工资，但是资本家将工人调整到周一去休息，就不必支付双倍工资了。这种方法叫做调休，规定在《劳动合同法》中，是企业常用的手段，也是工人痛恨的制度。工人罢工中经常提出反对调休的诉求，有些罢工甚至是因为调休而直接导致。

综合工时是另外一种变相延长工时的方法。综合工时规定，在 174 小时以内的工作，都不必支付加班费，174 小时之外的工作，除 10 天的法定假日外，任何时候仅需支付 1.5 倍加班费。综合工时本来仅在某些特殊行业适用。我们以水手为例，假定水手连续航行十五天，在这十五天里面，每天工作 10 小时，剩下 15 天休息。这样，水手工作的十五天中，每一天的劳动时间都会超过 8 小时，但是平均每月总体的劳

动时间不会超过 174 小时，在此情况下就没有加班费。这是合理的，因为轮船水手，需要连续工作，季节性很强。金融危机一来，政府要和资本家一起共度时艰，中央主动指示要扩大综合工时适用范围，地方各级政府迅速跟进。比如深圳，2009 年 5 月 13 日颁发《深圳市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管理工作试行办法》，扩大综合工时制的适用范围。《试行办法》颁布不到一周时间，就有上千家企业获批适用综合工时制，其效率之高，令人咂舌。《试行办法》出台后，金威啤酒老板谢女士就明确表示欢迎："啤酒生产行业有淡旺季的，如果像一般单位的员工一样每天 8 小时生产的话，没有任务的时候员工没有工作可干。申请了综合工时工作制，员工旺季的时候加班，淡季的时候可以休息。"凡是打工的都知道，这段话意味着什么。淡季的时候可以休息，意味着淡季的时候员工不再有稳定的收入，《深圳工资支付条例》明确规定"停工超过一个月的，按照不低于最低工资的百分之八十支付"。也就是说，淡季工人的工资很可能就 1000 多块钱。

除了调休和综合工时外，资本家还采取提高产线转速、增加单位时间产量的方法，来变相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

工人被极端压榨，精疲力竭，一回宿舍就恨不得躺下睡觉。

(三) 工伤、职业病和社保

新工人工作环境很差，得不到有效的劳动保护。资本家根本不在意职业安全保障。在资本家眼中，工人的健康远远比不上机器重要，机器磨损了，还要花钱保养，计提折旧；工人的健康"磨损了"，既不需要"计提折旧"，也不需要"花钱保养"。

法律上有个概念叫做"间接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某种后果，但是却放任这种后果的发生。资本家对职

业病和工伤的态度，就是典型的间接故意。

如果职业保护会妨碍干活的速度，资本家会想尽办法让工人加快速度，而根本不管不顾职业危害。很多电子代工厂都需要接触天那水[1]，这个工序本应该要求工友带防毒口罩、手套，但是这样干活就会慢。资本家会提高额定产量或者严控单件价格，工人为了完成定额，有时候就会自己脱掉手套、摘掉口罩，导致职业病或者工伤。而一旦工人发生工伤，资本家就推卸责任，指责员工安全意识淡薄。

尘肺病也是如此。建筑作业中，打碎的岩石粉尘被工人大量吸入，导致肺部组织弥漫性纤维化，出现呼吸困难、咳血、最终死亡。尘肺病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使用水钻而不是风钻，就可以有效吸附粉尘，再加上通风管道，即可有效防止尘肺病。但是，“老板们从来没提过给我们打水钻，因为打水钻进度比较慢，进度慢就影响他们的利润。我们也不想得罪老板，不敢得罪，得罪以后就失业呀，老板心太黑。知道自己生病了，但不干不行啊。孩子读书，两个老人，七八十岁了，生活费没有着落，他们怎么办？”

表 2. 36：2012 & 2016 年工伤职业病比例（单位：%）[2]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2016	工伤	4.82	3.05	2.72	3.68
	职业病	8.13	6.28	5.42	6.84
2012	工伤	8.87	6.10	6.93	7.27
	职业病	10.50	8.99	11.26	9.91

上表显示，2016 年每 10 个人，就有一个患职业病或者受过工伤。由于工人不断斗争，这个比例比 2012 年有较大幅度下降。

1 一种有毒化学物品，长期接触会得白血病。

2 数据来源《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7 年报告（2017）》。

但是工人仍然时刻被笼罩在工伤和职业病的阴影中，下表显示，25%以上的工人被潜在的工伤或职业病包围。

表 2.37：2016 年目前工作有毒害情况调查（单位：%）[1]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粉尘	13.38	13.08	8.42	12.21
放射性物质	1.41	0.67	0.33	0.88
化学类或腐蚀类	6.08	9.58	6.71	7.64
物理危害如高温、噪音等	3.02	3.24	3.73	3.26
生物类如炭疽杆菌	0.40	0.38	0.24	0.35
其他危害	0.68	0.94	0.60	0.77
无危害	75.03	72.11	79.97	74.89

而资本家给工人缴纳工伤和医疗保险的比例却非常低。工伤保险实质上是血汗工厂的一块遮羞布——工人为城市付出了血汗和青春，带着残缺不全的身躯回到家乡守望渺茫的后半生——即便拿到了工伤赔偿，也掩盖不住工厂吞噬工人生命的事实。更何况，申请工伤的程序漫长，导致工人维权艰难。根据北京市的统计，所有程序走一遍要 3 年 9 个月。申请工伤的过程中，拿不到任何赔偿，还需担负维权成本，承受精神折磨，很多工友被迫放弃。

1 数据来源《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7 年报告（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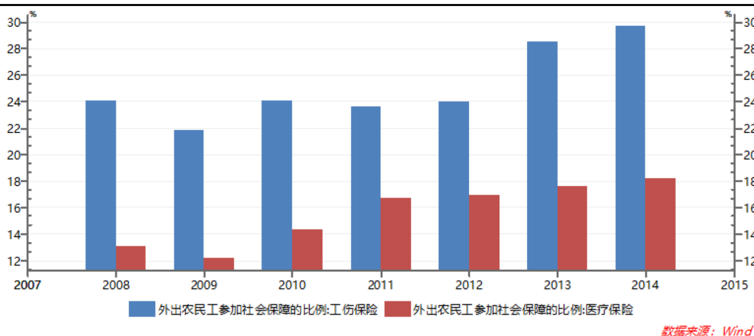


图 2. 2：外出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例

(四) 居住条件和子女教育

工人创造了宏大的城市，自己却居住在狭小宿舍、工棚或者卫生条件很差的出租屋，能在务工地购买房屋的工人非常少。

表 2.38：2008-2015 年外出农民工居住情况（单位：%）[1]

年份	宿舍	工棚	合租	独租	务工地购房	其他
2015	28.70	11.10	18.10	18.90	1.30	21.90
2014	28.30	11.70	18.40	18.50	1.00	22.10
2013	28.60	11.90	18.50	18.20	0.90	21.90
2012	32.30	10.40	19.70	13.50	0.60	23.50
2011	32.40	10.20	19.30	14.30	0.70	23.10
2010	33.80	10.70	18.00	16.00	0.90	20.60
2009	33.90	10.30	17.50	17.10	0.80	20.40
2008	35.10	10.00	16.70	18.80	0.90	18.50

这些宿舍、出租屋的公共卫生条件非常差，床板下面有臭虫，生活区遍布着蟑螂，老鼠攀爬墙垣，出门就是堆积的

1 其他项中，包括在生产经营场所居住（5%左右）、乡外从业回家居住（13%左右）等。 数据来自 wind。

垃圾，四处可见污水。房屋密集，管理混乱，一旦着火就会酿成大灾。2017 年深圳沙井和北京大兴的两场火灾，都是发生在工人聚集的生活区。

资本不光把工人排挤到肮脏的房屋中，还把工人的后代从他们身边夺走。据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全国 17 岁以下农村留守儿童 6102.55 万。马克思指出，劳动力再生产的价格，包含了养育后代所必须的费用。中国资产阶级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利用社会主义时期遗留下的户籍制度和城乡体制，通过设置入学门槛、建立歧视性的农民工子女学校、设置升学障碍等方式，把农民工的子女从他们身边夺走，进一步降低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压低其工资。

19 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卫生状况太差，导致资产阶级感染霍乱等疾病，最终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关心工人的卫生。近年来，中国的资产阶级也开始关心农民工留守儿童问题了，因为留守儿童的犯罪行为已经影响到了资产阶级的自身安危。2013 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有过相关统计,截至当年,我国各级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平均每年上升 13%左右,其中留守儿童犯罪率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 70%。除了 6000 多万留守儿童，城市中还有 3500 多万流动儿童，这些得不到父母关爱的无产阶级后代，都是资产阶级严重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第三节　新工人的斗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新工人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和资本或明或暗的斗争。他们的意识在斗争中成长，组织在斗争中壮大。

(一) 2003 年前：讨薪

1992 年到 2003 年底，珠三角农民工的月工资只提高了 68 元，与此同时，物价翻腾数倍。2004 年之前的新工人，

斗争主要不是涨工资，而是讨工资。2000 年前后，总理帮农民工讨薪的消息频频见诸报端。一国总理屈尊帮助农民工讨薪，可见问题之严重。在 2002 年，欠薪甚至成为全国范围内“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

当时新工人的主体还是老一代农民工，他们的身份定位还是农民而不是工人，他们没有长远打算，而是希望打工赚钱回村盖房，他们意识落后，遇到问题保守妥协，仅有在被逼无奈下才爆裂的反击，这种反击往往是无组织的、混乱的。工人的行动也很容易被资方分化，被政府压制下去。

(二) 2003-2008 年：从讨薪到涨薪

2003 年是一个转折点。中国加入 WTO 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用工缺口扩大，资本家招工困难。工人处于有利的条件，不再是沉默的羔羊，当权利被侵犯时，敢于站起来抗争。一开始仅是在一条流水线或生产线上停工，几十人、上百人相互约定，一起停下手中工作，人也不离开产线，彼此相互聊天。如果工人之间的联系进一步稳固和扩大，就可以发展成全厂的罢工，大家一起走出车间，堵住厂门和行政大楼，甚至涌上马路、堵高速。这时的行动一般是基层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发起的，他们也深受资本剥削，普工相对比较被动。

列宁说，“当一无所有的工人单个人反对富有的资本家时，这说明工人是彻底受奴役的。但是当一无所有的工人联合起来，情形就不同了。”

从 2004 年到 2007 年，联合起来的工人，在外资工厂掀起了密集的工潮。成规模、有影响的罢工，多半发生在工资、福利待遇较好的大电子厂。罢工以女工为主，多是无组织的自发工潮，经常采取堵路、示威游行、堵政府大门、集体上访等手段。

涨薪的诉求多起来了，甚至在深圳宝安出现了典型的区

域性罢工。由一家台资厂的罢工，引发同一工业区雇佣千人以上的大厂都发生了罢工，最终工人获胜，多数厂方将工资调整到法定标准以上。

斗争多起来了，但组织性还不强，斗争之后往往不能沉淀下任何组织。

然而新工人毕竟崛起了，他们随着大工业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斗争而成熟，他们组织力度还不够、意识程度还不强，但他们代表着未来。

(三) 2009-2012 年：从金融危机到第一轮工潮

2008 年秋，金融危机导致各行业普遍萧条。资本家转移矛盾，大规模裁员、降薪，增加工作时间。金融危机之下，政府也抛开了表面的中立，露骨地站在资方的立场上。2009 年的劳动力市场上，充斥着负面的消息。劳动者每天耳闻目睹的裁员事件络绎不绝。在职的员工普遍感觉人心惶惶，朝不保夕。严峻的环境下，劳动者的行动趋向保守。整个金融危机时期，为了防止工人反抗，资本家管理更加严苛，劳资关系雪上加霜。

2008 年底，中央推出 4 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刺激计划的效果在 2009 年开始凸显，用工缺口明显扩大。用工缺口一来，工人就借机提出各种要求，包括改善伙食，缴纳社保，取消不合理的规定，增加工资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增加工资。涨薪的呼声越来越大，压抑一年之久的工人重新行动起来，最终形成了一个自沿海城市开始，席卷全国的浪潮。

2010 年 1 月，苏州联建爆发大规模罢工，要求加薪，打响了当年工人进攻的第一枪。随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罢工接连不断，掀起了席卷全国的涨薪潮。南海本田的连锁罢工和大连工业区的呼应罢工，就在此时发生。

2010 年 5 月，南海本田爆发了持续 20 天的大罢工，最终以工人的全面胜利告终。在罢工中，本田工人明确提出重

整工会，要求选出能代表自己利益的“真正的”工会委员。罢工结束后，本田工人进一步落实了重整工会的诉求，并于当年选出了自己的工会代表。之后，在工会的带领下，本田工人逐年与资方进行加薪谈判。这表明，工人已经意识到集体的力量，意识到组织的重要性。南海本田的斗争，标志着中国新工人自发的走上了组织化的道路。本田工人胜利后不到一个月，十几家汽配厂和广东其他行业工人的罢工此起彼伏。

同样在 2010 年的 5 月底，大连开发区爆发了连锁罢工。从 2005 年到 2009 年，开发区工人工资平均每年增长仅 45 元左右。到 2010 年罢工前，很多员工的工资甚至还不到 1000 元。2010 年 5 月开始零星罢工，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缓慢增多， 7 月初，零星的罢工汇总爆发。开发区集中了大量日企，罢工波及的企业，日企比例最高。7 月下旬，一广毛巾、东芝、YKK、通世泰等数十家企业均发生罢工。工人明确提出增加工资，预期增幅大致为 800 元。但大部分企业的加薪方案与之相距甚远，平均仅为 150 左右，根本无法满足工人的需求。“我们卖着命为日企工作，为日本的经济做出巨大的贡献，而我们得到了什么？只有满是老茧的双手，而我们得到就是那不到一千块钱的工资，更别说养家了，自己都得小心的花！”整个罢工潮，大致持续了三个月，波及企业 70 多家，参加罢工的工人 7 万多人，最终以工人的胜利而结束。工人工资平均上涨 300 元，平均增幅为 34.5%，待遇较高的企业平均工资达到 1400 元/月。

除去上面提到的本田系统罢工和大连开发区罢工之外，2010 年下半年的中国各地都爆发了不同程度的罢工。深圳、珠海、上海、重庆、成都、南昌等数十地都爆发了不同规模的罢工。

2010 年的罢工是对资方长期压榨的反抗，是对金融危机期间资方各种恶劣措施的反抗。它是工人对自身经济处境反

思的结果，也是工人对集体力量渴望的结果。2010 年的罢工使得新工人第一次工潮达到巅峰。这一轮工潮，工人以经济诉求为主，组织诉求为辅。组织诉求中，比较出名的是汽车零配件行业的工会。以大连开发区为代表的连锁罢工，昭示着同一区域有相同诉求的工人联合行动的趋势。

这是新工人从自发走向自为的起点，新工人在意识和组织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工人在斗争中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团结意识快速形成。而南海本田的罢工，更是表明先进工人走上了单个厂建立工会的组织化道路。

(四) 2013 年至今：余波之下的新特点

2011 年欧债危机后，外向型沿海中小企业大量倒闭搬迁。“追讨被拖欠的工资”和“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逐步成为工人斗争的主要诉求，而主动涨工资的斗争明显减少。

到 2013 年，发生在盈利企业、以主动涨薪为主要特征的工潮到此结束。2013 年起，工人从进攻回归防守，工人斗争转向因搬迁而索要补偿金。

虽然整体回归防守，但是某些厂的搬迁斗争——比如先进微电子——组织性强、斗争坚决、持续时间长、参与人员多，这表明新工人在第一轮工潮之后正在迅速成长。这是第一轮工潮之后的余波，新工人的斗争也展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1) 斗争向内地扩散

金融危机后，沿海低端制造业破产的同时，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制造业为了获得更有力的补贴和更低廉的劳动力，也开始成规模内迁，并在内地形成各自特色的产业集群。郑州围绕着富士康作配套，搭建电子制造的产业链集群，建设五千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西安将半导体产业列为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打造千亿级半导体产业集群。贵阳重点扶

持电子元件产业，大力推动与英特尔、戴尔等国际龙头企业的合作。再如合肥的中科系、武汉的光谷系，等等，都是重要的产业集群。

资本内迁，导致内地工人斗争明显增多。内迁的公司多是相对较好，能持续盈利稳定存在的公司。公司员工流动性较小，容易沉淀社会关系。由于资本内迁，本省就业员工比例增加。本省就业，不同于沿海的无根漂泊，更容易利用既有的社会关系形成组织，导致内地成为继沿海之后阶级斗争的又一个重要战场，从长远看影响深远。

2) 社保成为重要诉求

随着工人平均年龄增加，越来越多工人面临退休等问题，工人在社保费和住房公积金方面的诉求明显增加，特别是年龄较大的工人，更是意识到社保的重要性。2014 年东莞裕元大罢工，直接导火索就是资方没有为员工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社保问题在以后还将继续。2017 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 43310 亿元，其中征缴收入 33403 亿元，全年基金总支出 38052 亿元，当期征缴收入已经低于当期支出，且资金规模仅相当于当期基金支出的 87.78%。这导致 2017 年财政补贴社保金额缺口巨大。因此才有了 2018 年税务局征收社保一事。社保一旦如此征收，势必导致企业成本加剧，这就形成了一个两难的局面，不征收就有巨大的缺口，征收就导致企业或员工利益受损。到底动谁的奶酪？让企业缴纳社保？还是提高员工缴纳比例？不管动谁的，最后负担都将转嫁到工人身上，导致矛盾激化。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四十年，是极其不规范的四十年。私人企业给农民工缴纳社保的比例很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缴纳率不到 20%。越来越多的人临近退休，政府社保缺口，资本家的欠账，叠加在一起，社保在今后将成为斗争的一个

重要诉求，甚至可能围绕社保形成区域性或全国性联动。

3) 部分行业形成呼应罢工

出租车、教师、卡车司机、塔吊司机、公交司机、环卫工、外卖骑手，是近几年不断出现的几个呼应罢工的行业。

表 2. 39：2007-2018 年部分行业呼应罢工情况

	2007-2008	2009-2010	2011-2012	2013-2014	2015-2017	2018
出租车	42 起罢工	不详	71 起罢工	340 起罢工	454 起罢工	
	份子钱、黑车		份子钱、黑车、油价	黑车、份子钱	黑车、份子钱	
公交车		10 余起	36 起	114 起	次数不详	
			工资低	增加工资		
教师	上百起			125 起	200 余起	
	落实和公务员同等待遇			工资养老	追讨欠薪	
环卫工		15 起		42 起		
		增加工资和补缴社保		增加工资		
外卖骑手					2017 年 11 起	
					涨工资	
卡车						全国联动罢工
						粗暴管

						理等
塔吊	至少两起					全国联动罢工
	涨工资					涨工资

不同行业出现呼应罢工的时间不一样，比如出租车司机罢工由来已久，教师罢工在 2008 年也是此起彼伏。2013 年之后，不同行业呼应罢工明显增多，且出现了全国范围行业联合行动的趋势，这是前所未有的。

塔吊全国罢工最为典型。从 2013 年开始，受投资衰落影响，塔吊司机工资福利等逐步下滑，经历了长达五六年的萧条。这使得塔吊工人长期忍受数年不涨的工资以及低廉的加班费。2017 年以来工程机械行业整体复苏，塔吊租金，行业利润暴涨。2018 年 4 月 25 日江西南昌塔吊司机拉横幅抗议要求涨工资，其后塔吊司机通过 QQ 群串联，在数十个城市发起抗议，相互响应并约定五一总罢工。塔吊司机主要诉求：1、涨工资至 7000 左右；2、获得或提高平日和节假日的加班费。

劳动节前夕，不少发布罢工游行消息的塔吊司机已经被警方控制。劳动节当天，许多工地罢工，但没有上街游行的相关消息。劳动节过后，罢工的声浪逐渐平息。大部分地区塔吊司机诉求得以满足。罢工后个别地区成立了事实上的塔吊司机工会，帮助工友协商工资、协调工友与资方的矛盾，等等。

塔吊罢工是典型的行业罢工，有明显的形成行业联合的趋势。塔吊属于技术工种，工作随工程项目而不断变化，很难与同一家企业建立长期雇佣关系。大多数司机长期从事塔吊，甚至可能一生从事塔吊工作，对职业的归属远大于对单位的归属。这些特征导致多数塔吊司机提出加薪诉求时，一般不会针对某一家企业，而是整个地区的整个塔吊行业。拉

横幅抗议的塔吊司机，选择的地点也并非某家施工单位，而大多在城市的中心地区。

4) 工人展现出更高的组织水平和斗争手段

2011 年底，深圳海量储备有限公司被日立环球并购。作为导火索，该收购事件引发全体员工集体罢工，抗议公司长期低工资、粗暴管理、克扣工资，并要求工龄赔偿。海量罢工，是 2011 年持续时间最长、组织化最高的一次罢工。工人在罢工后明确提出诉求：要求公司在并购过程中给予知情权；公司用年假抵厂休不合法，应作赔偿；在并购完成前，给以工人合理的赔偿，即 2N+1 赔偿。

罢工先后经历 22 天。罢工之初，工人堵住库房不让出货，资方和警察联合镇压，数百名警察驱赶堵库房的工人，并致使一名孕妇流产。此时恰值上班时间，数千愤怒的工人闻讯赶到将警察包围，高呼："政府拿着我们的钱在养着违背人民意志的走狗汉奸，来欺负我们自己人!" 大部分警察突围而去，少部分警察被围困一上午，中午才被工人放走，最终警察不敢再次插手。当日下午，工人继续在现场集会，要求厂方交出两名带头打人的高层。几千工人一起唱国歌，气氛很热烈。其后数天，每天都有数百名工人到厂区静坐，"每天上午 9 时多来，下午 3 时多回，就在外面聚集，喊口号"。工人还组织了上千人每天轮流守夜，随时防止警察偷袭。资方随后抛出了忽悠工人的《最终方案》，但离工人预期差得很远，工人严厉拒绝。工人在工厂墙壁上贴满了条幅，条幅写着"强迫年假及厂休，无耻！""日企欺压中国员工"、"要改嫁先赔偿"等字样。再之后，资方组织了主管和文员集体到仓库，试图进入仓库，被工人赶了出去。双方在仓库门口拉开阵势，互相对骂。随后，工人展开第二轮反攻，进入办公大楼，要求骂人的主管出来道歉。数天后，资方一计不成另生一计，命令打扫卫生的外聘保洁人员（劳务工）装扮成本厂工人，

加上被收买的部分一线班组长和办公室文员共三四百人，举着“复工”标语牌与一线工人对峙，喊出“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工作”口号。但工人组织了更大的反击，声势浩大的工人怒吼：“打倒汉奸”“滚、滚、滚”。在整个过程中，资方不断通过暗中收买和威胁分化，使工人选举产生的三批代表都遭资方打压，罢工工人干脆不再选公开代表。

各方都没有成功压制住工人，官方工会撕下伪装，赤裸上阵，联合资方，分化打压。工会副主席王某威胁到：“经过这么些天的谈判，哪部分人是骨干，哪部分人是核心，我们都一清二楚。作为工会工作者，我们真的不希望任何一个人受伤，大家是为了自己的权益去做的。最后的结果是绝大多数工人的权利都保障了，上班了，个别人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最终，在多方压力下，12 月 28 日，海量员工结束罢工，回到工作岗位。

海量工人复工了，但是也争取了相当的权益。公司承诺：一是上调基本工资 380 元，另外每年调薪大约 7%×基本工资；二是对不住宿舍的工人增加房补；三是推出产品增长奖（0.6×2012 年 3 月 31 日的薪水×工作年限），一次发放给工人；四是如果兼并，给工人 0.6N+1 赔偿。

海量工人在罢工中展现出很高的组织水平和丰富的斗争手段。工人们打着横幅、喊口号，向厂方、政府和社会请愿，罢工期间每天都组织日常活动，为了追究打人者，工人们还组织了规模盛大的群众集会，高唱国歌，以及跟管理层现场对答和辩论。一般而言，在工人斗争中只要放出几百警察或防暴队，都可以将工人斗争压制下去。但海量事件中，几百警察出动，却无法压制下工人，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撤退，答应只要工人不出厂就不再干涉。这表明，警察是无法把一致行动的工人压制下去的，未来运动必然势不可挡的发展起来。

5) 工人阶级意识进一步成长

2010 年本田罢工后，新工人的阶级意识在斗争中快速成长。组织诉求上，斗争后建立工会的诉求在增多。经济诉求上，越来越突破法律的规定。

以 ASM 罢工为例。罢工之初，就有工人发表《ASM 员工维权倡议书》，针对“什么是工会”、“工会经费怎么来的?是员工筹措吗”、“ASM 工会处于什么状态”、“为什么要大家加入工会”、“我们通过工会要求资方加薪资以及工龄补偿金违法吗”、“我们要求加薪 1500--3000 元,要求 2N+1 工龄补偿合理吗”、“为什么说工会代表广大工会会员而并不等于全体职工”、“为什么员工的权益屡次被侵犯!并且得不到保障”这 8 个问题作了回答，并向全厂员工发出了倡议。工人提出的六大诉求中，也是明确提出要“成立由广大员工直选的新工会”。

而且，ASM 工人们不是单纯的喊口号要求涨工资，而是在对企业的经营状况进行考察分析的基础上，鲜明地提出“我们为公司创造了那么多，公司给了我们什么”的问题。工人们连自己的诉求将会对企业造成多大影响都计算清楚，让资方无法逃避、无法反驳。这说明工人们的阶级自觉更进了一步，他们意识到在雇佣劳动中，无产者才是价值的创造者，理应参与到成果分配中来，资本家的“资本创造价值”、“风险创造价值”已经忽悠不了工人们了。要求参与利润分配，也是工人斗争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随着阶级矛盾的不断尖锐，随着工人意识的不断发展，工人的诉求一定会继续前进，工人运动一定会越发成熟。

第四节　新工人的未来

(一) 工人运动的一般规律

工人的成长是一个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从组织上讲，工人的斗争最初是零散的，没有组织的，但面对高度组织化的

对手，工人不得不组织起来。于是，开始出现老乡会、互助会、工会直至政党。老乡会和互助会是最初级的组织，工会克服了老乡会地域的限制，同时也不同于互助会纯粹的防御性质，因此是工人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政党把工人各种诉求通过政治活动集中反映出来，是工人的最高组织形态。从诉求上讲，工人最初的诉求一般是经济性质的，并且往往是防御性质的，只是要求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工资。随着工人组织的发展，随着工人觉悟的提高，也随着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工人会慢慢意识到，仅仅是经济层面的要求，永远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时，工人的斗争就开始转向政治层面，开始要求在国家机器中有自己的声音，开始积极寻求建立有利的社会制度，研究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力求在劳资对抗中取得主动。

上述整个过程，都伴随着意识形态方面激烈的斗争，也即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觉悟的工人在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引导下渐渐认识到，如果不打破雇佣劳动制度，如果不推翻资本对劳动力的统治，他们就永远不能获得解放。进而，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织起来，成立马列主义的政党，为解放本阶级而奋斗。

从历史上来看，自发的工人运动都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上述规律。

现代意义上的英国工人阶级，是随着 1760 年前后开始的工业革命而诞生的。从他们诞生的那一天起，劳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经过数十年的斗争，1824 年，英国工人获得了结社的权力，工会开始大规模发展。在 1836 年-1848 年的宪章运动中，英国工人逐步摆脱激进派资产阶级的影响，开启了独立的政治活动，积极干预立法，试图从政治层面解放自身。1900 年，英国工人成立工党；1911 年，社会主义者整合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建立了社会民主党；1920 年前后，成立共产党。这个时期，特别是 1848 年之后的工人运动，一直

受到改良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交替影响。然而遗憾的是，社会主义者迟迟未能组织成强大的政党，也迟迟未能以组织的形态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在 1916-1920 年左右，工人运动最为高涨，当时全国性的运动开始萌发，工人组建了“全国车间代表和工人委员会运动”，由车间选出代表，进而选出工厂代表，进而选出地区代表，最后形成全国管理委员会。但这一时期社会主义者还仅仅是以个人身份参与其中，最终英国的无产阶级失去了这次解放自身的机会。

韩国战后的工人运动开始于 60 年代初。在 1970 年全泰壹自焚事件[1]后，韩国开始了长达 10 多年的筹建工会的斗争，其目标就是建立工人自己控制的工会或夺取公司的黄色工会，以集体的力量与资方谈判。70 年代，在先进工人的努力下，逐步建立了少数自主工会。到 80 年代，韩国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几千名学生进工厂做工人，他们组织小组学习，提高工人的阶级意识，在原有基础上对工人斗争起了推动作用。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工人运动开始突破单个工厂的范围，出现了不同工厂之间相互声援的团结罢工。1987 年，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结合起来，利用政治危机，开

1 韩国工厂工人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经历的剥削和压迫程度确实极其沉重。1970 年，韩国产生了最早的抗议者组织——“三栋会”的小劳工团体。三栋会由在平和市场血汗工厂区工作的十几名年轻裁缝组成。组织该团体和这次示威的男子，是 22 岁、名为全泰壹的裁缝。在多次斗争都得到当局和资本家虚假的承诺后，全泰壹得出了残酷无情的结论：除了极端的抗议行为之外别无他法。1970 年 11 月 13 日，在抗议者与警察和市场保安扭打的时候，消失了几分钟。当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罐汽油。突然，他把汽油浇在身上并点着了。他的身体顷刻间被烈焰所包围。惊恐的人群听到全泰壹在火焰中高喊：“我们不是机器！”“让我们在星期天休息！”“遵守《劳动标准法》！”“不许剥削工人！”人们看到他正拿着一本《劳动标准法》小册子。全泰壹时常说的广为人知的一句话是：“我多么希望有一位大学生朋友啊！”因此，全泰壹之死让学生猛醒。学生们开始关注工人，对因非人条件而遭受苦难的工人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怀。1983～1986 年间进入工厂的人数达到最大数量，一年有好几百人。奥格尔（Ogle 1990,99）估计，到 80 年代中期，大约有 3000 名以上的学生出身的工人。全泰壹的自焚标志着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的开始。

启了劳动大攻势，上百万工人卷入其中，反对低工资和生产关系中的独裁主义，要求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军政府被迫妥协，政府取消单一工会的规定，并取消政府有权解散工会及指定工会领导人资格的规定，工人获得组织权。之后工会蓬勃发展，并于 1995 年成立全国民主工会总联盟，2000 年成立民主劳动党。90 年代后，资方发展出了一整套对付工人的方法，比如采取临时工、分化工人队伍，比如在罢工中不承认非正式工的要求为合法的要求等。今天，韩国大企业中正式工的工会虽仍能对企业施加强大影响，但很难带动整个工人阶级进行反对全球化和反对资本的斗争了。事实上，这也是韩国的劳工活动家需要反思的地方，在缺少阶级大联合的政治视野、不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前提下，工人运动究竟能否从根本上解决整个工人阶级面临的问题。

自觉的工人运动，不一定先有工会再有政党。俄国工人运动开始较晚，但却是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的最好的典范。1861 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工人阶级开始逐步形成。在 19 世纪 70 年代，进步工人开始了“非法结社”，相继组建了南方工人协会和北方工人协会。19 世纪 90 年代，社会主义者开始在工业区活动，组建先进工人的学习小组。1895 年，列宁把彼得堡分散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起来，建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开始实现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1898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这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1903 年，布尔什维克诞生，积极联系先进工人，参与他们的斗争。1905-1907 年，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布尔什维克领导了新诞生的苏维埃的伟大斗争。在第一次革命后，工人阶级争得了结社权，开始大量筹建工会。在此期间，布尔什维克为保持同群众的联系而利用了工会和其他各种合法的社会组织：疾病救济会、工人合作社、俱乐部，文化团体以及民众文化馆等，并代表工人阶级参与议会的斗争，这为布尔什维克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1917 年二月革

命和十月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再一次参与和领导了苏维埃的斗争，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探索如何跟工人相结合，到俄国工人获得正式的组织权，大约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从俄国工人组建政党，到建立工人阶级自己的政权，彻底改变工人阶级命运，经历了 19 年时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深入工农当中，成功的将工人阶级的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有机结合起来，有效的避免了韩国的"大工厂主义"[1]和英国的改良主义，成为各国工人运动的典范。

俄国工人用了 30 年左右，完成了从阶级形成、骚动式反抗、罢工到提出建立工会的发展过程。列宁曾经评价过俄国工人运动，"工人阶级联合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会进展得无比迅速，比德国工人的这种事业进展得还要迅速"[2]。

与俄国工人阶级成长速度对比，中国新工人的发展并不慢。中国新工人从 1978 年到 2010 年，用 30 年左右完成阶级形成、骚动式被动反抗、积极罢工到提出建立工会。未来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也将以俄国工人的速度，完成历史上最大规模工人群体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

(二) 罢工和工会

罢工是工人"战争的学校"，工人"就在这里受到训练，准备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中去；罢工是工人阶级各个队伍宣告自己参加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

大多数的自发罢工都是失败的，但却带来了越来越大的联合。2006 年-2008 年间，爆发了一轮斗争的小高潮，劳资纠纷急剧增长。激烈的阶级斗争促进了工人的反思，越来越多的工人开始意识到工会的重要性。这个时期的罢工除了经

1 目前韩国工人斗争以单个大企业工会为中心，不管小企业和非正式工，没有形成统一的阶级力量。

2 列宁. 给农村贫民. 列宁全集第 6 卷。

济性的诉求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先进的工人开始明确的提出要组建工会。2007 年 3-4 月间，盐田港数家公司发生了一连串罢工，工人不同程度的提出了工会方面的要求，蛇口集装箱码头工人在罢工期间明确要求罢免不作为的工会主席，而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公司的吊车工人更是将“立即成立工会”列为罢工诉求的第一条。2010 年的工潮中，更多的工人提出了要参与工会，组建工人自己选举的工会。

2010-2012，全国范围内经历了第一次新工人的大斗争。在此大形势下，以本田为代表，成立了大致数十个工人自己的工会，中国新工人阶级自发的走上了组建工会的道路。从 2013 年经济持续衰退以来，这些聚集起来的零星的组织力量逐步衰退，阶级斗争的战线被再次推了回去。曾经建立起来的工会出现分化，一部分被资本家打压后收编（广州汽配行业），一部分成了中高层管理人员手中每年加薪的工具，还有一小部分举步维艰的坚持。从政治环境来看，十九大以来整体形势明显收紧，体系外的合法空间越来越小，体系内的合法空间管控也日益加紧，党的触角试图延展到每一个环节，其中工会是党在基层的重要依靠。所谓“根基不牢，地动山摇”，政府是不能允许在庞大的基层生产单位丧失其组织根基的。而工会，是重建组织的抓手。打造基层企业工会，进而维护社区稳定，维护劳资和谐，这就是中国政府关于工会工作的基本设想。

2018 年塔吊罢工是又一个标志性事件，代表着行业联合的趋势。不同行业由于受平均利润的差异、工人劳动的技术含量的差异、行业经济周期的差异等方面影响，工人提出的诉求不尽相同。但“同一个行业，工人的利益诉求是高度一致的，行业工会可以最大范围团结具有共同利益诉求的工人群体，进而形成与资方力量的平衡，稳定劳动关系”。塔吊罢工就是典型。塔吊工作本身具有一定技术性，工人的诉求高度一致，工人的身份归属是职业而不是单位，工人的斗争不是

指向个别的资本家而是指向行业本身，这就会导致整个行业的呼应罢工，为行业的联合打下基础。相同的诉求、身份归属、斗争对象，是工人跨地区联合的基础，而技术进步将促进工人更便利地形成跨地区的联系，突破障碍形成组织。本次塔吊罢工后，有两个地方的工友成立了地区性的俱乐部，事实上就是地下工会。可以预计，在下一轮工潮来临之际，某些同质性较高的行业将出现全国性罢工，并在罢工后形成全国性行业工会。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新工人阶级从无到有，不断壮大。以 2010 年南海本田事件为标志，新工人阶级走上了自发组建工会的道路，到 2018 年，塔吊行业出现明显的全国联合的趋势。

以罢工为主要斗争手段，在基层生产单位获得事实上的结社权——组建工会，即是中国工人自发斗争所处的阶段。

当前是该阶段的初期，处于最严厉控制的时期。一般而言，当前条件下，任何在全总体系外公开建立工会的企图，都是难以实现的；在工厂中，在全总体系内建立工会工人自己的维权工会，并以此教育工人、维护工人权益的企图，也是很难实现的。

然而，在管控能力相对较弱的某些行业，工人可以建立工会或类工会组织，这类组织有些能公开活动不被干扰（如塔吊俱乐部），有些会被全总收编而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如网约车司机工会等）。但不论如何，工会可以相对独立的开展某些维权活动，并以此教育工人。即使在管控力度很强的工厂（工厂管控力度明显比塔吊等行业强），工人仍可以利用工会开展工作。工人可以将工会当作密切联系群众、进而开展工作的据点。先进工人还可以结合工人的日常需求，围绕群众的切身利益，进行各种力所能及的斗争。在此过程中，必然会涌现出更多的积极分子。出现机会时，先进工人可以参选某些工会的职位。但先进工人要明白，参选工会职位，

不是为了把厂工会搞好，而是占据平台，便于其接触群众，以培养革命力量。也就是说，工会仅仅是工具，而不是目的。

工人的斗争以及在斗争中组建工会，是由雇佣劳动关系本身决定的，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压制的。至于在什么时候迈出第一步，在什么时候大规模爆发，是依条件而转移的。回顾中国工人上一轮工潮，先是经济危机，其次是资本家进攻，工人在危机时行动趋于保守，再是经济复苏，资本家招人缺工，工人在经济高涨时开始斗争，最终汇成席卷全国的工潮。在斗争中，少部分先进工人提出重组工会的诉求，获得了宝贵的经验。

上一轮工潮过去快十年了，中国的经济再次来到危机的边缘。近几年来，导致中国经济放缓的一切事实，都没有改善，反之，还在不同程度加强。数年后，危机必然到来，且比 2008 年更为严重，工人福利将大幅削减。政府必然印钞票救市，虽然饮鸩止渴，但短期会刺激经济复苏。经济复苏后，各行业对工人的需求加大，带来大规模斗争的有利条件。更多工人在斗争中将提出建立工会的诉求，获得结社权，并形成更大规模、甚至是全国的联合。这仅仅是一个起点，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必将超越经济斗争，最终走向政治斗争。

(三) 中国新工人的历史命运

中国工人已经能够通过集体行动争取到一定的工资提高和待遇改善。某些人开始认为，工人阶级可以只去搞罢工，成立罢工基金会或互助协会，工人阶级仅仅通过罢工就能大大改善自己的境况，甚至求得自身的解放。毫无疑问，工人的罢工和工会运动是有重大意义的，这是工人消灭竞争的伟大尝试。先进工人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建立在工人彼此竞争、也即工人彼此不团结的基础上。正因为工会运动反对这种竞争，反对资本家赖以生存的关键，所以资本家们才会对工会运动如此心惊胆战。但工会运动也有可能走向狭

隘的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走向英国的工联主义和韩国的“大工厂主义”，最后葬送无产阶级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根本在于单纯罢工只是在争取一个较好的雇佣劳动制度，争取一个体面的当“奴隶”的条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新工人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工人将越来越多的面对以下问题：第一，物价越来越高怎么办？新工人已经能够争取到提高工资，而且近几年新工人平均工资提速可达 10%甚至更高，并不算慢，但新工人收入真的增加了吗？富士康基本工资上调很快，但工人的收入不升反降，“工厂周边的商户听说我们涨工资，把物价抬得很高，房租几乎翻了一倍，我们员工真是伤不起啊！”[1]工人争取到工资上调，一般都是隔两个月以后才能拿到，但周边的餐馆、商店和房主都是听到消息就立马提价，这两年工人工资上涨以后存下的钱不但没增加，反而更少了。争取不断提高工资是必要的，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确实无法为工人赢得更多东西，工人必须要思考怎样根本改变自己的命运。第二，工厂亏损了怎么办？在工厂盈利时，工人可以去跟老板搞集体协商，根据上一年公司业绩和利润增长情况，提出本年提高工人工资的目标。但一旦工厂亏损呢？工人工资那么低，养活自己刚刚够，养活一家子捉襟见肘，面对“芝麻开花节节高”的物价，工人就应该固守原有工资，永远熬下去吗？第三，工厂破产了怎么办？在工厂不破产的情况下搬厂，工人可以去讨要 N+1 倍补偿，但如果工厂就破产了呢？在工厂不破产的情况下，工人可以去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但如果工厂破产了呢？工人最宝贵的青春都献给了工厂，剩余价值都献给了厂主和管理层，而工厂倒闭是因为厂主和管理层经营不善导致的，工人却要

1 付渑. FLA 调查适得其反 富士康员工收入不增反降[N]. IT 商业新闻网，2012-04-10。

承受这群吸血鬼经营不善的结果。第四，遇到经济危机怎么办？一家工厂倒闭了，工人还可以到别的工厂里找到工作，但所有工厂都经营不善、都裁员怎么办？在经济高涨期，工人为了资本家们的幸福流血流汗，勉强可获一盘残羹冷炙，到经济危机期，工人就要被一脚踢开，流落街头。现在工人越来越无法回到农村了，很多工人家里都没有地了，危机的时候城里连讨饭的地方都难找，难道他们就该到垃圾堆里找吃的吗？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生产相对过剩是老板贪婪追求剩余价值的结果，凭什么经济高涨期老板赚得钵满盆溢，到经济危机期就要工人们去承担代价？工人创造的价值被不劳而获者挥霍，不劳而获者带来的危机却使穷苦人不堪承受，难道工人不该质疑这样的社会制度吗？第五，遇到普遍的社会危机怎么办？如果不仅是经济危机，而且成为社会各阶层都广泛卷入的社会总危机，那工人应该怎么办？社会各阶层都会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工人阶级只能去盲从，只能去选择有产者设计的圈套吗？新工人不该独立提出自己阶级的目标和改造社会的方案吗？这些问题都是觉悟的工人必须面对的，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只靠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而必须通盘考虑全中国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工人群众的生活条件使他们整天忙于奔命，没有、也不可能有空闲时间去考虑国家的任何问题，但工人为争取自己的日常需要而进行的反对厂主的斗争，却必然使工人来考虑国家问题、政治问题，以及国家怎样管理劳动者的、劳动法规是怎样发布的，这些法规是为谁的利益服务的等问题。

目前，中国工人已经开展了罢工行动，这是工人的“战争的学校”，工人“就在这里受到训练，准备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中去；罢工是工人阶级各个队伍宣告自己参加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1]。但“战争的学校”还不是战争本身。

1 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 年 9 月-1945 年 3 月）. 马恩全集第 2 卷。

事实上，罢工只是斗争手段之一，只是工人运动的一种形式。只有觉悟工人成为社会主义者，成为解放事业的追求者，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到工人中间传播社会主义，教育工人掌握各种对敌人斗争的方法，并且建立起为全体人民摆脱政府压迫和全体劳动者摆脱资本压迫而奋斗的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只有在这个时候，工人阶级才能吸引全世界所有工人，高举"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旗帜，参加联合全体工人的伟大运动。

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会爆发大规模的工人罢工浪潮，斗争形式也会越来越多样。在这些斗争的过程中，新工人不论在组织上，或是在意识上，都将有进一步的发展。资产阶级希望把工人运动纳入到有序化的工资集体协商下面，让工人有序化的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虽然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进而促进和谐的劳资关系。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增长，但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却否定了这个前提。西方国家都曾经希望把工人的抗争纳入到制度化的轨道下面，但金融危机一来，工人的斗争就马上突破了以前的界限。这表明，只有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是工人阶级最终的方向。

资本主义把生产力发展到巨大的规模以后，便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资本主义生产出日益增多的商品使竞争尖锐化，使大批中小资产阶级破产变为无产者，而裁员和降薪则缩小了全社会的购买力，导致生产出来的商品无法销售出去[1]。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通过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暴露出来，危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引起的，也必然要求变更现存经济关系加以解决。大工业生产的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正如列宁所讲："工人应当万众一心地来反对所有靠别人劳动养活

1 斯大林.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 年 9 月）. 斯大林文选（上）. 201-202。

的人；工人自己应当联合起来并把一切无产者联合成一个工人阶级，联合成一个无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来说，斗争并不是容易的，可是在这个斗争中最后胜利的一定是工人，因为资产阶级，或者说靠别人劳动养活的人是人民中的极少一部分。而工人阶级是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工人反对业主，就是几百万人反对几千人[1]。”在中国，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就是几亿人反对几百万人，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工人阶级。未来二三十年里，随着工人阶级思想和组织上的成熟，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将成为 21 世纪上半叶最为辉煌壮丽的事业，随着资产阶级灭亡，私有制也将被一道消灭，工人阶级的胜利最终将使得一切阶级统治和特权现象一去不复返。

1 列宁．给农村贫民（1903 年 8 月）．列宁全集第 6 卷。

历史变迁中的国企工人

第一节　引言

国企是共和国的长子，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建国初期，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加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建立了一批国营企业。当时，国企工人是一个光荣的职业，社会地位高，享受着非常好的待遇——作为主人翁参与民主管理，享受免费的住房、医疗、教育保障；同时，国企工人也迸发出极高的生产热情——“轻伤不下火线”“以劳动为荣”“我们不是为了义务劳动而义务劳动，我们义务劳动是因为我们爱国、爱厂。怎么能不爱呢?这个厂都是我们自己的，自己的东西怎么能不爱！”[1]等话语反映了国企工人普遍的思想状态。

改革开放后，中国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不断降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在改革开放所导致的不同社会阶层变动中，前后反差最大的就是国企职工：他们从昔日的主人翁变为了今天的雇佣劳动者，从原本令人羡慕的领导阶级变为了需要被关注的弱势群体。

老一辈的国企工人在改制时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抗，老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团结抗争的力量震撼了统治阶级，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确立和巩固，老工人的反抗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止国企改制的进行。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一辈的国企工人正在逐渐退出政治和历史舞台。改革开放已经 40 周年，目前在国企中工作的工人大都是改革开放后才进入工作当中，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公有制时代的国企。现代的国企

---

1 老工人访谈：大锅饭养懒汉吗？http://www.sohu.com/a/192321483_800284

工人生活状况如何？其思想意识的特点是怎样的？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

第二节　国企工人的基本情况

(一) 数量

国企工人指的是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在国有企业中工作依靠工资为生的工业劳动或手工劳动者。本文研究中，国企工人主要指在国企中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就业人员。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6 年以来，除了在 2010、2011 年由于 4 万亿刺激计划以及大规模兴建基础设施使得国企工人数量增多之外，我国国企工人的数量是在不断下降的。 国企中存在着正式工和劳务派遣工，二者的工作待遇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二) 正式工

正式工，即有正式编制的员工，在目前国企中，就是直接和国企签订了正式劳动合同的员工。

国企正式工的工资相对于私企和外企来说不高，但工作稳定，上下班时间固定，工作压力相对较小，有周末和年假。“五金一险”等社会保障齐全，工作福利较好。相对于劳务派遣工来说，正式员工不仅享有合同规定的正常工资、各种福利补贴以及绩效奖金，还有更多的晋升机会。

国企改革不断加深，对于国企内部中高层干部和技术专家（领导层和科技人员）的激励机制也在逐渐加强。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于 2019 年 5 月表示，当年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覆盖面将力争新增 30 户左右，尚未尝试实施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的央企，原则上在年内都要求实现“破冰”。根据对一个科技型国企的访谈结果，国企内的科技工作者对于股权激励非常支持。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城镇就业人口平均工资的数据（见图 2. 4），2015 年之后，

国有企业城镇就业人口平均工资涨幅明显高于有限责任公司城镇就业人口平均工资的涨幅。而国企只将正式员工数量和待遇上报考核，从图 2.4 可知，近年来国企改革对于国企正式员工的物质刺激力度非常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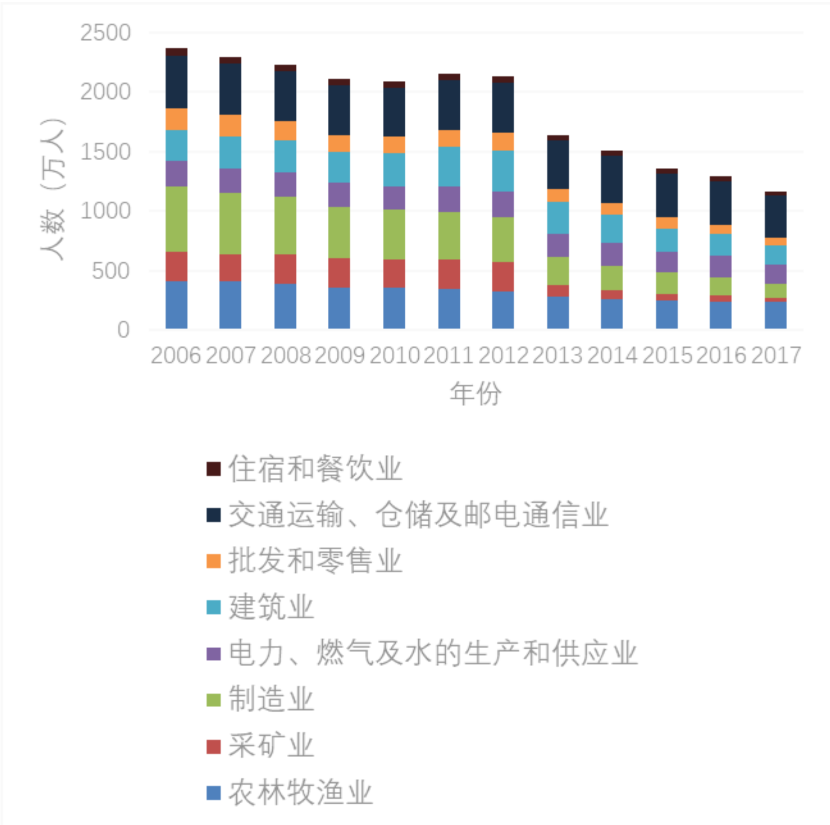


图 2.3：按行业分国企工人数量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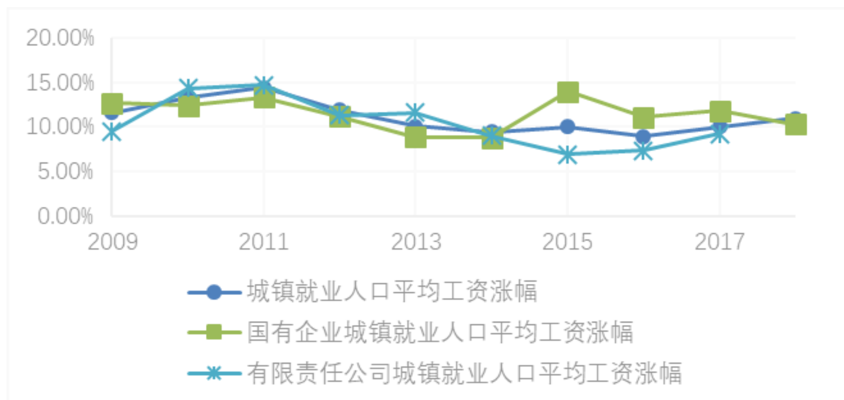


图 2. 4：城镇就业人口工资涨幅[1]

(一) 劳务派遣工

劳务派遣工指的是不和国企签订劳动合同，而是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被派遣到国企工作的工人。

1) 劳务派遣工是国企内的“二等公民”

劳务派遣工并不直接和国企签订劳动合同，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工作待遇与各项福利和国企正式员工相去甚远。

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但是很多国企却无视法律规定，将生产中处于生产一线的体力劳动大量交由劳务工完成。

《广州劳务派遣用工问题调查》显示，大中型国有企业不但在生产一线大量使用劳务工并存在“混岗”现象，而且在某些生产部门或岗位上主要或全部使用劳务工，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2]。广船集团有劳务工 7700 人，占职工总数的

1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
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40E&sj=2018
2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四条 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使用

55%；广药集团有劳务工 6319 人， 占 42.4%；广钢集团有劳务工 3400 人，占 24%。[1]

在全国范围内，根据截至 2008 年底的统计数据，邮政和电信企业的劳务工主要成为邮递员和营业大厅服务员。在石油、采矿等行业，劳务工大多从事基层体力劳动。遇到洪水、暴雨、雪灾等恶劣天气，电力、运输企业奔赴一线抗灾救灾的也往往是劳务工群体。

做着相同的甚至更苦的工作，劳务工却面临"同工不同酬"的待遇。据河北省对 3 个市 9 家垄断行业经营单位的调查，2008 年底，该省企业使用的劳务派遣工总数与企业直接签订劳动合同的职工人数基本持平，但后者的平均工资却是前者的 3 至 4 倍甚至更多。在社会保险方面，为了减少保险费支出，劳务派遣公司会按非正规就业的比例"就低不就高"缴纳，或选择性地只参加 1 至 2 个险种。其他福利方面，在联通基层供职的劳务工表示，正式工每年享受公司组织的职工体检，每年发放两千元以上取暖费，多年来劳务工没有享受过。正式工还有"烤火费" 、"防暑降温费"、饭补、车补等多项补贴，就连话费补贴也远高出劳务工两倍多。春节前公司发放购物卡，正式工 2000 元，劳务工只有 300 元。"三八妇女节"，女正式工有购物卡，而女劳务工什么都没有。 《人民日报》曾报道一名在电力公司工作的架线员陈学锋，作为劳务工，他没资格拿的交通、差旅、野外作业补贴加起来，甚至比工资还高。

2) 国企劳务派遣泛滥

我国的劳务派遣制度起源于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成立的外企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是向雇佣当地员工的外资机构提供

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 10%。

1 国有企业里的"二等公民"。
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zhongguoshigaige05.html.

服务的劳务派遣机构。2000 年前后，国企改制中减员增效使得大量工人下岗，地方政府为了安置失业人员，以及置换职工身份，曾"大力发展劳务派遣组织"。劳务派遣的大量出现是在 2008 年之后。一方面，2008 年《劳动合同法》出台，将劳务派遣制度写进法律；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下，企业为了将负担转嫁到工人身上，开始大量使用劳务派遣，避免和员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避免在裁员时支付赔偿。不少用人单位强制有 10 年工龄的老员工与劳务机构重新签订合同，以劳务派遣人员的名义在原单位继续从事劳动。在资方"不签约就走人"的强势之下，员工有的选择忍气吞声，就此踏上上访维权路的也不在少数。尽管 2013 年《劳动合同法》进行了修订[1]，规定劳务派遣只能使用在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三类岗位上，同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又起草了《劳务派遣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提出辅助性岗位不超过 10%的规定，但是实际执行过程中企业的劳务派遣现象仍大量存在。



图 2. 5:劳务工与派遣单位、用人单位之间的三角关系

1 新法实施后 6 成国企岗位使用劳务派遣。http://jingji.cntv.cn/2013/10/30/ARTI1383116658910836.shtml.

国有企业成了劳务派遣泛滥的重灾区：据全国总工会于2011年“两会”前夕上报至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国内劳务派遣调研报告》显示，“全国劳务派遣人员总数已经达到6000多万”，劳务派遣泛滥现象，“主要集中在公有制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在石油、化工、电信、金融、银行、航空、铁路等系统最为严重，部分央企甚至有超过2/3的员工都属于劳务派遣” 。据上海市总工会提供的数据显示，在按所有制类型统计的劳务派遣用工中，“国有企业最高，占47.2%” 。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于2013年基于20座城市的整体数据完成了一项调研报告，调查结果显示，国企和外企才是劳务派遣的“重灾区”，在各自企业类型中的使用比例分别为64.7%和61.4%，而民营企业中仅有34.3%在使用劳务派遣。

相对于私企，国企的劳务派遣更加泛滥的原因主要是以下两点：

一是通过劳务派遣人为地绕开“工资总额控制”这条“红线”，以此来保证正式职工尤其是中高层管理人员享受尽可能高的工资待遇[1]。部分单位在用工中大量使用劳务派遣人员，并以“劳务费”形式支付其工资报酬，变相降低本单位工资实际支付额度，从而使“劳务费”成了部分国有企事业单位逃避工资总额控制的“调节阀”。相应地，处于工资总额部分的正式职工尤其是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待遇得到了保证。

二是出于国企考核的需要[2]。国资委考核国企的一个重要指标为国企营收和其员工数量的比例，国企为了增加其考核的成绩，便通过大量采用劳务派遣工来控制企业内部员工的数量。

---

1 全总建议：劳务派遣工资纳入国企工资总额。https://finance.qq.com/a/20120627/000435.htm.

2 国企为什么热衷于劳务派遣。http://www.0551hfzp.com/news/news-show.php?id=33.

国企中劳务派遣的泛滥反映的不仅仅是国企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其还反映了在国企的市场化改革当中，国企管理人员蜕化成了骑在工人头上的资产阶级。这些管理人员形式上并未占有生产资料，但他们却拥有组织生产、管理企业的一切权力，而且这种权力是不受工人监督的，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在事实上支配生产资料。既然他们能够在事实上支配生产资料，他们必然会要求获得相对应的收益，也就是说他们必然会想尽办法盘剥工人，榨取剩余价值，扩大自己的利益。大规模使用派遣工，就是他们为自己谋利益的明证。而随之产生的是国企内部大规模的劳务派遣群体，他们的工作待遇与私企一线工人的工作待遇并没有什么差别。长期来看，国有垄断集团与劳务派遣工之间的矛盾必将不断爆发出来。

第三节　国企的历史变迁

(一) 工人当家作主的年代

改革开放之前，国企实行公有制，工人当家作主，这个年代的基本特征为：企业不能开除工人；工人与领导关系相对平等，工人能够监督干部；工厂福利好，工人衣食无忧；工人爱厂如家，工作热情高。

工厂负担了工人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对于工人的特殊困难（如家中有人生病、出了工伤等）均会给予特殊的照顾，工人衣食无忧；领导不能凌驾于工人之上，比如在鞍钢宪法中规定“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要求干部到工人中去进行体力劳动，工人能通过诸如工人管理小组的形式对参与管理，且能够有效地对干部进行监督。例如在对某国企老工人进行访谈时，他表示“我们厂，副处级以下干部基本上所有时间都在生产一线，干的活比工人还多。正处级以上的干部每个礼拜五都要参加劳动，还要向工人拜师学艺。

当时干部参加劳动那是真的在劳动哟，我就听说过有些车间的主任、书记亲自上一线结果中暑晕倒的。”“我们厂的副厂长利用权力给自己分了一套房子，群众在民主生活会的时候反映到党委，结果这个人被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房子退回，级别从副厅级降到副处级。”这些历史记忆，即是当时工人和干部之间关系平等、工人监督干部的很好的例证。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下，工人以厂为家，迸发出了极高的生产热情，在国企老工人访谈中能够了解到许多类似的事例：正常 7 点上班而一些工人早上 6 点就会翻窗进入车间参与生产；小伤小病不愿跟领导说，怕领导不让他参加劳动。

在工人当家作主的年代，国企内部能呈现出如此特点，是由当时的政治路线和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改革开放之前，国企实行公有制，对于干部和技术人员的特权采取了限制措施，工人与干部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且工人对于干部拥有很强的监督权力，内部的分配相对平等，工人和干部之间的差距很小。同时，国企按照计划进行生产，无需像资本主义下的企业那样紧盯利润，因此能够为工人提供较为完善的福利待遇。而这一切，均随着改革开放后生产关系的变化而成为历史。

(二) 新常态以前的国企演变

改革开放之后，国企内部的改制使得厂长经理等人的权力不断增强，他们的利益也不断得到巩固和扩大，而工人阶级的管理权，监督权却在不断地削弱。掌握了企业内部生杀大权的国企领导层，开始通过各种或明或暗的手段，将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揣入自己的腰包。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国企攻坚战，更使得许多管理层一夜暴富，摇身一变而成为新时代的资本家。

1979 年 7 月，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

成的规定》等 5 个扩权文件，大范围内实行放权让利。此次放权让利和 1958 年的工业企业下放是有本质的不同的。1958 年在工业企业下放的同时，大力推行工人民主管理，而 1979 年的放权让利同时大力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这实际是扩大厂长经理享有的特权，使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在国营企业内部的公权力私有化，加大国营企业中存在的资本主义因素，破坏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领导权[1]。也就是说，1979 年的放权让利，实际上是将权力集中到了厂长经理手中，使他们能够利用这些特权为自己谋取利益。

1983-1984 年在全国推行利改税，企业逐步“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从 1987 年到 1993 年底，企业改革的重点从放权让利过渡到转换企业机制的轨道上来，具体做法为完善承包制。利改税和承包经营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恶果，实行以后，企业几乎一窝蜂地追求高利润行业，造成生产过剩和国企之间的无序竞争，浪费了国家的资源，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也加剧了厂长经理的腐败。像作为《抉择》[2]原型的纺织厂每年的招待费就一千多万元。该厂每个厂长经理退休，发给一百万元办三产，也就是个人小纺织厂。于是大纺织厂周围布满了小纺织厂，国家的资金、原料、市场都流到了小纺织厂。小厂红红火火，大厂一点一点被蚕食。大厂的工人失业，被小厂以低价招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随意压榨剥削。

1993 年 11 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实际上掀起了一股更大规模的私有化的浪潮，因为追求所谓的“产权明晰、权责明确”，大量的国企被半卖半送给私人。

1 《国之重器：共和国 60 年的国营企业》
2 1997 年红极一时的电视剧。

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过剩，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决心拿国企开刀，强行让大量企业退出市场竞争。1994 年开始试行国有企业破产，1996 年 58 个“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兼并企业 1192 万户,资产总额 292 亿元。1997 年国企开始“三年脱困”，当年破产倒闭的企业 675 万户,被兼并企业 1022 万户。与此同时，举国上下推行“砸三铁”，以铁手腕、铁面孔、铁心肠去砸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出现了国企工人的下岗潮，失业的只能拿基本的生活费，出现了许多上访、绝食、自杀的现象。大量下岗工人年纪在 40 岁至 50 岁之间，且没有掌握太多其他技能，数千万人同时下岗更使得再就业之途异常艰难。这一代工人在发展时期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血汗，但在市场经济改革的大潮中却被抛弃，从昔日的主人翁变成了今天的弱势群体。

2003 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由于国资委的出现，中国的国有资产有了一个正式的代理人，整个官僚集团通过国资委掌控着巨大的资本量，而中国的国有资本作为一个整体，也成为最大的资本集团。

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内部的分配差距也在不断地扩大。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208 家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从 2006 年的 6. 72 倍扩大到 2008 年的 17. 95 倍[1]。同时，高管作为国企的代理人，一定程度上能够安排自己的薪酬，因此出现了高管工资增长与国企业绩脱钩的现象，如在 2011 年，上石化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为 9.44 亿元，比 2010 年的 27.03 亿元下滑 65.07%，而从 2008 至 2011 年，在企业业绩下滑的情况下，上石化的三位高管的薪酬年增幅，最低的也在 4.2%，而最高的增幅却高达 50%[2]。国企普

1 国企高管"控高"仍需落在实处。
http://www.drc.gov.cn/qyyjs/20130530/165-672-2878043.htm.

2 国资委调查国企薪酬 或为收入分配改革开路。
http://m.sohu.com/n/385149411/?pvid=000115_3w.

通员工的工资与之相比则是另一种景象，以中石化为例，中石化集团旗下上市公司 2011 年共实现营业收入 2.5 万亿元，当年归属集团的净利润达 716 亿元。而 2011 年北京加油站的加油工一个月只有 1300 块钱，岳阳石化工作十年的大学毕业生，最高工资 3200 元，一般 2600 元左右[1]。

伴随着国企私有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领导层的权力在不断地增强，而普通工人的地位和待遇在不断下降。然而经历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双重教育的国企老工人，并没有坐以待毙，他们在国有资产被侵吞时英勇反抗，其中较为典型的反抗私有化案例通钢事件甚至一度减缓了国企改革的步伐。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确立，已经被边缘化、且尚未重新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无力主导历史的进程，只能被市场化的大潮裹挟着被动前进。

(三) 新一轮国企改革

从 2009 年投放 4 万亿以来，基建投资增速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政府负债、居民债务也迅猛增长。2015 年之后，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进入了所谓“新常态”，产能过剩问题凸显。国内经济增长的乏力，迫使资本向海外扩张，寻求新的增殖空间，“一带一路”政策应运而生。在这样的经济发展背景下，新一轮国企改革应运而生。

1) 从管人管事管企业过渡到管资本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提出了国企改革需要从管人管事管企业过渡到管资本，大意是进一步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原则，使企业拥有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同时，明确国资委为直属特设机构，突出了国资委的专门性、独立性，即

1 樊大彧：国企高管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须严控。http://news.sina.com.cn/pl/2013-03-13/171426521256.shtml.

专门履行出资人职能、独立于行政部门之外、不行使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机构特点[1]。

可以看出，此轮国企改制，将进一步地使得国企的社会职能淡化，进一步否定了政府基于公共管理职能而采取的对国企的管控，国企的市场化程度也进一步推进了。

2) 新一轮放权授权

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必定会涉及到权力的下放。2019 年 4 月，《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方案》出台，为落实这一重磅文件，国资委随即公布了《国务院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2019 年版）》，将 5 大类、35 项授权放权事项列入《清单》，包括规划投资与主业管理（8 项）；产权管理（12 项）；选人用人（2 项）；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工资总额管理与中长期激励（10 项）；重大财务事项管理（3 项）等。此轮放权将"层层松绑"，要求把授权放权落实到各级子企业或管理主体上[2]。国企层级按照控股结构划分，由国资委直接控股的称为一级企业，由一级企业控股、国资委间接控股的为二级企业，以此类推。国企的各级企业均能获得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同时对层级越低、股权关系链越长的企业，国资委的掌控能力越弱，如中核集团由于行业特殊，一直都是国家严密掌控的国企，而在此轮放权之后，中核集团的二级公司可以自主经营，超过一定额度的投资才需要报告国资委，再高的则要到总公司备案；三级公司的负责人既可以是集团的一把手，也可以是市场招聘而来。可见，中核集团的二三级及以下的公司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了。

1 周丽莎. "以管资本为主"完善国有资产监管方式的概念内涵[J]. 政治经济学季刊. 2019(02), 1-12. https://mp.weixin.qq.com/s/34eFiwTSbPhnrQdtA7koUA.

2 上半年国企改革"发令枪"声声，你感受到"加速度"了吗？https://wxn.qq.com/cmsid/WXN2019070500181200.

3) 混改和市场化雇工

混改指的是将社会资本引入国企资本中，在股东之间分配资本的所有权，在董事会中分配资本的管理权。实际上是进一步政企分开，推动国企市场化的措施，也代表了国有资本集团和社会私人大资本的合流。国企的市场化改革必定包含分配制度的改革，2019 年颁布的《中央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指出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把内部分配权交给企业[1]，也即交给了企业的管理层。《国务院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2019 年版）》[2]则明确了“支持中央企业所属企业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实行市场化薪酬分配制度”“企业实施分红激励所需支出计入工资总额，但不受当年本单位工资总额限制、不纳入本单位工资总额基数”等政策，实际上是为国企管理层和科技人员的工资待遇迅速增长打开了绿灯。

这些措施一方面使得国企的领导所能获得的物质财富进一步增长，使得“国企领导也能达到私企领导的工资水平”，另一方面促使了国企的科技人员的工资增长，大量国企实行骨干技术人员的岗位津贴、成果转化奖励以及全员工资和绩效挂钩，使用物质刺激的方式，增强国企的科技人员对于企业效益的推动作用。根据前往科技型国企访谈的结果，国企的科技人员对于此轮改革带来的物质刺激的欢迎程度很高。

4) 战略性重组和供给侧改革

战略性重组主要针对在“一带一路”战略中走出去的国企，为了避免国企之间的互相竞争而损害中国资本在海外的利益，中国的国企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性重组，如南车北车合并成中车，南船北船合并成中船等。

---

1 上半年国企改革“发令枪”声声，你感受到“加速度”了吗？https://wxn.qq.com/cmsid/WXN2019070500181200.

2 《国务院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2019 年版)》全文一览。http://www.chinairn.com/news/20190812/152432434.shtml.

战略性重组的意义为加强国企的垄断程度，避免在海外的互相竞争压低利润。同时国企集中程度的进一步加强也使得国有资本集团的利益共同性进一步加强，成为更加强大的资本力量。

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措施为三去一降一补，基本的经济背景为国内的全面生产过剩。国企由于体量较大，运行更为规范，并且有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担保，在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中很少出现破产倒闭的情况，中小私企则相反。因此，清理落后产能使得许多上游国企的竞争情况得到了缓解，基础工业产品的价格有了提高，所以国企在供给侧改革中受益较大，而大量的规模较小的私企则损失惨重。

(四) 国企变迁中的阶级性分析

中国国企改革的历程是一个无产阶级丧失统治地位，国企的领导层变质为新的资产阶级的过程，从以下几个方面我们可以考察国企变迁的阶级性：

	工人当家作主的年代	国企改革之后
生产目的	以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为目的，国企保持了对于工人的高福利，企业办社会，工人无后顾之忧。计划经济下，国企的生产服从社会的生产需要	以利润为导向，国企需要自负盈亏，服从自身利益的需要。为了增加利润而需要缩减工人福利，强迫工人提高劳动强度，国企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
所有制	集体所有或全民所有，国家代为经营，不能随意处置（如不能将国企私有化）	所有权在法律上归属于国家，在本质上是官僚系统高级干部集体占有生产资料，通过相关部门代为管理
权力关系	干部与工人平等，干部接受工人的监督。干部参加劳动，	生产过程由国企领导层支配，领导层的特权不断扩

	工人参加管理，干部与工人之间的差距受到严格的限制。工人处于主人和共同的建设者的地位	大，工人丧失监督管理权，处于被雇佣和被支配者的地位
分配制度	干部的收入被严格限制，企业利税上缴后国家以高福利的形式返还工人，工人创造了国企的财富，也能公平分享企业发展所带来的收益	领导层一定程度上自定薪酬，领导和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企业利税上缴后，国家不再以高福利形式返还工人，而是用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或者被高官以各种方式占有，工人创造了财富，得到的只有仅能养家糊口的工资

即使有人说中国的国企相比于私企来说对于利润的追求不是那么高从而肯定了国企的国有性质，但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国企改革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群体被缔造了出来，无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丧失了，资本主义又重新占据了统治地位。

第四节　新一轮下岗潮

上世纪 90 年代末的下岗潮中，数千万国企工人下岗失业。而从 2015 年开始，以去产能为重要特征的供给侧改革开始推行，清理过剩产能的过程中必然产生一部分国企工人失业的问题。

本轮下岗国企工人的数量，有的估计三百万[1]，也有人估计有一千余万人下岗[2]，也有人指出，本轮国企工人下岗将主

1 中金梁红：如果未来两三年这些行业减产 30%，将有 300 万职工面临下岗。http://people.chinareform.org.cn/L/lyn/media/201601/t20160113_242021.htm.

2 胡星斗：下岗潮中望工人别再沦为弱势群体。https://www.voachinese.com/a/hu-xindou-20160317/3241834.html.

要影响 6000 万临时工[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 2016 年 2 月 29 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化解过剩产能将造成一部分职工被分流安置。据初步统计，煤炭系统涉及约 130 万人，钢铁系统约 50 万人。根据 2017《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6 年我国煤炭开采和选洗业城镇就业人口为 330.7 万人[2]，《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没有直接对应钢铁系统的就业数据，不过有数据显示，中国的煤矿和钢铁行业共有 1200 万工人[3]，这意味着在煤炭和钢铁的领域，有 15% 的工人将面临失业的状态。煤炭和钢铁行业作为产能过剩最具代表性的两个行业，同时也是本轮改制下岗人数最多的行业，可以作为分析此次下岗潮的典型行业，接下来我们将对这两个行业的工人下岗情况进行分析。

(一) 去产能情况

先来看煤炭行业去产能的情况。

2016 年 2 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发 [2016]7 号）中明确提出，从 2016 年开始，用 3 至 5 年时间，再退出产能 5 亿吨左右、减量重组 5 亿吨左右，较大幅度压缩煤炭产能，适度减少煤矿数量，煤炭行业的过剩产能得到有效化解，市场供需基本平衡，产业结构得到优化，转型升级取得实质性进展”。也就是在“十三五”期间，煤炭产业需要化解 5-10 亿吨煤炭产能。煤炭产业依赖于煤炭禀赋，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区性特征，山西、黑龙江、河南、山东、贵州等煤炭资源型局部地区因而面临

1 国企第二轮下岗潮剑指 6000 万“临时工”。
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dai/2016/01/358510.html.
2 数据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http://tongji.cnki.net/kns55/navi/result.aspx?id=N2018070151&file=N2018070151000103&floor=1.
3 中国煤钢业大裁员 农民工首当其冲。
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lay-off-steel-coals-20160229/3213456.html .

大批量员工裁员下岗的急迫问题[1]。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原煤产量在 2013—2016 年持续下降，尤其是 2016 年的原煤产量下降幅度最为巨大，2017 和 2018 年原煤产量有所回升。原煤产量回升主要是国家为了减轻煤炭下游企业的负担而释放先进产能的结果："电煤价格的过快上涨导致电力行业从全行业盈利变成了全行业亏损，炼焦煤价格的上涨导致钢材价格快速上涨。由于用药过猛，国家宏观调控部门不得不着手政策回调，开始释放先进产能。"[2]

而从煤炭行业的投资量来看，2013 年实行供给侧改革后，煤炭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在逐年减少。按照资本再生产公式，在一个短时间内，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需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煤炭行业的固定资本投资额降低，势必会引发煤炭工人的数量的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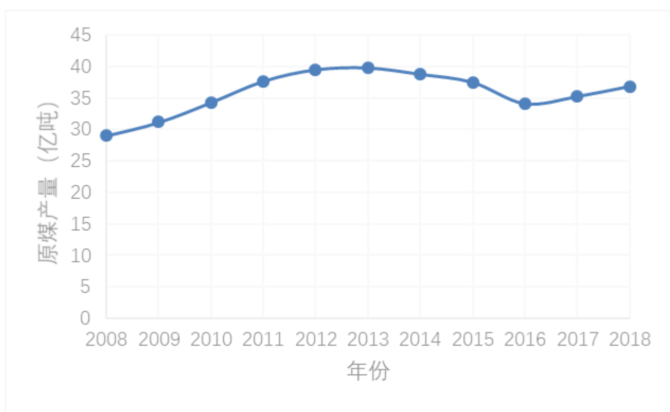


图 2. 6：近 10 年来我国历年原煤产量[3]

1 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煤炭转型中的就业问题研究[R]. 2019(05)

2 这两年煤炭大涨大跌背后的秘密！http://www.sohu.com/a/230807044_520407.

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E0H&sj=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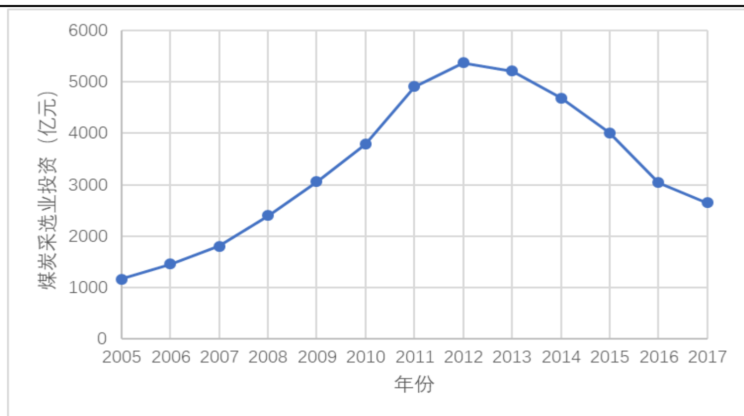


图 2. 7:煤炭采选业投资[1]

再来看钢铁行业的去产能情况。

自 2016 年至 2019 年 5 月，中国累计压减粗钢产能 1.5 亿吨以上[2]。从钢铁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知，从 2013 年以来，钢铁行业的投资基本上一直处于萎缩当中，钢铁产能削减，必定会造成相应的工人失业问题。

从工信部的数据整理可知，2013 年以来钢铁行业工人的数量一直在下滑，从 2016 年开始，钢铁行业工人数量下滑速度进一步增快。截至 2018 年 5 月，钢铁行业从业人员数为 226.8 万人，与 2015 年底相比，减少了 135.9 万人。较之尹蔚民部长声称的影响钢铁行业工人 50 万的数量多了一倍以上。

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70A&sj=2018

2 我国去产能成效显著 2019 年还有这些大动作。https://caijing.chinadaily.com.cn/a/201905/10/WS5cd537d2a310e7f8b157bf23.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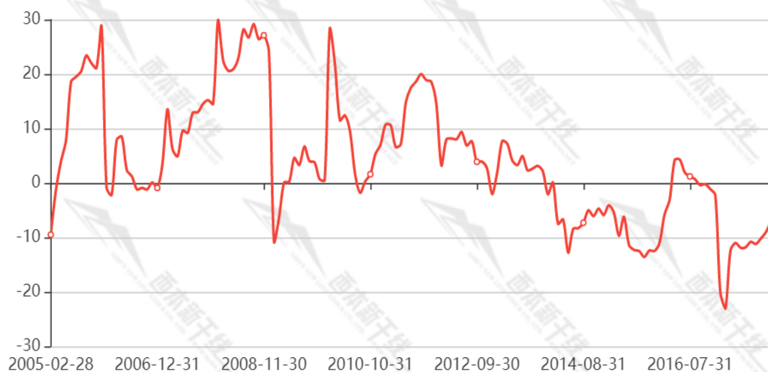


图 2. 8:钢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累计值，%）[1]



图 2. 9:钢铁行业历年从业人员走势[1]

1 数据来源：西本数据库。http://www.96369.net/indices/172.

(二) 下岗工人安置情况

在煤炭和钢铁大发展的时期，这两个行业拥有较高的薪水和极大的吸纳就业的能力，吸引着大量的劳动力涌入其中。而如今煤炭和钢铁工人又不得不在去产能的压力下离开原来的行业。这两个行业的工人以体力劳动为主，所从事的工作技术含量低，有些工人在长期的工作中甚至染上了职业病[2]，加之被裁退的工人往往年龄已经较大，这一系列因素均使得这些下岗工人的再就业之路充满了艰辛。

对于如何安置下岗职工，时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具体安置渠道已经明确了四个方面：

“第一，要鼓励企业挖掘现有潜力，在本企业内部安置职工。第二，促进转岗就业创业。启动就业扶持计划，在职业培训、职业介绍、职业指导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帮助职工能够尽快就业和创业。另外，对法定退休年龄五年以内、职工自愿、企业同意的，可以实行内部退养；对不能实现市场就业的困难职工，政府将开辟公益性岗位进行托底安置。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将拿出 1000 亿元资金妥善处理职工安置。”[3]

然而在整体的去产能背景下，前两方面的措施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以山西同煤集团地煤公司的安置方案为例：地煤公司对于下岗的员工给出了两个安置办法，一条路是去地煤公司青瓷窑煤矿，另外一条路是去同煤集团阳高的一个电厂，大多数员工都选择去电厂。但据工友反映：“但直到现在很多人也没有接到去电厂上班的通知，去青瓷窑煤矿上班

1 从全行业亏损到盈利创纪录背后：钢铁行业三年裁员超 135 万。
http://m.sohu.com/a/239450295_222256.
2 下岗后的煤炭工人：再就业不知何去何从！
https://kknews.cc/news/ey323kr.html.
3 兖矿计划三年减员分流 2 万人 煤企去产能去人员双刀疗痛。
https://kknews.cc/finance/z8o52gq.html.

之前要培训两个月，据我了解，他们现在也没有上班”[1]。再如地处东北的龙煤集团，提出了将员工分流至农垦总局、森工总局、林业厅和四大煤城机关的安置方案[2]，但由于东北整体经济形势不佳，有些年轻的煤炭工人并没有接受安排，而是选择到东北之外去另谋出路[3]。在 2018 年陕煤化集团对于富余职工的安置方案中，“由于提供的岗位有限，目前来看，更多的人只能选择待岗、内部退养等方式进行安置。”[4]钢铁行业的安置情况以宝钢于 2017 年的第一批分流为例，在宝钢不锈第一批分流的 1700 名职工里，有近 600 名职工办理了正常退休和内部退养；700 名职工自愿被公司买断工龄后，自谋职业；300 多名职工通过宝钢集团内部招聘安置，剩下的 100 多名职工在当时则没有分流的去向[5]。在整体的去产能大背景下，不可能创造出足够多的工作岗位，能够继续给员工提供的工作的数量只占下岗员工数量的很小一部分，大多数则是通过内退、买断工龄等成本较低的方式进行安置，同时也有大量的员工并没有得到安置。可见转岗分流等安置方法能够解决的问题是非常有限的。

在上世纪 90 年代，“内退”是国企节省开支的一种做法，现在这样的做法又开始流行起来。尹蔚民部长说了“对法定退休年龄五年以内、职工自愿、企业同意的”实行内退的条件，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变了样，国企为了节约成本，往往会用长时间休假或者强制性说服的方法迫使员工接受内

1 下岗煤炭工人成功转型 感慨：“太阳底下干活儿踏实”。https://kknews.cc/society/86zm22g.html.

2 钢铁煤炭行业将分流两成职工。https://kknews.cc/finance/nax45q.html.

3 兖矿计划三年减员分流 2 万人 煤企去产能去人员双刀疗痛 https://kknews.cc/finance/z8o52gq.html.

4 煤炭行业去产能：1000 亿元奖补资金显然不够。https://kknews.cc/finance/mgxk4rg.htm.

5 【供给侧改革“宝武”调研】2.6 万名分流职工转岗不下岗 转业不失业。http://www.sohu.com/a/164543541_428290.

退的方案，而内退员工所能享受到的退休金待遇相比于正常退休的员工来说将大大缩水。

而尹部长提到的第四种安置措施——公益性岗位，更像是杯水车薪，仅是能解决很小一部分大龄下岗职工的工作问题，对于整体的工人下岗潮的消化作用是很微弱的。

在去产能的过程中，一部分国企干部也会采用“调职”或者“分流”来避免“工人下岗”。这些计划包括将工人分派到较低级的工作岗位，或者实际上让他们做兼职。职工们还记在企业的账上，但获得的工资则少得多。[1]这一批人形式上避免了下岗的命运，但是生活水平大大缩水。

去产能的大背景使得在传统行业中不可能吸纳如此大量的劳动人口，于是许多下岗的工人转而进入了共享经济行业，成为了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2016 年 7 月 18 日滴滴出行发布的《移动出行支持重点去产能省份下岗再就业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 5 月底，滴滴为国家去产能计划中的 17 个重点去产能省份提供了 388.6 万就业机会（含专车、快车和代驾）。其中，来自去产能行业的滴滴司机为 101.9 万[2]。这类新兴的行业的确容纳了大量的劳动人口，对于缓解去产能的压力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不过我们也看到，这类工作的稳定程度远不如国企的工作稳定，共享经济中的工人一般是非正规雇工，即并没有和平台签订劳动合同，工人们往往是处于被平台支配的地位，所以共享经济对于下岗工人的吸纳仅是对矛盾的暂时缓和，实际上的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极有可能爆发出来。

1 国企“调职分流”裁减冗员 社会安全网可缓冲震荡。https://kknews.cc/finance/92a2ev8.html.

2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煤炭钢铁行业去产能的“痛与断”。https://kknews.cc/finance/zmkbnvp.html.

第五节　国企工人的意识与集体行动

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以抓大放小为特征的国企“攻坚战”，使得数千万职工下岗，企业倒闭、重组、私有化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一波私有化的浪潮使得先进的国企老工人觉醒，他们高举反对国有资产流失、反对私有化的大旗，进行了坚决地抗争，通钢、林钢改制中老工人的斗争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以经历过社会主义时期的老工人为主体，旗帜鲜明的反私有化斗争一直持续到 2010 年。

2010 年以后，国企中以老工人为主体的斗争逐渐走向衰弱。新一代的年轻国企职工，大多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成长起来的，其社会主义意识、政治觉悟、组织程度远没有老工人强。在对重庆两家汽配企业（中车和长安）中近 30 名国企年轻职工的调研发现：70%的职工不了解劳动合同法，了解劳动合同法的也多是在遇到利益受损需要争取的时候临时抱佛脚学习的；企业中的工会形同虚设，工人基本不参加；年轻职工也呈现出明显的原子化状态，职工相互之间的联系很弱。总体来说，这两家国企年轻职工的意识水平、组织程度和普通的私企工人相差无几。国企年轻职工的这种状况也就决定了其斗争水平。接下来，我们便以 2016 年震惊全国的双鸭山事件为例展开分析。

2014 年以来，4 万亿政策的刺激作用消退，重工业的生产过剩开始凸显出来，钢铁煤炭尤为明显。钢材综合价格指数从 2011 年的 5000 元/吨跌至 2015 年的不足 2000 元/吨[1]；煤炭行业的状况更是惨不忍睹，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从 2011 年的 854 元/吨的价格一路跌至 2014 年的 512 元/吨，甚

1 钢材综合指数 https://index.mysteel.com/xpic/detail.html?tabName=pugang.

至在 2015 年底跌至 380 元/吨[1]，价格不足峰值时期的 40%。价格下跌导致行业利润迅速下滑，许多煤炭企业陷入困境；行业内的职工普遍面临着降薪、被拖欠工资、裁员的状况。

龙煤集团是黑龙江省最大的煤炭企业，在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四个城市设立了煤炭分公司[2]。2016 年，集团年产煤 4270 万吨，在全国排名第 16[3]。龙煤集团职工数目庞大，截至 2015 年，其在职职工为 25 万人，离退休职工 18 万；在七台河分公司拥有 10 万职工和 30 万家属；在鹤岗分公司的在岗职工有 48436 人，离退休人员 6.34 万人[4]。龙煤与数十万职工及家属和退休人员息息相关。

2011 年龙煤集团盈利 8 亿元，此后，受到煤炭行业生产过剩、煤价暴跌的影响，龙煤持续亏损：2012 年净亏 8 亿元，2013 年净亏损扩大到 23 亿元，2014 年亏损接近 60 亿元，2015 年前三个季度依然亏损 30 亿元[5]。截至 2015 年 4 月，龙煤集团下属的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 4 个煤炭公司已欠付工资 8.2 亿元[6]。2015 年 9 月，龙煤一度宣布三个月内要分流 10 万名员工[7]。

从 2015 年开始，龙煤集团的工人们便开始因为拖欠工

---

1 BSPI，https://www.cctd.com.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520.

2 百度百科，龙煤集团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E%99%E7%85%A4%E9%9B%86%E5%9B%A2/10321090?fr=aladdin.

3 中国煤炭企业 50 强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0213/09/4344459_729708137.shtml.

4 东北最大煤企龙煤负债 500 亿 站在生死存亡边缘的他能破产吗? https://www.sohu.com/a/115642275_131990.

5 政府牵头成立脱困小组 龙煤集团拟 3 个月分流 10 万 http://news.cableabc.com/enterprise/20150924019570.html.

6 政府牵头成立脱困小组 龙煤集团拟 3 个月分流 10 万 http://news.cableabc.com/enterprise/20150924019570.html.

7 政府牵头成立脱困小组 龙煤集团拟 3 个月分流 10 万 http://news.cableabc.com/enterprise/20150924019570.html.

作而走上街头抗议。2015 年 4 月，鹤岗数千职工上街游行，抗议拖欠工资[1]。同月，七台河市的数千龙煤矿工罢工围市委、阻交通，以抗议被拖欠数月工资以及取暖费，遭到警察镇压，20 余人被抓捕[2]。从 2015 年 11 月开始，双鸭山市的龙煤职工也开始被拖欠工资，一直持续了半年，而 2016 年 3 月份的双鸭山事件其实是龙煤职工长期被拖欠工资后积累的愤怒情绪的爆发。

2016 年 3 月 6 日，黑龙江省省长陆昊在两会上表示，在产能调整关闭煤矿过程中，工人得到妥善安置，“没欠井下职工一分钱”。这句话激怒了龙煤工人。从 3 月 9 日开始，数万双鸭山龙煤职工走上街头，持续长达数天的抗议[3]。抗议的矿工打着“陆昊睁眼说瞎话”“我要吃饭””的标语走上了街头，甚至有部分职工围堵铁路[4]。



图 2. 10:双鸭山工人抗议[5]

1 中国煤矿工业衰落，大幅裁员加剧社会动荡隐忧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51217/c17hegang/.
2 http://wickedonna.blogspot.com/2015/04/201547_8.html.
3 黑龙江双鸭山数千煤矿工人讨薪当局调集大批警力镇压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51217/c17hegang/.
4 黑龙江双鸭山百姓游行事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044a8c0102w6xx.html.
5 黑龙江讨薪/传双鸭山抗议事件至少 75 人被抓 花甲老人也不放过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6/0316/708600.html.

面对双鸭山龙煤工人的抗议，统治阶级采用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省长陆昊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之前说“龙煤井下职工不欠薪”确实是错了，错了就要纠正，没有理由隐瞒[1]。同时，龙煤集团各方筹措资金，在 3 月 13 日的时候宣布补发所拖欠双鸭山职工的 2015 年 11 月、12 月的工资[2]；另一方面，警方在工人抗议的这几天内抓捕了 30 名组织者，并通缉数十名其它职工[3]。最后事件很快平息下来。

从 2016 年下半年开始，随着供给侧改革的发力，煤价开始飙升，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从 2016 年初的不足 380 元/吨的价格飙升至年末的近 600 元/吨，并在 2017 年维持在近似的水平[4]。龙煤效益好转，暂时结清了历史欠债问题[5]。

总体来看，双鸭山的职工是在煤炭行业利润下滑的情况下采取的被动斗争，其核心诉求在于解决拖欠的工资和取暖费问题，和上一轮国企劳工人抗议私有化相比，本轮的斗争局限在经济领域内。其参与人数较多，但组织程度并不高，在官方的打压和让步下很快平息下去。这种斗争能为国企工人在未来经济形势进一步变化时的行动积累经验，起到了初步锻炼工人的作用。

第六节　未来发展趋势

从国企改革的大方向来看，国企的市场化程度在不断地提高，如今已经呈现出了和私企殊途同归的趋势——国家对

1 黑龙江省长：龙煤欠薪这事之前是我说错了
http://news.sina.com.cn/o/2016-03-14/doc-ifxqhfvp0921070.shtml.
2 关于双鸭山事件的声明
https://boxun.com/news/gb/yuanqing/2016/03/201603170038.shtml.
3 黑龙江讨薪/传双鸭山抗议事件至少 75 人被抓 花甲老人也不放过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6/0316/708600.html.
4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70A&sj=2018.
5 龙煤集团“涅槃重生” 煤炭行业形势大好
http://www.sohu.com/a/161948661_99971561.

于国企的行政管控进一步弱化，国资委的政府机关职能的分离，国企内部的领导层任命已经部分地实行市场化招聘和市场化的薪酬制度，对于企业科技人员的物质刺激力度也有了显著的加大……国资委作为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实际上代表了最大的资本集团，在努力地把"国有资本做大做强"。

在国企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推进的过程中，国企内部的矛盾也在积聚。一方面，国企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扩大，领导层和科技人员能够获得的利益份额增加，普通工人的收入却增长缓慢，国企内劳务派遣现象也持续泛滥；另一方面，在供给侧改革中有几百万工人面临下岗的命运，安置措施所能起到的效果很有限。国企内部矛盾的积聚实际上是由整体经济形势变差导致，也必定在将来随着危机的到来更加猛烈地爆发出来。

第三章 阶级斗争篇

国企工人一场漂亮的狙击战：通钢事件

2009 年 7 月 24 日，通化钢铁公司因私营企业建龙集团控股通钢引发群体性事件，建龙集团总经理陈国君被工人打死。自上世纪 90 年代国企改制以来，工人阶级一直被分化瓦解，整体上且战且败、且败且战，国企工人基本上无力抵抗统治阶级瓜分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浪潮。“7·24”事件打破了中国国企工人的被动局面，工人阶级找到了抵抗私有化的手段，影响和带动了一批国有企业工人成功抵制私有化步伐。

第一节 改制前的辉煌

1958 年，毛主席视察武钢第一炼铁厂一号高炉，时值这座高炉炼出第一炉铁水。毛主席与我们钢铁工人心连心。在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国家的主人。钢铁厂是我们钢铁工人亲手建设起来的、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做贡献的“金色的炉台”，而不是私企老板剥削压迫工人的“铁打的营盘”。私企吞并国企，我们坚决不答应！

新形势，新任务，新使命，新起点，新平台……通钢是一枝民族工业之花，是长白山脚下的钢铁明珠，我们光荣的通钢人有钢铁般的意志、钢铁般的信念、钢铁般的精神，一定要在新的征途上谱写新篇章。

——郭春孚《通钢工人的“盛世生活”》

通钢是吉林省省属国有企业的“四大金刚”[1]之一，“十里钢城，百里矿山”。到 2005 年，作为吉林省省属最大的国

1 一汽、吉化、吉林油田、通钢被誉为吉林省企业的“四大金刚”。

有企业和唯一的大型钢铁企业，通钢的集团公司生产钢 293 万吨、铁 279 万吨、钢材 294 万吨，总资产 100 亿元，销售收入 80 亿元，实现利税 8.5 亿元，成为一家集采矿、选矿、烧结、焦化、炼铁、炼钢、轧钢、动力、运输、机械制造、冶金研究设计等于一体的综合配套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同时也是全国 100 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和国务院确定的 520 户重点扶持企业之一。建龙入驻以前，年均销售收益达 300 个亿，纳税 20 多个亿。在全国 500 强中排行 240 多位，制造业中排名 120 位。

1958 年建厂的通钢有着令职工骄傲的奋斗史。创业时期通钢职工历尽艰辛，1960 年发的粮食是皮粮，有时是苞米，开始公司的行政处还设法自己加工，后来不行了，只好吃“麦粒饭”。粮食最紧张时，一天发一次粮，为了买粮，职工不得不成夜去粮店排队，第二天还要照常上班。而一线的干部更惨，粮食定量比别人低，工作时间却长于工人。通钢职工家属钟珍回忆，1969 年工厂搞扩建时，她为了响应“老婆孩子齐上阵，组织家属革命化”的号召，毅然把孩子扔在家里，加入了党政工青妇上生产一线的大会战，一天工资不过 1 块 5 毛钱[1]。经过老一辈通钢人的辛苦拼搏，通钢从无到有，发展成全省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再到东北重要的钢铁城，书写了光彩夺目的恢宏篇章。

同其他国企一样，通钢见证了社会主义时期改天换地和改革开放时期重受二遍苦、重遭二茬罪的历史，通钢工人也经历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后来又沦为企业奴隶的过程。经过文革时期大规模群众运动，通钢的社会关系也发生巨大变化，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深入推进。与文革前相比，官僚主义、不民主、搞一长制等现象少了许多，重要事项都要征

1 张鹭，周政华. 工人们为何愤怒[N]. 中国新闻周刊，2009-08-05.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bb320d0102wlx9.html.

求大家的意见，半年开一次职工大会，各个单位也都设立意见箱，正确的意见确实会被采纳。干部的任命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文革前从厂长到班组长都是自上而下任命，文革期间实现了车间及以下级别的干部选举，即职工代表大会、工会小组推选代表，直选车间主任、段长、班组长等干部。通过自下而上选举干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权力进一步落实。通钢退休工程师王工回忆："通钢学习实施鞍钢宪法，干部参加劳动，和工人一起干活，干部群众参加义务劳动，会战的时候，干部带头参加。""当时改革不合理制度，工人可以提合理化建议，当时的工人实行技术改革，技术革新，能创造很多的价值。当时有些从国外引进的机器，如果不合理，工人就可以改造机器。"

改革开放后，通钢很快实行了承包制和一长制改革。1984 年 1 月 4 日，厂里召开经济承包签订合同大会，总厂与各分厂签订 1984 年度经济承包合同。1985—1986 年基层开始承包。承包制之后，行贿、受贿、提成等现象开始出现。当时通钢流行一个词叫"甩炮"，而"甩炮"就是承包的意思。承包给别人，一千块一个炮。1988 年 1 月 7 日，中共吉林省委、省政府批准，通化钢铁公司实行经理负责制、经理任期目标责任制和终期审计制，是全省大型联合企业中第一家实行经理负责制企业。从此，厂长经理说了算，工会和党委都没权了，实行的是一长制。职代会、工会逐渐流于形式，职代会代表都逐步更换为干部。工人涨工资头头说了算，于是后门大开，送礼成风。工厂搞物质刺激，涨工资的人少，打击了多数工人的积极性，所以许多工人不出力不干活。以前工人积极性靠主人翁地位，现在都是工作责任制，以惩罚为主，逼着大家干活。机器坏了管理者也不知道，只有技术维修工人来了才知道，工人也不自己修，能糊弄就糊弄。

尽管改革开放后工人已不再是工厂的主人，但福利制度还是延续下来。逢年过节发放鱼、肉、蛋是默认惯例。碰上

过年，每个分厂都要出节目，厂里发票给大家看。各分厂组织汇演，年底表彰先进、劳模和积极分子。“有个气氛在这里，再困难工人也不叫苦，我们通钢人的工作动力不都是物质刺激的。”退休前一直从事党群工作的王殿昌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解释他的工作范围，“干部的思想工作，工人想不开的事，柴米油盐、吃喝拉撒，都得管”。

几十年来，通钢人走过了艰苦的创业阶段。回想过去的艰难岁月时，老工人眼睛总是闪着光：“建炼铁厂和焦化厂的时候，工人们一天一块五毛七的工资，吃的是苞米大碴子饭和萝卜咸菜，付出老大的辛苦，但那时人人干劲都很高。”

第二节　建龙蚕食通钢

法律与工人矛盾的时候就不好使。

——通钢职工代表经过多次上访无果后感慨

对工人各个方面的克扣十分严重，资产阶级对工人以惩罚为主，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时的以教育为主。……宋凯之所以会被打死，就是因为他总是用罚、骂等压迫工人，把工人激怒了。

——通钢老工人对建龙入主后压榨工人的评价

这个社会极不公平。要是不和厂子斗，一点都不会涨。这要靠自己去斗争，不去斗争，就什么都没有。

——通钢内退工人自述

(一) 改制重组

工人现在要是接管工厂，有能力管好工厂，肯定比他们管理得好。工人有正确的路线，路线正确，企业才能发展。

——通钢职工代表吴敬堂[1]

2004 年，吉林省委、省政府就确定 116 户省属国有企业为改革重点，但截至 9 月末，只完成了对其中第一批 41 户的产权交接。但改革很快进入了一个快车道。2004 年 10 月，中共苏州原市委书记王珉调任吉林省省长，不久他提出，希望国有股比例在竞争性行业中降到 20%。而当时，国有经济占吉林全省总资产中比重为 80%。王珉带来的苏州“四到位一基本”的改制经验，成为这次吉林国企改制的基本思路：“企业整体改制到位、国有集体资本退出到位、职工身份置换到位、债权债务处理到位、基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不久，吉林掀起一股国企改制浪潮。2005 年初，816 户吉林地方国企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被要求在年内完成改制。通钢集团公司改制重组，要达到《钢铁产业发展政策》提出的减少钢铁生产企业数量、实现组织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升级的目标。通过引入民营资本推进资本结构调整和机制创新。2005 年 1 月 31 日，集团公司改革攻坚战全面打响。按照省政府提出的“四到位一基本”目标，对辅业进行剥离，对主业进行改革、改组、改造、改制，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随后，通钢进入攻坚阶段，重点做好辅业改制，要求 2005 年 8 月末前，学校、公安、离退休管理等涉及的人员、资产、

1 吴敬堂同志 1938 年 8 月出生于山东省黄县，自幼饱受旧中国、旧社会之苦。解放后，自言跟着毛主席和共产党“吃着苞米面儿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任何怨言，吃得特别的香”！吴敬堂退休后，一边打工养家，一边学习毛主席著作，用社会主义的理维工人阶级的权，2009 年通钢事件中带领通钢工人反对国企私有化，维护工人阶级的应有权益。“通钢事件”后，吴敬堂同志顶住各种压力，有理有利有节地坚持为工人阶级继续维权。他曾经为上千名通钢“五七”家属工争取到了每月近 2000 元的退休养老保障。帮助大家表达诉求，解决取暖费。吴敬堂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中国工人阶级反私有化的英雄，从不为自己的个人得失维权。真正做到了永远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身体力行地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和优秀风范。吴敬堂同志 2019 年 1 月 25 日早上 5 点 57 分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 82 岁。

费用、社会保险全部移交属地政府，全面完成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分离移交工作。

2005 年 9 月，通钢集团突然大面积压缩人员。30 年工龄以上的职工“一刀切”，全部内退、下岗。这一波减员中，共有 7000 余人被内退和下岗。后来又有更多的工人内退和下岗。在建龙入主通钢的这几年间，通钢工人由 36000 多人锐减到了约 12000 人。这些下岗工人的每月所得只有 300 元。因为工人下岗，姑且算通钢省出来的工资成本是每个工人每月 2000 元，则下岗 24000 工人每月所省为 4800 万元，每年为 5.76 亿元，这就是建龙大幅裁员的强大动力。

2005 年 11 月 28 日，通钢集团、建龙钢铁、吉铁集团资产重组正式签约。吉林省政府提出，本次重组本着“整合资源、共享市场、共谋发展”的原则和战略目标，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以资产重组为手段，将通钢改组为多元投资主体、结构优化、机制创新、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和经济带动力的区域性大型钢铁企业集团。

(二) 建龙入主通钢

建龙入股后，通化钢铁厂的工艺、设备，基本都是老样子。他们的管理就是“整人”，公开说法叫“减员增效”。民愤就是这么来的。

——一位老工人回忆说

通钢从 1958 年至今 51 年，我们是老老少少三代人都工作生活在这里，我们可以说，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然而，现在我们的儿女也要下岗，他们没有像我一样的退养待遇，而是直接裁员，我们孩子都难以生活了，我们活得能有意思吗？

——退养干部表达对私有化的愤怒

1998 年 12 月 17 日，现建龙董事长张志祥个人注册成立

建龙控股公司的前身——遵化建龙钢铁总厂（建龙钢铁总厂）。刚刚诞生的建龙钢铁总厂，注册后仅一周，便马上与遵化市签下了 5 年的租赁合同，租赁对象是遵化市钢铁厂。租赁合同履行不久，2000 年 3 月 6 日，建龙钢铁总厂买断遵化市钢铁厂，更名为建龙钢铁总厂。半年后，建龙钢铁总厂改制，注册成立唐山建龙实业有限公司。紧随遵钢加入建龙的是吉林市市属企业明城钢铁总厂。2002 年，建龙买断了建厂 43 年的明城钢铁。继遵钢、明钢后，又有承德钢铁水泥公司、宁波钢铁厂、黑龙江钢铁厂相继挂上“建龙”字号。到 2008 年底，建龙已经拥有控股子公司 17 家，它的触角已经伸到吉林、河北、浙江、黑龙江、北京、辽宁、四川等地，总资产 319.81 亿元，在钢铁民企中排行老大。

2005 年 12 月 25 日，通钢改制协议正式签署。国资委出台的通钢改制方案要求，在新通钢成立两年内，要形成年产 1000 万吨钢的规模。但四年后，这一目标并未实现。

2005 年 12 月 30 日，新通钢集团正式挂牌。重组后的新通钢集团总资产 139 亿元、资本注册达 38.81 亿元，形成国有、民营、金融机构、经营管理层共同出资的多元产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其中建龙钢铁出资 8 亿元现金，加上吉林市建龙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的 6 亿净资产，一共持有新通钢集团 36.19%的股份，吉林省国资委拥有 46.64%的股份，通钢集团的债权人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拥有债转股的 14.6%的股份，通钢经营层为 2.57%。

通钢的资产评估有很大问题。对通钢资产进行评估是建龙找的一家资产评估公司。通钢集团纪委一位参与当时资产评估的科长表示，当时通钢集团的 1、2、3 号三座高炉到了折旧年限，但由于连年投入大修仍“完整如新”，但在资产清查中这三座仍在炼钢的高炉的资产都是零。这些大修资金未被计入固定资产。他认为，国企和私企在资产评估中分别采取了两种会计制度，导致评估标准不一，“这也是国有资

产评估中存在的一种通病”。整个通钢集团 240 多亿资产被评估成了 38.81 亿元。当时整个通钢议论纷纷，大家都不明白，全体职工都发懵，很多离退休干部不同意。而建龙方面认为还是太高了，于是再次评估为 18 个亿。但是不满的职工与干部无权参与其中。对此，工人有一个剔肉的比喻：猪，先剔骨，再剥皮，剥完后还挺肥，建龙的钱还不够，所以只要里脊肉，还需要再剥离。结果讽刺的是，资产评到 18 亿元，建龙只需出资 8 亿元，但建龙还是没钱，只好打个欠条，后面用通钢赚的钱补上，典型的空手套白狼。

2005 年建龙重组通钢之初，在通钢集团 15.7 亿元改制成本中，有 5.7 亿元是用于职工买断身份的经济补偿金。因无力支付，通钢以股抵债的方式将参与改制员工所获经济补偿金转换为所在子公司的股权，而高管人员则获得 9990 万元奖励转为通钢集团约 2.56％的股权，仅安凤成一人即有 3000 多万元的股权安排，副经理 500 万，处长也有，科长以下的其他工人没有。组织部长写打油诗：“国有企业变民营，领导随心所欲分资产，几百个亿分个空，通钢究竟何处去，全体职工都发懵”。建龙在重组之前还在通钢造谣说老总张志祥是张万年的孙子，大家惹不起。工人们都只好认了，“唉！谁叫咱没权了，认了。”“中国人都愿意当奴隶，还差我一个啊！？”

建龙集团派来的陈国君自 2005 年 12 月开始担任通钢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实际上“大权在握”。2006 年 2 月，通钢集团总部从通化迁至长春。2006 年 6 月，建龙集团正式介入通钢的管理。陈国君升任通化钢铁总经理，加快了对通钢的管理改革。“用一个民营企业家的角度来看，陈国君很能干。”工人王春和说到。但王春和的老伴曾晶大妈对陈国君印象较差：“这个人不好，他训斥职工就像训斥儿女一样，工人们都没有起码的尊严。”听到这里，王春和对老伴的话又进行了补充：“人也不算太粗暴，但我认为让他来管理通化钢厂

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不太合适。因为陈国君没有文凭，没有专业知识，没有技术职称，也不是党员。按企业干部的四化标准，他是不合格的，与通钢半个多世纪积累的许多人才比有很大差距。”2007 年，通钢开始停产。轧钢厂轮着停产，但高附加值的产品都让建龙旗下其他公司生产。2006 年建龙还曾私自提走 8 个亿，职工们反映到国资委，也是不了了之。

2008 年 5 月中旬，建龙在吉林市龙潭区金珠乡启动面积 500 公顷以上的吉林钢铁公司项目。为了上这个项目，建龙用通钢名义向银行借了大量的贷款[1]。实际上，这个也是先上项目再报审批的工程，虽然在吉林省通过了，但在国家发改委和环保部没有通过，而且距离松花江只有 5～6 公里，也遭到俄罗斯方面的投诉。

(三)工人群体发生的变化

建龙主管通钢后，工人与干部收入差距太大，自觉性、积极性消失，有干部曾经对工人说“你们就是会说话的工具”。在职员工月薪 2000-3000 元，而安凤成年薪 700 万，处级干部加上灰色收入一年大概有 50-70 万，科级一年有 6 万到 15 万。老工人都说：“同龄的下岗的下岗，为什么他当干部就能拿这么多？国资委的所做所为和态度是什么？”“我们管这叫，黑爪子（工人的手）挣钱，白爪子花。”工厂管理也非常粗暴，工人们反映，“当官的拿着工人不当人”。干部甚至对工人说：“非常危险的活，你能干就干，不能干就回家！”

经过建龙折腾，通钢先后出现了内退工人、退休工人、买断工龄、集体工人等不同利益受损群体。其中退休和内退

1 因为要上这个项目，建龙以通钢为名向银行借了大量贷款，通钢在与建龙合作的三个月后，其负债就由 10 个亿变成了 20 个亿。还不止这一笔，经过与建龙合作，通钢元气大伤，即便 2009 年通钢事件赶走建龙以后，通钢也长期难以恢复到黄金时期。

工人由于经历过毛时代，享受过主人翁的待遇，同时也因为他们自己的工资收入并不会因为斗争而受到影响，而他们的子女大多也在通钢上班，所以他们的斗争性非常的强。中层干部利益也受到损害，也希望工人能牵制陈国君，所以有重要信息会给老工人通风报信。

第一，内退工人。2005 年，按照 30 年工龄以上就内退的原则，通钢集团各分厂和矿山一共有 7000 多内退工人。据当时参与并亲自操刀的通钢一位劳动人事干部介绍，员工退休按照满 30 年工龄的实行“一刀切”，不管工人还是干部全部退休，给予一定的补偿金后一概与通钢再无瓜葛。通钢改制小组组长王乃谦说：“我当时很愤怒，作为改制的人事组长，这个政策的出台连我都不知道。”在这一波减员中，共有 7000 余人被内退，通化钢铁职工人数锐减至 1.3 万人。“近一半的工人被赶出工厂，年龄最小的才 46 岁就让人家下岗，有人气病了，有人跳楼了。”王春和介绍，从那时开始通钢人的上访路就开始了。宣传内退的时候，说是国家有这方面的政策，辅业拖了通钢的后腿，只要在范围（工龄 30 年）内的，就要内退，使得企业“轻装上阵”。由于当时和建龙重组确定的目标是重组后公司 1 万人，而通钢当时有 34,000 人，辅业分离后还不够，主业中又有内退的职工，从 15000 内退到 11000 人，实在退不下去了，重组的时候就是 11000 人。而内退以后企业生产工人又不够，因此还要返聘内退工人，例如开通勤车的 15 个人内退，返聘了 6 个人，刚内退时内退职工的工资是是 500 多元一个月，经过几年斗争，他们的工资涨到人均每月一千元左右。内退工人的主要诉求为：一是补发工资，内退后只有 580 元生活费，违背中央、吉林省委的文件精神；二是不享受正式职工的福利待遇，如过节的时候发一些面、食用油等，内退职工都没有；三是内退工人返聘是按照临时工的待遇，住房公积金和养老保险的系数都很低，正式工住房公积金按照每个月工资 10%来计

算，内退的则是按照生活费（即 580 元）的 5%计算；四是内退职工实行双重标准[1]，所谓的“一企一策”违反法律规定。

第二，退休工人。2009 年通钢的退休工人有 12000 多人，这其中就包括正常退休的工人和以往内退工人年龄够了转化过来的退休工人。退休工人的要求：一是子女要生活，在岗工人工资太低；二是要求对国有资产流失的真相有知情权，主辅分离等措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如一、二、三号高炉一直在生产，但评估的时候这部分资产为零，职工也咽不下这口气；三是改制中出现很多弊病，比如给干部分大量股份违背国家政策，这些东西要评评理；四是职代会流于形式，工人成了奴隶，也一直不涨工资，而且还有三级管来做监工，职工没有一点生产上的“自由”；五是通钢在发展中欠全体职工 4 级的工资（100 多元），这是一个遗留问题；六是退休后工龄工资计算方法不一，只有 7 毛五（有职称是一元/年工龄*月），而 2001 年在岗的有 7 元，双重待遇相差 200 多元；七是按照国家规定，距离退休年龄 5 年之内才可以内退，要求对不合理内退政策做纠正和补偿。

第三，买断工人。这部分矛盾并不是很突出，主要是指按照 1440 元（一个月工资）×工龄进行买断的职工，2005 年办过一次，以后就没再办过，主要是自愿的。买断的范围是工龄不到 30 年的。这部分人大多是个人愿意买断，如原来负责采购、销售的，因为有人脉，很多都选择买断，自己搞经营。

第四，大集体工人。集体工人不仅仅在各个集体企业和辅业中工作，还有很多是在通钢生产一线从事工作，这些工人虽然身份上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工人，但在改制前按计件工资制领取工资，也能开到 1000 元左右，与全民所有制

1 改制后有 30 多位处级干部内退后，经过一系列争取，厂方按副处每年 6 万、处级每年 6.5 万予以安抚，普通内退职工则一贫如洗。

的正式员工相当。然而，在通钢改制后，这部分通钢企业公司的大集体职工身份转为汇宁劳务公司的职工，生活相比正式员工差别巨大，虽然干着跟正式工相同的工作，但拿的工资却只有正式职工的一半左右，同工不同酬现象严重，许多工人需要通过啃老的方式来维持生活。

第五，临时工。从 2005 年改制以后出现，有 4000 多人，是由几家劳务公司派过来的。在建龙来了以后，承包外租的事情更加多了，例如劳务公司就是在建龙来了之后才成立的。车间里不用的人就下岗，然后都去这个劳务公司，当厂子缺人了，又让这些人给厂子干活。临时工的工资很低， 05 年刚改制的时候，最低的工作如看澡堂的只能拿到 460 元，还有许多临时工岗位实际上干着跟正式工一样的工作，工资却只有 500-600 元，大班长也只有 704 元，而同样的活，通钢的在岗工人平均工资却能够达到 1300—1400 元。临时工的工作通常是污染比较大且比较累的岗位。

第六，在岗工人。通钢有 11000 名在岗工人[1]。相比起改制前，在岗工人的工资下降了许多。班组长一年拿 2 万，一般工人一个月 1400 多，低的不到 1000 元。有一位一线工人说，改制前他的收入是 2500 元/月，建龙入主后，在效益没有减少的情况下，工资越来越低，最后降到一千元左右，而在 2008 年 9 月金融危机发生后，工人开始放假，放假期间工资只有 300 元/月。建龙来之前，通钢一个炉前工，月工资高的可以拿上万的，一般也有五六千的，连一个水泵工也有三四千。建龙入主以后，通钢工人没有拿 3000 元的，大部分在 1700-1800 元左右。在岗工人敢怒不敢言，因为企业管理层威胁说“不干就回家”。建龙时期高层干部与一线工人的收入可能差千倍。当时安凤成年薪 700 万，陈国君则是 300

1 2009 年 3 月前，职工一批批下岗，总共有三批职工下岗，职工总数由 18000 人减到 11000 人，其中第四批没有下岗成功建龙就走了。这里下岗的实质是“放假”，即通钢现在效益不好，回家等着，等通知再去上班。

万元/年。据说辽宁一位内退的工人每月能有 2400 元。由于一个家庭两个在职职工也养活不起一个上学的孩子，就出现退休的工人补贴子女的情况。在岗工人对于企业改制也是比较不满的，可是由于他们目前还在工厂上班，害怕失业，同时也因为他们并没有当家作主过，所以斗争性相对要弱。很难有组织地斗争，只能是跟在老工人后面参加斗争，或者自发地单个的斗争（如 2008 年锤杀厂长宋凯一事）。

第七，辅业群体。通钢原来是厂办教育（从幼儿到高中、技校）、厂办医疗、厂办治安管理。2005 年改制后通钢一共剥离了 33 个辅业单位，分离出去 17 个学校和 7 个公安机构。

第八，中层干部。2006 年 6 月，建龙掌权后，在各个部门安排建龙的人，将原来通钢干部排挤走。建龙对于原企业机构也进行了一定调整。党群关系科被合并，工会和纪委事实上取消了。2006 年 6 月 6 日，建龙逼迫 33 个处级干部离岗（其中 1/3 是专业干部），给他们只发 1700 元每月的生活费，并把他们安排到区里。这些处级干部心中不满，他们一方面不断上告说建龙入股通钢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向普通工人说明相关的政策、法规，透露他们所知道的关于建龙进入通钢的秘密，鼓动工人上告。为了收买这些中层干部，新通钢后来将他们的年薪提到 6 万，于是这些处级干部就不闹了。留下来未内退的中层干部实行年薪制，一个处长一年能拿 60 万~70 万。与在职干部相比，内退干部利益受损严重，有一些是暗中支持或鼓动工人上访、游行的。

在上述人群中，只有退休和内退工人较为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并有组织地行动起来。但是由于他们不在岗，斗争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旦在岗工人响应起来，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就到来了。

(四) 工人开始反抗

为了长远的幸福而争斗，不要当缩头乌龟，要把勇敢放到首位，只有奋斗，才能生存。我尊敬的通钢人，不要再保持沉默了，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我深知口号满足不了通钢命运，一个小小草民只能用最后的呐喊尽一点寸心，我毕竟努力争取过。

——节选自通钢职工代表吴敬堂《最后的呼唤》

随着改制不断推进，建龙把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体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工人中有买断的、内退的、下岗的，而且人数很多，2006 年时达到了下岗高潮。由于内退干部透露信息，职工们知道了一些通钢改制的内情。以内退和退休工人为主力，先后发生了如下几次工人抗争。

第一，2006 年内退干部上访。2005 年大量职工开始内退，据说先后几批内退的职工干部总共有两万多人。内退的工人一般开六七百块钱，而他们在岗时的月工资约为二千多块钱。2006 年 2 月，正式退休的工人工资说要涨，但不管在岗和退休职工如何涨工资，都没有内退工人的份。由于一刀切的政策，其中还包括几十个内退干部。2006 年，最后一批干部下岗时有 33 个处长都下岗了。一个处长年薪 30 万，可是内退后一个月才四百来块钱，损失就非常大。所以内退干部有一部分人最先起来斗争，他们更多地将通钢改制的内部情况告诉工人[1]。06 年 8 月，没得到好处的一部分处级干部就把事情捅出来，内退工人开始维权斗争，后来就通过自荐

1 后来他们开始游行示威，在二道江大道打着横幅去区政府，把企业怎么腐败的事都给抖出来了。最后他们却被公司收买了。建龙先是把中层干部收买了，再后来是一般干部。如王**现在在退休管理处当经理，领高工资，有权了，能给别人安排工作。别人托他办事还得送红包。这批人现在通过斗争也获得了许多利益，除了工资以外，他们还有企业给的封口费：正处级的 6.5 万每年，副处级的 6 万每年。区政府还给他们弄了个办公室，让他们在那里挂名。就这样把他们收买下，他们也就不给百姓出头了。

等方式产生了十名代表。10 月，公司给内退职工涨了 20 元工资。“他们涨这点工资，就是在哄小孩。”11 月 2 日，通钢工人贴出了自己的第一张维权海报，从此拉开了反抗改制的序幕。维权高潮的时候有三四千人参加，平常五六百人，主力就是内退职工。2006 年 12 月份，内退职工第一次上访，但信访部门接待人员被买通，递上去的材料如泥牛入海。在国资委见到了 3 个部长，当面告诉工人代表说会将有关情况反映给安凤成，在 1 个月内会处理相关问题。2007 年，内退工人的工资又涨了 40 元，之后的涨工资就和正退职工同步。有工人总结说：“这个社会极不公平。要是不和厂子斗，一点都不会涨。这要靠自己去斗争，不去斗争，就什么都没有。”

第二，2007 年的大游行。2007 年 3 月 28～29 日，几千工人上街游行，“反对不合理的一刀切政策”。其中有一个工人被抓，大家去公安局围住把这个人要了回来。这次游行主要是内退的工人组织的，也有内退干部领头。当时内退的工人有 2000 多人（包括建龙来之前内退的），一个月就五六百元钱，而在岗的工人一个月有二千多元。家属和退休工人也参与助威，好几千人到大街上。此后去北京上访，国资委又称通钢为省属企业，不归他们管，这时工人才发现上当受骗，中央部委骗人说假话，2006 年国资委解决问题的承诺一文钱都不值。工人代表到劳动部，是吉林省接待的，通钢改制就是吉林省委推动的，吉林省的官员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工人感叹到：“法律与工人矛盾的时候就不好使。”

此后，内退职工一直支持职工代表坚持上访，每年四次。2008 年 3 月，许多党员和普通工人进京向中纪委递送了状告王珉的材料，中纪委让工人回去等着。据工人说，2008 年 6 月 20 日，通钢举行建厂 50 年庆典，王珉却没有来，来的省领导在庆典没结束的时候都走了。那一段时间王珉也很少露面，这说明那时中央正在调查他。后来吉林省派人到北京围追堵截职工代表，100 多个当地警察去北京，通钢的问题都

是由吉林干部来处理。于是工人开始意识到“吉林的高层领导不走，问题解决不了”、“斗争到底”。工人希望能直接将问题反映到中央。

第三，2008 年年底炉前工锤杀厂长。建龙入股通钢后，工厂克扣工资严重，只要工人喝点酒，工厂就让人下岗。老工人说：“对工人各个方面的克扣十分严重，资产阶级对工人以惩罚为主，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时的以教育为主。” 通化钢铁公司炼轧厂厂长宋凯经常对工人用“你想不想干了？”这样的话来威胁工人，逼迫工人好好干活，压迫工人。12 月 27 日凌晨，一名 27 岁的炉前工张某上夜班前跟几个工友一起喝酒过节，酒后上班，厂长宋凯就以酒后上班为由威胁开除张某，宋凯本人当时也喝了酒，也属于酒后上班，工人张某不服，就和宋凯发生口角，宋凯还打了张某，甚至张某下跪恳求不要开除自己也没有用。张某一怒之下锤杀宋凯。觉悟的老工人看得清楚：“这是管理路线问题，宋凯是资产阶级的管理方式，完全不是无产阶级的管理方式。”老工人认为，宋凯之所以会被打死，就是因为他总是用罚、骂等压迫工人，把工人激怒了。联系起后来陈国君被打死的事情，老工人说：“短短半年多，一个厂长、一个总经理，多可怕的干群关系，旧社会的资本家和工人恐怕也没有这样的吧。”

第四，2009 年年初群众大会。总体上讲，通钢群众仍处于自在状态，虽然普遍有怨恨情绪，但缺乏组织，很难发动起来，谁挑头厂方就打压收买谁，工人间彼此的信任感也不高。2009 年年初的这场运动就经过了好几个月的酝酿才成功发动起来的。这场运动是冬季停止供暖引起的。因为 2008 年经济危机，通钢遭受了巨大亏损，而所在二道江区的取暖是依靠工业余热，通钢停产就无法供暖，2009 年的新年和春节通钢人都是在没有暖气的情况下度过的。2009 年春节刚过，由于厂区和住宿区没有暖气，于是大伙就起来维权。两

千多个工人把供暖的益信公司经理弄到十字路口，围在中间。该经理被你推我拽给撂倒了，但他也没办法，只答应说暖气不热的住户公司给退钱。由于供暖问题没有解决，这2000多工人直接把公路给堵了。通过这件事，大家就开始聚在一起说通钢这些不合理的事情。过了年（2009 年春节），"我们就搞串联，那一段天天干，发通知，发信。但我们心里也没底，群众也议论纷纷。" 3 月 2 日，在体育馆的广场上召开群众会议，官方称之为302会议。这是工人代表组织召开的一个预备会议，一位代表说："这个会议就是想试试群众的心有多齐，大家都是什么想法。"结果来了五六百人，以退休老同志为主，人虽不多但心都较齐。考虑到天气冷，大家年纪都比较大、腿脚不好，又正下大雪，有些家属出来不方便，于是决定推迟几天继续开这个群众大会。当时在302会议上，工人代表号召大家：谁家有子女，回去跟自己的孩子说，回到生产岗位跟职工说，我们老一辈都是为下一代着想才起来的，过几天开会大家一定都要来。

按照毛主席说的，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退休工人和内退工人代表贴出通知发动群众，通知上号召内退工人、退休干部、在岗、职工家属，为了挽救通钢，大家应该到通钢办公楼门前维权；要求建龙滚出去，要求职工恢复上岗。职工代表发了很多传单。此后，老工人们连续几天在通钢办公楼门前聚集开大会，开始时也不容易，连续一个多星期，没人搭理他们。通化市安全局、企业公认这些群众大会有三大特点：一是没有七十岁以下的；二是没有违法现象；三是持续时间长。尽管工人把办公楼堵的严严的，但干部们都在楼里不出来。于是来开大会的工人就越来越少，最少时只剩三百来人了。退休工人代表吴敬堂（当时已71岁高龄）看到这个情况后也挺灰心，写了一封题目是《最后的呼唤》的公开信："可叹通钢人，可叹民众缺信心，可叹你也是通钢人，可叹通钢人不齐心，可叹通钢存亡仅在旦夕，可叹下

一代何去何从”“可叹为你不公讨回公道的精神，70 多岁的人向你猛喊：猛醒吧，通钢人！”“为了长远的幸福而争斗，不要当缩头乌龟，要把勇敢放到首位，只有奋斗，才能生存。我尊敬的通钢人，不要再保持沉默了，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我深知口号满足不了通钢命运，一个小小草民只能用最后的呐喊尽一点寸心，我毕竟努力争取过。”这封信起了效果，发出这封信后，广场上工人们一下子多了起来。

利用开“两会”的时间，老工人在 3 月 12 日正式集合了六七千人。聚会后大家打着横幅去区政府。当时通钢集团董事长安凤成正在北京开会，没开完会就赶了回来。退休工人们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是针对管理层持大股，老工人是建厂“元老”，为通钢立下汗马功劳，结果现在钱都大把大把地被管理层和建龙捞走了，“我们这些‘元老’是不是应该占些股份”；二是资产重组之后，国有资产流失严重，“我们这些老人看着不忍心，建龙把通钢搞垮了之后撤了，我们这些通钢人往哪里撤”；三是通钢的子女们很多都被裁掉了，铁饭碗变成泥饭碗，“把我们的饭碗砸了，然后找一些外地的人来干”。

第五，2009 年退休职工代表逐级上访。职工代表要求见政府领导，但无人回应。最后吴敬堂向公安局写了两份申请：一份是游行申请，一份是保护我们工人代表人身安全的申请。退休职工天天都来，公安被逼的没办法，给通钢厂的领导说：“你们到底见不见工人，你们不见，我们就往省里报，批他们游行。”吴敬堂说：“这样领导们没办法了，才见我们，开听证会，开了四五次，结果他们都答不上，让我们上省。我们到省里找国资委，跟他们谈判谈了四五次。他们也不答复，我们把省政府骂了。”2009 年 3 月-7 月，五名退休职工代表从通钢逐级上访到省国资委，并与省国资委展开了多次谈判。当时在干部中间也有很多不满情绪，建龙来了以后对中层干部进行绩效评级，并且往厂里塞了很多外人，原中层

干部评级评不上，也招不进自己的人，所以暗中支持职工代表，还有人匿名给工人代表送材料。在 7 月 1 日之前，退休职工代表去省里上访了 10 次左右，没有去中央，省信访部门主要是开听证会。信访审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把材料打回通钢，通钢予以答复；第二阶段是省国资委复查，并让退休职工签字复核；第三阶段是省政府复核，这就到了 7 月 20 号，复核结果是没有国有资产流失。吴师傅看了结果很生气，还写东西骂了省政府一顿，5 个退休职工代表都没有在省政府的复核结果上签字。在听证会中，工人们对国资委提了许多问题，国资委都答不上来。

第三节　通钢事件：矛盾大爆发

在零五年底，通钢组私企，操作违法纪，侵害三者利。
资产百余亿，参股十八亿，高炉评零值，资产估过低。
改造八工程，制氧和发电，连轧干熄焦，投四十余亿。
新建四工程，三炼等一批，加超薄带钢，投资数十亿。
再谈侵权益，年龄四十七，工龄三十年，内退一大批。
内退无补偿，工资还很低，生活遇危机，无奈泣天地。
重组新国企，股少者管理，领导年薪高，年薪数十级。
工人月薪低，高低无法比，差距数百倍，无处去评理。
企业无效益，私企不得利，零九年三月，私退又投机。
吉林钢基地，半价归私企，矿资源基地，私企也拿去。
干群齐努力，通钢又盈利，私企要返回，股权再升级。
职工有怨气，董事不同意，国资委着急，企业来威逼。
忆私进国企，凭补充协议，凭明城破钢，参股十四亿。
二十四晨时，数千人聚集，对话国资委，抗议赶私企。
国资委不理，事态又升级，罢工十一时，死去总经理。
抓凶手姓纪，判刑处无期，通钢的问题，至今未处理。
——通钢职工代表吴敬堂写的五言句《通钢组私企》

2009 年 7 月 24 日，通钢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通钢事件”——通钢工人在厂区罢工、游行，打死了建龙派来的总经理陈国君。有些人将“通钢事件”归结为“不明真相的群众”被煽动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也有些人将“通钢事件”归结于工人们“国有情结”的爆发。事实上，“通钢事件”是在国有企业私有化背景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总爆发，建龙在将各个工人群体推到自己对立面之后，仍依仗省委撑腰对已经聚集起来的工人耍威风，最后总经理罪有应得，充当了省委书记王珉的替罪羊。

(一) 建龙增资扩股，“二进”通钢

建龙挣钱就开，赔钱就关，他们不对社会承担责任。

——大多数通钢人都这样表达对建龙的不满

通钢重组真违规，未满五十办内退。
双重待遇错与对，叫天喊地还呼谁？
女工失业擦干泪，挺胸走进夜总会。
陪喝陪乐还陪睡，生活窘迫还怨谁？
工人失业加内退，经济拮据找岗位。
力工勤杂脏又累，众人竞争能聘谁？
通钢重组有发挥，企业责任推社会。
正义公平无所谓，作奸犯科查到谁？

——通钢工人写的民谣《无望》

建龙于 2005 年进入通钢后实行“减员增效”政策，使原通钢大批职工在未得到合理补偿的条件下内退、下岗；同时，在工厂内部实行三级管理、管理层工资年薪制、处罚连坐等激化厂内干群矛盾的管理制度，使得工人整体物质生活水平下降，与资方矛盾突出，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反抗行动来维护自身权益。2008 年 6 月钢材价格暴跌，钢铁业开始出现危机，铁矿石价格一时难以调整，通钢陷入“生产越多就亏

得越多”的怪圈。到 2009 年 2 月，亏损一度高达 10 亿元。在这种情况下，建龙于 2009 年 3 月撤出通钢，具体方案是退出其在通钢的全部股份，但持有 100%吉林钢铁股份公司股份和板石矿 23%的股份，即把原属通钢的优质矿山资源全要走了。当时正值两会期间，建龙撤资消息一出，工人们都放鞭炮、扭秧歌，鼓乐齐鸣，庆祝建龙走人。通钢职工的国有观念和集体主义精神较强，不愿意走私有化道路，因建龙而下岗的职工也大部分回来上班了。大家心情变了，干劲上来了，生产积极性一度增强，加之国家实施了四万亿投资计划，对钢材生产需求大幅提升，使得通钢在 2009 年 6 月盈利 4279 万元，7 月份盈利 12352 万元，比 6 月增利 8073 万元。

但让工人始料未及的是，2009 年 7 月 22 日，突然又得到消息说，称吉林省国资委与建龙集团达成新的协议，由建龙控股通钢集团。根据新方案：建龙集团以 10 亿元现金和其持有的通钢矿业公司股权向通钢集团增资控股，持股 66%，吉林省国资委直接持有的通钢股权降至 34%。一位通钢的人事干部回忆说：“早在 7 月 22 日，我就听到消息说，通化钢厂附近已经在部署警力了，也听说建龙要重新入股通钢的传闻。”工人们没有预料到这一局面，也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此事，通钢人积压了四年的愤怒瞬时激化，工人的大规模反抗行动一触即发。另一方面，建龙再度入主通钢也有损通钢干部阶层的利益，这一次建龙来势汹汹，培训了一大批干部准备接替通钢的处级、科级干部，甚至连保安都要调换。建龙入主通钢有省委书记王珉撑腰，所以一路绿灯，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建龙将通钢的总部设在长春，通钢领导干部都将被束之高阁。对于这样的改制安排，许多工厂高层领导也显得无奈。2009 年 7 月 22 日，在长春市的通钢集团总部，吉林省国资委召集通钢集团领导班子开会，宣布通钢重组方案，要求几位集团高层在建龙集团重组方案上签字。集团董事长

安凤成、集团副总经理鞠忠、胡品、孙玉斌等四人拒绝签字，当场辞职。据通钢内部高层称，安凤成在会场摔了一个茶杯，愤然离去。高层干部在事件过程中对工人行动采取了默许、并暗中推动和支持的态度。

(二) 抗争准备——通告、号召，反对通钢重组

重组私企来管理，高管高薪数十级，职工低薪差天地，强奸民意侵权益。

职工年龄四十七，强迫内退众怨积，谁来维护三者利，祈盼苍天能正义。

——通钢职工代表吴敬堂写的七言句

7 月 22 日，维权多年的退休职工代表吴敬堂正在从省城上访回来的路上，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说“建龙二次赤手空拳杀回通钢”，也没说他是谁就挂了。吴敬堂回来后，又有工人来电话来问：“胡汉三又杀回来了，该咋整？”当时吉林省委支持建龙，通化市公安增派警力维持治安，面对统治阶级的高压态势，5 个退休职工代表一商量，就有 3 个说不干了，只剩吴师傅和何师傅两人。

7 月 23 日，上午 8 点半通钢的干部们在办公楼开会。吴师傅、何师傅还有十几个群众就去了。他们并不知道在哪开会，是警察领了吴师傅过去，并用手势告诉了他会议地址，在五楼会议室正在召开宣布建龙控股通钢的发布会[1]。吴就领着大伙进去了，刚好会议在开场，宣布建龙要控股通钢。在会场的时候，吴师傅也没有抢他们的喇叭，等会议一结束，吴敬堂拿自己的喇叭喊：“别散会，我有话说，我代表群众的意见，你们是不是本着中央三公开的精神？”干部们不听，都走了，吴急了，就又大喊，然后警察过来，说是国资委一把手都在一楼开会，就围着把他扶到了一楼，进了会议室。

1 很多警察就是通钢工人的后代，他们也不愿看到私有化的结局

出来两个干部交涉，吴就说不跟他们对话，要照这么整，大家就要“十个大个进京”[1]。然后他说，“走，不跟他们谈了”，把大伙拉了出来。

7 月 23 日 9 点，省国资委主持在通钢公司主持建龙二次入股通钢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主要是通钢退休、退养（内退）的原处级干部、科级干部及退休工人，大约十五六人。当老干部走到公司大楼门前时，许多工人已经围在那里。一个老工人提醒干部们：“你们这些参加座谈会的人要注意，一定要坚持正义，千万不能让建龙控股（通钢）啊。”会场设在公司三楼，与会领导有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王喜东、省企业改革处处长何启刚、通钢集团副总经理孙毅及“建龙那边新提的副总经理李云祥”等。省国资委副主任王喜东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情况，然后是让代表们发表看法。两名退休工人在表示完反对意见后，原公司组织部长王乃谦说了自己的看法：“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经过职工代表大会？”王喜东回答到：“根据新的《公司法》，这种情况是不需要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新的《公司法》确实规定，股东权益变更需要召开的是股东大会，股东大会通过后，属于国有企业的还要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而通钢的员工在 2005 年国企改制时已经进行了身份置换，并且按照国家政策每个人都支付了经济补偿金，这笔经济补偿金已经转入通钢的股权，职工仅有作为小股东的知情权。在王乃谦发表意见后，其他与会人员也都从建龙入股通钢这几年通钢的发展、建龙的一些管理不当等方面表达了反对意见。会议持续到中午 11 点 40 分左右，王喜东总结说，这个事情省委会议已经讨论决定下来了。于是，就建龙二次入股事宜，只是在 22 日召开了通钢的经理级会议、23 号上午召开处级干部大会和一个内退人员座谈会、23 日下午召开一个老干部座谈会。

1 意思是“组织十次大规模进京上访”。

许多参会人员感觉受到了愚弄，“既然是吉林省委决定的事，还让大家座谈什么”。吴师傅和何师傅就在外面等到省国资委主持座谈会开完，吴问这些干部的态度，他们也都很坚决，并表示“他们要重组，就是走打死宋凯那条路”。大家就联合起来了，准备第二天的职工大会。吴师傅等回去就开始写通知，写了《急，急，紧急通知》，号召通钢的干部、职工，无论退休还是在职的，还有家属都一起来保卫通钢，请大家于24日早上参加大会。

7月23日当天，吴敬堂和何师傅顶着巨大的压力，重新选举了5名退休职工代表，并同5名内退职工代表联合开会。大家兵合一处，决定共同组织工人召开职工大会。吴师傅和何师傅两人去贴紧急通知，一直贴到晚上十二点，贴满了厂区的整个街。

急 急 急 紧急通知

通钢所有的退休、职工、干部、内退、在职职工和家属同志们，目前通钢发生的重大变化，有些同志知道了，有些同志还不知道，7月22日省决定建龙二次控股和通钢重组，我们深知第一次重组，私企和通钢重组，将国有资产已盗空，职工一批批下岗，这次重组，比上次还要严重，后果大家会很明白，这次重组立即就要有一批人面临下岗。同志们，通钢是我们全通钢人的通钢，我们通钢人有能力有决心会建设发展好的，我们坚决反对建龙二次进入，为我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如果这次大家再不勇敢的站出来，我们家园没有了，我们的饭碗也没有了，我们应该怎么办？自己选择吧！

愿为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的权力，就希望大家准时在24日早8点到厂办公楼前开大会。

7月23日

与此同时，工人中已经在广泛流传各种传言："建龙培训 200 名管理层要来接管，上万人要被一刀切下岗"、"建龙要让 45 岁以上工人全部内退"、"建龙征用吉林 5000 亩地，通钢将转移到吉林"等。

(三) 职工大会变游行——"建龙滚出通钢"

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不组织群众，无产阶级就一事无成。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就无所不能。

——列宁 1906 年《同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

厂主和警察局能够，而且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把等级规定得使工人难于团结和联合，不仅在不同行业、不同行会的工人之间，而且在不同民族、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技术水平、不同工资以及其他等等的工人中间，制造和煽起纷争。只有工人团结一致，工人代表机构才可能有利于工人，而且有些地方事实也正是这样的，因为受压制、受压迫、受工作压抑的我国文明的雇佣奴隶的力量的唯一泉源，就在于他们的联合、他们的组织性、他们的团结精神。

——列宁 1903 年 8 月 15 日《改革的时代》

7 月 24 日早上 8 点，就有人就聚集到厂门口，大约有七八千人。吴敬堂师傅现场讲话，说危机要来了，马上就要卖给建龙了，生死存亡，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同时希望大家依法维权，因为中央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通钢的不和谐都是干部们造成的，大家站在这里就是表达不和谐，就是胜利，不要有过激行为。吴老开始领着大家一起唱国际歌。

来会场的路上，有人就给内退职工代表赵师傅送了个横幅，上面写着"建龙侵害国有资产，从通钢滚出去！"此时正好是夜班职工下班的时间，到了厂门口横幅刚打开，就被

在职职工夺过去。在职职工长期以来敢怒不敢言，但建龙对工人的种种压榨与压迫在这一刻汇聚成为爆炸性的力量。在职职工拿过退休职工的横幅和标语，冲进厂区开始游行。面对游行洪流，警察、便衣不敢靠前，有几个警察曾试图阻拦人群，被打得满地打滚，警车被掀翻两三辆。工厂的地上有人写着："狼来了怎么办？"里里外外都有游行，外面的群众也进去了，游行队伍达到几万人的规模。一位警察说，当时的局势"谁也控制不了"。跟随通化市副市长巩爱平一同在现场安抚职工的通化市通钢协调办主任于连才，由于被误认是"建龙的人"，被工人错打，晕倒在地，被送至通钢医院。一样被错打的，还有巩爱平的秘书宋玉清，肋骨断了两根。政府把辽源、浑江、集安的警察都调来也无济于事。

整个游行过程一路绿灯。游行的具体路线是：一号门、机械厂、轧钢厂、一炼钢、二炼钢、一号高炉、焦化厂、二号高炉、三号高炉、四号高炉、五号高炉、六号高炉、七号高炉（中间还经过了耐火厂、烧结厂、氧气厂等地）。一号门的警戒杆早早就升起了，保安放行，让群众随便进。要在平时，即使是在职工人都要刷卡才能进门，退休工人都进不去。游行队伍很受厂区里的在职工人欢迎，队伍到哪里，哪里就停工，加入队伍。队伍每游行到一个地方，就在铁路等关键位置插上红旗。这样就形成全厂区全部停工。工人们很有默契，停工也很有秩序，不是直接把高炉停了，而是修封，这样高炉还都可以用。

工厂食堂还给大家准备了饭菜，并免费供应，还有大车拉了成箱成箱的矿泉水。市区也有许多群众自发地参与到游行队伍中来。游行和围观的人，据估计有几万人。有的人早上去了，中间有事走了，后来还惦记着，又回来了。据后来公安部门的统计，现场一共有 5 万 2 千人次。光派来现场的警察、武警就有 1.5 万，周围区县的各种警力都被召来了。警车都停满了。

(四) 陈国君耍横，横尸当场

谁叫你们进来的，都出去，不出去明天就让你们都下岗！

——陈国君面对成千上万的游行群众这样说

我求求你们，救救我，我还想活。

——陈国君临死前遗言

你要活，我们就得死。

——工人对濒死的陈国君说

大约 10 点多，不知是谁给一位工人打来电话[1]，说陈国君正在焦化厂的旧办公楼开会。焦化厂和炼钢厂是通化职工最多、矛盾最激烈的两个部门。陈国君当时是去焦化厂宣读免职决定，焦化厂的四个厂长免掉了三个，当时正在与炼铁厂厂长荆玉起谈话。于是游行队伍都去了焦化厂。得知工人聚集抗议，陈国君把荆玉起给骂了，还怒摔了一个烟灰缸。

人群全部涌向焦化厂后，陈国君不知收敛，公然威胁工人说："谁叫你们进来的，都出去，不出去明天就让你们都下岗"。工人急了，拿安全帽砸了过去，陈也拿烟灰缸回敬，两边就干上了。开会的干部后来都跑没影了。被打的陈国君挣脱了出来，由保安掩护撤往焦化厂办公楼二楼材料科办公室，他藏在办公室的铁皮工具柜中，然后还锁上办公室门。一位在现场的抗议者说，陈国君仓促逃跑，一只皮鞋脱落后也顾不上穿。陈国君给建龙集团董事长张志祥打电话，请求救援。张志祥就在远离厂区的通钢宾馆，并未受到抗议队伍的冲击，张志祥得到消息后立马抛弃陈国君，于上午 10 点半在武警的保护下撤离通钢宾馆。

1 稍早些时候，陈还在炼钢厂和负责人谈话，从工人们的事后分析来看，这个电话是中高层干部打的。

工人们到焦化厂办公楼上，逐屋寻找陈国君。经由保安暗中指引，工人们拆下暖气片砸开了材料科办公室的两道门，将陈国君拉出来。陈虽然已经吓得哆嗦，当时还嘴硬。他在与职工僵持的过程中，做了一个让工人下岗的动作，并说“3 年后我让这厂子姓陈，让你们回家”。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工人们，他被拉到一楼的走廊里殴打。被殴打的陈国君开始很愤怒，让现场各厂厂长指认现场殴打他的工人。但随着现场的失控，陈表现出明显的恐惧，又被愤怒的众人反复殴打。

从焦化厂现场回到办公楼的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马明向在当时也在通化钢铁的吉林省副省长王祖继汇报称，在有人身攻击的情况下，企业工作人员已不敢出头做工作，建龙集团和省国资委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中午 11 点前后，吉林省副省长王祖继传达了意见，调集警力，对现场布控。待伤者诊断出来后，再追究打人者的责任。中共通化市市委书记齐晓光则要求，在场的通钢集团领导提供闹事者姓名。此时焦化厂附近已经布控有数百名防暴警察和武警。看到外面来了消防车和云梯，愤怒的工人们就把云梯掀了，把消防车也拦住了。下午 3 点左右，7 号高炉停工，整个厂区生产陷入停顿。此时，焦化厂厂区聚集了超过 5000 人。一位现场抗议者称，炼铁、焦化的道口是几十人围成一堆，最开始是老头老太太在前面挡着，后来是后面的小年轻拿着石头往上顶，把警察挡在焦化厂门外。双方陷入僵持。

半小时后，中共通钢集团党委书记崔杰在警车内向聚集在焦化厂的抗议者宣告，暂缓执行与建龙集团的合作通知。与崔杰一同出现在现场的还有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常明、国资委主任李来华、副主任王喜东。崔杰刚读通告，抗议者纷纷向其投掷砖头瓦块和矿泉水瓶。他吓得马上坐车跑了。后来有工人说，他要留下的话，下场也好不了。

下午 4 点半，一个围观者说，数度被殴打的陈国君被人

用脚从二楼楼梯上踹下。倒在一楼门口的陈国君此时仰面躺倒在地不能动弹，口里喘着粗气，不能说话，看样子已经伤势非常严重，但还有人朝其扔砖头杂物。然后一批批工人就像瞻仰遗容似地到那儿看，去了就踢一脚，吐口唾沫。很多人拍了照。有武警官兵要求把陈国君抬出来，遭到工人们的拒绝。

五点多，陈国君已经奄奄一息，“脸已经变形，看不出模样了，衣服黑糊糊的，头朝外，不能说话，光哼哼，吐字不清”。此时，公安人员从焦化厂传来消息称，陈国君已经不省人事，生命垂危。“我求求你们，救救我，我还想活。”据说这是陈国君的遗言。这次求救并没能打动身边的工人们。“大家伙都说，你要活，我们就得死。”

下午 5 点 10 分，吉林省国资委主任李来华再次来到焦化厂，宣布终止建龙集团重组并控股通钢集团的决议。大约 6 点半，到厂里上班的工人纪宜刚来到现场，拿着块砖头，不知道打了没打，但当时有公安的便衣，带着袖珍录像给录下来了。

晚 8 点左右，国资委的正式文件——《关于终止建龙集团增资扩股通钢集团的通知》开始散发到厂区职工手中[1]。这一通知也立即在通钢电视台反复滚动播放，现场不断广播。吉林通化电视台播发公告称：“钢城广大员工和家属：根据广大职工愿望，经省政府研究决定，建龙将永不参与通钢重组，希望广大职工保持克制，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秩序，尽快撤离。”

晚上 9 点半，聚集的工人们不断散去，只剩几百人。随后，武警排成方阵，进入焦化厂办公楼，将陈国君抬走。当时在救治现场的还有通化市卫生局局长李红玉、通化市医院院长杨立军。通化市医院一位医护人员表示，当天晚上 11

1 7 月 24 日当天，省里就为通钢发了三次通知，第一次暂缓，第二次撤出，第三次永不进入。

点，陈国君被送至医院时，已经死亡。吉林新闻第一次播报“陈国军因心脏病复发而死”。二道江区开始出现鞭炮声，一直持续到很晚。许多工人夜里两点多还是睡不着，“太高兴了，终于把建龙打走了”。

晚上 10 点左右，各厂和车间开始复工，大约只两个小时，八个高炉全部恢复生产。

关于终止建龙集团增资扩股通钢集团的通知

吉林省国资委文件　吉国资发直改[2009]105 号

通钢集团：

为深化企业改革，加快企业发展，省国资委经与多方战略投资者商谈，曾确定由建龙集团重组通钢集团，并控股经营。方案公布以来，很多干部员工及离退休人员不理解、不赞成。经认真研究，并报请省政府同意，决定终止建龙集团控股通钢集团的方案，不再实施。希望通钢集团广大干部员工接此通知后，从维护通钢稳定、维护通钢广大干部员工根本利益出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努力克服生产经营中的困难，促进通钢集团发展。

吉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公章）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第四节　通钢斗争成就

(一) 直接成果

企业改制方案应提交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职工的裁减和安置方案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未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的不应实施；既未公开又未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决定视为无效……

——中华全国总工会 2009 年 8 月 14 日《关于在企业改

制重组关闭破产中进一步加强民主管理工作的通知》

向通钢工人学习，四十年的财富积累不容侵吞。

——林州钢铁厂工人反抗私有化斗争中打出的标语

7 月 24 日是通钢工人的盛大节日。通钢工人的团结，显示了他们强大的力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一是成功赶走建龙公司，通钢重新恢复为国有企业。二是工人的切身利益得到了一定的补偿。在岗职工工资每月增加了两三百元；退休职工的退休金也涨了，并落实了取暖费。一部分因建龙下岗的职工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内退职工的退休金也有所增加。三是全国总工会因此事件于 2009 年 8 月 14 日专门发文，要求以后的国企改制必须经过职代会的同意，强调在企业改制中要依法依规地落实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通钢工人的这次斗争对全国国企工人阶级都有巨大的意义。从全国来看，通钢事件终结了中国大规模的国企私有化运动，在整体国企工人被动挨打的局面中，找到了一种有效的反抗方式。通钢工人给官僚资产阶级一个狠狠的打击，显示了国企工人的巨大力量和坚决性，也给全国其它国企的工人斗争开辟了道路，发挥了示范鼓舞作用。

几乎同一时间，远在中原的河南林州钢铁公司被一家私营钢铁公司宣布收购，工人们却被蒙在鼓里。但这家私企的劣迹工人早有了解——常常拖欠工资，超负荷工作，克扣工资、罚款，甚至打骂工人；缺乏假期、公休和三险一金，随意开除工人的现象很是普遍，“天天都在开除人，天天都在招人。”为抵制这次收购，五千名林钢工人已经斗争了一年。8 月 11 日上午，因不满此次收购及年工龄 1000 元的买断补偿金，数千名工人打出横幅：“向通钢工人学习，四十年的财富积累不容侵吞”、“用毛泽东思想占领我们的阵地，做企业的真正主人”占据厂房出入口，时间持续四天，并挟持濮

阳市国资委副主任达 90 个小时。面对严重的事态，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遂作出批示，“从现在开始，凡企业改制重组必须经职代会讨论通过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否则无效。请各级党委、政府认真执行。”接着河南省委、省政府宣布暂停改制工作等六条意见，事件方才平息。这次林钢大规模围堵事件明显受到通钢事件影响，一些工人喊出了“向通钢老大哥学习”的口号。

(二) 提升了工人的阶级觉悟

（一）

这样花呀那样花，比不上通钢的国有化，
工人革命精神冲破天，坚决抑制了私有化，私有化。
鞭炮锣鼓震天响，胜利凯歌传天下，
工人心里乐呀乐开花，
通钢定能再壮大，再壮大。

（二）

这样花呀那样花，比不上通钢的国有化，
这棵花儿是毛主席栽，百姓浇水开盛花，开盛花。
胆敢有人来摘花，大家齐心消灭他，
毛主席栽花，坚决要保卫，
让这鲜花开天下，开天下。

（三）

千朵花呀万朵花，比不上社会上义公有化，
毛主席栽下我们的心爱的花，百姓怎能丢掉它，丢掉它，
花开是烈士鲜血灌，捍卫江山靠大家，
花开花落人人都有责，
幸福花开百姓家，百姓家。

——吴敬堂改写的歌曲《幸福花开百姓家》

工人们有时候也会因为组织不起来而灰心丧气、甚至退缩。在抗争过程中，想，中国人这么多，要做亡国奴，也不差我这一个。但是反过来一看，如果你不斗争，他不斗争，毛主席不带领我们打江山，社会主义江山从哪来？工人阶级要有志气、有勇气才能捍卫人民的江山，因为这江山来之不易。

——通钢职工代表吴敬堂

“7·24”事件极大的鼓舞了工人阶级的斗志，提高了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从私有化的教训和通钢事件的经验正反对比中，工人们认识到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非常必要的，必须要坚持公有制、反对私有制。以前一些工人群众只是追求个人的金钱利益，也只是看到了企业领导的贪污腐败问题，但现在就认识到这是路线问题，认识到关键在于工人阶级丧失了主人翁地位、已经没有话语权。如果不经过斗争，主人翁地位是不会自动回来的，经济利益也得不到保障。通过维权斗争，老工人更深刻认识到，面对势力强大的资产阶级，如果自己不站出来捍卫主人翁地位，啥权利都没有了，就算要到钱也没有用。不仅老工人没有享受到应有的福利，而且连累子女受害。只要雇佣劳动的地位没改变，给多少钱都是白费的。

(三) 增长了群众工作经验

通钢职工代表们从斗争实践出发，总结出一些群众工作经验。

第一，相信大多数，促成大联合。职工代表埋怨群众不觉悟、不团结，是最常见的，工人群众也不可能一开始就团结起来，运动初期往往一团散沙，甚至工人会出卖职工代表。面对这种情况不能埋怨，相反，要逐步做群众的思想工作，通过分析现实情况和未来形势打动人、感染人、凝聚人，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最重要的是要相信群

众，相信群众能够接受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最终会联合到一起。开始的时候，不同群体的工人不容易联合，大家互相了解、做工作之后才能团结和联合。退休职工和内退职工的联合是在二次赶走建龙的时候实现的。职工代表要反复告诉群众，代表们是维护工人自己利益的，要通过争取群众看得见的切身利益去动员人。还要搞统一战线，团结起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即便是警察，也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团结的，通化市公安局的大多数人还是理解和同情工人的，否则不可能只抓纪宜刚一个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社会大多数人还是支持工人的。

第二，重视核心骨干队伍建设。实现大联合不容易，特别是职工代表要思想一致、路线正确。职工代表不能有私心，维权不能带有个人利益和目的，否则迟早被瓦解。要在斗争过程中不断召开不同范围的核心会，通过斗争来提高大家的觉悟，通过正反案例对比教育职工代表坚持集体利益。发动群众运动，要善于在斗争中发现工人骨干，培养骨干，形成干部队伍梯队，个别人被分化了，马上会有人顶上来。警察会用各种手段来威胁职工代表，甚至威胁他们的儿女，别让父母上访维权了，不然就让他们都下岗。在不断开会的过程中，要直面各类威胁，主动总结瓦解敌人威胁、鼓舞子女的斗争方法。

第三，熟练掌握法律和政策要求，争取政治主动。要组织职工代表一起学习相关政策文件，掌握国家政策精神和法律法规，熟悉现有的中央领导讲话、口号和要求，利用这些来反对地方领导的胡作非为。在具体斗争过程中，不直接针对最高层，相反要让群众看到地方干部违法违规、职工代表才是掌握国家政策的，这样群众才会迅速团结到职工代表周围。要熟读宪法、党章，这和毛泽东思想一样，是我们的精神武器。如果没有这些武器，就会被统治者吓倒。通钢职工代表在上访、运动的过程中有理有据，经常把领导问的哑口

无言，几次跟省国资委、省政府对话、开听证会，用事实和国家政策把领导们怼的没话说，这就在政治上争取到了主动地位。职工代表要本着“凡是对党对人民有利的事就一定要做”的精神，主动打坚决维护党、人民利益的旗号，让资产阶级抓不到把柄，具体斗争环节只反映具体违法违规问题，并力争使其中的问题逐个解决，积小胜为大胜。群众是需要胜利来鼓舞的，无论成就有多小，只要运动主要目的达到了、成功了，群众就会汇集到运动中来。

第四，善于把握时机，学会斗争艺术。职工代表做工作要掌握火候，允许大家有个认识过程。等到条件成熟了，才能进行鼓动式的“煽风点火”。通钢事件之前，2009 年 3 月的群众集会和游行就是吴敬堂等职工代表反复动员、教育、发动的结果，运动中逼迫供暖公司经理答应不热的给退钱，通过解决供暖问题凝聚了人心，为“7·24”运动奠定了基础。职工代表领导工人与资产阶级斗争时要有理、有力、有节。在运动的低潮时期，要保护自己，同时发动群众维护经济利益。比如 2010 年 7-8 月，很多职工都想搞“7·24”一周年纪念活动，但官方已经提前布局，形势就不允许采取市面上的、大规模的活动，职工代表审时度势就没有继续“顶风作案”。

第五，职工代表要不断培养自己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职工代表吴敬堂讲：“遇到困难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从里面找武器”。职工代表最经常遇到的就是经费问题，要有牺牲精神。以前退休和内退职工代表们要求工人集资，结果没办成事，还被企业收买了。通钢退休职工代表认为，在运动发起初期，职工代表队伍是没有经过斗争考验的，这时不要让工人群众集资。职工代表不是为了自己，就是想带大家维权，搞革命不能带私字。“7·24”运动前搞宣传，发信、贴通知，一下就一千多张，钱都是职工代表自己拿的。

第六，充分发掘通俗易懂、容易共鸣的宣传方法。吴敬堂就经常通过唱红歌、讲故事的形式进行宣传动员。吴老改

编的很多经典歌曲非常容易传唱，又说出了百姓的心声，让大家一下子就抓住反私有化、工人阶级必须团结斗争才能胜利等关键点。

诚然，通化钢铁厂的工人运动仅仅是中国国企工人抗争的第一步。目前，国企工人群众还没有全面地、普遍地发动起来，也极其缺乏组织和骨干，群众还普遍缺乏坚强斗争的信心。同时，近年来国企工人队伍不断萎缩，国企大量引入劳务工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工人的团结。但工人阶级的团结和胜利是毋庸置疑的，通过通钢事件的激励和雇佣劳动制度的现实教育，国企工人必将克服统治阶级分裂、分化、瓦解无产阶级队伍的企图，同整个无产阶级队伍一起团结抗争，最终夺回属于自己的主人翁地位。

南海本田罢工事件始末

罢工使工人懂得，厂主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工人的力量在什么地方；罢工教育工人不要只想到本厂一个厂主和自己身边的几个同志，还要想到所有的厂主，想到整个资本家阶级和整个工人阶级。靠剥削几代工人的劳动而积起百万家财的工厂主，根本不同意增加一点点工资，甚至还打算再降低工资，在工人起来反抗的时候把成千个没有饭吃的家庭抛上街头，所以工人很清楚地看到，整个资本家阶级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敌人，工人只有指望自己，指望自己联合起来。常常有这种情形：厂主千方百计地欺骗工人，假装工人的恩人，用空洞的施舍和骗人的诺言来掩盖他们对工人的剥削。任何一次罢工都是一下子就揭破了这场骗局，使工人看到，他们的“恩人”不过是披上羊皮的狼罢了。

——列宁《谈谈罢工》[1]

2010 年 5 月 17 日，南海本田爆发 2000 人的大罢工。从 5 月 17 日开始，直到 6 月 4 日结束，罢工前后持续 19 天。在此期间，工人进行了坚韧的斗争，顶住了政府和资方的联合施压，积极寻求外界的帮助，最终获得了罢工的胜利。这次罢工是承前启后的一次罢工——一方面，它是 2010 年以来工人经济斗争的继续；另一方面，在这次罢工中，工人明确提出了重组工会要求，是新工人自发工会运动的里程碑。

第一节　罢工的背景

2008 年秋季以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沿海加工业普遍出现订单减少、成本上升、利润下滑等情况。资本家为了自保，将危机转嫁到工人身上，开始大规模裁员，降低工

1 《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278-279 页。

人工资，取消相应的福利，增加劳动时间和工作强度。2008年下半年以来，大批工人被抛向街头，在职的工人也朝不保夕。在如此严峻的环境下，工人行动日趋保守。2009 年秋以来，经济逐步复苏，沿海出现民工荒，工人谈判的筹码开始增强。在此背景下，压抑一年之久的工人开始重新行动起来，涨薪的呼声此起彼伏。2010 年初，经济进一步复苏，用工缺口进一步扩大，而工人的抗争也更加激烈。2010 年 1 月，苏州联建爆发大规模罢工要求加薪，打响了当年工人进攻的第一枪。随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罢工接连不断，掀起了席卷全国的涨薪潮。而广为人知的南海本田罢工，就发生在这个大背景下。2010 年 5 月，南海本田爆发了持续 19 天的大罢工，最终以工人的胜利告终。南海本田的罢工，是 2009 年以来涨薪潮的继续，也是 2010 年下半年以来一连串的连锁罢工的开端。南海本田的罢工，把工人的斗争情绪引向了新的高点，把中国工人的抗争推向了新的阶段。

第二节　罢工的原因

南海本田，地处广东佛山南海区，是本田集团的零部件供应厂，生产汽车变速箱。该厂有员工大约 2000 人，多数为一线员工，一线员工中八成是实习生；少部分为文员，同时还有少量的日方员工。南海本田之所以爆发罢工，是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管理严苛、工资低、待遇差别大等等矛盾结合在一起，导致了南海本田的罢工。而所有这些矛盾里面，最核心的，就是薪酬待遇。

要了解本田的罢工，首先就要了解员工的工资。本田员工工资分成很多级别，但大部分员工的级别是 I 级。I 级工资共 1510 元，扣除保险等，实际到手的 1211 元。除去房租 250 元、吃饭 300 元、电话费 100 元、日用品 100 元、工会费 5 元，实际每月剩下的仅有 456 元。如果再添置点衣物，和朋友去下个馆子，或者出去玩一玩，那就几乎剩不下什么钱了。

本田罢工之后，就有员工给记者诉苦："就算现在辞职，我们连火车票也买不起。"

I 级工资很低，那么员工能否靠自身努力晋升上去呢？很难！按照南海本田的规定，员工视表现需要得到公司两个 A 的评定才可以升级到二级员工，二级员工的工资是 1700 多元。然而得到 A 并不容易，一般员工一年表现一般的话，年底的评定就只加一个 B，而一个 A 等于 15 个 B。所以，大部分员工都要熬很久才能晋升，每年晋升的名额也就几十个。即使熬到 II 级，工资也就多 200 元，对员工而言可谓杯水车薪。这还是正式工人的薪酬，而高达 8 成的实习工人的工资更是低到每月仅有 900 元。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籍员工的薪酬，日籍员工的薪酬高达每月 5 万元。一边是在温饱线挣扎的中方底层员工，另一边是拿着高额薪酬的日方员工，巨大的落差使得原本就过低的工资更为刺眼。如果说过低的工资是导致本田罢工的基本矛盾，那么巨大的落差就使得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同时，新闻又在不断报道各地涨薪调薪的情况。多种因素聚集在一起，南海本田成了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

第三节　罢工的准备

南海本田生产变速箱，一共有五个科，铸造、齿轮、铝加工、轴物和组装，其中组装为流水线上最为重要的环节，也是最后一道工序。如果这个环节停工，势必导致整个工厂流水线停止作业。本田的罢工，也是从组装车间开始的。掀起罢工的关键人物谭国成，以及最初的罢工核心团队，都是从这个车间出来的。

谭国成，湖南人，熟读毛泽东诗词，了解毛泽东事迹。是一个爱打抱不平，也会思考懂策略的工人。谭国成原本就计划辞职，所以没有什么顾虑，于是打算在辞职前搞一次罢工，给大家谋点福利。

从 3 月份开始，谭国成在组装车间秘密串联，进行罢工游说。组装车间大概 200 多人，谭国成串联的对象主要是较为熟悉的湖南老乡。经过一段时间，筹备罢工的队伍扩大到 20 余人，大部分都是在组装科干了一年以上的老员工，湖南老乡居多。4 月 6 日，谭国成正式向公司递交辞呈，进一步坚定了组织罢工的决心。5 月 10 日，长假之后工人回厂上班，了解到佛山上调了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从 770 元上调到 920 元[1]。厂方不得已上调了基本工资，但降低了工人的职能工资，结果工人的工资并没有上涨。工人原本满怀期待，觉得能够涨薪，如此一来，引起了工人普遍不满。

此时谭国成等人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几个核心工友商量后决定，趁大家普遍不满的时候号召罢工。罢工的时间定在 5 月 17 日，即星期一。罢工之前，核心工友相互通气，并通知了其他可靠的工友。5 月 17 日，在例行的晨会之后，工人们在生产线上按部就班，谭国成按下了生产线上的那个红色按钮，南海本田大罢工正式开始。

第四节　罢工的过程

本田罢工历时 19 天，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5 月 17 号开始第一轮罢工，到 5 月 20 为止。双方初次交锋，17 日下午资方承诺 5 月 21 日给出答复，工人有条件复工。

5 月 17 日早上 7 点 50 分，谭国成按下了流水线上的紧急按钮，随即锁定停机。谭国成等人对着各自流水线的员工高喊：“工资这么低，大家别做了。”本以为会一呼百应，结果却差强人意，经过一番动员，罢工队伍艰难的增加到了 50 人。接着，他们来到隔壁的铝加工车间“串联”，不过这里的工人也没有理会罢工的口号，仍然埋头干活。接着，在轴物

1 本田员工此时的基本工资是 675 元，连最低标准都达不到。

车间，谭国成遭遇了同样的尴尬，无人响应。铸造车间的工友们也对这支罢工队伍投来疑惑的眼神。随后，罢工的队伍来到篮球场静坐。正在谭国成等人不知怎么推进罢工的时候，罢工的消息却以短信的方式，在实习生中迅速传播开，一些生产线上的工人开始放下了手头的活儿。由于工厂采取流水线作业，任何一个环节停工，将导致整个生产停顿。于是，大部分工人被动地卷入停工。

与工人的“淡漠”形成鲜明对比，资方表现得非常的“重视”。中午，资方准备了 6 块白色公告板，供员工提意见。不料此举却激发了员工的热情，久被压抑的员工蜂拥而上，宣泄自己的不满，不一会就写满了 100 多条意见，黑压压、缭乱的文字占领了公告板的每一个角落。意见的核心是加工资，其后工人统一意见，加薪 800 元。

下午，公司方承诺 21 号给出答复。作为条件，工人在此期间继续开工。5 月 20 日，南海本田、狮山工会与谭国成、萧浪等四十五名工人代表进行了第一次见面，南海本田表示将于五月二十四日给员工一个明确答复。资方一拖再拖，几个核心工人认为，这是资方在耍缓兵之计。为鼓舞工人们的斗志，谭国成等人在工人们中宣传：“我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们是没有回头路的……”

第二阶段，从 5 月 21 日重新罢工，到 5 月 27 日工人明确提出要求为止。这是双方第二次交锋，资方昏招连连，蠢事不断，直接激怒了工人，罢工进一步发展。在此期间，本田数厂受罢工影响而逐步停工，经济损失巨大。而工人情绪高涨，并以书面形式明确提出自己的要求。

5 月 21 日，工人探听到公司准备在其他地方找人，以此来应对罢工，而不会给工人加钱。工人群情激奋，开始了第二轮罢工。5 月 22 日，本着擒贼先擒王的考虑，南海本田决定迅速解聘谭国成和萧浪，并用大喇叭向全公司广播已经开除这两位带头者。资方本以为工人只是乌合之众，带头的被

开除之后，剩下的人必然作鸟兽散。不料，资方此举非但没有吓退工人，反倒激起全厂工人的愤怒，连之前表现淡漠的工人也开始团结在一起，自此事态一发不可收拾。从 5 月 23 日起，为了防止日方拍照报复，罢工者开始穿上统一的白色工作服，戴着统一的口罩。5 月 24 日，南海本田公布了一个方案，每个工人增加 55 元左右的伙食补贴。方案公布后，工人觉得这是资方在羞辱自己，觉得自己被资方耍了，资方看不起人。甚至之前淡漠的工人都非常不满意，这直接导致罢工再起。

由于自动变速箱供应中断，本田组装厂开始逐步停产。5 月 24 日，本田增城和黄埔的组装厂停产；5 月 25 日，本田武汉组装厂停产；5 月 26 日，本田在华另外一家零部件厂和四家组装厂开始全部停工。据估计，这 5 家工厂的日产值损失合计约为 2.4 亿元。本田停产的消息通过各种途径汇聚到南海本田，工人通过 QQ 群等方式，将之公布给所有罢工人员。此时，南海本田的事件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外界关注，采访的记者络绎不绝。工人还通过佛山本地论坛天天新论坛实时对外发布消息[1]。

本田资方受到了空前的压力，资方不曾想工人的罢工能持续这么久，以至于导致本田在华整车厂停产，引起巨大的经济损失。而工人方在外界的关注下，也不再孤立无助，外加获知本田停产的消息，工人罢工的信心更加坚定。至此，罢工的主动权开始逐步转移到工人手上。

5 月 26 日，厂方张贴告示，决定给正式员工平均加薪 320 到 355 元不等，实习生从第 3 个月起，加薪至 1569 元——

1 当时民间各界均积极活动，例如中国工人研究网在 6 月初公开发起《声援中国佛山本田工人行动呼吁信》的签名活动，该活动影响较大，工人网因此事被政府强制关闭。再如，当年 7 月 1 日，多名民间人士向中华全国总工会提交了《百名国际国内人士联名呼吁全总为工人说话办事》的文件，全总接收文件后装聋作哑，没有任何反馈，但该文件却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这与现在老员工的工资水平接近。这与之前的羞辱性方案不同，是资方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妥协。不过，这一方案与员工们加薪 800 的目标仍相去甚远。工人并不接受这个方案，罢工依然在三个班次的员工之间交替进行。

资方不甘心就此失败，准备对工人发起新一轮进攻。5 月 27 日，资方给到岗出勤的所有工人发了一份《承诺书》，要求员工“绝不领导、组织、参与怠工、停工、罢工”。“厂方透露出来的意思是，签的就是留在这里工作；如果不签，明天就是自动离职。”但大多数人对此不屑一顾，为回应厂方发放的《承诺书》，工人代表当天草拟了 6 点要求：

1、工资提高 800 元，全部加进基本工资里面，公布 800 元体现在哪一项要明确说明(通告)，工资提升 3 天内重签劳动合同，年度提升不可少于 15%，年终奖、节日奖金不少于或等于上一年。

2、追加工龄补贴，工龄增加一年加 100 元，10 年封顶。

3、对这段时间部分员工的工卡被抢，恢复生产当天归还员工，事后不能解雇、辞退、劝退任何一位员工，前几天罢工事件辞退的几位员工必须安排复工，并保证不对罢工事件追究责任。

4、21 日至恢复生产日止的所有工作日，公司要支付工资。

5、员工在 17 日提的意见，恢复生产一个月内要有答复。

6、重整工会，重新选举工会主席各相关工作人员。

至此，工人的情绪达到罢工以来的最高峰。

第三阶段，从 5 月 28 日政府大规模介入，到 6 月 1 日广汽集团总经理曾庆红介入调解为止[1]。由于本田数厂停工，政府在压力下介入罢工，分化瓦解工人。工人承受了来自政府和资方的巨大压力，部分工人甚至一度感到罢工要失败

1 本田的整车厂广汽本田是广汽集团的下属单位。

了。但是 5 月 31 日政府工会殴打员工的恶劣事件，再次激怒了工人，催升了工人反抗的情绪。

5 月 28 日，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发布声明，称当地政府正积极协助调解。5 月 29 日，镇政府针对实习生发起进攻。政府把实习生所在学校的校长召唤到该镇的桃园中学，为他们每人提供一间临时教室，把实习生叫过来做思想工作。一位杜姓校长，对着讲台下的学生反复奉劝："要换位思考，换了你是老板，工人老罢工怎么办？"此时，实习生的压力逐渐变大。5 月 31 日，南海本田同意加薪 366 元，并集合所有工人现场讲解加薪流程。工人到场后，就被厂方按科室切割分组，每组配置政府人员、政府工会人员、学校老师，对工人一个个做工作。工人事后回忆，他们当时感觉到空前的精神压力，会场气氛非常压抑。会后，工人各自回到车间，由狮山镇总工会人员监督其复工。也就是在这一天，员工和工会人员发生冲突，工会人员围殴工人，数名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工会的暴行激怒了工人，工人团结一致要求工会道歉，并追究打人凶手。

6 月 1 日，资方和政府再次约集工人，解释加薪的事。然而经过昨天工会的暴行，工人情绪完全不同了。当狮山镇总工会人员开始讲话时，工人情绪开始变得激动，质问他们 31 日的"打人事件"。与会工人怒道："我们先不谈工资，工资不重要，先把打人的事情解决!"

政府的介入本给工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事后工人回忆，觉得当时非常压抑，甚至觉得罢工要失败了。然而，镇总工会愚蠢的打人行为，却彻底地激怒了工人，反而重新点燃了工人的情绪，坚定了工人的团结。

第四阶段，从 6 月 1 日曾庆红介入调解，到 6 月 4 日谈判结束。资方政府都束手无策，而工人也已经非常疲惫了，此时，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人介入此时调停。在此阶段，工人再次选出自己的谈判代表，并发布告各界公开信为谈判造

势。最后，经过 5 小时激烈的谈判，罢工胜利结束。

6 月 1 日，广汽集团总经理曾庆红介入调停本田罢工事件。曾庆红收集了员工意见和要求，表示将协助工人与资方协商，并当场促成此前打伤员工的狮山镇总工会发出道歉信。他的亲民姿态获得了员工的信任，双方达成协议，约定 6 月 4 日劳资双方派出代表谈判，而在这期间，员工先行复工。

6 月 1 日当天，罢工的工人推选成立了罢工工人谈判代表团，共有 16 名成员，基本覆盖各个科室。6 月 3 日，代表团发表了《佛山本田罢工工人谈判代表团致全体工人和社会各界的公开信》。公开信逻辑清晰，不卑不亢。代表在公开信中，呼吁员工要保持高度团结，避免被资方分化；要求资方拿出诚意，展开善意的谈判；谴责工会打人的恶劣行径；并希望社会各界支持工人们维权的壮举。

6 月 4 日，双方代表经过 5 小时的艰苦谈判，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资方做出进一步的让步，由之前提出为工人调薪 24%，再提高至 33%，即从本月起为每名员工调薪 500 元。经过长达 19 天的艰苦拉锯，本田工人大罢工最终胜利结束。

第五节　罢工的意义

本田罢工，不论从组织性、持久性或者最终的结果，都是当时新工人中罕见的。核心人员提前 2 月筹划罢工，罢工准备期就形成了 20 左右的核心团队，罢工初期明确纪律，“不砸设备、不破坏工厂、不给当局留下口实”[1]；罢工事件整整持续 20 天，期间工人顶住了各种压力，在领头人被开除、政府介入镇压、资方分化瓦解等等各种不利的因素下，团结一致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1 邱立本、呙中校等. 新时期工运湘军先锋. 亚洲周刊（香港），2010（6）.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pl/article_2010061811663.html.

然而这并不是本田罢工的重点，本田罢工有两点突出之处值得我们重视。

首先，本田罢工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劳资谈判。6 月 1 日，工人选出自己的谈判代表团。6 月 3 日，发布告各界的公开信为谈判营造有利氛围。6 月 4 日，在政府和第三方的介入下，劳资双方各派代表，对等地进行谈判。工人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诉求，双方进行了历时 5 个小时的漫长谈判。这既不同于工人去“讨薪”，也不同于以往不对等的“谈判”。工人完全是以一种“站起来”的姿态，与资方进行对抗。

其次，本田工人明确提出重整工会。罢工工人明确提出要重整工会，选出能代表自己利益的“真正的”工会委员。罢工结束后，本田工人进一步落实了重整工会的诉求，并于当年选出了自己的工会代表。之后，在工会的带领下，本田工人逐年与资方进行加薪谈判。2011 年，本田工人工资再次增加 611 元，增长 32%。2012 年，工人把罢工的组织者选举为车间工会委员，加强工会的力量，抵制资方的渗透。这表明，工人已经意识到集体的力量，意识到组织的重要性。本田工人的斗争，是中国新工人自发工会运动的里程碑。

工人的罢工、集体谈判以及工会诉求，直接促使国家考虑要把工人的斗争纳入到有序的范围内，即把工会建设和集体协商制度化、规范化。2010 年后，政府加快了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和建立企业工会的探索。

第六节　本田事件后的连锁罢工

本田罢工获得的巨大胜利，在工人心中树立了一个标杆，其影响仿佛浪潮一般，迅速传开。罢工的影响从本田系统内部开始，逐步波及到其他汽车公司，最终影响到其他行业的工人，引发了一系列连锁罢工。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本田系统的罢工和大连工业园区的罢工。

(一) 汽车产业的连锁罢工

6 月 4 日，南海本田胜利后，其他观望已久的本田系统的公司，开始沿着榜样的足迹，向前迈进。6 月 7 日，本田的排气系统供应商，即位于佛山的丰富汽配有限公司 200 多名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罢工工人打出横幅呐喊："我们有多少年可活，我们将来怎样生存！"6 月 9 日，广东省中山市的固力本田制锁公司约 500 名工人举行罢工，并在工厂外聚集示威。他们要求仿效南海本田，将每月的基本工资从 930 元提高至 1600 元，并在加班时领取双倍的工资。同时，工人还明确要求重组工会、严惩之前殴打员工的保安人员，并敦促资方保证组织罢工行动的员工不会遭到报复。6 月 17 日，地处湖北武汉的艾帕克汽车配件公司 200 多名工人罢工。该公司是东方本田的供应商，为其生产车身骨架板金零部件。工人提出了增加工资等一系列经济要求，并比照南海本田，提出加薪整体幅度不低于 800 元。同样是 6 月 17 日，天津的丰田合成公司爆发罢工，汽车行业的罢工风潮突破本田系统，开始全面波及。罢工历时 3 天，最终公司许诺增加每月 200 元人民币的"全勤奖"。6 月 21 日，广州市南沙区的电装（广州南沙）有限公司爆发千人大罢工，要求厂方提高工资并改善福利待遇。该公司产品为汽车动力传动系统，在华主要客户除了丰田外，还包括其他 15 家整车厂。罢工工人极其夸张地提出了 200 多条要求，核心就是加工资。经过 4 天的罢工，所有员工每人增加工资 800 元。7 月 12 日，佛山罢工再起，本田子公司阿兹米特汽车配件公司近 200 名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500 元。7 月 21 日，广州市欧姆龙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在每月 1270 元人民币的基础上加薪 40%。

与此同时，广东其他行业的工人罢工也此起彼伏，6 月 7 日，广东惠州仲恺开发区的亚成电子厂 2000 多名工人罢工。

次日，广东珠海伟创力集团（美资）500 工人罢工。6 月 22 日，广州日正弹簧有限公司工人罢工。一系列的罢工之后，广东政府坐不住了，7 月底，“搁置两年之久的《广东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草案修改稿)》再次摆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的案头接受审议。”[1]该《条例(草案)》中的相关规定，两成以上职工集体提出工资协商要求就可以启动集体协商程序。政府开始尝试将工人的抗争纳入到有序的轨道中。

(二) 大连工业园区连锁罢工

大连开发区建于 1984 年，到 2010 年之前，曾经爆发过两次工潮。第一次是在 1994 年，近 6000 名工人因工资问题罢工。第二次是在 2005 年，18 家外商企业的工人再次因为工资问题罢工，最后以工资平均上调 100 元宣告结束。

从 2005 年到 2009 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开发区工人工资增长却非常慢，平均每年增长 45 元左右。到 2010 年罢工前，很多员工的工资甚至还不到 1000 元。2010 年的 5 月底，开发区开始发生罢工，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其后罢工缓慢地增加，大概是 7 月初，零星的罢工汇集成为一股潮流。由于开发区集中了大量日企，因此罢工波及的主要是日企。

7 月下旬，一广毛巾、东芝、YKK、通世泰、利优比、原田、三井森、浮法玻璃、山武仪表、莫来克斯、富士塑料、三越，福雷斯、早川、高千穗等数十家企业均发生罢工。工人明确提出增加工资，预期增幅大致为 800 元。但大部分企业的加薪方案与之相距甚远，平均仅为 150 左右，根本无法满足工人的需求。“我们卖着命为日企工作为日本的经济做出巨大的贡献而我们得到了什么？只有满是老茧的双手，而我们得到的就是那不到一千块钱的工资，更别说养家了，自己都得小心地花！”整个罢工潮，大致持续了三个月，波及企业

1 莫非，吴敏平. 广东制订企业民主管理条例 促构建和谐劳动关系[N]. 中国新闻网，2010-07-21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0/07-21/2416984.shtml.

70 多家，参加罢工的工人 7 万多人，最终以工人的胜利而结束。工人工资平均上涨 300 元，平均增幅为 34.5%，待遇较高的企业平均工资达到 1400 元/月。

第七节　　结语

除去上面提到的本田系统罢工和大连开发区罢工之外，2010 年下半年，深圳、珠海、上海、重庆、成都、南昌等数十地都爆发不同规模的罢工。2010 年的罢工，是对金融危机期间资方各种恶劣措施的反弹，是对资本长期压榨的反抗。它是工人对自身经济处境反思的结果，也是工人集体力量崛起的起点。它使 2009 年底以来席卷全国的涨薪潮继续升温，同时也为后来工人更大规模的反抗打下了基础。

本田罢工及之后的系列罢工之所以能够获胜，一是源于工人的团结和正确的斗争策略，另一方面当时的外部条件有利于工人的斗争。经济高涨使工人有斗争胜利的基础；本田汽车的零库存管理为连锁罢工造成了条件；主流媒体罕见的公开报道（外资或合资企业的特殊性，内资企业很少报道）、民族情绪的激化等等，都造成了工人斗争有利条件。

2013 年开始，一方面是经济下滑导致企业利润摊薄、扩大再生产减缓，另一方面媒体管控更加严厉，先前的有利条件丧失之后，工人的行动也陷入了一定的困境。2010-2012 年间建立起来的工会出现分化，一部分被资本家打压后收编（广州汽配行业），一部分成了中高层管理人员手中每年加薪的工具，还有一小部分举步维艰地坚持。

现实的矛盾告诉我们，如果仅仅依赖一个厂或一个行业的自发工人运动，工人获得的成果往往是不巩固的。工人要想保住自己获得的利益，必须要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斗争，即进行立法层面、政治层面的斗争，并最终在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布尔什维克政党——带领下，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

沿海工厂工人斗争近况介绍——以兴隆厂为例

随着城市地租、生活费用的上升，加上关税贸易战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沿海企业为了获取更多利润而搬迁。依据劳动合同法，搬迁属于工厂“生产经营发生重大变动”，依法应对不愿意跟随搬迁的工人支付经济补偿金。对此，企业往往采用限制加班、削减福利、调岗等手段变相迫使工人“自离”，从而规避法律、降低成本。限制加班会降低工人工资进而不能维持原本生活；搬厂本身也会影响工人生活，不愿搬迁的工人会短暂失业。失业对年轻工人影响不大，他们能较快找到工作；但是年龄较大的工人，一旦失业就很难找到同等条件工作，甚至找不到工作。围绕搬迁赔偿而展开的斗争，是当前阶段沿海新工人斗争的主要内容。

资本家的进攻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未来厂房的选择、更改续签的劳动合同、减员计划等等，依据企业规模常常在一年甚至更早之前就已经谋划好。而普通工人对于企业的计划，往往一无所知，只能通过加班减少、福利削减等切身感触猜测企业的经营变化。因此，当工人知道企业要搬迁愤而抗争时，往往已经处于不利地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也不是完全被动的，积极创造条件，也能够获得一定的胜利。

本文将以兴隆厂为例，介绍沿海新工人抗争的基本情况和斗争经验。

第一节　兴隆厂情况介绍

兴隆公司是一家港资企业，以生产加工电子配件为主，为某外资品牌代工。1996 年在沿海某地建厂投产，辉煌时拥有员工 4000 余人。2017 年初，员工下降到 500 余人。该厂工龄在 5 年以上的老员工约占 50%，平均工龄约 6 年。

企业于 2016 年在南亚某国建设总厂并投入生产，陆续将订单转移至该国工厂生产。大陆工厂订单减少，导致工资

下滑、福利削减、不再包吃住。普通员工底薪均为 2000，由于加班减少，月收入大约在 2400 左右。很多员工嫌赚的钱不够养家，纷纷辞职。工厂在员工离职后也不再补充正式工，新招人员均为临时工。企业管理层在内部会议上威胁班组长，如果员工罢工，将立刻关厂。2017 年下半年起，企业开始停止加班，将订单外派至临近的数家工厂，并通过调岗、罚款等方式，变相逼迫员工离职。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企业搬迁须支付经济补偿金，该厂员工应得补偿总金额约为 1000 万元。而企业的厂房是租来的，机器大多不值几钱，最值钱的是生产的货品。

第二节　兴隆厂工人斗争过程

第一阶段。一线员工罢工，逐级上访。在上月工资到手的第二天，有工人在厂区张贴、发放传单，号召大家于三日之后在厂内集结维权，传单上留下了工人代表的姓名、部门和联系方式。三天后一早打卡时间前后，200 余名一线员工应约聚集在厂内，观望一个小时后，见企业无人回应，便分拨前往镇劳动办。区镇村三级劳动办和工会工作人员介入。企业方派两名经理级管理者参加，态度傲慢，出言辱骂工人代表。现场 11 名自发带头的工人代表写下的控诉包括：1.强迫员工免费加班。2.随意罚款。3.五险一金没买。4.随意调动工作岗位。5.到退休年龄辞退没有任何赔偿。6.发工资推迟，没按劳动法。7.生产线上料不够或者坏料，要员工出钱买。8.厂方过年任何事情不能请假，如国家法定假日，都不可以。

同时，百余名工人聚集在劳动办门外，有一名工人被警察带走，引发工人骚动。晚间，多名参与谈判的工人代表被派出所约谈、恐吓。第二天，工人代表组织数十名工人到区劳动部门上访，坚持之前诉求。镇劳动部门成立兴隆厂罢工

事件工作组，进驻企业摸底工人诉求。

第二阶段。班组长参加，斗争升级。罢工第二天，兴隆厂班组长代表到镇工会申请法律援助，提出七点控诉及诉求：1.五险一金没买。2.年假调休不经本人同意，强行调休。3.工资延时发放。4.陪产假没有补贴，高温补贴没有。5.随意罚款。6.订单外发。7.买断工龄。相比较于一线员工，班组长提出的诉求更具有法律依据，并明确提出了买断工龄的要求。之后，工人代表组织了五个工人小组在厂门口轮班，预防企业拉料出货，同时动员工人捐款购买帐篷等物资，三天内共捐款 4200 余元，购买帐篷 15 顶。企业派出安保公司黑皮到各生产车间把门，与罢工工人对峙。

第三阶段。代表身体力行，维护不同群体工人利益。兴隆厂临近退休的工人有二十余名，一直传闻退休可以得到工厂的补偿。罢工期间，一名已经回外地老家的退休工人被工人代表说服返回工厂，工人代表亲自陪同该工友去社保局申诉。尽管得知企业的"补偿"是针对没有缴纳养老保险的工人，这名工友仍在代表的陪同下成功取到了近万元退保金，以及企业发放的返乡路费一千元。

第四阶段。坚持轮值，逼出高层，大局初定。在工人代表的组织下，兴隆厂工人坚持了整整一个星期的停工，在假期结束后，参与罢工的人数增加到 350 人，终于将港籍老板逼回大陆。在管理层面前，该老板仍不承认搬迁，并拒绝工人买断工龄的要求。在镇劳动部门的主持下，企业管理层与员工代表及数十名员工在工厂会议室继续谈判，企业当场拿出工人代表签字"自愿放弃"购买养老保险的声明，谈判陷入僵局。之后，作为对工人罢工的回应，企业方在劳动部门的压力下，做出改善管理、补缴社保公积金、并按照 60%的标准向准备离职的工人支付补偿。

第五阶段。最后一搏，拿钱复工。在企业宣传最终方案的同时，部分工人代表坚持到市信访办上访，要求按照 100%

支付离职补偿。第二天，企业在镇综治维稳部门的协助下复工，阻止出货的个别工人与执法人员发生肢体碰撞并被带走。

第三节　工人维权斗争情况分析

从整体来看，兴隆厂工人代表斗争意志坚定、组织动员能力较强、并能够较好地掌握斗争策略，虽然法律知识不是非常精通，但凭借兴隆厂大部分工人的努力，仍然取得了积极的维权成果。在本案例中，有如下经验：

1.有坚强的组织核心。兴隆厂的工人代表主要有两类工人，一线普通工人和班组长，他们都是厂里的老员工，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普工代表针对工厂的各种管理问题和违法现象提出普工的普遍诉求，基层管理人员则依据内部渠道获得的关厂信息提出了买断工龄的明确要求。

2.工人代表和群众密切联系。无论是企业约谈中高层管理，还是基层管理及工人代表，广大工人群众始终在谈判现场之外积极表达诉求、给予支持。工人代表还注意通过帮退休老员工维权，向广大工人宣传证明斗争的积极意义，鼓励大家维护自身权益。

3.有坚定的斗争信念。兴隆厂的普工代表，对于工人受到剥削压迫的事实和种种社会现实，有着明确的阶级观念，在斗争过程中，会使用相关的概念鼓舞自己和其他工人。同时，工人代表也非常关心广大工人的反应态度，不断鼓舞士气。

4.注意斗争策略。由于企业所担负的全厂工人赔偿金数额巨大，一次性支付会对该厂资金周转造成影响，且工厂仍有订单，搬迁的预计时间为第二年年尾，工人代表能够接受企业的退让方案，及时停手，既最大程度地保证了胜利果实，也为暂时不愿离职的工友留下一个好的环境。

同时，兴隆厂的案例也表现出工人自发斗争中，值得注

意的几个问题：

1.不同工人群体的利益分化与团结问题。首先是普工群体中不同类型群众的诉求。其次是普工和班组长之间的矛盾，再次是和企业工会干部的关系。兴隆厂参与斗争的普工中，有一部分被企业拖欠了加班费，加班费拖欠是企业违法的有力证据，但是这条诉求后来完全被抛弃了。而这紧跟着就涉及普工和基层班组长之间的关系，从团结斗争的角度看，“免费加班”的证据恰恰掌握在班组长手中，但普工代表多数对班组长采取拒斥态度（在现实中，直接强迫普工“自愿”加班的是基层管理者，但他们执行的本是企业的要求，“换谁做都一样”，阶级矛盾以工人内部矛盾的形式折射出来），故在斗争前期互不联系、各自为战，到中后期也只是从罢工的角度自发走到一起，没有形成有效的信息沟通和协同作战。第三是未主动团结企业工会的力量，在罢工发生之前，兴隆厂工会是空壳工会，管理层挂职，平时没有任何活动，但在此次事件中，该厂工会也被要求执行收集工人意见，对于企业重新签署的一些劳动合同，工会委员能站在客观事实的角度陈述，反驳企业的说法，同时一些内部信息也是通过部分管理层传播到工人中间。从整体上看，兴隆厂的普工相对工龄短，工资基数低，又缺乏信息渠道，凭借人数优势坚持斗争；班组长则清楚地知道企业不买社保公积金属于违法，从而提出买断工龄补偿的要求，较好整合了广大工人的斗争诉求；工会委员很多是中下层管理者，了解厂方情况，是需要团结的重要力量。无产阶级在斗争中，需要有人组织起来充当核心，提出工人的诉求，整合工人的力量，充分掌握和交流信息，团结基层管理人员，推动斗争不断发展，但在当前工人的自发斗争中，往往表现出各自为战的问题。

2. 斗争水平有待提高。罢工斗争中，兴隆厂的普工代表表现出对法律的轻视和不成熟的斗争水平，不重视自身提出的各项诉求能得到法律何种程度的支持，除了前面所述的加

班费问题，这一点还导致后期斗争情势的逆转：企业方在摸底完成后，“态度大方”地邀请工人代表和数十名工人当面协商，尽管工人们陈情、哭诉、列举企业种种违法或不公正的现象，并以企业没有缴纳养老保险为由、要求解除劳动合同，获得经济补偿。谈判氛围一度一边倒，但是企业突然祭出大杀器，亮出在场工人代表入职时签署自愿放弃养老保险的签字声明，工人代表完全不知所措。事实上，这些声明丝毫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大局已定，工人代表只能拂袖而去，谈判竟草草结束。兴隆厂普工代表有非常清晰的阶级意识和坚定的斗争意志，但是在和资本家展开斗争时，没有妥善处理好斗争策略的问题，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第四节　启示

目前，企业越来越倾向于采用在本地注册或租赁场地的方式，规避工厂搬迁所带来的经济补偿金成本。同时，工人针对企业的做法，也采取通知补缴社保、看守机器产品原料等方式维护自身权益。“大斗大收获，小斗小收获，不斗没收获”的真理未变。但整体上，沿海的新工人仍处在消极防御的状态中。在面对资本家逐步进攻和分化工人队伍的时候，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应当提高自觉性，积极关心资本运动趋势的变化方向，认真学习斗争经验，熟练掌握法律工具，探索不同斗争方式，把理念转化为实践，为日渐严峻的阶级斗争局面的到来做好准备。

新经济平台从业工人的状况和集体行动趋势

自 2012 年以来，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之下，传统的工业企业遭遇了在去产能的政策导向下破产、倒闭的命运，而依托互联网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被寄予了厚望。在政策加持、资本疯狂追捧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一时风头无两，成了资本竞相追逐的对象，上百亿市值规模的独角兽企业在行业中屡见不鲜。

新经济产业的光环后往往是高估值的泡沫，互联网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没有其吹嘘的巨大需求市场，风险投资追逐的科技股也与企业的实际盈利水平相去甚远。然而，虽然过剩永远是资本市场的顽疾[1]，但一些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业态公司的出现确实对无产阶级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带来了大量的第三产业[2]就业，二是用工方式的灵活化加重了对劳动者的剥削。

第一节　第三产业劳动者的数量和来源

从就业结构看，1994 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达到 23.0%，超过第二产业；2011 年，比重上升至 35.7%，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特别是从 2013 年开始，第一、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均呈负增

1 以前两年炙手可热的共享单车为例，截至 2018 年，累计投入上百亿资金的共享单车企业无一盈利，无利可图的资本一旦撤离，留下的就是一地鸡毛，曾经风光无限的企业或卖身或破产，又一个泡沫破裂了。

2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第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农、林、牧、渔业中的农、林、牧、渔服务业，采矿业中的开采辅助活动，制造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长态势，新增就业人员基本为第三产业所吸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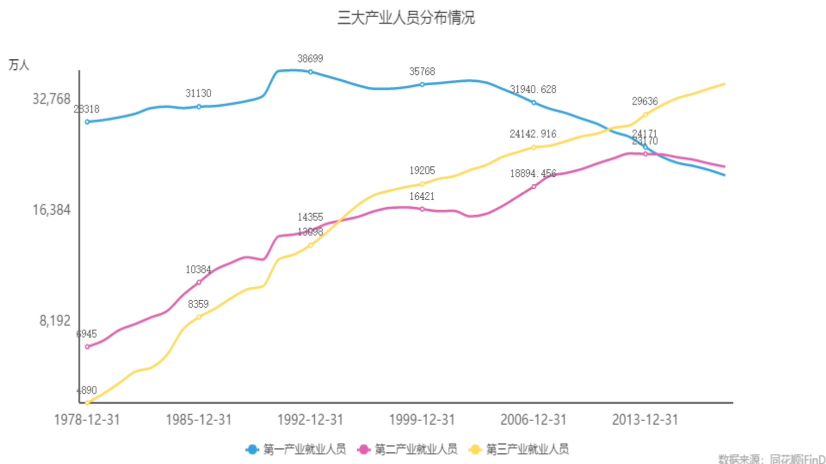


图 3. 1：三大产业人员分布情况

新经济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也创造了以兼职服务为主的劳动模式。根据国家信息中心 2019 年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9）》，"2018 年我国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数约 7.6 亿人，其中服务提供者人数约 7500 万。在这一庞大的服务提供者群体中，绝大多数都是兼职人员。但随着市场的发展，部分领域的服务提供者出现了专职化趋势，一批基于共享平台的专职司机、房东、骑手、主播等开始大量涌现……截至 2018 年，平台企业的员工数从 2017 年的 556 万增长到 2018 年的 598 万[1]，同比增长约 7.5%。"

新经济下，出现了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主要是以即时配送、快递业为代表的运输行业。美团 2018 年发布的

1 共享经济从业人员分成两部分：一是平台员工，多为技术员、网站设计、运营等工作人员，这些人基本都是平台的正式员工；二是接单人员，如滴滴司机、外卖骑手、家政阿姨等，这些人大多数在法律上不是平台的员工，与平台没有签署劳动合同。按《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9）》数据，平台员工 598 万，跑单人员合计约 7000 万。

《城市新青年：2018 外卖骑手就业报告》显示，2018 年有超过 270 万骑手在美团外卖获得收入。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旗下饿了么蜂鸟配送发布的《2018 外卖骑手群体洞察报告》显示，蜂鸟配送目前已在全国范围内拥有超 300 万注册骑手。根据 2016 年发布的《全国社会化电商物流从业人员研究报告》，全国社会化电商从业人员总数为 203.3 万人，其中一线人员 163.6 万人（主要包括站点快递员、站点仓库操作人员、基层管理人员）；二线人员 33.8 万人（主要包括仓库分拣人员、客服人员，货运司机）；三线总部职能人员 5.9 万人。

从户籍看，新经济中的劳动力多是来自农村。在电商物流从业人员中农村员工数是城镇员工数的 3.27 倍，近 8 成是农村人口[1]；美团骑手中，77%的骑手来自农村[2]。从上一份职业看，新经济中的劳动力一部分是在去产能中失业的产业工人，一部分是原本在城市务工的从事各种行业的外来务工人员，还有一部分是从事商业或工业的破产小业主[3]。截至 2017 年 11 月，美团配送骑手中有 15.6 万人曾经为传统产业工人，占比 31%[4]。

第二节　新经济下第三产业劳动者的基本处境

新经济下的第三产业工人用工开始呈现出了兼职化的特点，这些行业中的劳动者并未与任何一家固定的企业建立劳动关系，往往作为众包[5]或自由职业者在平台上工作，但实

1 《全国社会化电商物流从业人员研究报告》，北京交通大学&阿里研究院&菜鸟网络。

2 《城市新青年 2018 外卖骑手就业报告》，美团研究院。

3 根据调查，北京地区的部分网约车司机和货拉拉等货运司机主要是在 2018 年的北京“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中破产的个体营业者和小业主，他们自身受到电商的冲击也很大。

4 《2018 中国及时配送行业发展报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美团点评。

5 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

际工作状态与正式员工别无二致，甚至劳动状况要更加恶劣。这样的用工方式最初出现在美国。08 年金融危机后，以“共享经济”为名的经济模式开始出现，通过互联网平台将司机、保洁、保安等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和无数的任务需求联系起来，面临失业风险和经济压力的第三产业劳动者不得不在平台上寻找机会，在平台上工作随即成为美国普遍的就业状态。但是这些号称劳动者可以“做自己的老板”，自己为自己工作的互联网平台不过是将劳动者拖回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的十九世纪。许多大公司，如沃尔玛、谷歌等将自己的业务外包给平台，这样就可以大量地裁减正式员工，降低人力成本。而为这些大公司工作的平台劳动者不属于任何一家公司，奔波在数份低收入工作中，根本掌控不了自己的生活和时间，还面临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工作风险，一位美国的优步司机就戏称共享经济为共享面包屑经济。

在剥削劳动者这件事上，资本总是不分国界的，中国资本很快也学会了共享经济的这些技巧。金融危机后，在扩大内需的政策引导下，瞄准国内消费市场的平台经济发展起来，以滴滴、美团众包、蜂鸟众包为代表的平台企业，充分吸收了共享经济的精髓理念，以众包之名将数以百万的外卖员、配送员等劳动者置于劳动法律保护之外，肆意压榨。我们接下来就以新经济中的即时配送行业为例，来剖析当代共享经济的劳动者的真实处境。

(一) 配送行业从业人员基本情况

大部分的美团骑手都是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报告显示，75%的骑手来自农村地区，大多来自河南、安徽、四川、江苏、广东等省份，河南单省贡献比例超过 10%[1]。

美团骑手多是 20-30 岁的男青年。80、90 后为骑手群体

特定的（而且通常是大型的）大众志愿者的做法。

1 《新时代新青年：2018 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

的中坚力量，占比高达 82%，男性占比 92%。

多数美团骑手的教育水平都在初中以上。其中，34%的骑手是初中水平，21%的骑手是高中学历水平，29%的骑手是职高/中专/技校水平。

美团骑手们承担着养家糊口的压力，他们中 62%已婚，已婚人群中 87%都有一个以上的小孩，有很大的家庭压力。大部分美团骑手的工资收入主要用于包括吃饭、生活必需品、房租、手机话费、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电动车充电及维修等家庭日常花费。其中，吃饭、购买生活必需品、房租是最主要的花费。

(二) 复杂的劳动关系

根据《2018 中国即时配送行业发展报告》，配送平台目前组织运力的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自营，就是平台自己雇佣配送员进行配送；第二种是加盟，就是平台和物流公司合作，将特定区域的配送业务承包给特定的物流公司；第三种是众包，“指的是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而且通常是大型的）大众志愿者的做法。”

这三种运营模式对应着三种不同的用工模式。以外卖为例，自营模式下，送餐员与平台签订劳动合同，美团外卖创始之初就以合法的劳动合同和齐全的劳动保障做宣传噱头，与其他外卖平台争抢劳动力做骑手。加盟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分包模式，外卖平台会将自己特定区域的业务承包给某个物流公司或者个人，由其来运营特定区域业务，承包商大多通过劳务派遣、劳务外包等形式规避劳动法律，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劳动关系网络，而平台则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大大削减运营和用工成本。最后一种众包模式更为让人瞠目结舌，送餐员被认为和服务平台之间仅存在合作关系，平台不对送餐员承担任何劳动法上的责任，也不再预付劳动者工资。

在众包模式下，一方面，平台不再为劳动者购买社保，也不再为劳动者的工伤负责，平台更是不再苦恼于开除劳动者需要支付的赔偿，因此，相比传统行业的资本家，共享经济的资本家能够在付出更小成本的同时更自由地剥削劳动者；另一方面，由于节省了花在劳动者身上的预付资本[1]（即工资），同样数量的资本可以剥削更多的劳动力。因此，从2015 年以来，各大服务平台纷纷上线众包服务。当初那个以齐全的劳动保障为宣传噱头的美团，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由自营转型到加盟再转型到众包，最终成为行业巨头。

自营模式下与平台直接签订合同的送餐员很少，多数送餐员都是在承包商和众包模式下建立的用工关系。加盟模式下，企业多采用劳务派遣的用工模式。北京的一位送餐员说，在他 6 年的送餐经历里，一共签过七次合同。而多数的承包商是不和劳动者签订合同的，例如蜂鸟配送的一位站长就告诉配送员，签了合同会有五险一金，但是送一单只能按 5 元计价，如果不签，一单就按 7 元计价，这种算法下一月几千元的收入差距，对外卖骑手是巨大的诱惑，所以很多骑手“自愿地”放弃签订合同。

众包模式在各大平台的劳动者中越来越常见了。众包模式来自美国，是一种社会协作生产的模式，是生产社会化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在资本的牟利逻辑下，众包变成了一种对劳动者进行最无耻、最残酷的剥削方式。相较于建立劳动关系的专送外卖员，众包外卖员没有最低接单量的限制，可以随时加入，随时退出。但是除了前述的自由与灵活，这些众包骑手们从事的工作与专送骑手别无二致，都以外卖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他们没有假期，没有休息，有些人为了赚钱养家，一天甚至要工作 12 个小时以上，他们也同样承受着

1 预付资本是资本家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了生产剩余价值而预先垫付的资本。资本家把资本预付出去时，是为了要重新得到它，并且，还要带来比原预付资本更多的货币额，即剩余价值。

平台严苛的时间控制和近乎抢劫似的罚款制度。但是在已有的司法实践中，官方态度暧昧，多数判决都不认为平台和网约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许多法官为了规避此难题，都以调解结案，避免犯错。这就是当前众包用工的本质：以自由和合作之名，抛弃自己原本的法律义务，更赤裸地建立自己对劳动者的统治和剥削。而当前政府对此的态度则是回避问题、偏向资方。

(三) 逐渐降低的单价和收入

在外卖行业刚刚兴起的时候，为了抢占市场和招募外卖员，外卖员从平台获得的收入还算丰厚。在北上广深这些餐饮消费发达的一些城市，外卖送餐员月入过万似乎不是神话。但是随着行业内企业的合并，垄断市场的美团和饿了么翻云覆雨，一面对商家下手，挤占利润；一面又对送餐员开刀，不断削减配送费。首先，多数外卖员的工资计算由“基础工资+计件提成”的模式改为计件工资模式，以高工资、高福利为噱头的美团外卖骑手现在也以计件工资为主。2018 年北京美团外卖的每单配送费已经下调到 4 元，其他二三线城市的配送费也有下调。对于他们来说，除非更加拼命地送单，否则多数外卖送餐员的收入就要减半。根据 2018 年的报告，约有 72%的骑手的工资在 5000 元以下。快递行业亦如是，随着竞争的加剧，快递配送的单价不断降低，2007 年，中国快递包裹的平均单价是 22.4 元，十二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是 8.4 元，仅仅是之前的三分之一，如果算上通货膨胀，还要再低一半[1]。而四通一达的一线快递员的计件工资是 0.8 元-1 元/件，多数的快递和外卖员一个月收入在 5000-6000 元之间。

多数外卖骑手、快递员的工资收入主要用于包括吃饭、

1 《中国快递大逃杀：比双十一更可怕的，是你不知道的桐庐帮江湖》。https://mp.weixin.qq.com/s/7JE-LagVFcTo86gNZxZQhQ.

生活必需品、房租、手机话费、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电动车充电及维修等家庭日常花费上。他们多数都表示未来不会在一线城市定居，年轻的表示想趁着能干在大城市赚些钱，回家买房娶妻生子，有家室的则表示要赚钱寄回家里。

(四) 以罚代管的严苛制度

罚款——这是快递、外卖、环卫等服务业中最常见的制度，罚款话题总能让他们打开话匣，滔滔不绝。

外卖平台复杂而严苛的管理设计也让人叹为观止。首先是成本转嫁，各个外卖平台都有自己的统一标识，保温箱、帽子、T 恤和外套，都要外卖员自己掏腰包。公司以交押金换装备为名，将外卖员与该公司捆绑，工作达到一定的时间（往往是一年）才可以退。一个 20 岁的送餐员说，因为公司提供的装备过于昂贵，自己最后在淘宝上定了装备。其次是严苛的罚款制度和高昂的罚款金额。罚款的情况至少包括：请假超过规定的休息日，暴雨天不出勤，客户投诉，差评过多，突袭检查中不穿制服、不戴帽子等。再次是严格的时间控制。用户从下单到接餐几十分钟的时间限制里，包括了餐馆接餐做饭和外卖员送餐的全部时间，所以留给外卖员的时间是很少的。专送的外卖员往往会收到同一方向的错落有致的几个派单，往往就差了几分钟，使得他们不得不每天都上演生死时速。一线城市所有的外卖员都认为，不违反交通规则就不可能按公司的规定时间送完外卖（送不完就要扣钱罚款）；最后是频发的工伤事故无任何保障，交通事故和意外伤害是每日疾驰在城市大街小巷的送餐员经常要面临的危险，许多死亡和流血事件见诸报端。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无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以及其他社会保险，而一些公司缴纳的商业意外险赔偿率又过低。

根据 2018 年的一项调研结果，超过 75%的快递员表示他们所在快递公司有罚款规定，前三个月平均每月被罚金额

高达 566 元，相当于受访快递员平均月工资的 8%。罚款情形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收到差评或者投诉；二、所分配的快件没有被及时签收。对于第一种情况，一次罚款数额从 10 元到 600 元不等，平均为 162 元左右。而对于第二种情况，一单被罚数额从 20 元到 1000 元不等，平均为 200 元。

在即时配送行业，众包的用工模式现在已经相当普遍，以闪送、UU 跑腿等为代表的即时配送、同城速递等行业都采用了众包的用工方式。在快递业务中，以个人承包、劳务外包等方式来规避劳动法律的情况十分常见。众包模式否定了劳动关系，因此也就否定了诸如工伤保险、劳动保护等一系列劳动保障责任。配送行业中，交通事故已经成了杀伤劳动者的头号凶手。但是他们得不到来自社会保险的任何赔偿，而骑手的商业保险赔偿额度低，手续复杂，起不到任何保障的作用。

快递行业的状况也不容乐观。以中通快递为例，中通公司仅作为快递物流中心，负责货物的调配和中转，而送货上门的业务则全部外包给其加盟商。中通公司在北京及周边地区的配送业务全部承包给了一百多家加盟商，加盟商或者直接招募快递员，或者将某个网点再次分包，承包给个体的快递员[1]。加盟商的运力组织和规模不同，快递站点也有大小之分，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快递员的劳动关系也较复杂，存在分包的现象，大多数都也没有五险一金等社会保障，快件单价也越来越低。

从表面上看，新经济下的第三产业劳动者与传统的工业工人相比，在工作形态上有很大的变化，例如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在形式上可以选择工作任务、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等。但是，工作形态在形式上的自由化，并不能改变雇佣劳动的本质。实际上，由于罚款等制度设计，这些劳动者的劳

1 根据 2019 年对中通某加盟商的管理人员访谈整理。

动过程反而受到平台公司更加精确的控制。然而，资本家却以这种形式上的自由化为借口，公然地否认劳动关系，逃避法律责任，更加残酷地压榨劳动者。

第三节　第三产业工人的集体行动特点和趋势

通过上面的分析，当下以外卖送餐为代表的即时配送行业的工人的处境十分艰难，收入不高，工作危险。而经过行业整合，几家大型的平台垄断整个行业，如美团和蜂鸟配送，以合作、承包的名义任意摆布这些劳动者而不必顾及法律的威胁，政府方面目前采取了默认的态度，新经济的劳动者得不到基本的法律保护。这些都使得他们的劳资矛盾以更加尖锐地方式表现出来。

(一) 个案透视——重庆外卖员罢工

据不完全统计，自 2016 年以来，北京、深圳、上海、咸阳、成都、重庆德清、临沂等地都有外卖送餐员的集体罢工事件，地点从内地到沿海，主要分布在人口密集的一线和二线城市。2018 年以来更是愈演愈烈，多地发生了几十起外卖送餐员罢工。本部分就重庆外卖工人罢工为例，研究这些群体集体行动的主要特点、优势和劣势所在。

1) 主要矛盾

2018 年 5 月 16 日，在重庆南坪，一百多位美团众包的骑手停车罢送，罢工持续了两天。这次罢工的主要导火索是美团众包 5 月 10 日开始的强制派单。美团众包的工作一直以“时间灵活，自由接单”为特点，但是 5 月 10 日新版本上线后，接单自由被取消了，也就是系统会强制派单。对于一些价格低、路线不熟、太过遥远的单子，骑手已经没有拒绝的权利，因为如果骑手当天拒绝三次，系统的派单数量将大大减少，基本就接不到单了。

除了强制派单，这次罢工的矛盾还集中在几个方面：

首先是基础单价越来越低。最低的单已经降到 3.6 元，在现有的单价下，骑手的收入甚至满足不了基本的生活需要。一位骑手如是说："现在有的单价已经低得让你没办法接。比如现在 3 公里的订单，一般 6 块，少的时候 4 块多。但美团显示的 3 公里，一般来回你要跑 7、8 公里。我骑踏板摩托车，油耗是每公里 2 毛 3，光油费就要去掉近 2 块，每单剩 3 块多钱。每天尽力可以跑三四十单，一百来块钱的收入，还要去掉电话费、车辆维修磨损、吃饭喝水，还有可能遭遇罚款、事故。我 30 岁，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这个收入能做什么？"

其次是保险问题。每天接第一单的时候，美团会强制扣掉 3 块钱，用于骑手当天的保险费。但骑手们认为，真正出了事故，索赔是个大问题——保险公司通常会拒赔，理由是：骑手没有行驶证、驾驶证。但是如果办理行驶证和驾驶证，对于骑手来说就是收入的降低，因为每个月的收入，至少一半要拿来交违章罚款。

再次是时间管控与交通事故。为了在竞争中保持优势，美团将每单派送时间从 40 分钟降到 36 分钟，骑手一旦超时就会罚款，这让骑手们不得不玩命疾奔，安全问题进一步凸显。骑手一般都是两三单同时送，一般从接单到商家手里接过餐盒，要花 20 分钟，送这两三单路上就只有 16 分钟，等红灯、找路、等电梯都要在这 16 分钟里完成，哪怕超一秒，一半的配送费就要被扣掉。为了赶时间，骑手们闯红灯、逆行几乎成为常态，导致交通事故高发。

最后是虚假距离。在一些外卖派单中，美团众包上面显示的距离比实际距离要短一些，为了使距离显得短一些，甚至规划了需要逆行的路线，强迫外卖员违反交通法规。这欺骗了骑手，增加了其负担的同时，也增加了其违规的风险，为许多骑手所不满。

2) 事件过程和结果

这次罢工持续了两天，参与人数有一百多人，属于外卖中较大规模的罢工行动。但是持续至 17 号之后就不了了之了。

这次行动的组织性较差。一位外卖骑手自发建了一个有 88 人的微信群，16 日下午 6 点拒绝美团南坪站站长进群之后，群主的美团账号就被永久禁封。随后，不少活跃分子的美团账号也相继被封禁。而重庆南坪的美团外卖服务也停摆了两天，引发消费者的质疑和询问。18 号之后，美团重新恢复了派送服务。

一方面，美团处理罢工事件经验老道。美团方面直接将参与群体罢工的积极分子的美团账号永久封禁。包括一位私自建群的群主。按照美团之前的罢工处理惯例[1]，会从周边站点迅速抽调人员，组建新的配送队伍继续工作，防止因停工造成的不良影响。

另一方面，骑手一方组织性不强、斗争性不强、经验不够等弱点十分突出。在被美团永久封禁之后，骑手们并没有更加紧密地组织起来，除了找媒体曝光之外，他们似乎也没有其他办法。达不到诉求就转行，找"一份稳定的，有五险一金的工作"，成了当下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

3) 总结

与传统的产业工人相比，如今的第三产业工人面临着糟糕的处境：工作不稳定、工时更长、而实际收入却更低、受到更严重的剥削。而所谓新型的用工模式更是加重了这一趋势，2018 年以来罢工的主体几乎都是所谓自由的骑手——众包骑手。这些都导致了劳资矛盾的尖锐化。而得不到法律承

1 根据对北京的美团外卖员访谈整理而得，据称 2018 年北京的几个站点也发生过美团外卖的罢工，只是规模很小，很快被平息，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认的他们无法通过现有的合法纠纷解决渠道解决自己的难题，只能诉诸于劳动者集体的力量。尖锐的劳资矛盾的发展是 2018 年以来外卖送餐员集体罢工频频见诸报端的主要原因。

但是由于工作时间自由、工作方式灵活、工作场所不固定，这些第三产业工人很难像工厂工人那样形成紧密的联系和强有力的组织。国内的外卖罢工多以平台的强势辞退和劳动者的妥协收场。事实上，在国外，外卖送餐员的罢工事件也屡屡上演。但是由于西方国家遗留的工会传统和组织工会的空间，第三产业劳动者的集体行动形成了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表现出了一定的组织性。例如希腊的外卖送餐行业工会在 2019 年 4 月 11 日举行罢工，工会要求餐饮业雇主正式承认外卖送餐是一个独立的工作部门，因此有权与雇主进行集体劳动协议谈判。此外，工会还要求雇主向送餐员工提供更好的社保条件，以及提供摩托车等交通工具和配备防护设备。在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足球比赛进入终极决赛周，消费订单达到高峰之际，巴黎各大外卖平台的自行车外卖送餐员则呼吁从 7 月 8 日晚上起罢工一周，他们借此呼吁提高自身报酬，并改善当前的工作条件。

对于中国即时配送员这一庞大的劳动力群体而言，剥削最为严重，劳资矛盾最为尖锐，但是从被迫的野猫罢工，到有组织的集体行动，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还有一段路要走。在共享经济从业的无产阶级，还需要在一次次的集体罢工冲突中接受教育，积累经验，形成阶级意识，扩大自身组织，为未来更大的斗争做好准备。

(二) 山雨欲来风满楼——第三产业工人集体行动趋势

1) 处境恶劣 矛盾尖锐

重回十九世纪，劳资矛盾的尖锐化。我们以即时配送行业为例分析了当代第三产业工人的艰难处境，以兼职化为特

征的用工方式让劳动者失去了法律的庇护，成为名义上的“承包商”、“个体合作者”，事实上的劳务奴隶。这一用工趋势不止出现在以外卖、闪送为代表的即时配送行业，依托于互联网的消费服务让传统的第三产业劳动者都面临这一艰难的处境[1]。这就是新业态公司增殖的秘密，以“自由之名”将第三产业的劳动者推回十九世纪，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会保险，大型公司可以更肆无忌惮地宰割他们。

白领血汗工厂——脑力劳动者的零工化。在平台新经济的发源地美国，面临着这种用工模式的除了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保安、保洁、售货员、理货员等低收入第三产业人员，一些过去被认为是非常体面的脑力劳动者如撰稿人、会计、程序员也逐渐开始面临这种用工模式，这在 08 年的金融危机之后越发明显起来。例如著名的科技巨头谷歌公司，谷歌在全球约有 12.1 万名临时工和承包商，而全职员工仅为 10.2 万人，程序员、语言学家等从事开发工作的脑力劳动者都是临时工或承包商，他们赚的钱更少，享受的福利待遇也与正式员工不同，在美国没有带薪休假，甚至还要无偿加班[2]。在未来愈演愈烈的劳资冲突中，这种公然否定劳动关系及相应的责任，以便更残酷地剥削劳动者、减少成本的方式，将会成为资方的首要选择，也会成为阶级矛盾的重要引爆点。

2) 集体行动呈上升趋势

根据中国劳工通讯对 2015-2017 年中国工人集体行动的观察，在建筑业和制造业的集体行动分别位居第一、第二的情况下，服务业（报告里主要是酒店服务人员等，概念较为狭窄）、交通业的集体行动呈现上涨趋势。

1 [美]史蒂文•希尔著，苏京春译《经济奇点——共享经济、创造性破坏和未来社会》。

2 [美]史蒂文•希尔著，苏京春译《经济奇点——共享经济、创造性破坏和未来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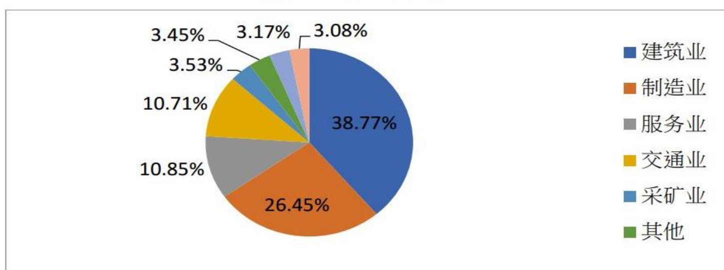


图 3. 2: 2015-2017 年工人集体行动的行业分布[1]

在传统制造业倒闭、撤资、搬迁，新兴行业的不规范用工以及新兴行业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工人的集体行动呈多发趋势。“从产业分布看，工人集体行动正在从以制造业为主扩散到新兴行业。据我们观察，制造业工人集体行动的比例在 2014 年之后呈显著下降趋势，到 2017 年仅占该年收录个案的 21.3%。反之，第三产业个案所占比例在报告期内呈逐渐上升趋势，到 2017 年已经达到了 20.7%。”[2]当然，尽管第三产业的工人集体行动呈上升趋势，但是制造业工人的集体行动仍然占据较高的比例，如何进行有力的组织是其集体

1 建筑业主要是指在房屋建筑业、建筑安装业、土木工程建筑业。制造业的工人集体行动，纺织、服饰、制鞋等行业占比最高，达 354 起（20%）；其次是电子制造业，有 261 起（14.75%）；在重工业如钢铁、铝业、化工业的工人集体行动也不少，合计个案 156 起（8.81%）；汽车、造船业则有 103 起（5.81%）。服务业的工人集体行动多发生在餐饮业，有 175 起个案（24.10%），发生在酒店业也有 103 起个案（14.19%）。交通业工人集体行动占比最高的是出租车司机，为 454 起（63.23%）公交车司机、快递员工及打车软件司机也是主要集体行动主体。零售业工人集体行动多发生在商场、百货公司，有 48 起个案（22.64%）；发生在超级市场有 41 起个案（19.34%）。采矿业的工人集体行动主要发生在煤矿，有 6220 起（93.62%）。教育业报告共录得 206 起教师集体行动个案，其中河北、河南、江苏、湖北、湖南发生的个案数量居于前 5 位。有 160 起个案发生在中小学，所占比例为 77.67%，另有幼儿园教师的行动 18 起（8.74%），乡村民办教师的行动 16 起（7.77%）。

2 中国劳工通讯，《中国工人运动观察报告（2015－2017）》

行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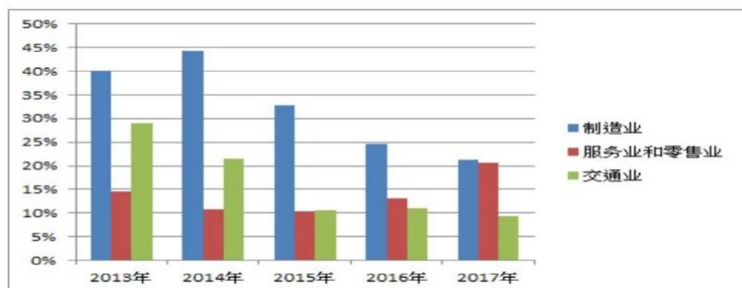


图 3. 3: 2013-2017 年集体行动中行业分布变化

在矛盾日益显化的地方，这些服务业的劳动者已经展现出了组织起来的巨大威力。美国的网约车市场被 Uber 和 Lyft 等巨头垄断后，网约车司机的薪酬待遇不断下降。司机们组成了网约车司机联盟（Ride Share Drivers United），在 Uber 和 Lyft 于 2019 年 3 月再次降薪时，司机们通过罢工来对抗平台，并在 5 月份 Uber 上市时再次组织罢工。国内各地方网约车司机罢工的消息也不绝于耳，但是很少听到比较强有力的组织。

2018 年惊雷乍起，外卖送餐员、网约车司机等行业的集体行动使得全年高潮迭起、此起彼伏。外卖送餐员、网约车司机等的罢工分布各地，接连多起。他们面临着相似的处境，首先是劳动关系不规范，存在大量的分包、众包等等，风险全部自己承担；其次是在高昂的生活成本和运输成本（购买车辆、油耗、维修等）下，实际收入遭到挤压，非常低下；再次是以罚代管的管理制度减少了工人收入，也让工人们最为不满；最后工作条件恶劣，劳动保障缺失，常常要忍受多发的交通事故、中暑、颈椎腰椎等疾病而没有任何的保障，加之经济下行，感到盈利压力的垄断企业，本能反应就是通过压榨工人以获得利润。尖锐的劳资矛盾不可避免地以集体

行动的方式表现出来。

3) 组织性不强——难以形成强有力的组织

尽管数量在上升，但是第三产业工人的集体行动仍然存在巨大的缺陷——很难形成强有力的组织、很少能出现持久的斗争。例如美团外卖送餐员的罢工通常持续不超过两天，至今仍未有类似于工会的组织出现。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方的有力应对，例如利用众包模式规避法律责任，组建新的配送员队伍来替代罢工团队，避免某个地区的配送业务因罢工而瘫痪。另一方面，这些工人相对自由的工作形态妨碍工人形成组织，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选择相对自由，使得这些劳动者缺乏交流、沟通的机会，难以形成紧密的联系。例如，2019 年 8 月，法国多地的送餐员罢工中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是，送餐员“平时很难见面，也没有固定交流地点，相互之间也处于竞争状态”，很难把大家组织起来。

综上所述，自 2008 年经济危机以来，在制造业生产过剩、利润下滑的情况下，资本依托日益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大量涌入消费领域，把市场化进行到底。人们生活服务的多个环节进行了产业化的发展，如外卖、同城速递、网约车等。这些行业创造了数量可观的就业岗位，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这一行业的劳动者也很年轻，以 80、90 后为主力。然而，在资本退潮之后，这些行业的最初红利也已经消失，劳动待遇逐渐降低，劳动管理日趋严苛，基本的法律保护缺失，劳动者们面临着来自资本的多重剥削，劳资矛盾在这一群体里更加尖锐。

在无产阶级的斗争还是自发斗争的情况下，限于这一群体的工作特点，劳动者之间的联系十分松散，在组织化和集体行动的道路上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然而，雇佣劳动制本身势必导致劳资冲突不断爆发。在当前条件下，在这种劳

资冲突中，“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在不久的将来，无产阶级的各个群体，都将爆发大大小小的斗争，并依据自己的特点，在不同的条件下组织起来。规模庞大的共享经济无产阶级，必然会将自己的斗争融入到整个无产阶级斗争的洪流中，和他们众多的阶级兄弟一起，挥舞着自己的铁拳，砸碎一切缠绕在他们身上的锁链。

新时代的新斗争：塔吊司机的全国罢工

2018 年劳动节前后，建筑工地塔吊司机在各地掀起抗争，这是 90 年代以来新工人首次全国性的行业罢工。

第一节　塔吊行业基本信息

塔吊是建筑工地上最常用的一种起重设备，又名“塔式起重机”，以一节一节的接长（简称“标准节”），用来吊钢筋、木楞、混凝土、钢管等施工原材料[1]。一个塔机的操作至少需要配备一名塔吊司机和一名指挥。2018 年，我国的塔机保有量约 45 万台[2]，以塔机设备利用率 100%计算，塔吊司机群约 45 万人，约占 2018 年中国建筑行业 5500 万从业人口的 1%[3]。

国内许多施工单位选择租赁的方式使用塔机，全国塔机保有量中超过一半在租赁使用[4]。中国的塔机租赁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兴起，至今已有 20 多年的历史，但行业集中度非常低，目前塔机租赁企业仍有 7000 多家，达到中型企业规模（营业额在 3000 万元以上）的不超过 20 家，竞争较为剧烈，租金年平均回笼率普遍在 40%~50%，在同地产开发商和大型建筑公司的博弈中属于被倾轧方。

早期的租赁公司在向塔机使用单位提供设备的同时，必须配备司机，签合同时的租价包含了司机工资。后期逐渐演进成了裸机出租模式，司机由租赁单位推荐，工资由使用单

1 百度百科：塔吊。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1%94%E5%90%8A%E6%8C%87%E6%8C%A5/22099868?fr=aladdin.

2 2018 年中国工程机械整机保有量、行业集中度及未来发展潜力分析。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801/606504.html.

3 粗糙估计，误差较大，仅保证数量级正确。

4 估测结果， 2014 年中国塔吊租赁行业发展特点、保有量、市场规模现状、行业 SWOT 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507/330054.html.

位发放。裸机出租模式下，有些地区甚至产生了“二包”的现象。二包就是个人包塔吊，“二包”在工地上负责对塔吊司机进行直接管理，并给塔吊司机发工资，是塔吊司机直接的老板[1]。裸机出租模式下，司机不属于任何一个部门或者是组织，没有所谓的社会保险，更不用说就业指导、技能培训、法定假日休息等一系列企业福利了，而且大多数“二包”不与司机签订劳动合同，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了塔吊司机极大的流动性。塔吊司机寻找工作大多通过老乡传帮带，或者通过司机群里租赁企业负责人发布的招工信息上门应聘工作[2]。塔吊司机的工资大多在 5000-6000 元/月，每天工作超过 10 个小时，经常大量加班，且加班费较少（15 元/小时或 20 元/小时）。塔吊行业发放工资的方式和建筑行业其它工种类似，司机每月拿到手的仅仅是生活费：一般在 2500 元至 3000 元之间；剩下来的钱大多在司机离职、过年回家或工程结束之后才会发放。除此之外，塔吊属于高危行业，一旦事故发生，死亡率极高，出了事故后，多数单位选择私了。行业的技术性和高危性决定了塔吊司机的工资水平高于一般建筑工。

1 塔吊工人行动背景，以及团结意识（上） | 投稿。https://www.shidaixianfeng.tk/archives/4867.

2从共享经济角度看塔吊行业用人制度改革。https://mp.weixin.qq.com/s/dQkYetnJ8D-dbmJBYQQZ_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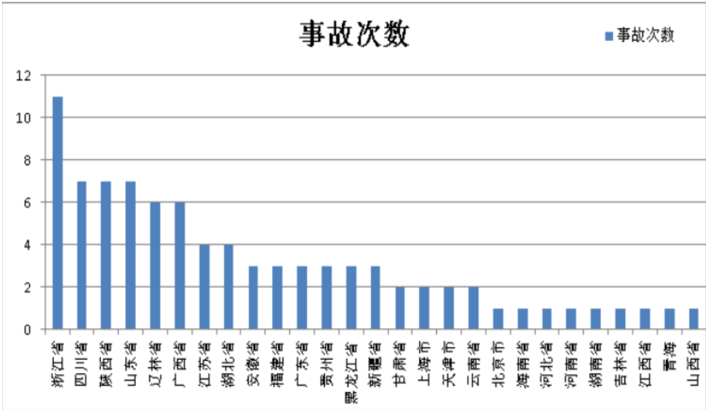


图 3. 4: 2014 年塔吊事故各省份分布

第二节　外部经济环境

塔吊租赁下游为建筑行业，应用领域包括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有房屋建筑工程、电力工程、市政公用工程、铁路市政公用工程、铁路等建筑施工行业。据统计，工程机械行业整体需求中房地产和基建占 40%和 35%[1]，而塔机不如其它机械设备能在采矿（如挖掘机）或制造业（如大型的机器设备）中广泛应用，因此塔吊行业对房地产和基建的依赖程度高于工程机械行业平均水平,随着房地产和基建固定投资的变化而变化。

2008 年西方国家爆发金融危机，中国也受到冲击，经济增速大幅下跌。2009 年，为了提振经济，中国政府出台了 4 万亿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大量工程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房地产和基建行业高歌猛进。在这两者的带动下，塔机制造行业急速扩张，塔吊租赁行业迅猛发展[2]。

---

1 2018 年工程机械行业发展现状及发展前景分析。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804/633823.html.

2 中国塔机租赁行业现状与发展趋势。https://www.sohu.com/a/193254808_99940875

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值 （亿元）及同比变化 （%）



图 3. 5：房地产投资增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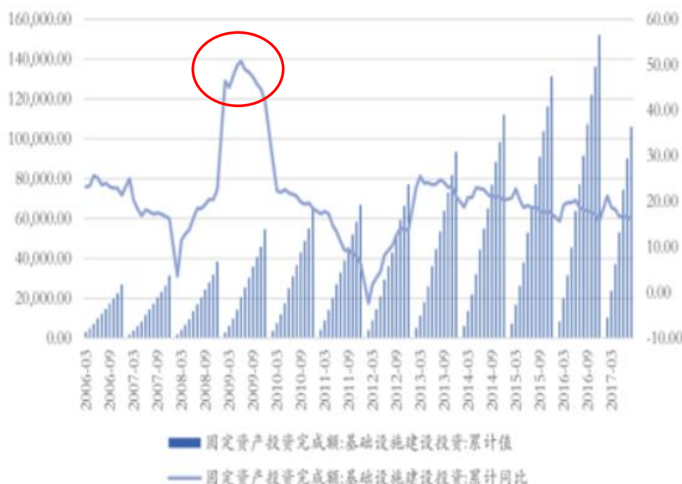


图 3. 6：基建投资增速

四万亿带动了经济高速增长，但也随后产生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生产过剩，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在 2011 年达

到顶峰之后开始走下坡路。2016 年推行供给侧改革后，官方主动压缩过剩产能，整个工程机械行业更是进入煎熬期。到了 2016 年末，我国起重机总销量只有 15957 台，比 2014 年下滑了 16.1%[1]。中国塔机的销售收入年增速也从近 15%降低到 5%以下。行业的寒冬期带来了塔吊司机收入的停滞不前，正如一位塔吊司机 2017 年年初所说："做塔吊司机 5 年了，工资基本没有涨过，中间还遭遇过没活干开不了工、每个月只能拿 3000 元基本工资的状况"[2]。2016 年，塔吊司机 QQ 群里讨论最多的话题便是"干还是不干"，"转行""工资低"等[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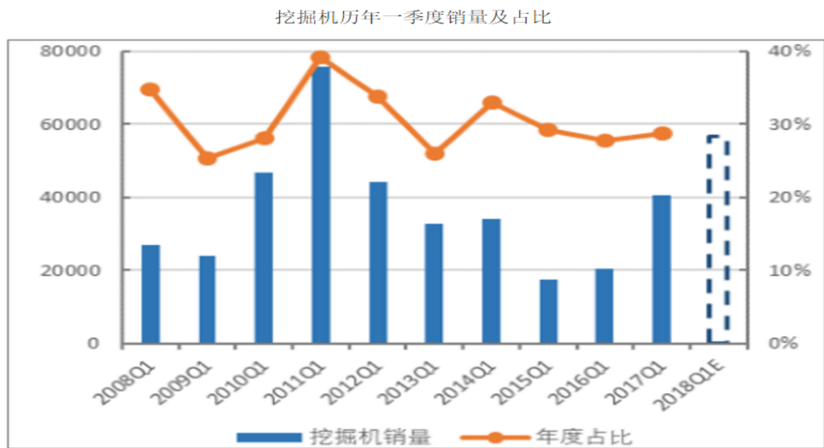


图 3. 7：挖掘机销量在 2011 年之后开始下滑

1 工资暴涨 133%，塔吊行业迎来春天意味着什么？http://news.ifeng.com/a/20180127k/55505965_0.shtml.

2 工资暴涨 133%，塔吊行业迎来春天意味着什么？http://news.ifeng.com/a/20180127/55505965_0.shtml.

3 贴吧塔吊司机回答。https://tieba.baidu.com/p/4682348293?pid=94306785200&cid=0&red_tag=1746395953#94306785200.

进入 2017 年，经历了主动去库存的阵痛之后，多个 PPP 大型项目落地，同时，上一轮固定资产更新换代的时间已经到来，几重因素的叠加使机械行业终于迎来了短暂的春天。2017 年 1-10 月，各项工程机械产品的合计销量增幅达到了 45.9%，行业内重点企业营收增长接近 20%，利润增长超过 600%[1]，相比上一年度，几家大的塔机制造商的销量平均增幅高达 25%-30%[2]。2018 年上半年，工程机械行业继续高速增长，前五月工程机械行业销量同比增长 35%[3]。塔吊租赁也异常火爆，明星租赁企业庞源股份 2018 年 1-2 月产值增长超 55%[4]。行业的短暂复苏终于导致了 2018 年上半年塔吊司机的大规模抗议。

第三节　全国塔吊工人罢工

(一) 工人自发斗争的一般特点

工人运动的历史表明，在自发斗争的情况下，经济繁荣时期，资本家扩大生产，劳动力供不应求，工人的斗争会增强，一般会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要求。而危机时期，由于被裁员后难以找到新的工作，工人自发的斗争则会大大减弱。危机之后的高涨，则是工人斗争由沉寂走向复苏的时期，2010 年由南海本田罢工引发的全国涨薪潮便是一个典型案例。2013 年 ASM 罢工时，企业已经从危机中恢复，利润大幅提高，但工人的工资待遇仍然延续危机期间“和企业同舟共济”的水平，终于引发了 5000 工人“加薪 3000”“2N+1”的抗

1 数说 2017：工程机械行业运行情况分析。https://www.sohu.com/a/214348697_234095.
2 工资暴涨 133%，塔吊行业迎来春天意味着什么？https://finance.qq.com/a/20180127/013502.htm.
3 2018 年 1-5 月工程机械行业销量同比增长 35.6%。http://field.10jqka.com.cn/20180628/c605346763.shtml.
4 今年塔吊租赁行业异常火爆 一线品牌卖断货。https://mp.weixin.qq.com/s/D8We29TpAtw4zh-q0D72Eg.

争。

2018 年塔吊工人的全国罢工也是如此，2011-2016 年生产过剩，经济低迷时期，塔吊司机不得不去忍受“5 年不涨工资”的阵痛，但是 2017 年行业复苏之后，塔吊工人的工资待遇却依然不能相应地提高，抗争自然兴起。

(二) 全国塔吊司机罢工过程

罢工的发动从 2018 年 4 月 25 日开始——江西南昌的塔吊司机拉横幅抗议要求涨工资。4 月 26 日至 30 日抗议迅速波及到全国十多个省，数十个城市。这些地方包括：江西（南昌，赣州，上饶）、四川（自贡，达州）、甘肃（兰州，天水，庆阳）、河南（洛阳，南阳，周口，三门峡，新乡，驻马店，郑州，平顶山，安阳，鹤壁），福建厦门，湖南（长沙，岳阳，衡阳），江苏（连云港，淮安），贵州清镇，湖北（仙桃，武汉，宜宾），广西（玉林，崇左），山西（太原，运城），河北石家庄，山东（枣庄），广东（肇庆，茂名，中山），重庆，天津，浙江（金华），贵州（贵阳，毕节），云南（昆明，保山），海南[1]等。

塔吊司机的主要诉求是：

1、将月工资由目前的 4000-6000 元涨到 7000-8000 元。工资数年不涨，但物价涨速飞快，提高月工资成为全国塔吊工人的共同诉求；

2、获得或提高平日和节假日的加班费。许多塔吊司机工作时间较长，常为 14-16 个小时，超时工作但加班费很低（15 元/时或 20 元/时，甚至有些司机根本拿不到加班费），这次塔吊司机提出的口号中有将加班费提高到 30 元/时或 50 元/小时的[2]诉求；

1 根据网络搜集到的资料进行的不完全统计。

2 不同地区的塔吊司机没有统一明确的诉求。



图 3. 8：塔吊司机抗议地图（部分统计）



图 3. 9：广西桂林塔吊司机拉横幅抗议

保山起义联名册名单:
本人自愿起义对现有待遇不满，请贵公司给予我们调整待遇。标准待遇:塔吊司机月工资7500元8小时，加班每小时30元。司信号工月工资5000元8小时，加班每小时20元。施工升降机及物料提升机司机月工资5000元8小时，加班每小时20元。
起义人签名、联系电话:
1　刘保双15331530537
2、朱盛杰189875463293
3.董继虎18187534981
4.赵强15184827471
5.李应江17787509018
6.艾国松18987501914　　7.李　月
18288550306
8.禹国辉15122557410　　9刘志玉
15925586384
10王金沙　15912710765　　11王林军
18087573083

图 3. 10：云南保山塔吊司机诉求

通过 QQ 群相互串联的塔吊司机在一个又一个城市发起抗议，相互响应，并约定五一的时候发动全国的塔吊司机总罢工。不同城市约定罢工的方式不同，有些地区是比较简单的停工，有些是主动地走到城市的火车站（如郑州）或中心广场（如昆明）拉横幅要求增加工资。由于多数司机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进行联络，他们的行动信息很容易被控制。在劳动节前夕，不少发布罢工游行消息的塔吊司机已经被警方控

制（如重庆的塔吊司机）[1]。劳动节当天，许多工地罢工，但没有上街游行的相关消息。劳动节过后，罢工的声浪逐渐平息。

(三) 罢工结果

从散落在互联网上的零星信息来看，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在许多地区以资方满足塔吊工友的诉求、提高月工资和加班费结束。如某地两家公司给塔吊工人的工资分别涨到 7500 元和 8000 元，晚上加班每小时也提高到 40 元，夜间加班后的休息时间，也被写进了合同[2]。

罢工结束后，H 省 X 市 H 县塔吊司机成立了"H 县塔吊司机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定位是"俱乐部通过民主的形式组建，建设了一支塔吊司机专业团队，公司化管理运营，管理人员义务管理，与老板与项目直接对接！"。截至 2019 年初，H 县塔吊司机俱乐部在岗人数如下：10 个小组，组长加组员 58 人，替班 70 人。俱乐部直接和用工方对接，帮助塔吊司机争取到了一定的权益[3]。这种俱乐部事实上是一个地区性的塔吊工人工会。斗争教育了一部分工人，必须建立自己的组织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第四节　建立组织——以 H 省 H 县塔吊司机为例

H 县隶属于 H 省 X 市，共有塔吊司机 300 余人。4 月底，在全国塔吊司机罢工浪潮的冲击下，H 县的塔吊工人也加入

1全国塔吊工人五一如期罢工　多处工地停工
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labor-05012018093946.html.
2全国塔吊工人五一如期罢工　多处工地停工。
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labor-05012018093946.html.
3 巩固五一战果，成立塔吊司机俱乐部！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NTIyNDY5Ng==&mid=2650039150&idx=1&sn=f30e1e2ddd14ef76e593c9ecd4079337&chksm=f00231f9c775b8ef8deaac073055ca7af0f4bd94935ac939c67b2c43ddb318595e6669e96719&mpshare=1&scene=1&srcid=07065NNKb0zb4mzPBedJvVxv#rd.

了拉横幅集会的队列。此后，部分塔吊司机成了 H 县塔吊司机俱乐部。5 月初，在塔吊司机俱乐部的带领下，H 县的塔吊工人加入了要求涨薪的队伍，不少塔吊司机争取到工资水平的上涨和福利的改善。由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的塔吊司机组织很少，我们便以 H 县塔吊司机俱乐部为例，分析在塔吊司机抗争中自发形成的群众组织的特点。

(一) 4 月 29 日集会

从 2018 年 4 月中旬开始，网上流传一些其它地区塔吊司机拉横幅的图片，H 县的塔吊司机起初没有放在心上，抱着看笑话的心态对待这些消息。4 月 23 日，H 县塔吊司机中工作时间长、联系广泛、威望比较高的 9 个人拉了一个微信群，在群里讨论塔吊司机权益相关的事情，大家最终决定关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塔吊司机的最低工资不低于 5000 元；二是拒绝疲劳驾驶，早上上班的塔吊司机工作时间不能超过晚上 12 点，否则要由工地出替班[1]；塔机要装空调改善工作环境[2]。9 个人讨论清楚后，便开始邀请其他人进群。这个群有一定的纪律性，工友必须实名进群，必须认可之前讨论的三方面内容，并且能积极去争取。群里的人越聚越多，大家在群里发视频，讨论塔吊司机的权益。

外界的塔吊司机行动越来越多，新乡、安阳、鹤壁、郑州的塔吊司机都已经在拉横幅抗议。群里的塔吊司机开始讨论是否聚在一起行动。4 月 28 日，H 省多地有塔吊工人集会，群里也在这天形成统一意见要进行集会。

4 月 29 日晚，H 县的塔吊司机下班后便来到了体育馆前，大家打着“提高工资待遇，拒绝疲劳驾驶”的横幅，高喊口号：

“我们是谁？塔吊司机。

1 塔吊司机经常连续工作 24 小时。

2 之前部分塔吊司机只要钱，不需要空调，大家讨论觉得不利于塔吊司机的身体健康。

我们的工资高不高？不高。

我们的活累不累？累。

工作危险不危险？危险。

工作的地方高不高？高。

我们要做什么？提高工资待遇，拒绝疲劳驾驶。”

集会队伍在体育馆呆了两个小时，现场有人提议在五一劳动节当天进行罢工，微信群的核心之一Y司机不同意罢工，认为“罢工是个极端行为，会给社会造成损失”“凡事都有商量余地，不要走极端”。他提议成立“塔吊司机协会”，获得大家的同意。

整体来看，4月29日的集会比较自发，没有太强的组织性。大家聚集在一起呆了2个多小时，仅仅是拉横幅，喊口号。集会结束后许多司机都跟朋友喝酒去了。



图 3. 11：H县塔吊司机4月29日集会

(二) 成立塔吊司机俱乐部：牛刀小试

在4月29日集会当天，Y司机提议成立“塔吊司机协会”，后来根据微信自媒体“塔吊人”的建议，改名为“塔吊司机俱乐部”。

5 月 1 日，Y 司机等人开始筹建塔吊司机俱乐部，俱乐部共形成了 10 个小组，组长加组员 58 人，再加上替班 70 人，还有外地工作的人，一共一百六十多人。小组以建筑工地为单位，一个建筑工地或在附近几个建筑工地工作的塔吊司机形成一个小组。

塔吊司机俱乐部成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动员各个小组去找相应的建筑工地老板谈判，谈判内容按照之前提的三项权益：涨工资到至少 6000 元[1]、拒绝疲劳驾驶和安装空调。每当一个小组谈判成功，就会把相应的消息发到微信群里，广而告之。通过这种方式，不少塔吊司机争取到了更高的薪酬和更好的工作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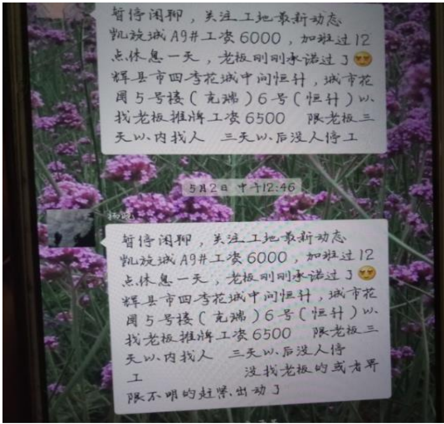


图 3. 12：塔吊司机俱乐部 5 月 2 日谈判动态

(三) 塔吊司机俱乐部的运营：困难中前行

在俱乐部发起人 Y 司机等管理层看来：俱乐部是一个塔吊司机自发组织的公益性团体，是调解维护司机与老板之间

1 29 日集会后，大家集体决定，将 H 县塔吊司机的最低工资标准从最初讨论的 5000 元提升至 6000 元。

的矛盾与权益的中间平台，要通过这个平台打造一种合作共赢的关系。目前塔吊司机俱乐部的组织架构是：管理层 5 人，包括一名会长和两名副会长，两名副会长中，一人兼任对外联络员，一人兼任财务员和替班管理员。重大事项必须由管理员五人全部同意。五人管理层下面是 10 个小组长，小组以在建楼盘为单位，小组长的职责主要是调节小组的矛盾、统计小组内的工资水平和进行塔吊职位、小组内部的团队建设（如聚会、交流）等。小组内部接受的最低工资标准是 6000 元/月。替班小组则由暂时没有工作的塔吊司机组成。正在工作的司机，有事或者想休息的，由替班小组安排人去。替班小组的人员不固定，找到固定工作后的司机会退出替班小组。

俱乐部成立后，5 月初组织各个小组和工地老板谈判涨工资，并且通过微信群的方式交流具体的谈判经验和技巧，为司机们争取到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后期俱乐部联络到一些老板和工地项目，为司机们提供了一些工作信息。当老板和司机之间产生矛盾时，俱乐部会出面协调。有两个例子能表明俱乐部在这方面的作用：第一个例子是某司机和老板核算的工资不一样，司机在群里说老板的坏话，老板找到俱乐部，俱乐部的人出面协商。认为那个司机是“以团队的名义威胁老板”。团队出来作为中间人调解，最后，以司机向老板道歉收场；第二个例子是一名司机离职，老板拖着不给结算工资，并且另找新的司机顶替，而两位司机都是俱乐部成员。俱乐部此时出面，做替班司机的思想工作，最终替班司机逼迫老板把前面司机的钱结清了。通过这些方式，俱乐部在一定程度上将广大分散的塔吊司机组织起来了，增加了塔吊司机群体的力量。

俱乐部的运行同样面临着一定的困难。首先是管理层内部的矛盾，这方面有两件比较大的事情。一是最初发起的四名管理人员被清理。俱乐部发起之初，管理层共有 9 人，但

是有 4 人在其位不谋其政，于是管理层核心人员 Y 司机逼迫 4 人退出，其中 2 人离开俱乐部，另外两人降为普通成员；第二件是买工衣和募捐引起的内部分歧。Y 司机等人对塔吊司机俱乐部的建设非常用心，实施了收费购买统一工衣的方案，部分工人反对；Y 司机组织了一次和雷锋爱心团队合作的扶贫活动，关爱弱势群体，主要目的是塑造良好的团队形象，方便以后进行公开合法工作，俱乐部的一百五十多人里有五十人参加了募捐。关于捐钱是群里发还是私发的方式，Y 司机在其它管理人员仍在讨论的时候擅自做出决定，引起了其它管理人员极大的不满，认为 Y 司机搞独裁。6 月，Y 司机发出了一封面向俱乐部全体成员的公开道歉信。Y 司机个人热情很高，关于俱乐部建设思考和推动很多，但由于工作中忽视充分的民主讨论，引起了管理层内部的反对。除了管理层内部的矛盾外，管理层和小组长之间的联系也比较松散，没有定期见面的机制，小组长本来应该承担起每周同组员定期见面和聚会的职责，但是管理层对具体执行的情况并不清晰，Y 司机自己也觉得小组可能已经散了。

整体来看，H 县塔吊司机俱乐部扮演了以下几种角色：协调者——协调老板与司机的矛盾，司机与司机之间的矛盾；集体协商的组织者——确定司机与老板集体协商的标准，传授一些与老板协商的经验等；司机的管理者——成立塔吊司机的替班小组，俱乐部的司机需要替班的，优先让俱乐部替班小组的成员来替换。这种以经济利益为纽带将工人联系在一起的组织本质上就是塔吊工人工会。这个工会顺应五一前后全国塔吊司机抗争的浪潮而产生，一开始便以维护塔吊司机的经济利益而扎下根来。这个工会尽管还不成熟，组织尽管还很松散，但只要它能持续维护 H 县塔吊工人的具体利益，俱乐部本身便有条件长期存在下去。

另一方面，无论是从现实还是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个强大的工会需要有高度的组织性。这种组织性的建立，仅仅依

靠在斗争高潮中凭借自发性将群众聚集在一起是不够的，它还需要对群众日常的切身利益的维护，需要对群众进行日常的细致的教育，需要和群众有日常的联系。没有后者，大多数工友会仅把俱乐部当作一个可提供帮助的外部力量，无法产生“我就是俱乐部一员”的高度组织认同感。这是Y司机感受到俱乐部松散的本质原因。产生这种现象，既是塔吊行业自身的独特性导致的，也和俱乐部核心人员的思想认识密切相关。作为建筑工地上的技术工种，塔吊司机人数少，且随工地项目流动，远不如产业无产阶级那样集中，要使得塔吊司机建立日常联系，对其进行日常教育，难度很大。Y司机将俱乐部看成一个协调双方矛盾的平台，“既要维护老板的利益，也要维护司机的利益”，“罢工太极端了，给老板和司机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种认识是不清晰的，维护双方的利益只是一个虚幻的表象，只有塔吊行业利润很高，老板有利润让渡空间的时候，才有可能通过谈判使老板和司机双方都获得一定的好处。一旦行业利润降低，老板每一次的利润让渡都将成为“割肉”的行为，塔吊司机此时只有通过艰苦的斗争（斗争的手段不局限于罢工）才能争取到一定的物质利益。代表双方利益的平台是不存在的，俱乐部只有实质上代表塔吊司机的时候它才能存在，才有力量。由于对这一点认识不清楚，Y司机等管理层对加强俱乐部和司机的日常联系重视不够，没有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对塔吊司机的日常教育和日常权益的维护上，而是花费许多心思搞章程，制作衣服，搞募捐等次要的事情上。在加强工会的组织性方面，珠三角地区的产业无产阶级有许多值得学习的方面。当然，对一个刚刚成立不久的工会组织，不应过多的苛责，现实终究会慢慢教育塔吊司机们。

第五节　基本结论

1、这次罢工是塔吊行业经济周期变化的结果。长达五六年的萧条，使得工人长期忍受数年不涨的工资以及低廉的加班费；2017 年以来工程机械行业整体复苏[1]，塔吊租金、行业利润暴涨，工人要奋起争取萧条期被剥夺的利益，形成了 2018 年四五月间全国塔吊司机要求加薪和提高加班费的罢工高潮。

2、这是 90 年代以来首次出现的全国范围内的行业工人罢工。塔吊司机通过 QQ 群串联，在五六天的时间里，于全国近二十个省份、几十个城市发动了罢工、抗议，并约定在五一当天发动全国性的罢工。虽然劳动节的全国罢工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实际行动，但这次斗争的范围之广依然是前所未有的。塔吊司机属于技术工种，人数少，容易形成地域性的圈子，且塔吊司机的工作随工程项目而不断变化，很难与同一家企业建立长期雇佣关系。这些特征导致多数塔吊司机提出加薪诉求时，针对的并非某一家企业，而是整个地区的整个塔吊行业。拉横幅抗议的塔吊司机，选择的地点也并非某家施工单位，而大多在城市的中心地区（如火车站，中心广场）。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导致塔吊司机相比于当前大多数行业的无产阶级，更容易形成行业性的罢工。塔吊司机罢工的跨地域性和行业性，走在无产阶级的前列。

3、这次斗争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工友彼此联系的方式高度依赖于互联网媒体，而这些社交工具是有关部门高度监控的对象。因此，大多数罢工和游行的行动信息已经提前被相关部门掌握，甚至被提前破坏，无法组织起真正统一的行动；同时，全国性的塔吊司机罢工仅仅局限在全国范围内的自发响应，没有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诉求，各个地区的

1 尽管如此，整个中国经济仍处于持续恶化的状态。

塔吊司机，也仅以本地区的资方有无妥协来决定是否复工，罢工中表现出来的这些问题，都是组织程度相对较低的体现。

4、罢工后少数地区成立了事实上的塔吊司机工会，这些工会成立不久，组织经验和管理都很不成熟，但作为维护塔吊司机经济利益的群众组织，这些工会可能会长期存在，组织化也是未来塔吊行业群众斗争的一个历史趋势。

第四章　时代篇

世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发展现状

当前，有人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经不存在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容纳能力大大增强了，垄断资本主义至少还有几百年的寿命；有人说现在世界已经趋同，资本主义开始使用宏观调控手段，社会主义也利用市场经济手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什么鲜明界限，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矛盾已经不能解释当前社会；还有人说现在已经是金融危机时代，传统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已经不起作用，金融危机成为科技革命时代的新课题，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已经无法解释新时期的问题。面对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出现的很多新特征，尤其是在 90 年代苏东剧变以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方法是否适用，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断是否已经过时，这些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迫切需要回答的历史问题。

回想 1848 年，正当欧洲资本主义以青春的活力扫荡着衰朽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时候，有两个年轻人却预告了它的灭亡，他们就是《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马克思 30 岁，恩格斯 28 岁。马恩之所以认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历史作用和阶级矛盾的科学分析，其中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是“两个必然”论断的重要基础。掌握辩证法的武器就可以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把握私有制固有矛盾就可以洞见资本主义的未来命运。事实上，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借助泡沫经济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目前这个泡沫已经空前膨胀，2008 年次贷危机并未将其刺破，当前规

模更是远超次贷时期。新时期是资本主义大萧条的新时期，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全球化的新时代，站在共产主义运动低潮与高潮的交界点上，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已经离开人们视野几十年的问题又重新摆在了世人的面前。

第一节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矛盾。马恩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的历史成就，“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也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危机发生的时候，面包丢到垃圾堆里，牛奶倒进下水道，火烧庄稼水淹农田。社会生产成果本应为劳动人民所共享，资本主义发达的生产力为什么会变成不可控制的“魔鬼”？为什么资本家宁肯销毁产品也不愿分给陷入贫困中的工人呢？答案就在于资产阶级所有制本身。在资本家看来，如果过剩商品贱价卖掉或者送给穷人，会造成商品的需求量减少，这样就会造成以后都无法顺利维持价格，同时培养了民众的“惰性”（等着买减价产品），以后就会造成恶性循环，商品的剩余价值无法实现。

事实上，生产相对过剩一直同市场经济如影随形，典型案例在我们身边俯拾皆是。例如房地产，广大进城务工人员迫切需要良好的居住条件，但三四线城市的商品房却处于严重的过剩状态，不少开发区内“鬼楼”林立；每年都有很多的农产品过剩，例如拿火龙果喂鱼、西瓜烂在地里的现象非常常见，粮食、蔬菜、猪肉、食用油、水果等大宗农产品全面供过于求；新西兰的低成本牛奶挤垮全世界奶农，2014 年以

来全球都在倒牛奶。二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相对过剩的表现同以前自由竞争时期有些不同。随着国家干预经济能力的提高，在生产资料和耐用品领域，生产相对过剩的表现形式从商品过剩过渡到产能过剩，更多的过剩商品没有被生产出来，而是表现为生产能力的闲置。如图 4. 1 和图 4. 2 所示，中国钢铁、煤炭、水泥、铝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均不足 80%，处于明显的产能过剩状态。



图 4. 1：中国六大行业产能利用率情况[1]

1 彭薇. 中国欧盟商会关注产能过剩问题——中国欧盟商会：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钢铁、电解铝等 8 个行业[N]. 中国有色网，2016-02-23. http://www.cnmn.com.cn/ShowNews1.aspx?id=3387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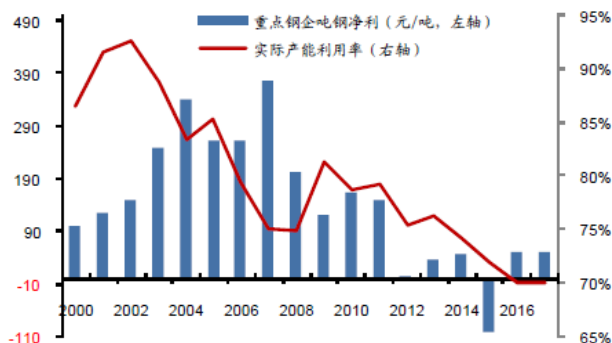


图 4. 2 ： 2000—2016 年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1]

在私有制的情况下，一边是堆积如山的产品，一边是两手赤贫毫无购买力的老百姓。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逐渐积累，最后爆发经济危机。在发生经济危机时，资产阶级似乎应该想办法扩大社会消费、提高工人阶级的收入，才能避免危机恶化。但实际上资本家们又是怎么做的呢？在危机到来之际，面临商品大量积压的局面，资本家首先缩减生产，随接着降低工资和裁员。由于降薪和裁员，从全社会角度看，工农群众的购买力进一步下降、社会消费进一步缩小，于是经济危机不可遏抑爆发出来。

第二节　不同阶段经济危机的表现

(一) 自由竞争时期（1873 年之前）

1848 年革命之前仍然是资本主义的革命时期，资本主义逐步取代封建生产关系成为欧洲主要的生产方式。早在 1788 年、1793 年、1797 年，当时为数极少的工厂中心就出现了前所未闻的生产过剩症状。

1 2017 年中国钢铁行业发展现状及市场前景预测[N]. 中国产业信息，2017-04-11. 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704/512652.html

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方式，1825年第一次普遍生产过剩危机条件成熟，英国爆发了经济危机。工厂纷纷减产关门，机器设备的价格跌到和废铁差不多，英国努力地对外扩展市场，通过对外倾销来解决问题。商业、信用、价格、工资和工人群众的就业和消费、利润、人民收入、资本积累、技术革新等，都同生产一起，具有了周而复始的周期形式[1]。

初期，经济危机在主要工业国独立发生，一般一两年就过去，接下来又是十来年的繁荣。经济危机的周期一般为10～11年。1857年，出现了第一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1866年，金融信贷领域也开始出现严重的混乱。

(二) 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19世纪后30年）

随着生产集中，各国之间联系日益密切。1873年，出现了19世纪持续时间最长、打击最为沉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标志着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顶点，从此开始了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农业危机和工业危机相互交织，使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最后30年里的经济发展速度大大放缓，经济危机更加频繁。1882年、1890年、1900年经济危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反映出资本主义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

(三) 无干预垄断资本主义（20世纪上半叶）

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危机的周期缩短、危机持续时间更长，大约每7～8年左右爆发一次经济危机。由于垄断资本规模巨大，全社会的无计划性和单个资本的有计划性之间的矛盾也空前尖锐，垄断制造过剩的能力也超非自由资本主义时代。

1 列·阿·门德尔逊[苏]. 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129-184.

由于没有国家干预缓解危机，这一时期的危机程度非常剧烈。20 世纪前 50 年是以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大萧条为标志的，一度将资本主义带到崩溃的边缘。1929～1933 年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一次最严重、最深刻，持续时间最长的世界性危机。在这次危机中，工业、农业、金融危机交织在一起。危机引起了世界信用、货币体系的崩溃，大批银行破产，从 1929 年到 1933 年，美国破产银行达 10500 家，占全国银行总数的 49％；到 1933 年美国股票价格下降 73.4％。1937 年又爆发了世界性的危机，这次经济危机在 1939 年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这一时期资本主义成为一个贬义词，就连蒋介石主观上都不愿意搞资本主义[1]。

(四)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黄金增长时期（20 世纪 50 年代—70 年代）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二战以后，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危机周期进一步缩短。以美国为例，其战后共发生 10 次危机，平均周期为 5～6 年，一个周期内衰退占据的时间更长——复苏、增长和萧条、衰退的比例大致为 1：1，有时甚至比这个比例还要低。

战后凯恩斯主义对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进行了调整，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加能够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家全面干预国民经济发展。在萧条和衰退时期，通过财政政策兴建公共工程，扩大社会服务，主动拉动投资和消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矛盾。

1 杨奎松．蒋介石为何最终输掉大陆：不搞资本主义惹的祸[N]．凤凰网，2011-12-03.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yangkuisong/detail_2011_12/03/11077037_1.shtml.

第二，实行了福特工资制。面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和本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罗斯福主动调整劳工政策，允许工人组建工会与资方开展谈判。工人按照上年公司收入和利润的增速提出工资增长幅度要求，保障工人收入能够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社会两极分化程度缩小，社会需求稳定增长带动了经济持续发展。

第三，实行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大萧条之前，各国实行的是以英镑、法郎和马克等三国货币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由于各国生产的相对过剩都较为严重，英法德之间竞相通过压低本国汇率来将过剩商品倾销出去，结果造成基础货币体系不稳定，为金融投机提供了一定的土壤。战后实行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形成了以美元为基础货币、美元同黄金挂钩的金汇兑本位制，同时商业银行同投资银行相分离，并对贷款利率进行限制以保持有利于工商业经营的低利率条件。凯恩斯主义通过限制虚拟资本与投机行为，为职能资本增殖创造良好的金融条件。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系统性措施，凯恩斯主义对生产关系进行了全面调整，使资本主义获得了 20 年的黄金增长期。

(五)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时期（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以里根和撒切尔上台为标志，80 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全面转向新自由主义。这一时期颠覆了凯恩斯主义时代的主要政策：

第一，实行了弹性工资制。里根和撒切尔分别向美国航空业工会和英国煤矿工会进行进攻，拆散工会，抑制工人同资方谈判的能力，工会运动走向低谷。由于工会力量变弱，工人工资长期不涨，直到 2004 年，美国小时工资同比仍低

于六七十年代[1]。

第二，解除了金融资本管制。首先是 80 年代银行以遏制通胀为名大幅提高利率，虚拟资本快速膨胀，实体经济走向衰落。其次是 1999 年，克林顿政府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解除了对金融资本的约束与管制，恢复了混业经营体制，商业银行可以以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从事证券和保险业务在内的全面金融服务。从此，不受约束的各类衍生品交易（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私募基金等）和规模庞大的场外交易繁荣起来，他们游离于监管体制之外，为金融海啸创造了物质条件。

第三，积极推行资本全球化。里根和撒切尔等通过 WTO、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将产业转移到工资低、地价低、税收有优惠的发展中国家，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可见，相对凯恩斯主义时期，新自由主义时期国家干预的方向和手段出现明显变化，劳工政策、金融管制政策与之前完全相反。整体上看，新自由主义对实体经济不利，消费需求也会比较低迷，相反金融投机会比较旺盛。那么可以做出推断，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应该会出现与 30 年代大萧条、70 年代滞涨同等程度的严重危机。但事实上却仅出现了严重的周期性危机，并未出现大萧条，其原因就需要深入分析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

第三节　当前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

(一) 金融危机引发经济危机

以 29 年大萧条为代表的传统危机，往往是由于商业部门扩张无法维系，从商业传导回工业企业，大量工业企业由

1 李民骐，朱安东．当前世界的基本状况与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J]．高校理论战线，2005(5):55-58.

于销售不畅、亏损直至破产，导致银行信贷无法偿还，最后导致银行业危机。1929 年经济大萧条形式上是股票市场暴跌引起的整个危机，实际上是实体经济的生产过剩。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然后是长达 10 年的“柯立芝繁荣”，美国生产能力迅速扩张。而在生产能力迅速扩张的同时，消费需求能力并没有跟上，这种扩张远远超过了消费需求能力。当生产线大量上马之后，各国发现消费严重不足。为了保护自己的需求市场，各国都在努力出口的同时相继设置贸易壁垒。这样，越是生产能力过剩的国家，其庞大的生产能力越会找不到消费者。生产过剩带来的是企业利润下降、企业破产、信贷收不回来、坏账增加，伴随严重产能扩张的是信贷膨胀，而在生产过剩之后银行则面临亏损，并出现大规模的银行倒闭、经济大萧条。股市暴跌仅仅是导火索，由于过剩严重、产业利润较低，大家都把资本投向股市，甚至借助杠杆炒股，银行也参与其中，最后泡沫破灭导致企业和银行利润损失惨重，引发整场危机。[1]

但当代金融危机情况颠倒了过来。首先是先发生某种金融市场的暴跌（如 2000 年美国股市危机、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流动性收紧，企业无法获得周转资金；同时居民财富大幅缩水，财富效应的正反馈机制发生逆向作用，导致投资、消费活动停滞，形成生产相对过剩的格局，使金融危机加深。2000 年之后，美国银行业在住房按揭贷款上搞创新，大搞资产证券化，发行了大量的消费信贷，依靠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膨胀，提高居民信贷规模，推高了美国的消费能力。资产证券化是以基础资产未来所产生的现金流为偿付支持，通过结构化设计进行信用增级，在此基础上发行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 Securities, ABS）。也就是说，如果

1 宋鸿兵. 金融危机的本质：美国过度消费和中国生产过剩危机[N]. 第一财经日报，2008-09-23.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4233966/.

居民的房产价格不断增长，居民可以以房地产作为抵押，从银行或金融机构那里贷款出来，用于消费或购置新的金融资产。资产证券化产品种类大致分为抵押贷款证券化(MBS)及资产支持证券(ABS)两类(见图 4. 3)。美国资产证券化规模增长迅速，从 1990 年的 1 万多亿美元增长到 2008 年的 11 万亿美元（见图 4. 4）[1]。这样，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就完全颠倒了，股市等金融市场不再是导火索，而是变成了危机本身，如果房地产、股市崩溃，将导致资产支持证券规模减少，财富效应缩水，居民消费相应减少，进一步引发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见图 4. 5）。



图 4. 3：资产证券化产品类别

1 2017 年美国资产证券化行业概况分析[N]. 中国产业信息，2017-08-26. 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708/554403.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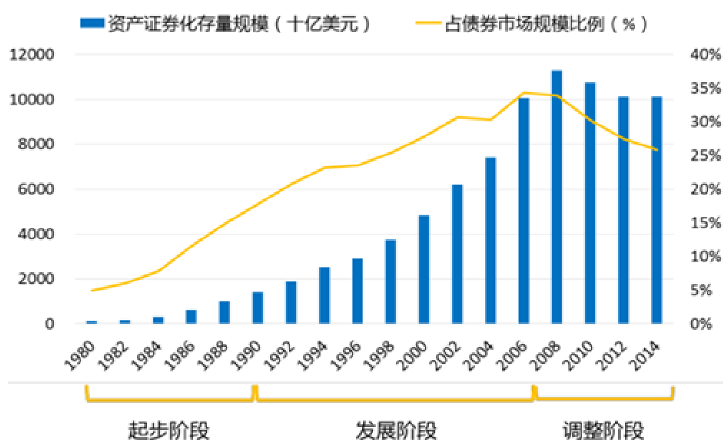


图 4. 4 ： 美国资产证券化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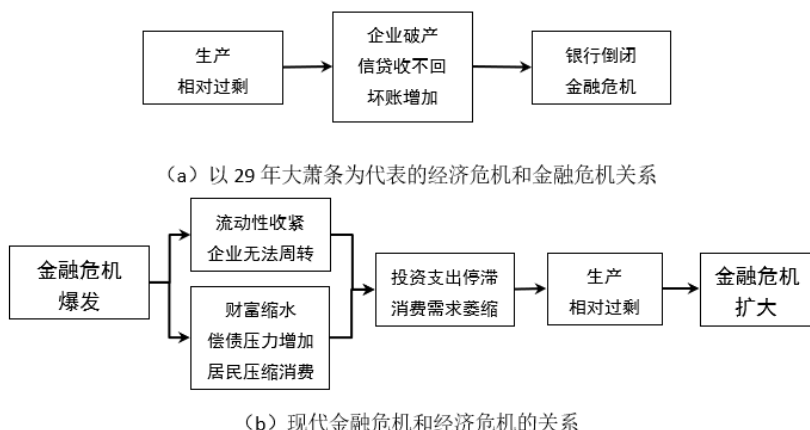


图 4. 5：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关系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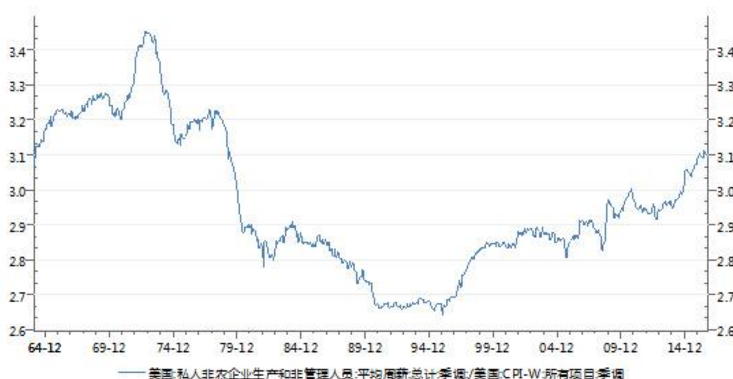
(二) 财富效应拉动居民消费

正是借助于财富效应机制，美国居民在实际收入长期下降的趋势下，居民消费不减反增。美国居民消费信心指数暴增，在 90 年代后期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甚至超过了 60 年代

实际工资快速增长时期。



（a）消费者信心指数



（b）实际工资走势

图 4. 6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和工人实际工资变化

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都在下降，只有美国在上升，而且上升趋势明显。美国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长期维持在 70%左右的水平，拉动着世界工厂持续扩大产能。2015 年美国人口 3.21 亿，居民消费高达 13.07

万亿美元，人均消费 5.58 万美元；中印两国总人口 26.64 亿，居民消费总额只有 5.10 万亿美元，人均消费 4692 美元（见表 4. 1：2015 年美国居民消费与中印对比）。长期以来，美国人的浪费型消费模式引得全世界环保人士的批评，仅以化石能源为例，美国人口仅占全球的 5%，但石油消费量却占全球消费量的 1/4。事实上，美国人的浪费型消费模式正是全球资本主义所需要的，从资本增殖的角度讲，美国人是不能节能减排的，如果美国人都开始过环保节能的日子，全球资本主义马上就会进入衰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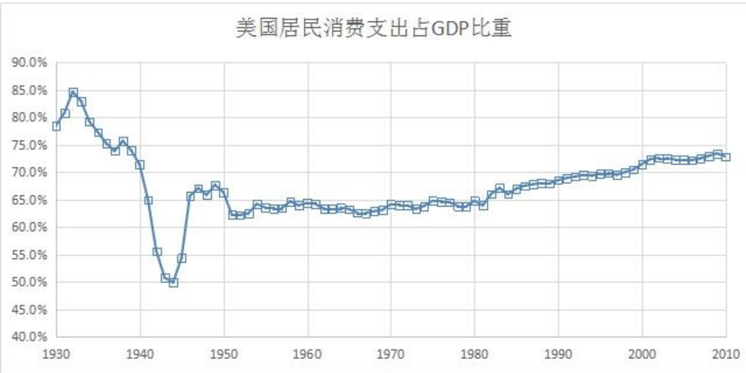


图 4. 7 ：美国居民消费支出增长情况

表 4. 1：2015 年美国居民消费与中印对比

	人口（亿）	GDP（万亿美元）	居民消费（万亿美元）	人均消费（美元）
美国	3.21	17.9	13.07	55763
中国	13.75	10.4	3.95	7564
印度	12.89	2.1	1.15	1629

(三) 居民负债规模空前膨胀

但财富效应会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透支消费能

力，负债越来越重。实行新自由主义以来，美国的储蓄率一直在下降，净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凯恩斯时代的 10%左右下降到80年代的约5.8%、90年代的约4.5%，到2001—2008年房地产周期进一步下降为 2.5%，危机后才又重新上升（见图 4. 8）。通俗的讲，次贷危机前美国人都在一片乐观的情绪中疯狂扩大消费，根本不管自己赚了多少钱。结果就是负债累累，真金白银越来越少，债务越来越大，形成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居民总负债从 1990 年的 3.6 万亿美元增长到 2000 年的 7.0 万亿美元，到 2008 年达到最高 13.8 万亿美元，现在仍然维持在这一水平，并且出现新的增长趋势（见图 4.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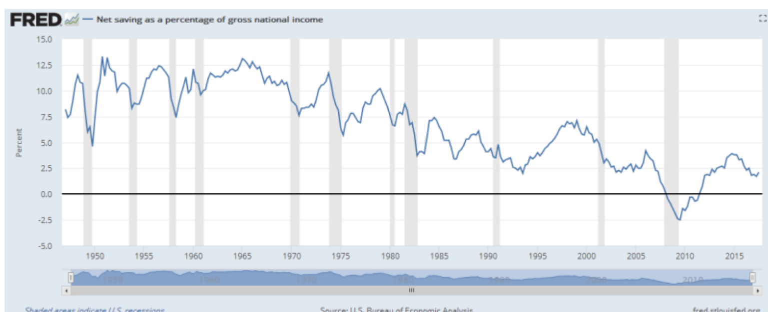


图 4. 8：美国净储蓄率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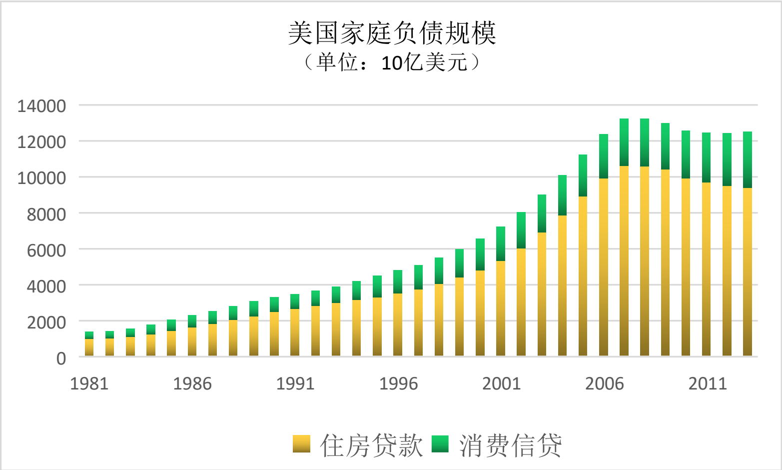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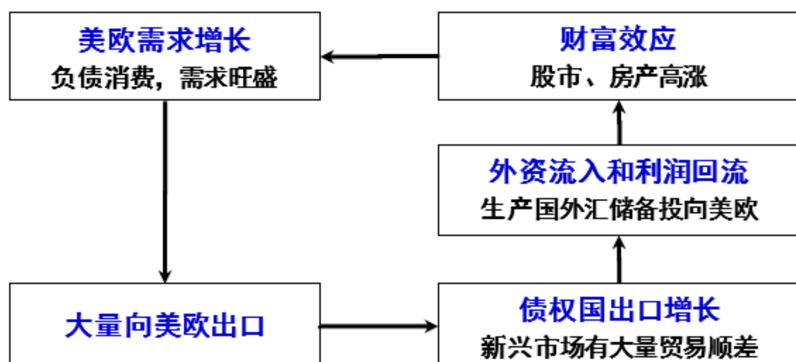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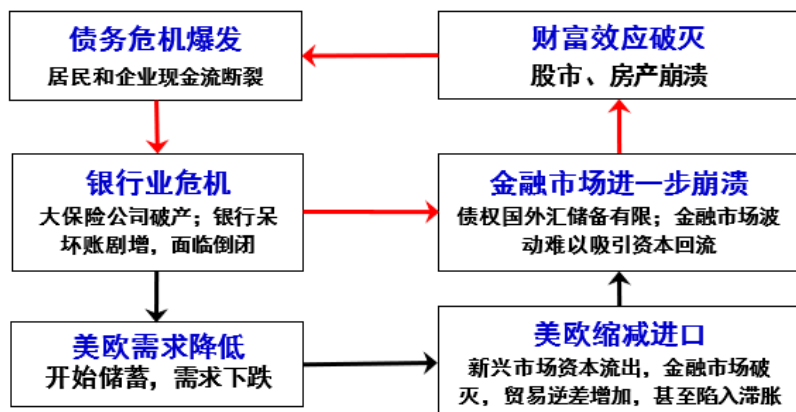


图 4. 9：美国家庭负债增长

在这个过程中，看起来美国消费成了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实质上却积累了大量的系统性风险。而在房价不能无限上涨、债务系统撑不住之后，债务违约也将导致依赖资产证券化的金融创新泡沫破灭，并形成正反馈，进一步引发现金流断裂、偿债能力下跌、金融市场崩溃，过度消费归零，最后经济危机爆发。



（a）正反馈机制之泡沫增大



（b）正反馈机制之泡沫破灭

图 4. 10：财富效应的正反馈机制

第四节　当前的危机进程

世界经济依赖于欧美的超前消费，欧美的超前消费依赖于房地产、股市等金融泡沫的膨胀。目前，世界经济增长坐落在一个空前膨胀的气泡上，同时面临国家干预手段捉襟见肘、左右为难的困局，一旦这个气泡破裂，将产生一场远超

上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规模的全球经济危机。

(一) 泡沫增长程度

目前，全球虚拟经济远超实体经济增长速度。自 2014 年美国结束量化宽松政策、美元开始进入紧缩周期以来，伴随着全球资本回流，美国股市、房市重新开始迅速膨胀。美国股市总市值占 GDP 比重（证券化率）快速飙升，目前已经达到 142%，接近 2000 年股市危机前的高点，远超上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之前 88%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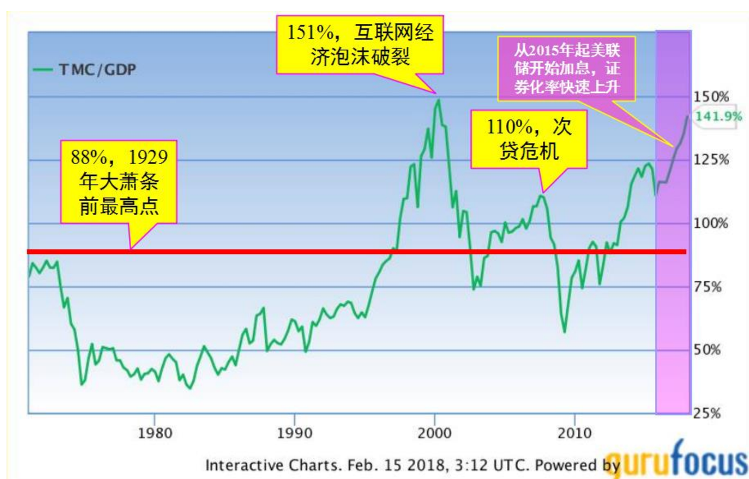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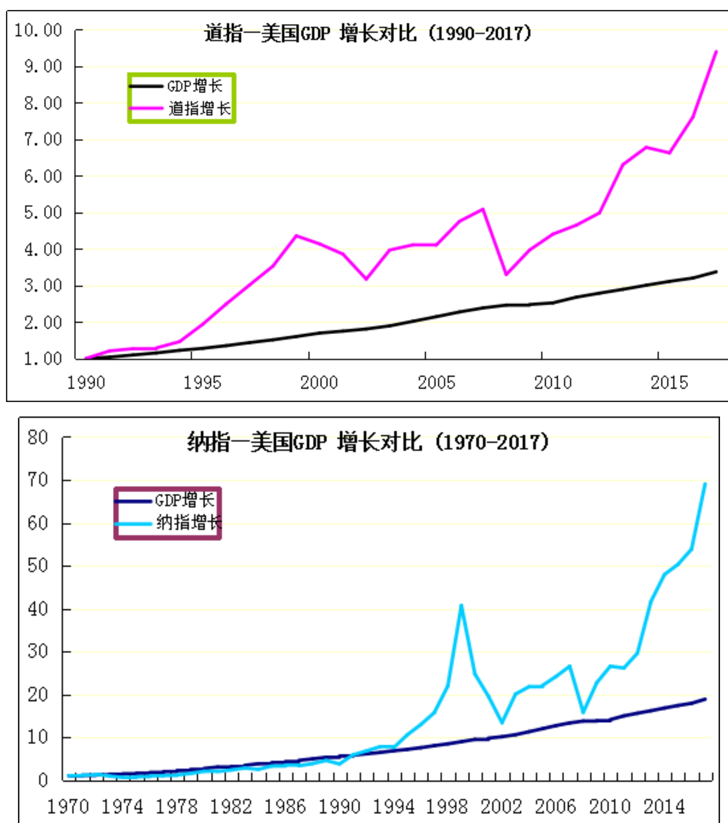


图 4. 11：美国证券化率重回历史高点

虚拟经济中，金融衍生品增长速度最快，衍生品未清偿合约名义余额从 1990 年的 3.45 万亿美元增加到 2015 年的 1500 万亿美元，增长了 400 多倍；债券余额从 1990 年的 18.02 万亿美元增加到 2013 年的 100 万亿美元，增长了 4 倍多；股票市值从 1990 年的 9.4 万亿美元增加到 2016 年的 64.9 万亿美元，增长了近 6 倍。而实体经济方面，到 2016 年全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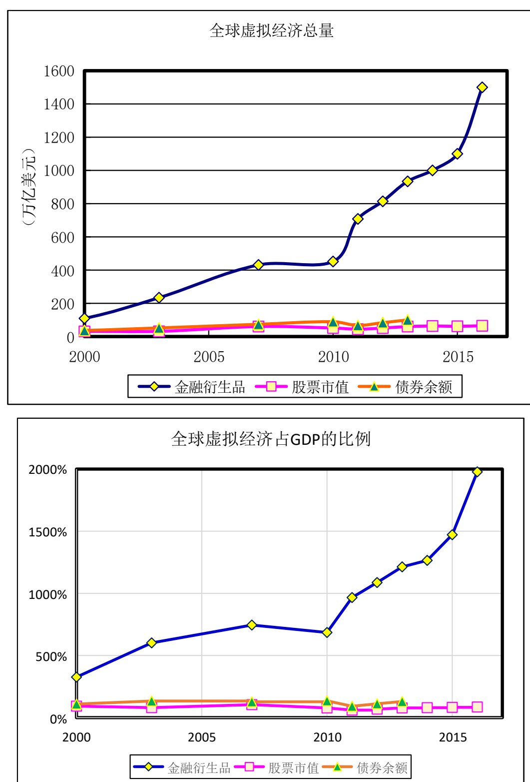
（a）1990 年以来道琼斯指数增长

（b）1970 年以来纳斯达克指数增长

图 4. 12：美国股市增速远超 GDP 增速（以起始年为 1 进行比较）

GDP 的规模也仅为 75.8 万亿美元，虚拟经济是全球 GDP 的 20 倍以上。虚拟经济实质代表的是资本-利息关系，虚拟经济规模越大、实体经济规模越小，承受金融波动的能力就越小，发生金融危机后债务链条断裂的可能性越大。而当前虚拟经济的波动幅 度是非常大的，光 2018 年 2 月美国股市短期下跌就超过 3 万亿美元，这正是虚拟经济脆弱的地方，也

是 2008 年次贷市场上一有风吹草动，美国马上要大笔砸钱救市的原因之一。



（a）全球虚拟经济总量

（b）全球虚拟经济占 GDP 比例

图 4. 13：2000 年以来全球虚拟经济增速远超实体经济

从金融部门利润增长情况可以看出这一趋势。根据美联储数据库公布的数据，1980 年美国金融部门利润为 1297 亿美元，占全部企业利润的比例约为 17%；2000 年美国金融部门利润为 6198 亿美元，占全部企业利润的比例约为 24%；次贷危机时，金融部门利润为负值，危机后美国政府砸钱救

市，这一比例迅速回升到 30%左右，到 2017 年金融部门利润接近 20000 亿美元，占全部企业利润的比例约为 28%。打一个比方，越来越多的企业不是去做工农商业活动，而是去炒股、炒房，实体经济要拿出越来越多的利润份额给这些炒金融资产的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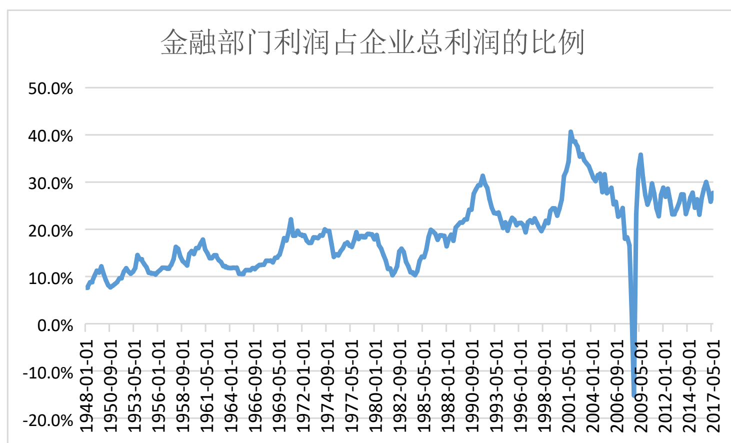


图 4. 14：美国金融部门利润占企业总利润的比例

泡沫经济的发展滋生了以投机为生的金融大鳄。在各类金融机构中，对冲基金的投机性最强。对冲基金是各类投机资本的先锋军，对冲基金还不是投机资本的主体，但即便不是主体，对冲基金的规模也已经从 2000 年的 3600 亿美元增长到次贷之前的约 20000 亿美元，次贷之后略有下降，到 2010 年之后再次快速增长，目前规模已达 30000 亿美元。假定再发生与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类似的危机，并假定某国实行货币自由流动政策（可自由兑换），仅这个先锋军对某一国的金融市场和货币进行投机，如果该国要维持金融市场稳定和货币不贬值，就要拿出与对冲基金同等规模的外汇储备，目前仅有中国具备这个规模的外汇储备（约 3 万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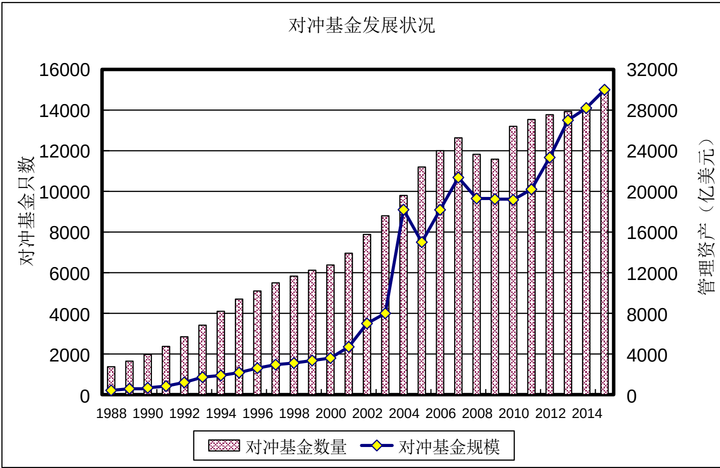


图 4. 15：全球对冲基金发展情况

(二) 国家干预两难格局

美国政府真正想要维持的，是源源不断进入美国金融市场的资金流，无论是税改还是升息，都是这个目的。但税改对资本的吸引力是有限的，特朗普把企业所得税税率从 35% 降低到 20%，但跨国公司有种种抵扣和税务漏洞，美国企业实际税率仅为 18.1%，加之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和资本增值潜力远超美国本土等因素，税改难以形成大规模的资本回流[1]。

真正能起到的作用的是加息。如果短期内形成大幅加息预期或快速持续升息，是可以带动美元升值、进而有效吸引资本回流美国的。但加息是一把双刃剑，美国的居民负债、国家负债规模已经很庞大，加息有可能刺穿经济泡沫，形成债务危机，进而引发金融危机的连锁反应。2007 年的次贷危机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2000 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使美国经济

1 金旼旼，高攀. 美国税改会不会导致全球资本回流美国？[N]. 搜狐新闻，2017-12-03. http://www.sohu.com/a/208176984_313745.

一度陷入低迷，为了刺激股市，格林斯潘连续 12 次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降到 1%的低水平，结果超低利率刺激了美国房地产的繁荣，滋生出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到 2006 年初，美国房价连续 5 年大幅攀升，年均升幅超过 8%。低利率和高房价引发了购房热，加上弥漫全社会的奢侈消费文化和对未来繁荣的盲目乐观，塑造出房地产市场只涨不跌的神话，催生了抵押贷款证券化工具，诱使大量不具备还款能力的消费者纷纷通过按揭手段，借钱涌入住房市场。然后格林斯潘又开始担忧通胀和资产泡沫，2004 年 6 月至 2006 年 6 月，美联储连续 17 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从 1%升到 5.25%，直接刺穿了房产泡沫。受加息影响，2006 年初美国房地产开始降温，房价于 2007 年初开始下跌。利息上升导致还款压力增大，很多本来信用不好的用户感觉还款压力大，出现违约，于是银行收回的房产就多了，银行收回房产不会持有，而是马上出售回收资金，进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房产供过于求，房价开始下跌。美国次贷市场迅速恶化，许多购房者房产净值由正转负，既无力偿付房贷到期本息，又无法再融资。同时，随着优惠期结束，购房者面临按市场高利率还贷的压力。自 2006 年开始次贷市场违约事件剧增，随后大量金融机构陷入困境或破产，2008 年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并迅速波及全球，演变成国际金融危机。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既担心加息会导致泡沫经济破裂，又担心不加息资本外流导致财富效应衰退。格林斯潘、伯南克、耶伦都是对金融泡沫又爱又恨，怕股市、房市过快增长泡沫会破裂，又怕股市、房市不增长金融市场资金会外流，全世界统治阶级真正喜欢的都是“慢牛”。所以耶伦上演了虚张声势的好戏，从 2014 年年底以来不停地说要加息，实际上基本没怎么加息，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涨了 3 年多，到现在才 1.5%，还不如中国连续下调了几年的基准利率高（2018 年中国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至 4.35%；一年期存款

基准利率下调至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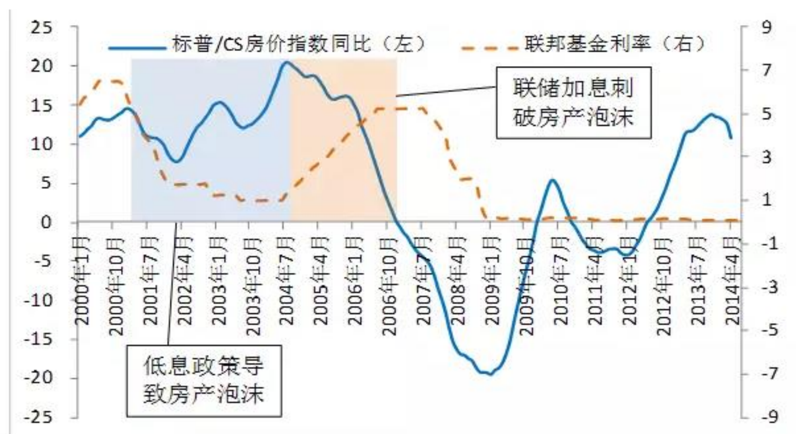


图 4. 16：美联储加息刺破次级贷泡沫（单位：%）[1]

但由于美国各类债务实在太庞大，即便这么低的利率，美国的企业还款、消费卡还款、买车还款也难以承受。2015 年，由于国际油价暴跌导致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收入减少、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导致借贷成本升高，全球企业债务违约率上升，其中美国公司约占 60%[2]。自 2019 年年初以来已有 91 家企业出现债务违约，超过 2018 年全年（82 家），如果按此速度发展下去，2019 年全年违约企业将超过 100 家，创三年来最高水平[3]。持续 10 年的历史低利率让企业向投资者出售了创纪录数量的债券，将美国企业债务总额推高至近 10 万

1 任泽平. 这次会是谁？历次美国加息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及启示[N]. 老虎财经，2016-09-13. http://www.laohucaijing.com/Www_detail/index/121171/.
2 驻奥地利经商参处. 2015 年美国公司债务违约数量全球居首[N]. 商务部网站，2015-12-31.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m/201512/20151201224109.shtml.
3 标普：今年全球债务违约企业或超百家 创三年新高[N]. 金融界网站，2019-10-30.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48759499260039266&wfr=spider&for=pc.

亿美元，《福布斯》数据显示，加上中小企业、家族企业和其他未上市企业的债务，美国企业债务还将增加 5.5 万亿美元，总量达 15.5 万亿美元[1]。美国企业债务已超过次贷危机前水平（见图 4. 17）。根据美联储的报告，2017 年 11 月，美国的循环贷款（主要由信用卡债务组成）触及 1.023 万亿美元，稍高于 2008 年 4 月房地产和信贷泡沫破裂前创下的纪录高位，与此同时，2017 年美国的信用卡违约率从 7%上升到 7.5%[2]。尽管就业情况好转，但由于薪酬上涨受阻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甚至负担不起信用卡的最低还款额，同时民众对信用卡和汽车贷款的申请规模也大幅减少（见图 4. 19），这将导致负债消费持续下降。根据瑞银的调查，由于两极分化变得越来越糟糕，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低收入人群和三分之一的中等收入人群要么无法负担他们的开销，要么就是刚刚足够，尤其是汽车贷款的拖欠率比过去几年发行的贷款要高得多[3]。目前，美国几乎 90%的新车和 55%以上的二手车的购买是通过贷款的，美联储一直试图通过低成本贷款刺激非正常需求，与 2007 年次贷危机时刺激消费者对房屋的需求如出一辙，汽车贷款也成为了次级贷的重灾区。2015 年，美国汽车贷款达到 10000 亿美元，其中拖欠还款量为 5.16%，达 20 年来的最高水平[4]。根据调查，汽车贷款大多发给了年轻人，其中学生群体的债务负担很重，债务负担超过 40,000 美元的比例达 41％，19％的汽车贷借款人表示可能在未来一年内违约，违约原因包括医疗费用增长、家庭成员增长、收

1 债台高筑 美国企业债务违约正在攀升[N].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2019-12-04.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9-12-04/doc-iihnzhfz3471661.shtml.
2 聂琳. 美国信用卡坏账大增 可银行和分析师为何并不担心[N]. 界面新闻，2018-01-24. http://www.jiemian.com/article/1897050.html.
3 张美. 违约率不断上升 这或是美国消费者现状最好的分析报告[N]. 华尔街见闻，2016-06-27. 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251561.
4 硕家姑娘. 又一个即将破灭的泡沫——美国车贷违约率 20 年新高[N]. 汇金网，2016-03-23. http://www.gold678.com/C/20160323/201603231722492244.html.

入减少等[1]。



图 4. 17：美国企业债务占 GDP 比重创历史新高[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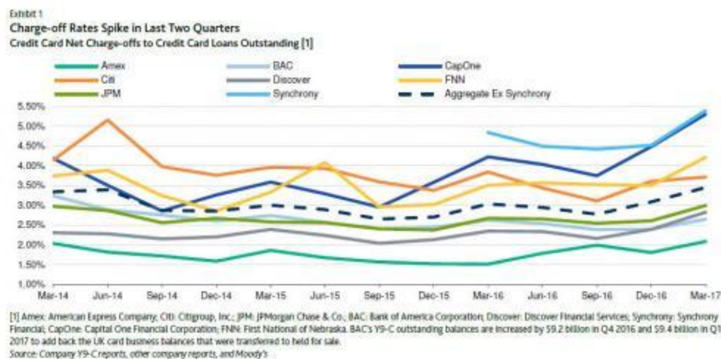


图 4. 18：2014—2017 年美国不同金融机构信用卡坏账率走势[3]

1 张少华. 美国车贷违约率创新高，“次贷危机 2.0”会上演吗？[N]. 华尔街见闻，2017-05-19. 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010567.
2 债台高筑 美国企业债务违约正在攀升[N].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2019-12-04.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9-12-04/doc-iihnzhfz3471661.shtml.
3 双刀. 外媒：美国信用卡违约在金融危机后首次暴增[N]. 凤凰国际 iMarkets，2017-07-03 . http://finance.ifeng.com/a/20170703/15507015_0.s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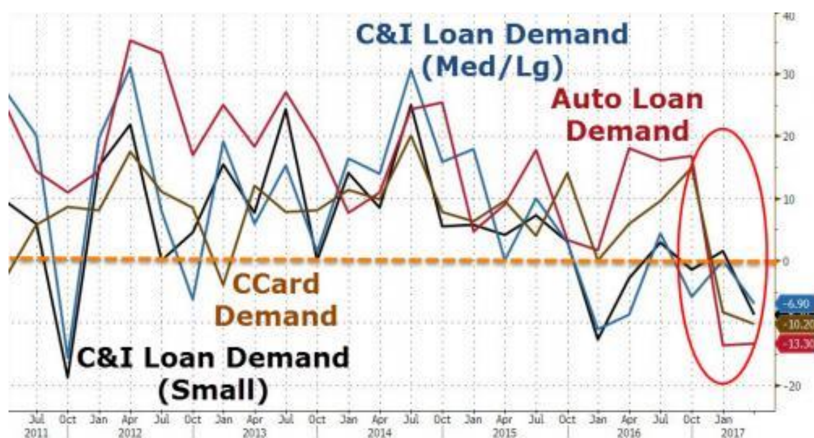


图 4. 19：2017 年 1 月之后美国汽车贷款、信用卡需求等信贷服务需求都出现下降（红色线条代表汽车贷款需求、黄色线条代表信用卡需求）[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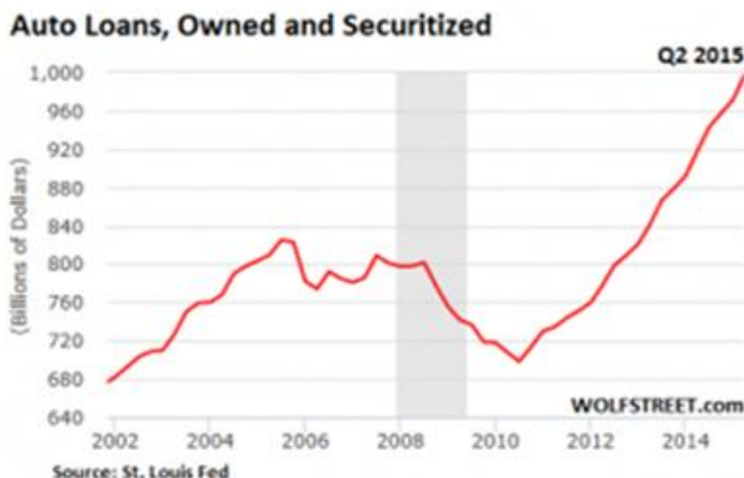


图 4. 20：次贷危机后美国汽车贷增长迅速[2]

1 张少华. 美国车贷违约率创新高，“次贷危机 2.0”会上演吗？[N]. 华尔街见闻，2017-05-19. 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010567.

2 聂琳. 美国信用卡坏账大增 可银行和分析师为何并不担心[N]. 界面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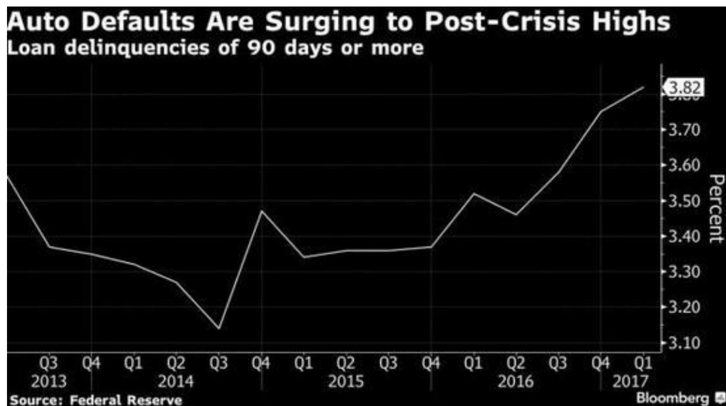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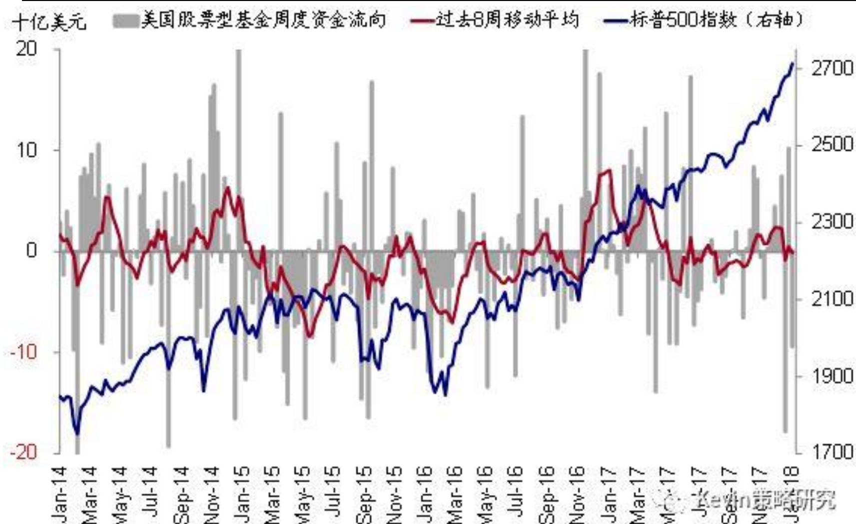
图 4. 21：汽车贷款违约率创历史新高[1]

事实上，比起今后几年，上述违约情况还不算严重，主要是美国基准利率仍在低水平，同时房价仍在上涨。房屋贷款仍是各类贷款违约的主体，只要房价涨，财富效应就发挥作用，买房人预期自己资产增加，不会轻易不还月供，违约情况就不会太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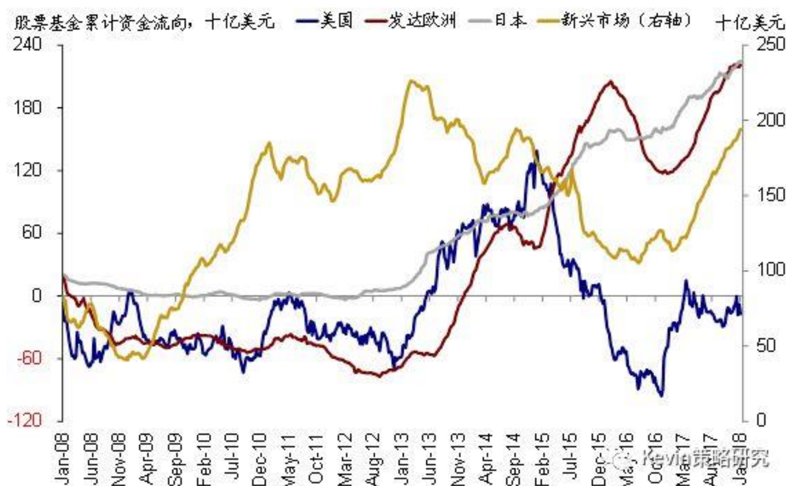
但现在的问题是，“狼来了”喊太久，总有泄气的那一天。美国升息速度过慢，目前美国的升息预期已经无法有效保障资金仍处于持续的净流入状态。从 2017 年下半年以来，投机资本持续从美国股市流出，2017 年年底股票型基金出现 2014 年以来最大单周流出量，单周资金流出规模达 178 亿美元。由于 2018 年 2 月美国股市出现闪崩的波动，未来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将进一步下降，如果当前升息的节奏不出现大幅变化，美国牛市转熊、到最后泡沫破裂的日子也不远了。

2018-01-24. http://www.jiemian.com/article/1897050.html

1 王晓易. 次级贷款卷土重来？美国车贷违约率创下金融危机以来新高[N]. 华尔街见闻(上海)，2017-07-18. http://money.163.com/17/0718/06/CPJU0J9J002580S6.html.



（a）美国股票型基金单周流出美国股市资金量创 2014 年新高



（b）美国股票型基金投资方向转移到欧日和新兴市场

图 4. 22：美国股票型基金离开美国股市情况[1]

---

1 刘刚. 全球资金流向监测：美股再现大幅流出，南北向节后活跃 [N]. 华尔街

(三) 发生金融危机的过程

当前，金融市场已经连接成为一张密网，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市场上主要有两类主体，一类是生产企业，另一类是金融机构。生产企业可以进行农工商业等生产性投资，也可以进行金融投资；金融机构可以给企业提供贷款，也可以进行金融投资。任何一个投机资本，都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投资股票的不会只投资于某一种股票，投资债券的也不会只投资于某一类债券，而要尽可能地分散风险，进行投资组合（见图 4. 23）。这样从某一种金融产品出发，沿着投资主体、投资产品的路径，都会同整个金融市场发生紧密联系。如果某一种金融产品暴跌，持有这种金融产品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不仅会抛售该种金融产品，而且会抛售其他同类金融产品。如果金融资产下跌的范围足够大，很多企业和金融机构都会出现现金流断裂，为了弥补现金流，企业和金融机构会按照金融资产的灵活程度依次抛售所持有的股票、衍生品、债券和房地产，这样就把某一种金融产品的风险连锁传导到其他金融市场（见图 4. 24）。这就是现代金融危机会产生股市、债市、房地产、衍生品连锁下跌的反应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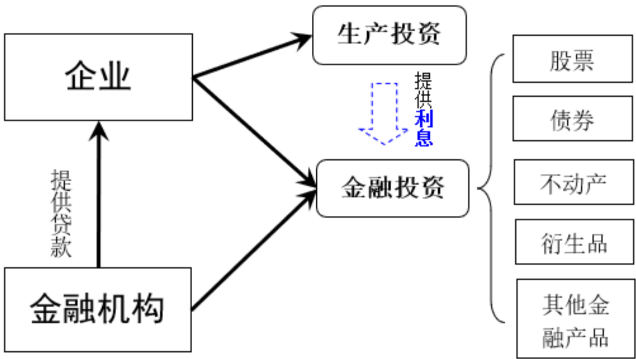


图 4. 23：资本交叉投资示意

见闻，2018-01-05. 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053805.

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也不例外。无论危机发生在股市、债市还是房地产，最后都会演化成一场全面的金融危机。而几个金融市场的逻辑都差不多，都是资金流入就会增长，增速越快越吸引资金流入，资金流出就会下跌甚至崩溃；都是靠杠杆资金进行炒作，杠杆越高盈利越高，同时也越脆弱，承受风险的能力也越差；都是靠生产部门源源不断供给利息才能活，如果生产部门越来越萎缩，短期内金融市场会获得大量资金投入而暴涨，长期就是泡沫繁荣最后破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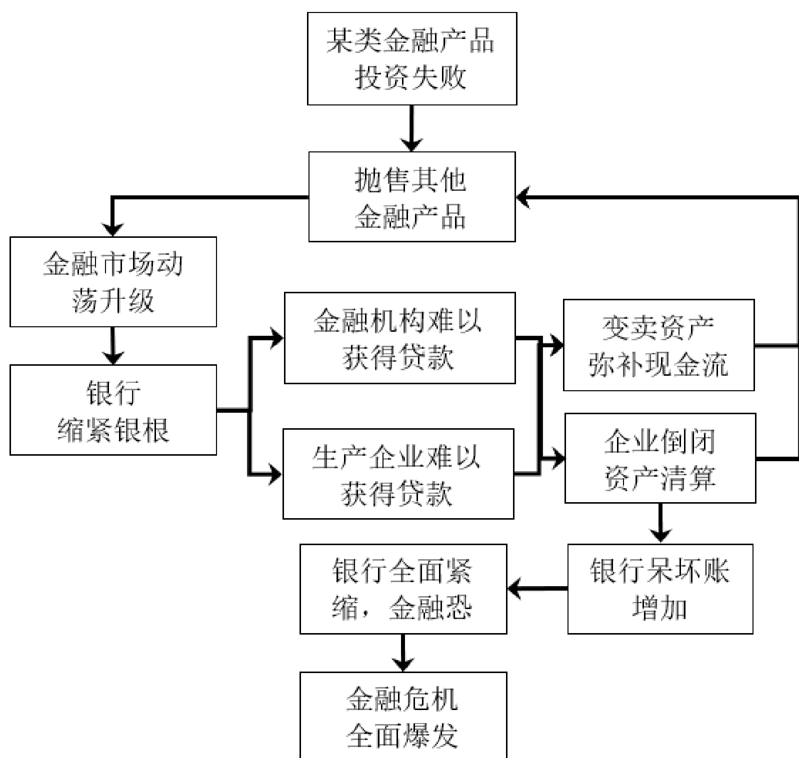


图 4. 24：金融危机连锁反应示意

(四) 历史进程中的危机深度

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是靠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拉动的。在自由竞争时代，随着生产不断超过社会需求，经济发生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到了二战以后的凯恩斯主义时代，产生了负债经济，可以依靠提前消费刺激经济增长；再到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虚拟经济时代，靠财富效应刺激出来的消费归根结底仍是债务，是比凯恩斯时代规模更庞大的债务。对于资本主义而言，靠借钱搞出来的消费，短期内能带动经济增长，长期结局必然是滞胀，所以借助财富效应发展经济，仍是饮鸩止渴。正如马克思所言："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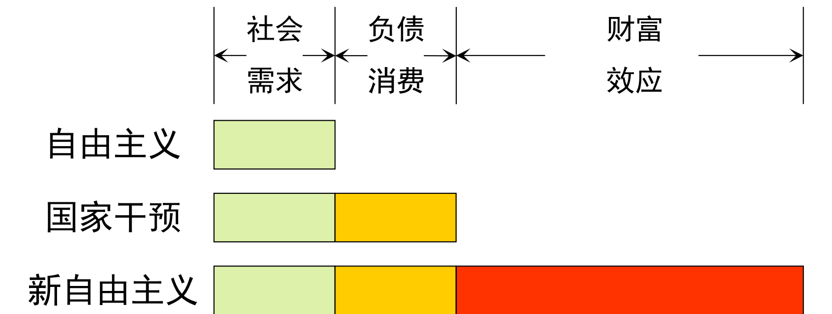


图 4. 25 ：不同历史阶段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示意

从历史进程中看，解决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经济危机的程度是加深的。2008 年次贷危机已深深改变了美国社会。经过 2008 年次贷危机的教训，美国人的消费习惯改变了，开始不那么大手大脚，甚至有人开始存钱了，全社会储蓄率开始回升，产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财富效应减半了

1 马克思. 《共产党宣言》一、资产者和无产者. 马恩选集一卷。

[1]。像以前那样疯长的泡沫经济再也无法提振经济快速增长，而同时美国人却背上了大笔的债务。当前的危机程度要远比滞胀时期更为严重。1980 年美国非金融部门债务占 GDP 的规模约为 140%，而现在这一比例接近 275%，翻了一番。不仅美国的负债水平很高，全球整体负债水平都非常高，日本甚至超过了 400%。多数国家都已经走过了明斯基时刻，债务不可能缩减下来了，与经济相比，债务只能不断地膨胀下去。而与凯恩斯时代相比，现在同等幅度增长的债务能带动的经济增速远逊于原来。最后迎接资本主义的也只能是债务爆炸、信用破产。

(五) 发生大萧条的条件

在图 4. 10 的正反馈机制中，股市危机爆发、房地产市场危机爆发、债务危机爆发等每一环均有可能引发大萧条。但大萧条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利润回报规模显著缩小。21 世纪以来，全球的资本流动以“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为主，这种流动主要目的是通过金融炒作获利，这种金融投机实际上是零和的游戏，如果没有发展中国家源源不断供给利润，发达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也难以维持。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金融泡沫膨胀时期，往往表现为发达国家资本净流入，但到了金融泡沫走向崩溃的时期，资本流动格局就会改变，发达国家表现为资本净流出[2]，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发展中国家的高利润。

发展中国家给发达国家提供的利润回流主要包括四部分。第一，利用债务关系。拉美是典型。1980 年，整个第三世界外债是 5670 亿美元，到 1992 年，连同利息及本金支出，

1 邢荷生，孟令铎. 摩根大通：美国财富效应可能正在减弱[N]. 一财网，2014-04-15.http://www.yicai.com/news/3706811.html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稳定研究课题组. 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2016 年全球资本流动回顾[N]. 中国金融杂志，2017-02-17.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lczx/2017-02-17/details-ifyarrcf4397799.shtml.

发展中国家共向发达国家还债 16620 亿美元，到此时，却债台更高筑，债务余额 14190 亿美元[1]。90 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每年都要以 1500～1600 亿美元的速度偿还债务，但债务仍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2]。次贷危机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逐步走入滞胀之中，外债增速更快。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的统计数据估算，从 2000—2016 年，东亚与太平洋地区（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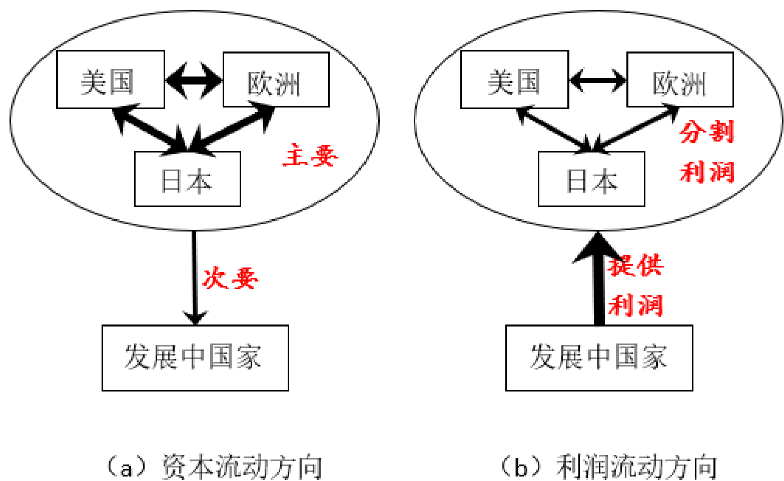


图 4. 26：全球资本和利润流动示意

高收入国家）、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非高收入国家）、欧洲与中亚地区（非高收入国家）累计偿还债务本息 2.01 万亿美元、2.78 万亿美元、2.71 万亿美元，结果到 2016 年，东亚与太平洋地区（非高收入国家）、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非高收入国家）、欧洲与中亚地区（非高收入国家）外债规模已增长到 2.31 万亿美元、1.74 万亿美元、1.52 万亿美元。总计非高收入国家从 2000—2016 年偿还外债本息 8.28 万亿美元，外债却从 2000 年的不到 2 万亿美元增长到 2016

1 刘宇凡．现代金融危机的来龙与去脉[J]．中国税务, 2000(8):25-26.

2 张雷声．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与依附[J]．高校理论战线, 1996(7):54-57.

年的 6.25 万亿美元（图 4. 27 和图 4. 28）。外债是植入发展中国家肌体上的吸血管，只要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有财政收入、银行有利息收入，就要乖乖地将其作为贡赋转入发达国家金融财团的腰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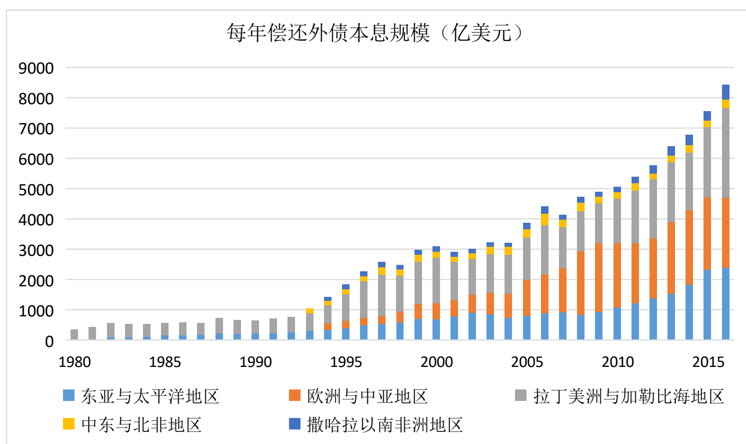


图 4. 27：非高收入国家每年外债本息偿还情况（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估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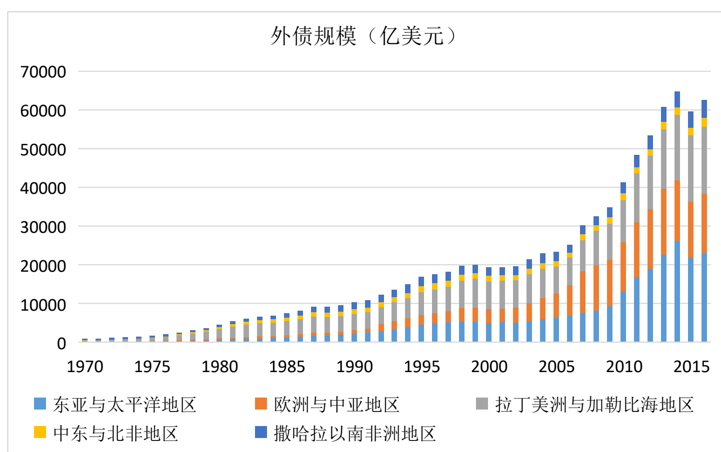


图 4. 28：非高收入国家外债增长情况

第二，通过金融投机，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典型的就是东南亚金融危机，1997 年 7 月泰国发生危机期间，投机资本在几天之内就从泰国掠走 40 亿美元。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还专门谴责过索罗斯等金融大鳄，指出这场金融危机至少给东南亚地区造成 2000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更严重的是危机之后，垄断资本杀回马枪。1997 年 7 月危机爆发以后，有关东南亚国家和韩国的货币已平均贬值了 50%以上，企业、银行的外债随之激增。债台高筑的企业只能被迫接受外商收购或兼并以求得生存，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整顿和关闭的金融公司的资产也正在等待买主的到来。于是东亚的大甩卖开始了，这被国际投资者视为利用其陡增的购买力廉价收购的极好时机。一度不准外国人购买的资产现在都可以“公平交易”了，国际资本大采购的主要领域是东亚的原来不能进入或不能全资进入的或由政府专营的金融服务业、电话电信业，以及超低值的房地产业和可大大降低生产成本的现成的制造业资产[1]。

第三，利用在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投资，通过国际垂直分工体系，获取巨额垄断利润（其利润率远高于发达国家本土企业，也高于吸纳投资的发展中国家本地的私人企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 50 年代表现为发展中国家生产农产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来与发达国家生产的制成品相交换，形成资源性生产与加工性生产的垂直分工；在 70 年代的垂直分工表现为发展中国家生产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生产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随着分工的细化，80 年代垂直分工深入到产品的内部，表现为在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流程中，发达国家从事技术、资金密集型工序的生产，而发展中国家

1 宋玉华，徐忆琳．当代国际金融资本运动规律初探——东亚金融危机所引发的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 1998(6):75-88.

从事非熟练劳动密集型工序的生产，形成产业内非熟练劳动与技术交换的新形式。

第四，通过全球生产体系，直接从发展中国家转移价值。例如很多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子公司，就采取了“高进低出”的做法，压低中国出口价，尽管价值是在中国创造的，但实际财富被直接转移到了美国。例如，一只“格列奥”在德国的售价为 19.95 欧元，而扬州玩具厂制造的“格列奥”出厂价格仅为 1.45 欧元[1]。还有很多，比如广州丰田，利润率一度高达 36%；而德国大众与中国合资生产的轿车，占其全部产量的 14%，中国市场却贡献了其 80%的利润额；通用在美国每卖一辆车赚 145 美元(约合人民币 1160 元)，而在中国却获得纯利润 1.6 万元人民币。

上述四种渠道当中，第四种是最主要的渠道。很多人认为，由于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占发达国家投资总量比例下降，发展中国家回流利润已经很低了，事实上并没有考虑到发达国家利用其政治、军事霸权和经济、技术垄断地位，通过跨国定价、剪刀差等途径，使商品价值转移的因素。2017 年中国出口总额为 2.26 万亿美元，其中对美国、香港、日本、欧盟出口额分别为 5331 亿美元、2793 亿美元、1373 亿美元、3720 亿美元，将上述出口额作为对发达国家出口总额（实际上不止，还有经韩国、台湾等地的转口贸易），假定大陆离岸价占商品最终价值的 15%、发达国家各级商业资本分割利润占商品最终价值的 70%、中间运输成本占商品最终价值的 15%，则通过国际定价体系每年从中国转移到发达国家的剩余价值至少有 6.17 万亿美元，这些财富以商业公司利润、美国海关税收、美国政府税收、贷款利息等形式在资产阶级的不同部分瓜分掉[2]。2016 年中低收入国家出口总额为 5.24 万

1 青木. 闯入世界杯的“中国制造”随处可见 利润微乎其微[N]. 环球时报网络版，2006-06-17. http://www.southcn.com/news/china/zgkx/200606170048.htm,

2 欧美通过与中国的不平等交易获取垄断利润，同样，中国也会通过与其他国

亿美元，按照中国的比例估算，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转移来的利润至少达到 14.30 万亿美元，占高收入国家当年 GDP 的 29%。

也即，如果发展中国家通过上述四种渠道向发达国家转移的利润明显下降，也即发展中国家可能产生危机、利润生产链条断裂，大萧条也就开始了。

第五节　结论与展望

第一，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是“美国消费—中国投资”。80 年代实行新自由主义并未将全球经济带出低谷，90 年代以后的拉动作用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快速发展，形成投资需求，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大力发展虚拟经济，刺激财富效应。财富效应带来的是正反馈机制：美国经济要想继续增长，必须依靠股市、房地产市场繁荣；美国股市、房地产市场要想繁荣，就必须中、日等债权国继续向美国投资，同时全球利润仍流向美国；中国继续向美国投资，前提是中国仍要有大量的贸易顺差和资本顺差；中国经常帐户盈余的前提是中国出口仍然维持高速增长；中国出口高速增长的前提是美国仍不断大量进口，美国经济和美国金融市场继续繁荣。正反馈机制与美国双赤字（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相伴相生，中国的有效需求不足与美国居民的债务攀升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长期来看，美国财政赤字将持续扩大，美元持续贬值，直至金融市场崩溃，导致经济危机。

第二，近期将发生的危机同 2008 年次贷危机同样，应是周期性的危机。目前这一危机尚未爆发，仍处于酝酿期。预测这场周期性危机的爆发时间，主要应围绕美联储的升息

家的不平等交易获取垄断利润。事实上，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一直在提升，2008 年之后出口复杂度已高于进口复杂度。

政策是否成功吸引资本回流美国、美国债务违约率尤其是房地产债务违约率是否大幅上升。在这场危机爆发后，美国除印钞票以外无计可施。未来几年，随着美国 QE 重启，将引发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加剧其他国家通货膨胀压力，并将进一步推高资产泡沫，其带来的汇率波动将为金融投机创造良好条件。

第三，在 2030 年前，全球将发生类似上世纪 30 年代规模的大萧条。2008 年次贷危机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社会，但次贷危机不是终结，仅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序曲。大萧条将在美国仍然实行 QE 或刚刚结束 QE 政策时爆发。在这场危机爆发后，全球的金融市场都将崩溃，几十年印出来的天量纸币将进入商品市场兴风作浪，物价和失业率将同时飙升，全球资本主义的前景只有滞胀。各国资产阶级除了发行国债刺激经济以外，难以拿出有效措施。在这场危机中，国家资本主义步入衰落期，政府干预经济已然左右为难，包括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各种措施全部失效，各国失业率、物价双高现象将持续很久。尤其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将出现天文数字。美元霸权将在大萧条中崩溃，美国的政治霸权、军事霸权也将相继失去，且在危机与局部战争交织的过程中很难再有新的帝国主义领头羊产生。

第四，列宁对时代背景的定位是准确的。列宁提出，当前是帝国主义时代，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时隔百年之后重新审视时代主题，21 世纪不仅是帝国主义时代，而且是帝国主义走向没落和崩溃的时代；21 世纪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且是无产阶级革命走向胜利、赤旗插满全球的时代。21 世纪将见证美国霸权动摇、坠落的全过程，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将纷纷步其后尘。目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已经扩展到全球，难以找到上世纪 80 年代苏东国家那样缓解矛盾的空间，资本主义全球化将全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空前的危机中这个紧密联系的世界将被自己打翻，社

会主义全球化必将成为时代的主流。当前危机重重的地方往往是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也往往是无产阶级力量强大、存在较好发展空间的地方，随着普遍性的社会灾难，无产阶级将快速成长。《共产党宣言》中讲："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在 1917 年十月革命胜利时，俄国是 400 万产业工人带领 1 亿农民进入社会主义；当前全球无产阶级数量远超过百年前，也必将取得比百年前更伟大的成就。

在 170 年前，马恩发表《共产党宣言》，预测说，"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未来资本主义世界中越来越多的结构性危机、社会福利水平削减和成千上万人的生存受到威胁，将继续证明这一预言。"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生活在 21 世纪的年轻人，将有幸见证这一历史进程，也将作为历史的主体亲身参与到伟大运动中来。

我们的时代与中华帝国主义的命运

绪论：把握时代特征

一百年前，列宁在其经典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里，总结了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后半个世纪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揭示了帝国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论证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随后俄国、中国等国的革命实践证实了这个结论，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斯大林和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革命学说，明确提出了关于时代特征的经典提法：“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坚持了这种观点，并在上世纪 60 年代重新表述为“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和社会主义走向世界胜利的时代”，70 年代又进一步提出：“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毛泽东主席在著名的《五二〇声明》中断言，“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关于时代主题的判断发生了根本变化。邓小平在 80 年代中期的多次谈话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论断。邓小平认为，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和历史性竞争的现实说明，在世界范围内尚不存在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形势，当今世界，战争与革命不再是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和平与发展成了世界的两大主题。

邓的这些观点的历史背景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融入了世界新自由主义潮流，中国凭借巨大的市场、充沛而高素质的劳动力和稳定的政治局面、良好的工业基础，成为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续命场，使得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欧美国家滞

胀危机得以化解。搭上了资本主义末班车的中国，资本复兴的进程高歌猛进，一路凯歌。

但是，资本复兴近四十年之后的中国，同样摆脱不了西方国家的困境：生产相对过剩、资本积累条件恶化、产业空心化日益严重。这种困境，在社会层面表现为贫富分化加剧，阶级固化严重，在国际上表现为贸易战、地缘斗争、军备竞赛和逆全球化现象。

一个与此高度相关的问题，也是左翼争论较多的问题，即中国是否是帝国主义国家（简称"中帝论"问题）。争论此问题，并非是简单地弄清楚"是与不是"的问题，而是要服务于我们的目的：认清今天的时代特征、认清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大势，认清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进而从无产阶级的视角出发界定敌我友、把握主要矛盾、确定行动策略。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提出了三个定义：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是最简短的定义，它表明了金融资本的垄断统治是帝国主义的最根本的经济特征。二，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这个定义描述了列宁所处时代帝国主义五大特征。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即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个定义说明了帝国主义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中所占的历史地位和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两个主要派别的关系。

因本书中的一些章节谈到了中国垄断资本的发展以及中国的资本输出与全球争霸问题，因此，本文重点不是从列宁的定义出发来论证中国是否帝国主义国家的问题，重点是谈论方法论问题，从政治意义对相关的机会主义思潮进行辨析，由此来明晰我们对时代特征的认识。

关于"中帝论"的争论中，一些最基本问题是不容回避的，

也是左翼经常混淆的问题：帝国主义到底是一种生产方式、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还是一种相对的交换地位或某种特殊的侵略政策（如有人援引的大卫·哈维的“剥夺性积累”说）？帝国主义是让小粉红们热泪盈眶的祖国强大的象征，还是日趋腐朽与没落的标志？中国今天的问题主要是资本主义“成熟过度”造成的，还是因为受到外力的阻碍导致无法正常发展造成的？以美帝为首的超帝国主义能否实现？帝国主义战争是否有爆发的危险？

第一节　“帝国主义”与“中心国家”

左翼的讨论经常是回避这些最关键的问题，最常见的是用“中心国家”（或“核心国家”）的概念来取代帝国主义的概念，由此进一步产生对时代特征、对中国资产阶级定性判断的分歧，进而影响到敌我友、主要矛盾、行动策略等方面的分歧。

大致来说，世界左翼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从马克思到列宁一脉相承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其内部的结构，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性质。外部的力量也会起作用，但需要通过改变其内部的生产方式来发挥作用。当某个国家的金融垄断资本在发展中占据统治地位，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高度结合起来，这个国家就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即资本主义最高和最后的阶段，也是垂死和腐朽的阶段。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说“超帝国主义”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有其限度，随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斗争的升级，无论国际资本分工细化到什么程度，都不可能解决这个根本矛盾。华为的产品分工涉及 154 家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供应商，其中包括 33 家美国供应商，但是，一旦帝国主义者

认为华为可能威胁到他们的长远利益，这种长期的紧密合作关系便顷刻化为乌有。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已被列宁时代的理论与现实发展所彻底否定，新时代的超帝国主义论（利益一致论）在现实面前同样濒临破产边缘。

另一种则把帝国主义体系当做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剥削与压迫，一些地方能够充分发展是以世界大多数地方“不发达的发展”为代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针对许多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失败，一种替代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观念发展起来了，即依附理论（这里说的是广义的依附理论，包括远航一号等人援引的世界体系论），以弗兰克、沃勒斯坦、阿明等左翼学者为典型代表。依附理论认为，分析的单元必须是整个世界体系，不同的地域或民族国家仅仅是组成部分。与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不同，中心国家与半外围国家、外围国家的地位以及这些国家是否是帝国主义国家，是通过世界资本主义交换体系中的分工地位来确定，通过某些国家被其他国家的剥削来界定，而不是通过其内在的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来界定，也即不是通过这些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程度来界定的。中国、印度和阿根廷等差异巨大的国家被列入半外围国家。前苏联也被列入半外围国家。

依附理论学者的表述与主张各不相同，存在大量含混不清的概念与论述。依附理论的经典作家一般强调不发达国家的统治阶级依附于中心国家的利益，并利用各种国家工具在这些国家制造了一种不发达政策，阻碍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总体来讲，依附理论出现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式微的时代，大致属于进步资产阶级发展经济学理论，它批判本国统治者依附中心国家，强调本国民族利益和民族资本的发展，符合第三世界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目前，依附理论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因为它不能解释在所谓的外围国家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数十年间的工业化进程，也不能说明第三世界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极端不平

衡。它也很难解释近些年来中国在国际分工地位中的快速提升。二十年前，甚至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国际分工地位也高于中国。而这些只能用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中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来解释，只能用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结构来解释。决定这种不平衡发展的，主要不是所谓的国际分工，而是与国际分工相关性不大的一些因素，如国家的政治结构与军事力量、完整的工业体系、高素质的劳动力等因素，这些正是毛时代留下的伟大遗产，市场化改革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强大的垄断集团。否定这一点，将中国混同于一个普通的所谓外围国家或半外围国家，事实上也就是否定了毛时代的伟大成就。

需要说明的是，强调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对“成功”，并不是要否定目前国内明显的停滞与腐朽趋势，而是强调中国这种停滞与腐朽主要不是由所谓的核心-边缘结构来决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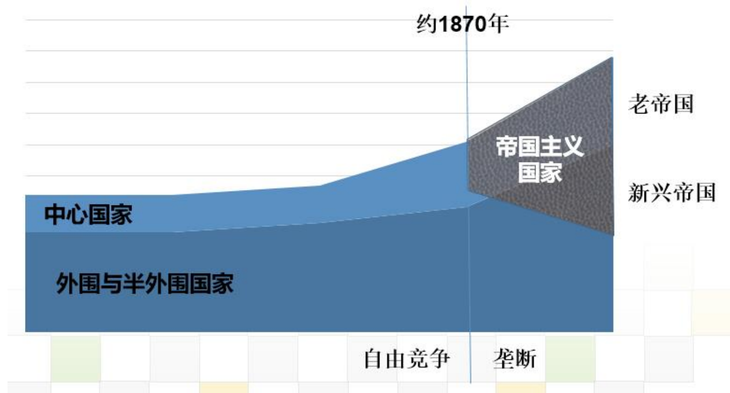


图 4. 29：“中心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区别

如图所示，“中心国家”是一个相对概念，与之对应的概念是“外围国家”与“半外围国家”，自资本主义产生初期就存在了。“帝国主义”国家是个绝对概念，即资本主义最高和最

后的阶段（如果超帝国主义阶段不存在的话），产生于十九世纪后半叶，并延续至今。两者有交集，但内涵与外延不同，用以界定和表现的矛盾运动也不同。

具体到关于“中帝论”的讨论，列宁主义从来没有从“资本主义强国”的意义上去理解帝国主义（尽管帝国主义国家一般是列强），帝国主义国家与“中心国家”也绝非同一概念（如列宁时代的俄国与日本不是中心国家，二战后的苏联也不是中心国家），所谓的中心国家早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初即产生了，而帝国主义国家是 19 世纪末期的才产生的。一些同志将帝国主义国家等同于中心国家、等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与成功，正是小资产阶级强国派的庸俗看法。我们谈论的帝国主义是行将就木的资本主义因其内在的生产方式决定的愈来愈走向腐朽、没落、衰老的阶段。资本越来越多地从实体领域流出而转向金融领域，越来越多地从一个国家流出而在全世界寻找增殖空间，在此过程中，资产阶级被迫去开辟海外市场、强化国家能力与军事力量、加强地缘政治斗争，这正是资产阶级积累危机的表现。而贸易战、科技战、遏制与反遏制战正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不可调和、日益尖锐化的体现，是现代资本主义体系衰老与腐朽的国际体现。

第二节　阶段论、政策论、体系论

“帝国主义”的基本含义自第二国际时期以来至今呈现出“政策论”、“阶段论”和“体系论”等多种视角。不同视角之间既相互补充，又存在着矛盾。

列宁是在阶段论的基础上，弱化政策论，吸纳体系论，进而形成了完整的帝国主义概念体系。

(一) 政策论及其错误

政策论的第一个错误，是认为帝国主义不是根植于经济基础的客观存在，而是以资产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对外扩张

或掠夺的政策，考茨基是这种错误的典型代表。

考茨基在《帝国主义》著作中提出了帝国主义概念，他认为:“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和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 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的实质是“高度发达的新型工业资本”的针对农业国家一种征服政策。而这种政策是资产阶级“情愿采取”的。既然帝国主义仅仅是一种“政策”，那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该“政策”，也可以不采取这种“政策”。也即是说，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阶段，而仅仅是资产阶级选择的一种“政策”。再进一步说，在考茨基看来，帝国主义存在的基础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帝国主义的出现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如此一来，由帝国主义所必然带来的矛盾，也就不再具有必然性。因此，考茨基认为，只要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联合起来，组织成为世界统一的托拉斯，就可以消除帝国主义的矛盾、实现持久的和平。

政策论的第二个错误，是把某些帝国主义国家基于自身独特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条件而制定的某些特殊的对外扩张或掠夺的政策，视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

中国左翼有人认为:

帝国主义就其性质而言，必定意味着经济剩余从落后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转移……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表现为金融掠夺与劳动力吸纳。在此背景下，中国主要是属于被剥削者，而非剥削者。再者，中国政治-经济的本质迄今还是以生产导向为主，这就构成了对新自由主义的顽强抵抗，也抵消了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全球范围的生产性投资不足、危机趋向。也正是这个本质，通过促进中国自身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性投资，成为抵抗全球范围的投机导向的重要力量。

这些左翼人士认为，帝国主义的本质是“经济剩余从落后

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转移”，并且这种转移，在当前的时代，体现为 “金融掠夺与劳动力吸纳”。在这些左翼认识看来，一个国家即使资本的垄断程度再高，即使金融垄断资本与政权的结合再紧密，但只要不是用“金融掠夺与劳动力吸纳”的方式来进行“经济剩余从落后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转移”的，就不能称为帝国主义国家。

还有左翼人士则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帝国主义国家，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帝国主义租”，它是衡量帝国主义的主要指标。在他们看来，如果某个国家有超额利润，但没有帝国主义租（它的超额利润来源于掌握核心技术或者资本垄断，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手段获取高额利润），即使这个国家资本垄断程度再高，也不是帝国主义。美国通过美元可以获取大量的帝国主义租，欧元可以分享其中一部分，但人民币距离这个还很远。他们据此否定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

在列宁的阶段论视角中，除了垄断资本的发展等根本特征外，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各自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条件的不同，帝国主义的特征在每个国家的表现形式、发展程度有着很大的差异，并不以一定的政策来界定：美国是托拉斯帝国，德国是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容克帝国，英国和法国是典型的食利型帝国，俄国与日本则是对西方资本带有依附性的封建军事帝国。如果套用今天的“帝国租”等概念，大概只有英、法两国有帝国主义资格。但英法工业资本的相对衰落与食利型帝国的特征，正是英法坠落成二流帝国主义的内在原因。

在论述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时，《联共布党史》和《苏联共产党历史》等著作是按照列宁阶段论思想来论述的，即强调俄国的帝国主义阶段性，同时也不否认俄国对西方资本的依附性与经济上的半殖民地国家色彩。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前者，即在俄国封建军事性国家支持之下的垄断资本的高速发展。如果列宁不从“阶段论”的角度坚持强调俄国的帝国主

义特征，那俄国布尔什维克恐怕会陷入护国主义的泥潭之中，伟大的十月革命就是句空话了。第二国际的西欧共产党领袖们大都滚入了护国主义的泥潭之中，俄国作为一个经济上的半殖民地国家陷入护国主义泥潭就更容易了。

“政策论”的共同主张是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对外扩张政策或手段，“阶段论”则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同时也是垂死与腐朽的阶段。

“政策论”目前占据了很大市场。“政策论”在一定条件是有其进步意义的，表现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批判与揭露上。它也是一种“安全的”学说，可以在庙堂之上讲述，所以有广泛的影响。比如阿明等人长期以来与中国政府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关系。“政策论”将批判的目标对准了个别帝国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一些特殊政策，而将本国的金融垄断资本排除于视野之外。在一定条件下，“政策论”是服务于本国大资本利益的，左翼中的“政策论”为机会主义打开了窗口。打着反帝的幌子，同时又将自己捆绑于民族主义的战车上，服务于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目标，而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

(二) 体系论及其错误

体系论的根本错误，是无视各帝国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把帝国主义国家在某个时期基于其力量对比而形成的暂时平衡，视为牢不可破的体系。“体系论”试图用宏大的体系视野来替代阶段论视角。例如，萨米尔·阿明认为，历史资本主义一直就是“帝国主义”的，因为它从诞生（16 世纪）便在中心与边缘地区之间产生两极分化，这种分化在后来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加深。可见阿明与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两回事。“体系论”在远航一号等人的叙述中表现得十分典型。远航一号等人将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看得十分强大、十分稳固，恐美之情溢于言表：

但是，只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不改变，这就是一场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赢得的竞赛。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垄断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技术封锁。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和高科技人才的投入。除了个别领域，社会主义国家在资金与人才方面，不可能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竞争。(《21 世纪与共产主义》)

在远航一号等人看来，不仅现在中国的发展由这种所谓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所决定，连过去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也受这种天上掉下来规律所支配，社会主义的失败在所难免。远航一号等人的唯心史观可见一斑。

列宁也谈论“体系”。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谈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时，其中有一条“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列宁认为近代以来的殖民侵略战争都是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瓜分世界市场的直接手段，殖民侵略战争养肥了帝国主义列强，也制造了被殖民国家的苦难史，造成了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

但列宁眼中的这种“体系”决不是远航一号等人眼中的决定性力量，而是一种脆弱的平衡，一种随时可能变迁与瓦解的临时共同体。列宁的一大贡献，是发现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1915 年，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首先阐明了这个规律。这个规律的发现，进一步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重要论断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战以来的西方帝国主义体系的相对稳固，并不表明这个规律失效了，而是二战之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力量对比是以美国为首的“一超多强”，且存在着以中国为首的第三世界阵营和强大的苏联集团，为了对付强大的外敌，帝国主义之间一直保持着相对的团结和力量平衡，即阿明所谓的“集体帝国主义”和美欧日“三合会”。

这个“集体帝国主义”“三合会”不是万古长青的。相对的

团结与平衡正在被打破。以中国为首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崛起，中俄准军事联盟的建立，欧洲与美国的渐行渐远，日本的“正常国家”追求的主要障碍不是别国，正是美国。欧洲两大国法德在反对“孤立主义”的名义下批评特朗普公然的民族主义政策，发出建设“一个主权欧洲”的信号。马克龙自上台以来一直推动建立欧洲联军。2019 年 10 月，马克龙更是在一年一度的驻外使节会议上公然提出了“西方霸权正在终结”的言论。西方国家领导人公然提出这种结论是非常罕见的。马克龙暗示欧洲要进行战略调整，第一步将从重获“军事主权”开始，声称“我们经历的是，北约的脑死亡”，不能再依靠美国来保卫欧洲，否则将“不再掌握自己命运”。这种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内发生的，由来已久。马克龙说：“这不只是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的，早在特朗普之前，美国的其他总统也作出了其他错误选择，克林顿的对中政策，小布什的战争政策，奥巴马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量化宽松政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可以比马克龙更进一步：无论美国总统作出何种选择，美欧渐行渐远的趋势都无可挽回。

从考茨基开始，超帝国主义论有很多变种。阿明虽然提出了“集体帝国主义”的概念，但并不认为管理全球化资本主义的“世界政府”会出现。而远航一号等人所理解的世界体系论（这里强调是远航一号等人所理解的，与沃勒斯坦本人的想法不尽相同）则已经十分接近超帝国主义论。近些年国内理论界争论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新时代超帝国主义论的变种）是否已经替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成为帝国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一度也甚嚣尘上。

但是，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日渐严重的今天，逆全球化已成为一股潮流，列宁的观点仍是最能够解释今天的时代特征的。

第三节　中国：未老先衰的末代帝国

(一) 帝国的崛起

具体到中国，我们需要分析一下，未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因为其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导致其无法进一步上升，还是因为国内垄断资本必然产生停滞和腐朽的趋向窒息了社会的发展？如果是前者，那我们可以将中国理解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本的发展仍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如果是后者，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则是占统地位的国家垄断资本。

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论核心的观点是分工决定论。共同点是强调国际分工对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分工体系的固化，导致国际社会的两极分化与秩序固化，富国愈来愈穷，穷国愈来愈穷。这种情况在一些国家是比较严重的。但中国的情况是否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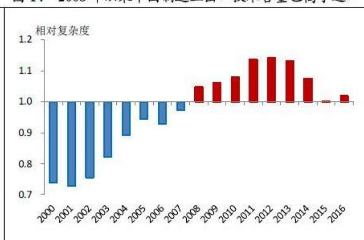


图 4. 30：2000-2016 年中国制造业进出口技术含量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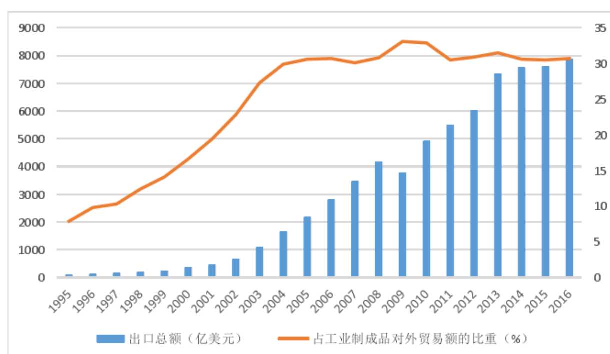


图 3-1 高技术制造业出口贸易状况

Figure 3-1 Export Trade Situation of High-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数据来源：EPS 全球统计数据库①

图 4. 31：1995-2016 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贸易状况

以上几张图显示了 2000-2016 年中国制造业进出口技术含量比较、1995-2016 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贸易状况、1995-2016 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总体出口技术复杂度。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一直在提升，2008 年之后出口复杂度已高于进口复杂度。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额占工业制成品的贸易额的比重也是不断攀升，由 1995 年的 7.9%增加到 2016 年的 30.7%，这期间高技术制造业总体出口技术复杂度也同时得到了提升。

附加值的大小直接影响一个产业的发展，根据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更高，如上图所示，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自 2000 年以来，附加值基本呈上升趋势，2015 年附加值高达 2694.98 亿美元，是 2000 年的 13.4 倍，除了 2009 年、2012 年附加值受世界宏观经济环境影响下降外，其他年份都是增加的。中国资本总体来讲是受益于全球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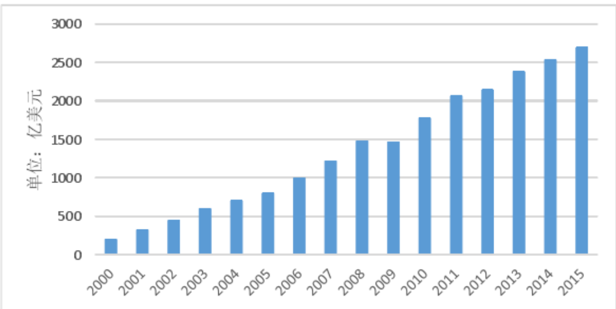


图 3-5 高技术制造业附加值状况

Figure 3-5 Additional Value of High-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数据来源：OECD-TIVA 数据库

图 4. 32：2000-2015 年中国高技术制造附加值状况

不可否认，中国一些行业，比如汽车等行业，在历经几十年的技术引进后，至今仍无法达到国际竞争的前列，出现了所谓“低端锁定”的情况。但是，鉴于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人才储备以及可以构建一带一路等区域价值链体系，这种局面并非是不可改变的。

总体来看，人们所担心的中国加入 WTO、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之后分工地位无法提升的局面并未出现。这就说明，分工决定论并不适合中国。全球化、国际分工本身并非是坏事，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打破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固化因素。全球化客观上为一些地区工业化和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奠定了基础。

(二) 中国特色的垄断资本

分析帝国主义问题的核心与基础在于对垄断组织的分析。我们可以把《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视为世界垄断组织的排名。2019 年 7 月 22 日发布的最新《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中，有 129 家来自中国，历史上首次超过美国（121 家）。即使不计算台湾地区企业，中国大陆企业（包括香港

企业）也达到 119 家，与美国数量旗鼓相当。30 年前的 1989 年中国企业第一次登上世界 500 强榜单，当年仅中国银行一家上榜。

中国垄断资本的一大特点，就是国企占据重要地位。入榜世界 500 强的中国企业中，国企占 70%左右，其中有 48 家央企。入榜企业中采矿及原油生产、金属矿业、银行等行政垄断型企业比重较大。大型国企与政府关系密切，国企领导人与党政机构领导人可以互相调动，各企业可以通过国家进行协调，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垄断资本的规模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所有国有企业可视为一家，党政军企可视为一家。这种集中精力办大事的优越条件，造就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型垄断组织发展速度。这类似于当年德、俄、日等相对落后国家的情形，在技术相对落后的情下，充分利用封建国家的能力快速发展垄断组织，再反过来推动技术的进步与市场的发展，这是后发帝国主义国家的特点。

伴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对外投资也在高速发展。根据 2019 年 9 月 12 日商务部、 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 «2018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数据，2018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1430.4 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 1.98 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位。中国打破了发达国家主导对外直接投资的世界格局。

有人认为，中国对外投资的利润率较低，特别是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存在绩效低下、管理不善问题，且中国对外投资类型以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因此中国的对外投资性质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由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容，官方表述也主要是“五通”的内容，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最终目的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

但是，中国资本并不是学雷锋的。中国的对外投资，包括“一带一路”建设内容在内，除了创造市场机会外，还有其他多重考虑，短期获利并非唯一目的和主要目的。多途径利用全球资源是一个重要目的，“一带一路”国家石油储量占世界石油总储量比约 57.11%，“一带一路”的实施有助于消除中国与全球资源类国家的贸易壁垒，降低贸易与投资的成本，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

“一带一路”等项目在地缘政治上也具有重要意义。“一带一路”通过增加国与国之间的深度经济合作形成利益联盟，形成自己的政治经济朋友圈。美国智库就“一带一路”倡议发布研究报告称，通过对中国在孟加拉国、斯里兰卡、柬埔寨等 15 个中资港口项目的分析，发现相关项目并非为实现“双赢”的经济发展，而是产生了政治影响力，扩大了中国军事存在，反映了中国的安全意图。

在对外投资快速扩张的同时，中国也悄悄修改了国防政策。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解放军实行海外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日益增多，因此不仅要关注国家生存利益，还要关注国家发展利益；不仅要维护国家固有的“领土边疆”，还要维护国家发展的“利益边疆”。“仗剑经商”的概念也经常出现在主流媒体中。自 2008 年底开始，中国海军在亚丁湾索马里海盗频发海域开展护航活动以来，中国这一活动从未中断，至今已持续 11 年，30 余批次。中国在海外的军事基地也在悄无声息地发展，2017 年 8 月 1 日上午，中国军队正式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据观察者网报道，美国《华盛顿时报》网站 2018 年 1 月 3 日报道称，2017 年 12 月期间，中国军队的一个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双方商定在瓜达尔港附近的吉沃尼半岛，设立一个中国“大型海空军事基地”。而由中国运营的瓜达尔港本身也具有很高的地缘与军事价值。

官方公布的 2019 年中国国防预算大约为 11899 亿元，约

1776 亿美元左右。仅次于美国。近年来中国军费增长速度一直是最高的国家之一。



图 4. 33：各国军费增长率对比

美国总统特朗普公然宣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而法、德等欧洲国家则高举“全球主义”的旗号捍卫欧洲的利益。而中国与俄国，按 FT 中文网评论说，中国是学会了“像全球主义者那样说话，像民族主义者那样行事”。

(三) 未老先衰

据长期观察国际货币市场的日本前财务官行天丰雄预测，美元的轴心货币地位短期内难以动摇，唯一能动摇美元地位的威胁，是“美国国内日趋严重的社会分裂”。这名学者认为，距离 2020 年的总统选举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日趋变得保守的美国自身存在风险。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研究半个世纪的全球化的结果时提出，世界贫富分化正在日趋严重：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西方国家 10%收入最高的人口占据着大约三分之一的社会总财富；而 2014 年则进一步急升至 70%至 75%。也就是说，在发达国家中 10%的高收入人口占据了 75%的社会财富。

因此，帝国主义面临的最大风险，并非来自别国的挑战，而是自身不可遏止的衰朽趋势。当代美国如此，历史上的英法也是如此。我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谈“中帝论”的。决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不是美帝的威胁，正是中国垄断资本的积累规律。搭上帝国主义末班车的中国资本正走向一条未老先衰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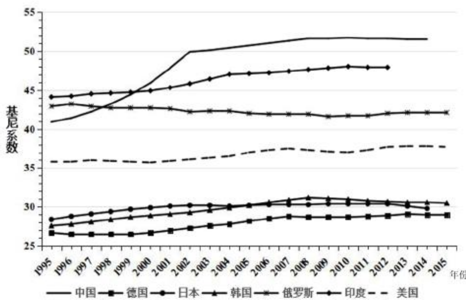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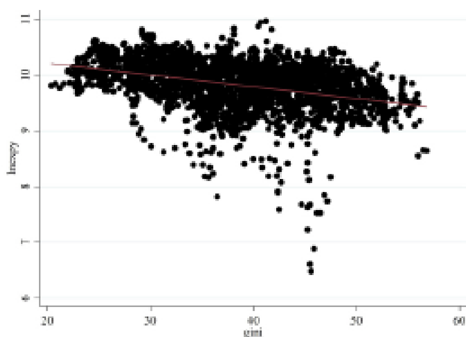
图 4. 34：1995-2015 部分国家的基尼系数变动趋势

上图显示，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分配状况要优于发展中经济体，美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在发达经济体中最为严重。特朗普挑起的贸易争端，其背后的深层次动机，就是将美国国内长期恶化的收入不平等问题转移为外部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以国际争端来缓解国内矛盾。而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正一骑绝尘，一路狂飙，在短短三十四年的时间内，将世界上主要大国甩在了后边。

收入的不平等反过来会影响资本积累。据相关研究，在控制其他影响消费的变量的前提下，收入不平等与居民消费率显著呈“倒 U 型”关系，当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小于 0.39 时，居民消费率随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而增加，当其超过拐点 0.39 后，居民消费率则随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而减少。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 0.39，如不能有效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

靠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是无望的。

收入不平等不仅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对贸易模式及结构也会产生深刻影响，特别是对出口贸易的整体技术水平也会产生影响。



b　收入不平等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散点图

图 4. 35：收入不平等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散点图

上图是出口技术复杂度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散点图，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大致呈现出负相关性，初步表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将降低出口贸易的技术复杂度。也就是说，中国要进一步提高在世界中的分工地位，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国内阶级分化状况。

中国垄断资本的快速崛起，得益于中国特殊的政经结构，但同时，其空心化与腐朽化的速度也高于一般的国家。

2019 年入榜世界 500 强的中国银行 11 家，平均利润 181 亿美元，是全部中国企业 35 亿美元的利润的 5 倍多，银行总利润高达 2000 亿美元，占中国入榜企业总利润的 50%。企业利润多数流向银行并不是因为中国银行经营水平超高和竞争力超强，而在于银行业的准入限制造成的垄断经营以及政府宏观金融调控政策不当造成的银行特殊地位。银

行本来应该服务于实体经济以及其他产业的发展，如果借助自身垄断经营优势而获取超额利润，则必将阻碍实体经济以及其他产业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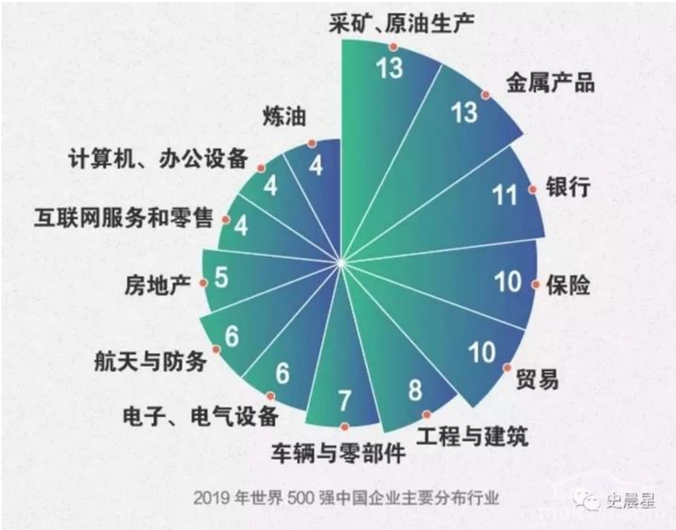


图 4. 36：2019 年世界 500 强中国企业主要分布行业

另一个让人震惊的数据是，入围全球 500 强的五大房地产企业全部来自中国，恒大以 705 亿美元营业收入排名第一，碧桂园、绿地、万科、保利分列 2-5 名，在全世界的舞台上，中国房地产企业一骑绝尘、独孤求败。

2019 年入榜世界 500 强中国企业中，大多数属于能源、泛金融等行政垄断型行业，实体产业偏少。

中国资产阶级已经走上了一条“脱实向虚”的金融化、空心化之路。2008~2018 年，我国房地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由 4.61%上涨到 6.87%；从金融业来看，我国金融行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在 2005 年时仅为 4%，至 2018 年已上升至 7.68%，尤其是 2016 年底这一比重高达 8.4%，已接近甚至超过了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历史高位。

货币"脱实向虚"与虚拟经济之间存在一种正向反馈机制，即虚拟经济繁荣会加剧货币"脱实向虚"，货币"脱实向虚"又反过来强化虚拟经济繁荣。在经济下行背景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一定能够有效刺激实体经济复苏，反而有可能加剧经济虚实背离。目前中国金融业对货币"脱实向虚"作用强于房地产业，这与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有关。其主要表现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扩容，如期货市场不断推出新的期货交易品种，债券市场交易规模扩大等。

在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产业结构比重中，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占比已超过 20% ，而同期制造业、建筑业等传统实体经济部门的比重则从战后初期的 50% 下降到了不足 30%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失衡下的"产业空心化" 成为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美国尽管提出了再工业化的战略目标，但基本没有收效。空心化的总趋势不会有任何改变。

无独有偶，日本政府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就提出了"产业空心化"的治理措施，其中包括向中小企业实施减税计划、对中小企业提供补贴和融资支持、加快建立高新技术主导产业、通过央行干预汇率缓解日元升值、完善外国对日投资的法律法规等。但从实施效果看，日本的经济仍长期处于低速增长的萧条状态，并未从 "产业空心化"的陷阱中走出。

中国资产阶级在世界资本的寒潮中，陷入了未老先衰的局面。

结语：衰朽与希望并存

中国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根据其研究帝国主义论的最新成果，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我们认为，新帝国主义既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一般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发展到国际垄断的新阶段，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新扩张，也是极少数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的新体

系，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霸权主义的新政策；从现阶段国际正义力量和国际阶级斗争的曲折发展来判断，21 世纪是世界劳动阶级和广大人民进行伟大革命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伟大建设和快速发展的新时代，是进步的文明国家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是新帝国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逐渐向全球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程恩富 鲁保林 俞使超：论新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特性———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

在马列主义话语的掩盖之下，这个结论有两个本质问题：

第一，所谓“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一般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发展到国际垄断的新阶段”，这是直接违背列宁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国际垄断”只能是一种现象或政策，但无法掩饰包括中国资本在内的国际垄断资本间的明争暗斗、渐行渐远，“国际垄断的新阶段”的超帝国主义是永不可能实现；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伟大建设和快速发展的新时代”，前提是摆脱现有资本积累规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中国早就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在资本主义发展了 40 年后的今天，同样深陷资本主义发展危机，这样的“新时代”与百年前的帝国争霸年代并无区别。中国的官方与民间左翼在谈论帝国主义问题时，热衷于批判西方帝国主义的政策，却忘记了全球最大的垄断资本集团——中国国家垄断资本集团的存在。“进步的文明国家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与“国际垄断的新阶段”也并无本质区别。

这是一个资本积累危机全面爆发的年代，这是一个资本主义进行“时间-空间修复”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年代，这是个“全球化-逆全球化”的钟摆又开始逆向摆动的年代。这是个日益接近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总爆发的年代。这个爆发的规模与

烈度将远超以往一切危机。“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战争”，尽管有核武器的存在，但是，核武器只能改变冲突的形式，并不会改变冲突本身。这是个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反动”的年代：资本主义高涨期的一些“普世价值”的信条逐渐为赤裸裸的沙文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所取代。

这也是个充满希望的年代：作为全球最大的民族国家，中国人民在突飞猛进的全球化年代，大部分人已成为工业人口，无产者超过 4 亿，这是有史以来全球最大的单一国家无产阶级队伍。这个队伍一旦觉醒并团结起来，将爆发出任何力量无法阻止的威力。这也是个全球无产阶级前所未有面临共同处境的年代，“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具备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是个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年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技术的发展终归有利于无产者，大资本试图垄断信息权，但却无能为力。

这也是个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甚嚣尘上的年代。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在国家与民族的大旗下，纷纷滚入机会主义的泥潭中。今天中国勃兴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同样在腐蚀无产阶级的意识，影响无产者的团结。考茨基被列宁批评为“最精致的，用科学观点和国际观点精心伪装起来的社会沙文主义理论”。无独有偶，今天中国左翼同样有人鼓吹“团结”“资产阶级左翼”，捍卫国家垄断资本，将自己绑在帝国扩张的战车上。这些观点最终会演变为“最精致的，用科学观点和国际观点精心伪装起来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理论。但是，只要我们今天意识到这一点，就有了最终战胜这些机会主义的保障。胜利终将属于中国工人阶级。

资本输出与全球争霸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深刻地分析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大国的演变，即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之一便是资本输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由于资本输出能对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将以资本输出为主线，来分析已经转变为帝国主义的中国如何试图在全球扩展自己的影响，以及这种扩张所必然带来的争霸局面。

第一节　中国对外投资的历史过程

(一) 1979-2012 年：从资本短缺到资本过剩

1979 年，十年文革的“噩梦”刚刚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美好蓝图已经绘就，经济建设代替阶级斗争成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正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以加入世界资本主义大家庭的时候，却面临着资金不足的困境。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提出了搞贸易合作区的大胆想法，邓小平听后表示:“中央没有钱, 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国内资本的不足只能用引进外资来弥补。八九十年代，外资成了资本短缺的中国社会的香饽饽[2]。

1979 年至 1996 年，中国经济的特点是短缺经济，生产能力没有相对过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短缺经济下的经济过热，即投资端或消费端需求过剩，导致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价格猛涨，进而导致经济领域中轻重工业结构失调。1996 年之后，中国经济步入过剩时代，900 种主要工业品、60%的企业生产利用率不到 50%。1998 年的中

1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7 年。

2 尹永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历史考察（1978—2005），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2006 年。

国经济，来到了经济危机的边缘，大量商品卖不出去而被迫成为库存——1998 年商品库存 4 万亿，占 GNP 的 50%。WTO 和城镇化挽救了中国经济，从 2002 年开始，中国经济在“出口——投资”模式的拉动下快速增长，资本得以在实体经济中获得大量收益。

2004 年之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净额均在 70 亿美元以下（2001 年为 69 亿美元）。2005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首次突破 100 亿美元（2005 年为 126.6 亿美元），占全球比重 1.46%。从该年开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攀升，至 2007 年对外直接投资已达 265 亿美元，接近 2001 年的 4 倍。然而，当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却高达 783 亿美元[1]，直接对外投资/实际利用外资=0.34，中国仍然是资本净输入国。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出口骤减。短暂的工业萧条后，中央政府出台了四万亿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城镇化进程得以进一步持续，中国经济从“出口——投资”模式转为“负债——投资”模式。企业大量负债投资，铁路、机场、桥梁等基础设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房地产和基建带动整个社会经济欣欣向荣。重化工业产量井喷，轻工业蓬勃发展，各行各业赚钱赚到手软，今日的资本家依然在怀念那段梦幻般的黄金时代[2]。

也就是在 2008 年，中国资本的过剩已经初露端倪。2008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猛涨一倍有余，达到创记录的 559.1 亿美元，占全球比重 3.01%。其后稳步上涨，至 2011 年达到 746.5 亿美元，占全球比重接近 5%。从 2008 年至 2011 年，直接对外投资/实际使用外资≈0.6，中国仍然还是资本净流入国家，但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速却明显快于实际利用外资的增

1 此为按商务部数据直接投资项下实际使用外资。

2 2017 年美团创始人王兴演讲：我对当前形势的思考。演讲中，王兴称：“而过去中国这些年是什么情况呢？傻逼经营一个企业都能赚钱 http://www.sohu.com/a/136956695_561580.

速。

(二) 2012-2016 年：资本输出快速增长

2012 年，新一届领导核心上台，新时代领导人面临的是远比父辈们更加棘手的问题。2012 年，4 万亿强心剂的药力褪去，经济增速在达到顶峰之后开始走下坡路，整个中国的生产在疯狂的扩张后已经全面过剩。过剩导致商品价格暴跌、利润大减和各行各业的萧条。随着城镇化的结束，“负债——投资”模式进入尾声。2015 年上半年，钢企每吨钢利润从之前的 1000 元左右暴跌至仅有 0.43 元[1]，2015 年全国 90 家大型煤企的利润减少 500 亿元，同比下降 91%。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感叹：“卖一吨煤的利润买不到一瓶饮料。”[2]资本在国内实体经济的投资空间越来越小，实体经济已经衰退，巨量资本必须要去寻找新的空间。从 2014 年至今，中国社会依次见证了股市[3]，P2P[4]，共享经济[5]、直播[6]等一个个全新领域在资本带动下的短暂狂欢，又见证了这些领域迅速的垄断和过剩。它们的空间都太狭小了，根本无力承接过剩的资本。国内增殖的空间越来越小，环境越来越恶劣。

资本主义时代的过剩都是相对过剩。历史上的大萧条时期，与资本家倾倒牛奶、焚烧粮食相伴而生的，是千百万劳

1 钢铁第三季出炉 钢铁每吨净利润还不如白菜价！[N]. 中国回收商网，2015-10-16. http://news.huishoushang.com/61841.html.

2 顾静芳. 产能过剩煤价下跌，山西书记王儒林：卖一吨煤买不到一瓶饮料[N]. 澎湃新闻，2016-02-25. http://news.huishoushang.com/61841.html.

3 2014 年，央行降息刺激股市；2015 年上半年，A 股崩盘。

4 2015 年，监管部门清理 P2P，大量平台爆雷。此后每年，均有百亿量级的 P2P 公司暴雷。

5 以共享单车为例，2015 年秋 ofo 登录北大校园，首次亮相，2017 年，共享单车企业暴涨至上百家，2018 年，大量共享单车企业倒闭，至今整个行业仅剩下摩拜、哈罗单车，小蓝单车几家巨头垄断几乎全部市场。

6 2014 年，直播行业兴起，几年内直播平台井喷。2019 年，仅剩下虎牙和斗鱼两家直播平台独大，连自带流量、背靠万达，由王思聪一手经营的熊猫直播也已经破产。

动群众的饥寒交迫。今天的中国，同样有广大的农村急需要资金的投入，来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但这些地方，对资本来说太缺乏吸引力了。资本追逐的是利润，市场化条件下要追逐平均利润，在垄断时代甚至要追求超额利润。落后的农村无法提供充足的空间。而城市工业领域，市场已经饱和乃至垄断，行业厮杀异常激烈，利润空间微薄。相对于资本增殖的需要而言，中国国内的环境已经严重过剩了。



图 4. 37：2012 年之后资本过剩，实体经济对资金的吸纳能力下降[1]

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强国（如一战前的英德，二战前的德日），面临国内市场过剩的困扰，都会选择把目光转向海外，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市场空间，实现对过剩资本的输出，从而获得较高的利润[2]。资本增殖的本性使得资本家必须寻求海外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正如列宁所说，“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

1 兴业证券研究报告：资本过剩年代认识本轮周期的三个问题，2015 年。http://www.doc88.com/p-6035384231252.html.

2 保罗 斯威齐 《资本主义发展论》。

(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1]

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也要遵循同样的逻辑。中国对外资本输出从 2012 年开始再次提速。金融危机以来，对外直接投资与实际使用外资的比值大致稳定在 60%左右。2012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实际使用外资的比值从 2011 年的 0.63 猛增到 0.77，2014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量更是首次高于实际利用外资量[2]，二者比值达到 1.03。

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到 2016 年，中国资本输出达到顶峰，直接对外投资额高达 1961.5 亿美元，占全球比例高达 13.51%，位居全球第二（第一是美国，占 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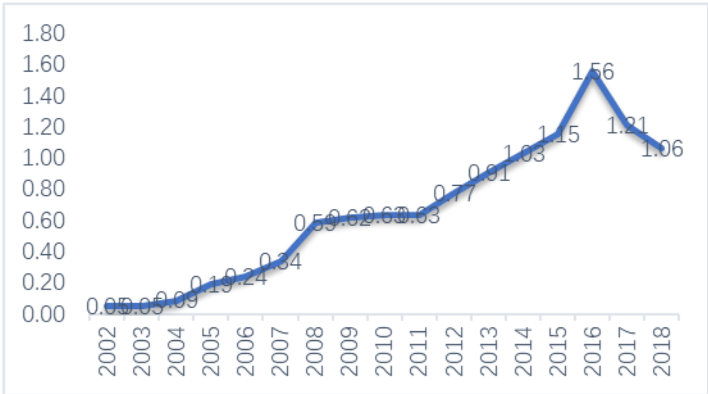


图 4. 38：1990-2018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际使用外资[3]

1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7 年。

2 指外商直接投资项下实际使用外资。

3 数据来源：IFID（同花顺）。本数据最终由商务部提供，数据与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有出入，按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2015 年才达到净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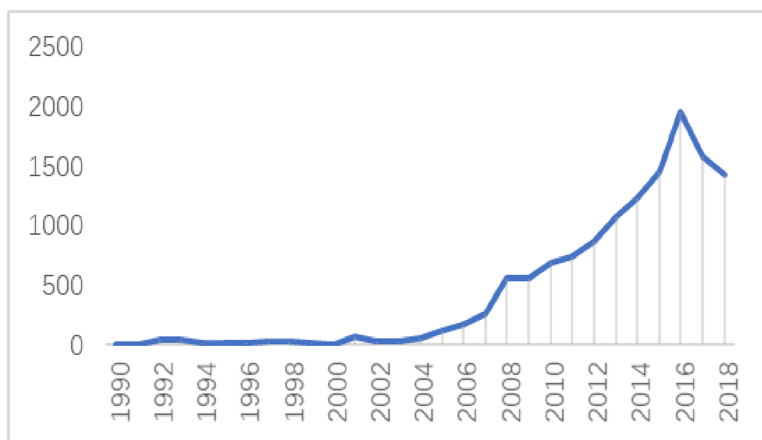


图 4. 39：1990-2018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亿美元）[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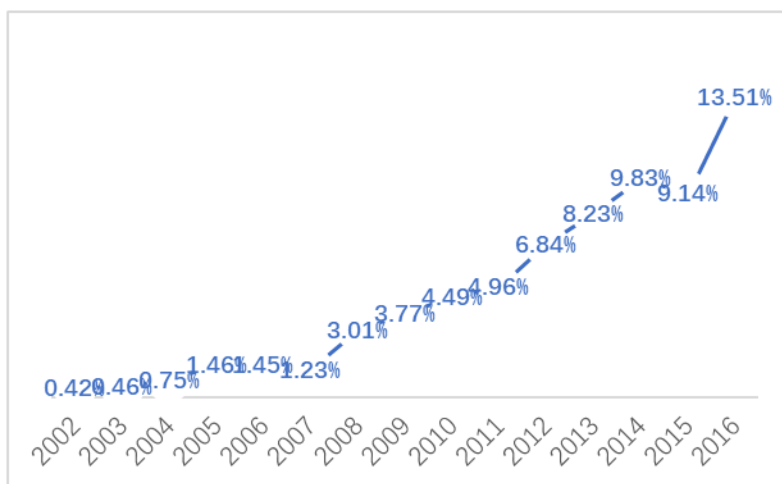


图 4. 40: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世界比例[2]

1　综合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1）1990-2002 年数据来源自《2005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2002-2005 年数据为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数据；（3）2006-2016 年为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

2　数据来源：IFID（同花顺）。

(三) 2017 年至今：加强管控，增速暂时下滑

2016 年中国企业发起海外并购交易达 923 起，比 2015 年增长 142％；并购交易金额达到 2213 亿美元，几乎是 2015 年的 3.5 倍，超过过去四年的总和[1]。其中，民营企业的并购额达 1163 亿美元，相比 2015 年增长 4.52 倍，超过国有企业的 665 亿美元[2]。

虽然数目庞大，但是仔细审视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结构，便能发现其中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参与并购的大型民营企业对海外房地产、酒店、足球俱乐部、娱乐业等产业的投资迅猛增长，这些企业的共同特征是：在国内都有数额巨大的负债，投资方向也和企业主业不同（如安邦集团巨额资金并购海外酒店，海航集团巨额并购涉及金融、酒店、物流、地产）[3]。它们从境内金融机构融资，通过并购的方式将资产转移到境外。对于这些民营资本来说，对外投资带来了投资收益，并将"不安全的"人民币资产转换成了"安全的"美元资产，但对于国内经济整体形势来说，资本持续流出使得国内投资减少，过剩产品得不到消化，就业机会增加不足，外汇储备流失，人民币汇率承受巨大压力。截至 2017 年 1 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从 2014 年的 4 万亿美元跌至 3 万亿美元[4]。

于是，从 2016 年四季度以来，政府由全面鼓励企业"走出去"转向限制资本流出，特别是控制特定行业的对外投资，包括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行业，遏

---

1 政协委员李河君:建议国家鼓励民营企业并购世界先进技术。http://www.sohu.com/a/128213421_119038.

2 欧阳辉：中国企业"走出去"海外并购的艰与险。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1118/140612676.shtm.

3 判断企业"走出去"是投资还是外逃的 4 个标准。http://www.sohu.com/a/160536163_620689.

4 外汇管制终止中国巨额海外投资，12 个问题帮你理解这是怎么回事。https://www.sohu.com/a/218255254_139533.

制海外转移资产性质的投资[1]。商务部对非理性投资的特征进行了总结："一是不能给国内带来紧缺型资源，二是不能给企业带来新技术，三是不能为国内带来就业机会，四是企业估值有巨大的弹性空间。"[2]可以见得政策对当前资本输出的引导方向，即攫取资源、促进产业升级、支持国内就业、资本保值增值，并且不能给正在国际化进程中的人民币带来负面影响。2017 年 6 月，银监会要求各家银行排查万达、海航、安邦等数家企业的授信风险，并进一步加强对这些企业的海外并购限制[3]。此后，万达、海航等企业纷纷抛售海外资产。在强化监管的大背景下，2017 年和 2018 年中国的海外投资流量分别下降 19.3%和 9.6%。

截至 2018 年末，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流量为 1430.4 亿美元，在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日本；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存量为 19882.7 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荷兰，排名全球第三。中国已经成为真正的资本输出大国。目前中国对外投资与对内投资存量之比远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也低于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未来对外投资仍将是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

1　四部委：密切关注影城体育俱乐部等领域非理性对外投资倾向。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12-06/doc-ifxyhwyy0872065.shtml.

2 判断企业"走出去"是投资还是外逃的 4 个标准。http://www.sohu.com/a/160536163_620689.

3 如对万达的监管措施包括：万达在海外并购的公司不能从中国金融机构融资；也不能以这些公司作为抵押从金融机构融资；被收购企业不能注入万达境内上市公司。并且，如果海外并购企业出现经营困难，万达也不可以从境内转钱给它们。如果万达要卖这些公司给中国企业，监管机构（比如商务部）不得备案、批准。http://www.sohu.com/a/160536163_620689.

表 4. 2: 2002 年-2018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1]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流量			存量	
	金额	全球位次	同比（%）	金额	全球位次
2002	27. 0	26	—	299. 0	25
2003	28. 5	21	5. 6	332. 0	25
2004	55. 0	20	93. 0	448. 0	27
2005	122. 6	17	122. 9	572. 0	24
2006	211. 6	13	43. 8	906. 3	23
2007	265. 1	17	25. 3	1179. 1	22
2008	559. 1	12	110. 9	1839. 7	18
2009	565. 3	5	1. 1	2457. 5	16
2010	688. 1	5	21. 7	3172. 1	17
2011	746. 5	6	8. 5	4247. 8	13
2012	878. 0	3	17. 6	5319. 4	13
2013	1078. 4	3	22. 8	6604. 8	11
2014	1231. 2	3	14. 2	8826. 4	8
2015	1456. 7	2	18. 3	10978. 6	8
2016	1961. 5	2	34. 7	13573. 9	6
2017	1582. 9	3	−19. 3	18090. 4	2
2018	1430. 4	2	−9. 6	19822. 7	3

注：1. 2002—2005 年数据为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数据，2006—2018 年为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
2. 2006 年同比为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比值。

第二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和在各地区的影响力

从地域分布上来看，中国目前在欧洲，美洲，西亚影响力依然比较弱小，在非洲、东南亚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影响力很大[2]。

1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2018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9 年。
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tjsj/tjgb/201910/20191002907954.shtml.

2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2019 世界投资报告》整理得到，在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西亚地区，中国的 FDI 存量排名在前十之外。而在世界最落后地区和内陆国，中国的 FDI 存量排名第一。

在非洲，虽然 FDI 存量上中国仅排名第五，落后于法国、荷兰、美国和英国[1]。但从增量上来看，中国在非洲的 FDI 远远超过其它国家，2014 年-2018 年，中国在非洲的 FDI 总流量为 720 亿美元，为排名第二的法国的 2 倍[2]。中国在非洲的投资集中在建筑、采矿和制造业三大领域[3]。建筑业是中国在非洲对外投资存量最大的行业，也是中国掠夺非洲的切入点。非洲许多国家由于遭受了数百年殖民，经济贫穷落后，政府根本没有资金承担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签订项目合同时，往往要以本国的资源做抵押（如石油，矿产），向中国的进出口银行贷款，获得的贷款资金要支付给承包这些项目的中方企业。项目完工后，这些国家留下的是中国企业修建运营的公路、铁路、桥梁、港口，并欠下对中国的巨额债务，这些债务又要以本国的资源做抵押，用数十年的时间还清。以肯尼亚的蒙内铁路为例，修建这条铁路共需要资金 32 亿美元，而其中 90%来自于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贷款，工程建设由中方主导完成，建成后由中国交建集团运营维护，其收入用来偿还贷款。当铁路运载量无法达到约定额时，肯尼亚甚至要以港务局的收入来偿还相应的债务[4]。再如西非的国家安哥拉，中国 2000 年-2014 年共向其提供了 212 亿美元的贷款，占中国对非洲贷款总额的近 1/4。这些贷款几乎全部以安哥拉未来开采的石油资源做抵押[5]，一度导致安哥拉几乎

1 联合国贸发会议，《2019 世界投资报告》。

2 Africa Attractiveness report, https://www.ey.com/Publication/vwLUAssets/ey-africa-attractiveness-2019/$FILE/ey-africa-attractiveness-2019.pdf.

3 《2018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4 蒙内铁路让肯尼亚栽进中国的“债务陷阱”？没那么简单。https://zhuanlan.zhihu.com/p/55735014.

5 中国自 2000 年援非贷款中 安哥拉占去四分之一。https://macauhub.com.mo/zh/feature/angola-receives-a-quarter-of-the-loans-granted-to-africa-by-china-since-2000/.

无油气可售，因为大部分新开采的石油都要被用来还债[1]。列宁时代的帝国主义列强以军事力量为后盾，一方面贷款给落后国家获取利息，一方面强迫这些国家用借贷的资金购买自己国家的产品，增加本国商品输出。“输出的增加，恰好是同金融资本的骗人勾当相联系的，金融资本并不关心什么资产阶级的说教，它要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第一张皮是从贷款取得的利润，第二张皮是在同一笔贷款被用来购买克虏伯的产品或钢铁辛迪加的铁路材料等等时取得的利润。”今昔对比，中国进步的方面，仅仅在于暂时还没有直接使用军事力量，以及兴建了占比很小的一部分民生工程。但就其投资实质而言，和历史上的殖民国家并无本质区别。

表 4. 3: 2014 年-2018 年，非洲 FDI 前十大投资国[2]

FDI 2014-2018 by source: 10 largest investors

Country	Projects	Jobs created	Capital US$m
USA	463	62 004	30 855
France	329	57 970	34 172
UK	286	40 949	17 768
China	259	137 028	72 235
South Africa	199	21 486	10 185
UAE	189	39 479	25 278
Germany	180	31 562	6 887
Switzerland	143	13 363	6 432
India	134	30 334	5 403
Spain	119	13 837	4 389

1 安哥拉向中国抵债的石油船货大增 可出口销售的石油锐减。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angola-china-oil-dbt-idCNL3S16N39W.

2 Africa Attractiveness report, https://www.ey.com/Publication/vwLUAssets/ey-africa-attractiveness-2019/$FILE/ey-africa-attractiveness-2019.pdf.

表 4. 4：中国投资在非洲前五大行业[1]

行业	存量（亿美元）	占非洲存量比例
建筑业	**147.6**	**32.0%**
采矿业	**104.8**	**22.7%**
制造业	**59.7**	**13.0%**
金融业	**50.7**	**11.0%**
租赁和商业服务	**29.7**	**6.4%**
合计	**392.5**	**85.1%**

在东南亚，以东盟十国为例，2013 年，中国在该地区的 FDI 流量仅占到日本的 1/3，为 67 亿美元[2]；而 2018 年中国在该地区的 FDI 金额达到 100 亿美元，仅次于日本，排名第二。如果算上从香港进入东盟的资金，则中国在东盟的资本输出与日本基本平齐[3]。中国在东南亚积极地推动泛亚铁路网建设，努力修建中老铁路、中缅铁路、中泰铁路、雅万高铁、新马高铁等，力争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已经和日本产生了竞争和冲突。

在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中国的 FDI 存量排名前十之后，影响力相对薄弱。但在个别领域，如 5G 行业，中国资本仍在迅速扩张。

在资本输出的过程中，国企尤其是大型央企，发挥了“排头兵”的作用。2014 年，为了避免南车与北车在海外高铁项目中恶性竞争，中央将南车与北车合并为中国中车，以更好地服务于走出去的战略目标[4]。此后，一大批央企陆续地进

1 《2018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 ASEAN Investment Report 2015: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Connectivity http://aadcp2.org/wp-content/uploads/unctad_asean_air2015d1.pdf.
3 ASEAN Investment Report 2019 – FDI in Services: Focus on Health Care http://aadcp2.org/wp-content/uploads/AIR-2019.pdf.
4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当时说：“国家要将南车、北车合并，主要是因为两家公司在海外搞恶性竞争，一家公司已经在国外 200 万美元中标，另一家公司

表 4. 5 东盟十国的 FDI 最大来源国

Table 1.5. Top 10 investors in ASEAN, 2017–2018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per cent)

	2017			2018	
Economy/region	**Value**	**Share (%)**	**Economy/region**	**Value**	**Share (%)**
Intra-ASEAN	25	17	Intra-ASEAN	25	16
United States	25	17	Japan	21	14
Japan	16	11	China	10	7
China	14	9	Hong Kong, China	10	7
Netherlands	10	7	United States	8	5
Hong Kong, China	6	4	Netherlands	8	5
Republic of Korea	5	3	Republic of Korea	7	4
Germany	3	2	Luxembourg	4	3
Switzerland	3	2	United Kingdom	4	2
United Kingdom	3	2	Germany	2	1
Total Top 10	**110**	**75**	**Total Top 10**	**98**	**64**
Other	**37**	**25**	**Other**	**56**	**36**
Total ASEAN	**147**	**100**	**Total ASEAN**	**155**	**100**

Source: ASEAN Secretariat, ASEAN FDI database.

行了战略重组，以提高效率，力争在海外市场中有更强的竞争力。在全球各个地区的海外资本项目中，央企都冲到了第一线。它们背靠中央政府的政治外交支持，以及进出口银行的雄厚财力，在各地拿下了大量项目，凭借中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工业生产能力，完成了铁路、公路、矿山、石油、电站等一个个工程，为私有资本走出去打下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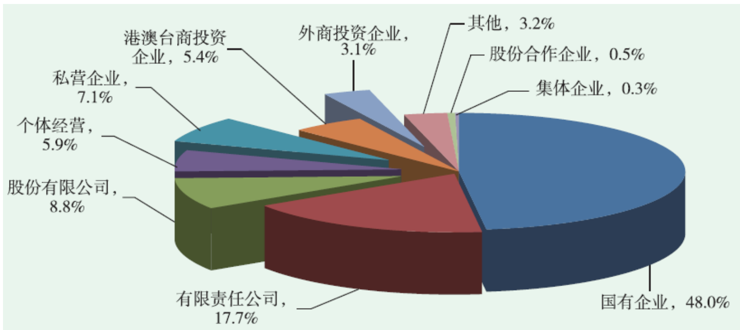


图 4. 41: 2018 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按企业注册类型分布[1]

跑过去说我出 140 万美元，这是亏本价，搞得人家放弃中国产品。南车、北车整合以后，有利于高铁‘走出去’。”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5%8C%97%E8%BD%A6%E5%90%88%E5%B9%B6/15962916?fr=aladdin.

1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2018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

第三节　冲突加剧，军备扩张

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是中国资产阶级“韬光养晦”的时期；而新时代则是垄断资产阶级希望开拓进取，有所作为的时期。中国这几年积极的对外输出，已经触碰到旧有的利益格局，矛盾正在酝酿升级之中。

在东南亚，中日之间正在积极地争夺建设项目，中缅铁路由于日本的阻挠而搁置，中泰铁路的修建也曾被日本搅局[1]。在 2014 年-2015 年之间，围绕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的修建，中方和日方争也几次争夺主导权。尽管贷款利率和工程造价相比日方较高，但中国以其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工期更短）和巨额资金不计风险的投入（无需印尼政府为铁路担保）最终战胜日本，拿下了这个项目[2]。但在越南高铁的修建上，日本又占得了先机，拿下了全部订单[3]。从短期来看，具体的项目争夺有输有赢，但从长期来看，中国在东南亚的资本输出迅速增长，将逐步取代日本在东南亚的传统优势地位。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的大背景下，双方在东南亚的冲突将要愈演愈烈。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在海外的迅速扩张，中美之间的关系也日益恶化。一方面，随着新一轮危机的临近，美国在旧有的国际贸易经济体系中获益越来越少，正试图改变旧有的规则，以保证自己的利益份额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另一方面，中国积极地对外扩张，在部分地区成为主导性的力量，在个别高新技术领域迎头赶上，在如 5G 方面甚至超越了美国，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挑战并改

公报》，2019 年。https://finance.qq.com/cross/20151016/29V95HjD.html.

1 一波三折！中泰铁路年底终于要动工了。https://finance.qq.com/cross/20151016/29V95HjD.html.

2 中日竞争印尼高铁的内幕 https://bbs.tiexue.net/post2_11195456_1.html.

3 越南发布 4000 亿高铁大单，跟日本签约，现在高铁修建得怎么样了？http://www.sohu.com/a/337059966_120114554.

印尼高铁中日方案大比拼

	中国	日本
工程造价	55亿美元	49亿美元
融资条件	提供全额贷款，年利率2%，无需印尼政府预算及债务担保	75%工程费可提供0.1%低利息日元贷款
还款期限	50年	40年
完工日期	2015年9月奠基，2019年前全面通车	2019年试运营，2021年完工

图 4. 42：中日争夺印尼雅万高铁

变美国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2018 年 3 月，美国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1]，并高调制裁华为等一系列国内企业和科研院所，中国对此强硬反击，双方打打谈谈，至今仍未结束。贸易战可能会出现缓和的局面，但贸易战背后关于是否改写旧有世界格局的根本问题，中美双方谁都不会真正让步。在没有拼出你死我活之前，两者的矛盾只会日益加剧。

各国的资产阶级从来不会真正相信“人类命运共同体”，他们只是编织一个美好的谎言，说给国内的普通民众听罢了。中国资产阶级在继续高调讲故事的同时，也在积极地扩军备战。庞大的海外利益的保障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力量，还必须以军事力量为屏障。“积极防御”的战略已经不合时宜，中国正努力宣示自己的军事存在。正如外交部长王毅所示：“在境外注册的中资企业将近 3 万家，在海外工作生活的中国

1 百度百科：中美贸易战。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7%BE%8E%E8%B4%B8%E6%98%93%E4%BA%89%E7%AB%AF/22450710?fromtitle=%E4%B8%AD%E7%BE%8E%E8%B4%B8%E6%98%93%E6%88%98&fromid=3098326&fr=aladdin.

公民达到数百万。所有重要国际航道中往来的货船，大都装载着中国货物，或与中国有关。在此新形势下，中国有充分理由提高自身的国防能力，以有效保护在海外不断延伸的正当权益”[1]。近几年，中国军费支出暴涨，国防开支仅次于美国，远超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海军更是迎来大发展时期，新建军舰如“下饺子”一般。2018 年，中国服役军舰的数量已经是全球第一，新下水的舰艇总数量达到 40 艘，相当于一个法国海军的数量[2]。虽然整体战力相比美国仍有不少差距，但中国正在开足马力进行追赶，以军事扩张来确保对海外的资本输出能够顺利进行，并在未来抢占更大的市场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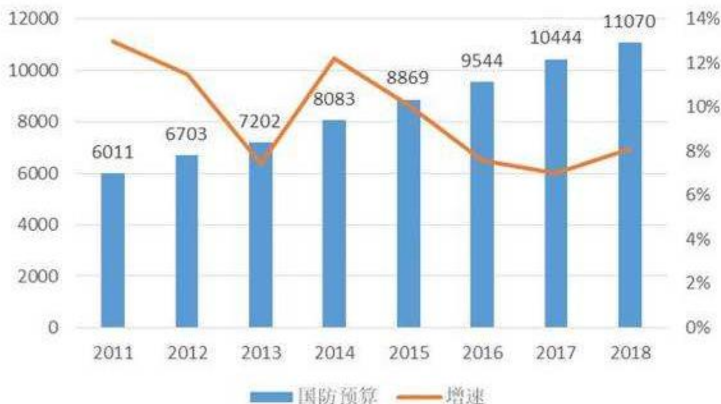


图 4. 43：中国历年军费预算及增速

1 王毅：中国有充分理由提高维护海外利益的能力。http://m.people.cn/n4/2017/0427/c45-8847934.html.

2.外媒：中国军舰数量超美居第一 10 年内还要再造 150 艘。http://mil.news.sina.com.cn/jssd/2019-06-03/doc-ihvhiqay3368982.shtml.



图 4. 44: 2017 年各国军费对比[1]

第四节　　未来：看得见的硝烟

国内的全面的过剩，决定了中国的资本必须要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增殖的空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总结得很到位："一路一带也好，亚投行也好，主要能做起来，就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 35 年，非常成功地从早先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现在变成资本过剩的国家，资本过剩国家，资本就是资本，中国的资本跟美国的日本的欧洲的没有什么区别，资本都会跑到他们转型去的地方……我觉得中国走出去不是政府走出去，而是资本走出去。"[2]如果放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我们看到的则是全球范围内的过剩。相比于 20 世纪，今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渗透到全球，缓和的空间越来越少。在海外市场没有开拓完毕的时候，每

1 盘点世界 30 年来各国军费变化排名，美国霸榜！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DPEQOUV705371E1Y.html.

2 郑永年：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实质是资本走出去。http://www.mnw.cn/news/china/877977.html.

个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各自扩张，互不侵犯。但当海外市场已被全部占领，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过剩又更加严重的时候，资本输出所需的新市场已经严重不足了，只能依靠对旧市场的重新分割。这种环境也决定了一点，即中国要解决自身的矛盾，将不得不挑战旧有的势力范围，触动旧有的世界政治经济体制。

这种冲突已然开始并在逐步加剧。2014 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达沃斯论坛时称，“当前的中日关系就像 1914 年的英德关系，广泛的贸易联系并没有阻止战争的爆发”。[1]当然，中日的冲突不是起决定作用的，根本的还在于中美冲突。2018 年打响的贸易战不过是一个开始，日益逼近的国内经济危机和全球经济危机，使得中美对旧有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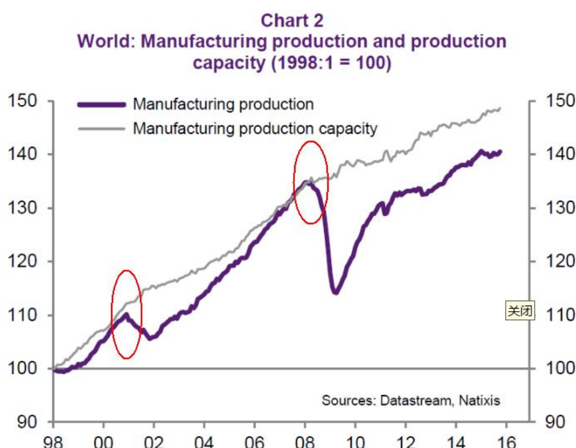


图 4. 45：全球范围内的过剩

都不满意，而如何塑造一个全新的体系，谁来主导这样一个

1 安倍与其类比英德，莫如直视侵略历史。 http://mil.news.sina.com.cn/2014-01-25/0410761706.html?domain=mil.news.sina.com.cn&vt=4.

全新的体系，则是冲突的根本问题。列宁在分析帝国主义争霸时这样总结："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狠毒，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而且他们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世界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瓜分方法。实力则是随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变化的……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列宁的结论仍然适用于今天，这种矛盾不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而只能依靠实力才能得以解决。硝烟就在远方，冲突和争霸的序幕已经拉开。

第五章　思潮篇

改革开放年代的思想斗争

1976 年 10 月 6 日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居主要地位，对包裹在马列主义词语下的走资派意识形态也有一定影响。在此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复辟，国内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与之相适应也产生了各种社会思潮。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阶级图景如此，社会思潮也不会例外。这些林林总总的思潮，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思潮和无产阶级思潮的不同表现而已。

第一节　　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走资派领导下的共产党在城乡大力扶植私人资本的同时，自身分布在党政军企各领域的高级干部也蜕化为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集体占有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生产资料，每个成员按自身在党国体系中的级别享有相应的收益；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垄断了一切权力，并以政治吸纳（人大、政协）的方式将私人资产阶级纳入到政权范围，扩大其统治基础。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其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意识形态。这套意识形态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核心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新自由主义作为其最重要的补充，最终服务于整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

1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 恩格斯。

(一)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1)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归根结底是服务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但是由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不同时期又面临着不同的具体矛盾，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不同时期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

1982 年，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后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分别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各种观点。1992 年，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理论至此形成[1]。

邓小平理论包括三个部分：政治理论——坚持党政分开；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军队建设理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社会上将邓小平理论归纳为一块石头（摸石头过河）、两只猫（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三条小鱼（三个有利于）[2]、四只鸡（四项基本原则）[3]。

邓小平理论是对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全面否定。

邓小平理论本质上是实用主义的，而不是辩证唯物的。

---

1 1997 年中共十五大，“邓小平理论”入党章。1999 年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邓小平理论”入宪。

2 1992 年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指出：“要看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3 1979 年 3 月 30 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提出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即“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1981 年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后，邓小平通过人大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改为“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四项基本原则是去掉了阶级内容的原则，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专政。

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本质上就是否定了理论（从前人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般规律）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所谓“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在本质上就是否定了目的（内容）和手段（形式）的辩证联系，认为手段独立于目的，而不受制于目的；从此出发，邓小平向人们传输一种错误思想，似乎用发展私人经济的手段也能达到建立社会主义的目的。

邓小平理论是充满逻辑矛盾而不可能实现的。他一方面扶持城乡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又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他一方面镇压无产阶级的罢工和学生运动，一方面又要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为其后的所有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基调：要在口头上坚持社会主义，但要在事实上发展资本主义；要在《宪法》上把人民高高抬起，但要在现实中镇压一切敢于反抗的人民；要坚持党的领导，但这个党不再代表人民，而是代表资本；要发展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但这个先进生产本身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生产力。

2)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1997 年邓小平去世，江泽民成为新一代核心。在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后，资产阶级的利益极度膨胀，全社会对共产党究竟代表了谁的利益产生了疑问，共产党必须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在此大背景下，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思想[1]，其具体内容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方面是口头上要代表广大人民，一方面却是在现实中培育资本压迫人民。人民笑着称“三个代表”代表三个大：代表大款（先进生产力）、代表大腕（先进文化）和代表大官

1 2002 年 11 月“十六大”，“三个代表”列入党章。2004 年 3 月 14 日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三个代表”思想入宪。“三个代表”是全民党思想。

（最广大人民）。

2002 年中国加入 WTO 之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粗犷式发展和环境之间的矛盾、沿海和内地的矛盾、城乡之间的矛盾等等各种社会矛盾快速激化，原有发展模式给全社会带来了太多问题，已无法再继续下去。2003 年 7 月 28 日，胡锦涛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就是所谓的“科学发展观”[1]。科学发展观在“科学性”上比“三个代表”更退一步，它罔顾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矛盾的基本观点，而试图调和一切矛盾。

2008 年金融危机后，西方资产阶级陷入巨大的危机，而中国垄断资产阶级以凯恩斯主义的方式续命，经济在平稳中下滑，但增速仍明显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此过程中，中国凭借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优势，集中力量协调各方资本，一跃完成赶超，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9 年世界 500 强企业数量更是位列第二（不算台湾），与美国几乎持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逐步抛弃邓小平定下的韬光养晦的整体政策，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活跃。除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外，新兴小资产阶级群体也在中国资本主义的扩张中分得一杯羹。然而，阶级矛盾也更加尖锐。国外颜色革命屡屡发生、群众运动不绝于耳；国内贫富分化更加剧烈，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把持一切，民营资产阶级也偶有不满；2009 年后凯恩斯主义带来的巨大后遗症，即随时可能爆发的金融风险始终如笼罩在头上的阴霾挥之不去。怎么重新在国

1 2007 年 10 月十七大“科学发展观”入党章。2018 年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科学发展观”入宪。

际上定位，怎么看待国内的矛盾，怎么应对已经积聚起来的巨大风险，这一切是习近平试图解决的矛盾。

2017 年 10 月 18 日，在十九大上，习近平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这个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必然发展，实际内容有如下方面：（1）在矛盾的判断上，无视阶级矛盾是当前的主要矛盾，用另一种词语重复了 1956 年八大的判断[2]，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判断的实质，是在否定阶级矛盾的基础上，希望以经济的稳定发展，换取资产阶级政权的稳定性。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3]、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4]。（2）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上，强调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握经济命脉、垄断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和正确性，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同时，将人民子弟兵变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私家卫队，即“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3）在对外政策上，要以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来重塑国际关系，即“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4）在对内管控上，试图建立全面管控的警察国家，即“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

1 2017 年 10 月十九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党章，2018 年 3 月 11 日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宪。

2 八大认为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3 “五位一体”是指，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4 “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5）所有这一切，最终都是在民族主义这面旗帜下聚集起来的，即“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经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与各种力量的不断斗争中最终形成[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如下特点：他们口号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但这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被阉割的、去除了阶级斗争内核的、无害资产阶级统治的“主义”和“思想”。他们口头上要发展社会主义，但是在现实中却大力发展资本主义。他们反对西方代议制而坚持党对一切领域的领导[2]，但是这个党却是代表资本而非代表人民的党。他们坚持国有经济为主体，但人民在国有企业里仅仅是雇佣劳动者而非国有企业的主人，因此他们坚持的不过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占有国有经济的权利而已。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一切权力，在经济上推行资本主义，在文化上垄断传播渠道清算阶级史观[3]，在口头上代表人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建国以来刘少奇新民主主义

1 上世纪 80—90 年代，是与以陈云为代表的老左派进行斗争，以及与老一代的国企工人对国企改制的反抗（老工人抗争的标志性事件是 2009 年 7 月 24 日的通钢事件）进行斗争。在新世纪，则是与自由派、无产阶级的斗争。在这个斗争过程的早期，无产阶级是缺位的。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新一代的无产阶级逐步走上历史舞台，其标志是 2010-2012 年间新工人的第一轮工潮，以及工潮褪去后的若干大小斗争。

2 党不搞代议制民主，而搞政治吸纳，即将各级私人资产阶级代表纳入到人大、政协等议会机构。2008 年 12 月 18 日，胡锦涛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 周年大会上宣布，中国的统治集团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毛时代的社会主义——笔者注），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西方代议制民主——笔者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路线的明确宣示。

3 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路线，初期是清算前三十年的阶级文化观，主张文化去政治化，消解阶级话语；后期，则是推进文化领域的全面市场化，大力促进资本与文化的结合，实现资本对文化领域的全面统治，至今已形成若干大型文娱寡头，全面控制了文化产品的生产、发行和传播。

巩固论的发展和深化，到今天已经形成一种服务于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阶级基础。私人资产阶级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庇护下成长并自由地剥削工人，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也支持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过他们在政治上权力较小，这也导致他们在支持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常有怨言。部分小资产阶级在中国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过程中，也分得一杯羹，因此他们也希望国家能够在平稳中壮大，从这个角度而言，他们也是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者，但是他们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系淡薄，因此他们的怨言比私人资产阶级更多。

(二) 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潮

民族主义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1976 年文革结束，群众运动被否定，阶级话语无法再持续。马列主义缺位后信仰缺失，官方祭出民族主义的大旗来填补其中的空缺。

1) 2008 年之前的民族主义：遏制下的反弹

1980 年代，官方大肆鼓吹民族主义，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对“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宣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是周恩来在少年时代立下的宏伟志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这种思想具有无可辩驳的进步性。80 年代的中国，民族矛盾早就不是主要矛盾，而全社会也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由于资产阶级仅仅代表社会上极少数人的利益，所以他们必须将自己包装成全社会利益的代表，此时鼓吹“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可谓别有用心。

80 年代的官方，一方面将以毛泽东为首的革命家包装成没有阶级色彩的民族英雄，一方面借助一切机会宣扬民族主义。

宣扬女排精神就是当时官方的杰作。从 1981 年到 1986

年，中国女排创下的世界排球史上第一个“五连冠”。女排第一次夺冠后，官方出动全部的宣传机器，宣传“女排精神”，即“无私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艰苦创业精神；自强不息精神；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遵法、团结友好、坚强拼搏”等精神。在这个宣传里面，阶级不见了，剩下的只有抽离阶级的民族和国家。

1990 年代，是中国主动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时代。1992 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全社会陷入一种疯狂追求财富的狂躁中，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信仰迷失的时代。苏联解体，美国独霸天下，开始对中国逐渐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台湾也与大陆渐行渐远，1995 年和 1999 年发生了两次台海危机。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向何处去，在美帝独霸下如何自处？民族主义迎来了一次大爆发。

1995 年发生第一次台海危机后，一本名为《中国可以说不》的书横空出世，该书据称发行 300 万册。作者在书中狂热鼓吹民族主义和战争，书中说：“苍天当死，黄天当立。21 世纪将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世纪。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抵制美国货，不看美国电影，不吃美国的小麦和大米！我们要准备打仗！不要忌言准备打仗，不要怕这种自豪感会刺激什么人！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1999 年发生轰炸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和第二次台海危机，全国各地爆发大规模反美游行。也就是当年，房宁等人合著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出版，此书封底广告说：“本书是继《中国可以说不》和《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知识界又一次面对汹涌澎湃的民族感情所进行的抉择。”这本书受“中心外围论”的影响，从经济方面论述民族主义，一方面反对全球化，另一方面提出中国需要光荣孤立。书中说：“西方是全球化最大的赢家，第三世界却在可悲地扮演着输家的角色。”“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的中心地带和以广大的

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外围地带，构成了未来世界的基本格局。”“中心与外围的矛盾，是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基本矛盾。”这本书也是民族主义者对中国谈判加入 WTO 的反应。以该书出版为标志，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掀起了反对加入 WTO 的浪潮。2000 年前后，一系列的书籍出版，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杨斌的《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和韩德强的《碰撞》。

《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一书，彻底否定全球化和世界贸易组织，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在中国周围，打倒美国、英国。该书认为，全球化摧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美英大肆鼓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乃是为了以软战争打开弱国大门，推行新殖民主义，重新征服并控制全世界。”《碰撞》一书主张经济民族主义，反对全球化，认为全球化是少数人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该书认为：中国一旦加入 WTO，美国农产品将挤开中国市场大门，中国农村可能破产；城市里大量的工厂企业也将关门大吉；银行体系将会破产；美联社接管新华社，紧接着记者大裁员。该书的结论是：“中国不仅完全可以搞贸易保护主义，而且必须搞贸易保护主义。”

这两本书认为，一旦中国加入 WTO，民族工业就将被摧毁，而中国就会成为英美的经济殖民地。这个观点在以后成了很多左翼论述中美关系的出发点，成了很多左翼否认中国已经变成帝国主义的理论支撑。

2008 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是防守型民族主义达到最高点的一年，也是进攻型民族主义启动的一年。这一年，先是发生了拉萨 3·14 事件、奥运火炬传递被干扰事件和 5·12 汶川大地震，其后成功中国举办第 29 届夏季奥运会。民族主义情绪因这些事件而空前高涨。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利用金融危机弯道超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后，中国在国际事务上越来越活跃，抛弃韬光养晦的策略，通过一带一路意图重塑世界的政治经济关系圈。与此同时，民族

主义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如果说 2008 年之前的民族主义，是对美帝国主义遏制新兴资本主义强国——中国——的反弹，那么 2008 年之后的民族主义，就变成了凝聚国内各阶级民心、缓和国内各阶级矛盾、以支撑官僚垄断资产进行全球扩张的工具。

2008 年之后，两种民族主义虽然还有交叉，但强调我国是经济殖民地而需要反抗、反弹的民族主义逐步减少，而宣言“厉害了我的国”的扩张型民族主义越来越多，扩张型民族主义强调国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比 2008 年前的民族主义更极端，更政治化，我们可称之为“国家主义”。

2) 2008 年以后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2009 年 3 月，一本叫做《中国不高兴》的书出版。这本书是国家主义的宣言，书中充满了国家主义甚至是法西斯式的叫嚣，书中说：“它宣扬的信念是：中国领导世界是天命所归；它规划的目标是：做世界老大。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西方人要排第二；它追求的精神文化是：尚武精神，好战激情；它的依靠力量是：火炬一代和军事英雄集团；它的动员方式是：民间大规模凝聚；它采用的手段是：持剑经商，除暴安良，军战+商战；它的语言是：我们强大了，我们就揍你。”

2011 年 12 月 9 日，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指挥部在云南西双版纳正式揭牌，这是中国经历了百年苦难之后首次以国家名义在境外执法。2012 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强国。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国家主义思潮呈逐渐走强的趋势，中国在国际事务上似乎也更加活跃。2013 年，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宣示其重塑国际关系的构想。2014 年 4 月份开始，中国在南海美济礁、永暑礁等 7 个礁石上开展大规模填海作业，很短时间就建立起总面积约 17 平

方公里的永陆岛礁，并在美济礁、永暑礁和渚碧礁上建立了较大的机场。2014 年 8 月，中国政府开始在东非吉布提建设海军保障基地，2017 年 8 月 1 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吉布提基地。这些都是令国家主义者极为振奋的大事。很多国家主义者的口头禅是："看见祖国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

国家主义否认国家是由利益根本不同的各阶级构成的，强调不分阶级的团结，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强调对国家无条件服从。但是，国家只可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只可能是最强大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不过是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利益高于一切，对国家无条件服从，不过是要求被压迫阶级无条件顺从统治阶级的压迫。

当国家用强大的军事实力"这么流氓"地开拓海外市场，国内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上层也能分享一些残羹冷炙。但是，国家能对外"这么流氓"，当然也能"这么流氓"地"消除"国内工人罢工、农民维权、学生闹事等等不和谐的声音。

民间有很多宣扬国家主义的网站，其中观察者网[1]是国家主义在民间最重要的宣传阵地。在制度上，观察者网鼓吹中国模式，认为中国模式是一届接着一届干，西方模式是一届对着一届干。宣扬"若有机会重来，当然选择中国发展模式"。然而，中国模式的实质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鼓吹中国模式的实质，不过是鼓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垄断命脉行业、在政治上垄断一切权力的模式。在公民和国家的关系上，观察者网鼓吹对国家的无条件崇拜和服从。该网编发文章："老师说，看见国旗要戴红领巾，听见国歌要起立敬礼"。然而，不讲清楚国旗国歌的来历，不说明白国旗国歌和阶级斗争的关系，而仅仅是把国旗国歌当成一种超阶级的民族团结的符号，这样的宣传，唯一的目的就是用国家主义愚弄人民。短短 7 年，观察者网已经成为主流网络媒体，这是非常

1 背后有李世默等大资本家提供资金支持。

“了不起”的成就。随着今后阶级矛盾逐渐尖锐，观察者网有蜕变成法西斯主义的倾向。

2008 年之前，民族主义往往还带有对英美老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反抗。而这种反抗一旦越出官方的界限，势必不利于统治阶级的管控，因此，统治阶级一度也曾管控、抑制民族主义思想。很多青年知识分子，在刚刚接触政治的时候，往往会接受一些民族主义思想，经过学习、思考，一部分人转向了马列毛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主义思想曾经起过一些正面作用。然而，民族主义对无产阶级实现社会变革是极端有害的思想。它模糊了阶级界限，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统治，某些情况下还会激化民族矛盾。

2008 年之后，民族主义转化为了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的阶级基础甚至比特色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更广，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渴望中国在全球扩张，小资产阶级中的部分人也能够受益于中国资本的全球扩张，他们都成为国家主义的阶级基础。然而，这种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极端反动的思想，它欺骗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充当资产阶级全球争霸的炮灰。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潮是极右思潮。而在中国，部分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具有工农情怀，有时候在不同语境下他们还会反对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在某些方面肯定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不反对甚至部分肯定文化大革命、认同马列毛的某些主张，因而他们一度也被归入左翼思潮，这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与西方对应思潮的重要区别。

(三) 新自由主义思潮

作为思潮的自由主义是从文革结束之后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在政治上主张宪政民主和三权分立，在经济上主张自

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在国家与经济的关系上主张小政府大市场，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主张保障人权、保护资产阶级范围内的民主自由。

自由主义思潮从 70 年代开始发端，80 年代在社会上广泛传播，89 风波之后经过一小段的消沉，90 年代重新兴起，与新左派展开论战。上世纪 90 年代末，新自由主义改头换面，一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在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完成国企改制和私有化、加入全球化进程、 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事业市场化改革，形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集体占有命脉企业并把持政权的利益格局。新世纪以来，还有一部分自由派仍然坚持要政体改革而为当局所不容，受到统治阶级打压，《零八宪章》是这部分自由主义思潮的最高峰，随后自由主义就逐步消融在当局国家主义的喧嚣声中。

1) 80 年代激进发展期

整个 80 年代的自由主义运动是舆论导向与知识分子“觉醒”相结合的社会运动。一些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利用他们掌握的文学杂志和新闻媒体，掀起了一次次的自由主义热潮。80 年代最响亮的口号是“思想解放”。但在这个口号下面，涵盖了各种不同主张。自由主义思潮认为，思想解放的目标是实现自由、人权、民主，最终建立宪政民主国家。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最初通过文艺作品和报刊杂志宣传。

伤痕文学是自由主义在文艺界的代表。卢新华以“文革”中知青生活为题材写了一篇短篇小说《伤痕》，伤痕文学因而得名，该派代表作还有刘心武《班主任》、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等。伤痕文学渲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苦难，控诉毛时代对自由的限制。与伤痕文学相呼应的伤痕电影，是自由主义在文艺界的另一股力量。《庐山恋》等电影，控诉前三十年的“极左路线”对老干部、知识分子、农民的“不公正”

待遇，具有较大的艺术感染力，在马列主义空缺的时代，有较大的影响。

报刊杂志是自由主义另一个阵地。1980 年 5 月，发行量超过 200 万册的《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的长信，提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伦理命题，最后感叹：“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随即，一场持续了半年多时间的全国范围内的“潘晓讨论——人为什么要活着”就此引发，共有 6 万多人来信参与讨论。时隔一年半，1982 年 7 月，第四军医大学的学生张华，因跳入化粪池营救一位不慎落入池中的老农而牺牲。此后两个月的时间里，新闻媒体用了较大的篇幅报道张华的英雄事迹。就在同时，社会上就张华救人是否值得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年轻大学生救年迈老农而牺牲，值不值？主流认为，就社会价值而言，一个大学生一般来说能比一个老农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一句话，大学生的社会价值比老农社会价值高，一命换一命对于社会来说是亏本投资，所以张华救老农不值得，是“金子”换“石头”。在官方介入下，“潘晓”争论的最后结论自然是“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更美好”；“张华”争论的结论是，张华救人是伟大的，是值得的。然而，否定了集体主义，这种“政治正确”根本不能令人信服。

80 年代的大学校园是自由主义异常活跃的地方，当时校园中出现了各种自由主义的学生社团，很多社团的积极分子后来成为学潮的骨干。1980 年代的两次学潮，虽然知识分子、市民和工人阶级的诉求是社会主义导向的，但运动主导者的主张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

80 年代的自由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得到官方的默许。胡耀邦和赵紫阳对自由派是宽松的。《河殇》这部拥抱西方文明的纪录片，曾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支持。这部纪录片从对中华传统的“黄土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入手，逐步引入对西方“蓝色海洋”文明的介绍，对包括“长城”和“龙”在

内的许多长期被中国人引以为荣的事物进行了辨析和评判，同时表达了对西方文明的向往。该片播出后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很大轰动，被认为是六四事件的思想前导。

六四之后，高层发生巨大分歧，老左派趁机发难，清除了同情自由派的改革派，自由主义主张遭受严厉批判，陷入低谷，这是自由主义第一次失落。

2) 90 年代融入体制内

90 年代是自由主义融入政权体系的蓬勃发展时期，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占据了媒体的重要岗位和大学讲堂。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行动力，影响力超过了 80 年代，远远超过了他们的人数和社会地位所能达到的高度。

1992 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但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却并不完善[1]。自由派知识分子凭借其对西方市场经济下法治、体制、国家权限、社会公共秩序、经济运行规律等诸多理论的熟悉，通过其占领的媒体和大学讲坛全面而系统的宣言上述理论，形成了一个相对系统的思想派别。

主要领军人物有李慎之[2]、朱学勤[3]、徐友渔[4]、刘军宁[5]、

1 当时甚至连《公司法》都未出台。

2 李慎之（1923 年 8 月 15 日－2003 年 4 月 22 日），1948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反右期间被打成右派并开除党籍。1985 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9 年后辞职。李慎之晚期研究自由主义，著有《风雨苍黄五十年》。被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誉为中国世纪之交思想领域的领军人物。

3 朱学勤，1952 年出生于上海，1970 年下河南兰考插队，1972 年进厂做工。1985 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1992 年获得复旦大学历史系史学博士学位。1991 年至今任教于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书斋里的革命》、《被批评与被遗忘的》等。

4 徐友渔，男，1947 年生于四川成都，1977 年考入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1979 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后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工作，1986—1988 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进修。其著作《“哥白尼式”的革命》在 1995 年获金岳霖学术奖。

5 刘军宁，男，1961 年生于安徽，1993 年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是当代中国

秦晖[1]等人。他们互相应和，梳理自由主义的理论脉络，建立起一套自由主义的学理，亮出了自由主义的旗帜。

1998 年 5 月，李慎之在文中说："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人民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

刘军宁论述了自由主义与私有财产权同生共死的重要关系。他说："个人自治的核心是个人对其财产的独立的、排他性的支配权。……无数事实表明，窒息个人自由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剥夺个人的财产权……财产权所保障的创造财富的自由是人类一切自由的前提。"刘军宁不提社会福利，被人称作"最纯粹"的自由主义者，或"自由至上主义者"，被划为自由主义右翼。

秦晖强调自己不属于左也不属于右，而倾向中间观点。他引用卫生部退休副部长殷大奎所说的中国80%的医疗资源都被官员享用的事实，批评中国实行"负福利"，即各项福利如住房、医疗等等都是优先覆盖社会强势集团如官员阶层，而不是优先覆盖最穷困的人。秦晖高调呼吁完善社会福利，实现公正平等。秦晖可视为自由主义左翼。

90 年代，新左派思想兴起。1995 年之后，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进行了多次争论。争论内容将在后面"新左派思潮"一节中论述。

3) 新世纪以来受到一定限制

新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各个阶

较早研究自由主义的学者。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2002 年因被举报在北大演讲中宣扬自由主义，被该所开除。现为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1] 秦晖（1953 年 12 月－），1981 年毕业于兰州大学，获历史学硕士。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著作有《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史比较研究》《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等。

层都开始反思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思潮受到一定限制。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是国有企业，阶级构成是党政军企高级干部，政权体系采取党国专制的政治吸纳方式。而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主张，却试图将所有国企私有化，试图将让所有资产阶级不分出身按资本体量分享政权，建立宪政民主和代议制政府，这些主张与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不相容的。进入新世纪，大型国企成为巨型垄断寡头。在这个形势下，新自由主义的黄金发展期结束，当局对仍坚持宪政民主的自由派进行了多次打击：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被清除出大学讲堂，自由派的重要阵地被整肃，部分维权律师和自由派知识分子被关押。

2008 年，303 位自由派[1]签署发布《零八宪章》，以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 60 周年。《零八宪章》主张修改宪法、实行分权制衡，实现立法民主，司法独立，主张结社、集会、言论、宗教自由。绝大多数宪章签署者都受到了官方的打击。国内媒体没有任何关于《零八宪章》的报道。2009 年 12 月 25 日，北京一中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刘晓波有期徒刑 11 年，剥夺政治权利 2 年。

2010 年后，金融危机下阶级矛盾越发尖锐，农民征迁上访和工人罢工维权频发，这些事件背后常见自由派活动家的身影。2013 年开始，当局重点打压自由派活动家。2014 年 6 月 13 日，当局以寻衅滋事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将维权律师浦志强[2]逮捕，随后判处其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3 年。2017 年 12 月 26 日，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判处吴淦[3]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2013 年 4 月，北

1 签署者除发起人刘晓波以外，还有一些中国著名异见人士与维权人士，包括鲍彤、丁子霖、刘军宁、戴晴、于浩成等。

2 维权律师浦志强，积极主张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妥善解决六四事件，常代理维权辩护案件。

3 吴淦在 2009 年邓玉娇案中，曾前往巴东县声援邓玉娇并积极推动了该案的迅

京公盟创始人许志永[1]遭到软禁，此后被逮捕、审判，2014年1月26日被宣布判刑4年。像这样的案例还有不少。

2016年7月14日，中国艺术研究院接管《炎黄春秋》[2]，宣布原社长、总编辑等悉数被撤换，并任命了新的管理层。2017年1月21日，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闭天则所[3]网站，主要人员的微信和微博也无法使用。2018年11月，北京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其营业执照。2019年8月，北京市有关部门指控天则经济研究所违反监管规定，并下令强制关闭该研究所。

但总体上，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传播是非常成功的，深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内心，甚至影响到一部分工人思想。城市中产群体在整个党国体制下受到的压迫和感受到的不公平比资产阶级更强，很多人对西方关于文艺、法律、经济、政治、国家的理论津津乐道。

这些自由主义者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坚持资本主义道路，从这一点来说，他们与执政者并无区别。未来一旦社会矛盾激化，统治阶级无法像往常一样延续统治，这时新自由主义仍有可能登台入室，再次成为统治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

速传播，并参与过多起维权事件。

1 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是许志永等人创立的机构，以建立约束权力的民主法治制度为目标，以期能够理性、建设性地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和社会正义；2003年，许志永、滕彪、俞江三人曾就孙志刚案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收容遣送制度违宪审查的公民建议开始；他们还参与代理了不少维权官司，撰写了若干有关中国当时热点社会问题的研究报告，并开展了几个促进社会公正透明的公民参与项目活动。

2 《炎黄春秋》从2002年之后，成为自由派的阵地。《炎黄春秋》发表了大量解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文章。

3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由经济学家茅于轼、张曙光、盛洪等人与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共同发起，于1993年7月创立。这是一个自由派智库组织，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

第二节　其他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意识形态

除了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家主义、自由主义外，还有一些形形色色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意识形态，其中形成体系的有两种，一种是民主社会主义，一种是新儒家。这两种意识形态，阶级基础薄弱，社会影响不大。

(一)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三章批判了多种反动的社会主义思潮。改革开放以来，这些曾经被批倒的社会主义思潮又披着社会公正的外衣，以学术词汇包装，复活了。所有这些新社会主义思潮，其主张都是在不撼动私有制的前提下实现社会公正。既然不撼动私有制，也就不会损害资产阶级利益，因而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并且这些人也无意将自己的主张付诸实现。正因为如此，这些主张的提出者，以及一些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学者们，完全没有门户之见，互相唱和，也算是特色社会思想史上的一大奇观。所有这些思潮中，影响相对较大的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曾撰写文章《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前途》。这篇文章首次明确公开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前途。谢韬认为，苏维埃采用暴力夺取政权，粉碎私有制，是错误的，是从左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瑞典等西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接过民主社会主义旗帜，通过和平方式演变到社会主义，并与苏联的暴力社会主义展开竞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欧、北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脑体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谢韬在文章中指出："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所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会

主义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他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

民主社会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意识形态。它也号称社会主义，但是却坚持唯心史观，漠视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它也渴望民主、批评当局专制，但却主张超阶级的民主；它也承认贫富分化以及相伴随的社会不公，但却不承认这些现象的根源是私有制；它要求在分配领域二次调整财富，但却不愿触动私有制分毫；它渴望限制官僚的特权，但却不相信群众，反对群众运动；它有时也会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寻找理论根据，但是却不敢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改良派希望解决贫富分化等各种问题，但却不愿意消灭必然产生这些问题的私有制，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面临的最大矛盾，而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这种矛盾在理论上的体现。

除了民主社会主义外，还有不少学者提出各种新的社会主义主张，如吴敬琏曾提出“市场社会主义”，高尚全曾提出“人民社会主义”。对这些主张，如果将他们文章中的“社会主义”一词全文替换为“资本主义”，丝毫不会影响文章原意，由此可见这些“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货色。

上面所列出的这些“社会主义”思潮，其提出者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吴敬琏、高尚全等人还是政府高级官员。与特色社会主义思潮不同的是，这些“社会主义”思潮不再披马克思主义的外衣，除了名字中有“社会主义”四个字以外，其内涵完全看不出与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这些“社会主义”都没有超越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范畴。

(二) 新儒家的主要思想

改革开放否定了前三十年的意识形态，即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之而建立起一套新的意识形态，即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强调顺从、等级制，是能够为资产阶级所

用的。在新意识形态建立的过程中，新儒家思想顺势而起。

新儒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最落后而反动的；新儒家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几乎不具备任何社会基础，因此影响也是不大的。

新儒家在政治上是落后的。新儒家大师蒋庆不赞成依法治国，主张依靠教化提高民众道德。比如，蒋庆赞成儒家学说的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排斥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观念。蒋庆提出了“儒教宪政”的理念。儒教宪政的构成要素分为三部分：虚君共和制、议会三院制和太学监国制。关于虚君共和制，蒋庆主张抬举孔子后裔为虚君。议会三院制就是通儒院（儒士组成）、庶民院（按功能选区选举产生）和国体院（宗教界以及圣贤名人的后代组成）三院制。通儒院不由选举产生，是从儒家饱学之士中选拔组成。通儒院可以最终否决其他两院的议案。另一位新儒家康晓光对现实中国持强烈批判态度，不过他也不赞成以自由民主主义救治中国。康晓光反对多党制和全民普选，主张由儒士共同体，即践行儒家理念的贤人掌权。

新儒家在经济上是反动的。新儒家张祥龙建议，在中国设立若干儒家文化特区。在特区内，“以家庭和家族的聚居为基本社会结构，以农业为本，士农工商皆有，三教九流并存。”在特区内，“以手工业为主要的加工方式，以自然或半自然的中医及整体疗法为主要的医疗手段……历法改用农历，纪年用干支或以孔子诞辰为始点。教育则全面有机地复活传统的耕读传统和科举考试，学习内容与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同时加入东西方文化（含哲学、文学、历史、科技、社会科学等）的比较。”

新儒家在教育上是荒谬的。王财贵提出“老实大量读经”理论，它定了一批经典书目，包括大学、论语等，约 30 万字，要求学生“只管读，不要管懂不懂”。所谓“大量”，是平均一天要读经 6 到 8 小时，到最后达到进入最高学府文礼书

院的标准"包本背诵 30 万字"。所谓包本，就是能无错漏、不间断地背诵整部经典。王财贵在全国建立了至少 50 家学生在 50 人以上的读经学堂。学堂严禁老师解释经典的含义，他们只需要知道六个字：小朋友，跟我念。除了圈定的经典之外，学生不能阅读任何课外书，手机也由老师保管，学生也极少接触外界信息。进入文礼书院的孩子将至少在这里学习十年。年龄处于小学阶段的孩子，脱离国家义务教育体系，进入读经学堂，本身就是违反国家义务教育法的行为。然而这种行为并没有得到制止，学堂经营者的违法行为也没有受到惩处，这是很意味深长的。

大部分新儒家主张等级制，反对民主，主张精英政治。这与当今世界的潮流完全背道而驰。他们的政治主张，如关于政治体制的顶层设计、儒家特区等，完全是空中楼阁，没有实现的可能；成立儒教、儒化中国更是痴人说梦。

第三节　老左派思潮

80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最核心的两个领导人，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陈云。二人曾联手清算文革派，扳倒华国锋。在是否推进改革开放上，二者主张是一致的，在怎么推进改革开放上，二者出现较大分歧。邓小平主张完全的市场经济，陈云主张计划经济为主。陈云身边聚拢了一批相同主张的老干部，包括李先念[1]（1909-1992）、王震[2]（1908-1993）

1 李先念（1909 年 6 月 23 日～1992 年 6 月 21 日），文革中曾任国务院副总理。1976 年 10 月打倒"四人帮"，李先念是主要决策人之一；1982 年 9 月～1987 年 7 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 年 6 月～1988 年 4 月任国家主席；1988 年 4 月～1992 年 6 月任政协主席。

2 王震（1908 年 4 月 11 日～1993 年 3 月 12 日），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 年 5 月担任农垦部部长；1975 年 1 月～1983 年 6 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76 年打倒"四人帮"，王震发挥了重要作用；1988 年 4 月～1993 年 3 月任国家副主席。

和邓力群[1]（1915 年-2015 年）等。他们的主张比邓小平派稍左，被称为老左派。

老左派是在与邓派的斗争中不断发展的。老左派与邓派的斗争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81 年-1991 年，是两派的拉锯时期；1992 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到 2001 年建党 80 周年，老左派失去体制内的地位，转而以杂志为阵地，继续开展斗争；2001 年之后，杂志被停刊，老左派以网络为阵地，开展新的斗争。

(一) 基本发展过程

1) 1981-1991 年间的老左派

在这个阶段，中国的改革过程呈现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状况。一放就乱：改革派的改革政策造成诸侯经济，各地胡乱投资，乱上项目，很快导致经济过热；一管就死：老左派发动反击，进行治理整顿，导致经济紧缩。

这个期间，老左派抓住改革派的一些政策失误，发起了多次斗争。

老左派的第一次斗争，是借“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打击改革派。1983 年 3 月 14 日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日，周扬[2]在中央党校的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大谈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称社会主义可能异化到自己的对立面资本主义。随后邓力群在中央党校批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话中，最先

---

[1] 邓力群（1915 年 11 月—2015 年 2 月 10 日），1981 年 1 月至 1987 年 9 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1982 年 4 月至 1985 年 7 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从 1980 年代初开始，邓力群紧跟陈云，坚持老左派立场。1990 年代，陈云、李先念等领导人年老或故去之后，邓力群被改革派称为“左王”。

[2] 周扬（1908~1989），1930 年在上海开始投身左翼文艺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文革”中受批判并被监禁。文革结束后复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等。

提出“清除精神污染”这个词。1983 年 10 月 11 日至 12 日，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说，理论文艺界“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在得到邓小平支持后，清污运动正式开始。然而，老左派却力图将清污运动推向包括经济在内的所有领域，当时一个说法是，“精神污染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这超过了邓小平许可的范围。清污运动开始不久，即受到了邓小平和胡耀邦等改革派的抵制。12 月 20 日，胡耀邦在书记处会议上说：这个问题以后不要再提了。这场来势凶猛的斗争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结束了。一个说法是，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只搞了 28 天就偃旗息鼓。

随后，老左派借助 1986 年的学潮将胡耀邦拉下马。整个 80 年代，大学校园的政治氛围很浓厚，很多知识分子宣扬自由主义，很多学生成立思想类社团，各种学者办讲座、开论坛，讨论政治问题。而当局中以胡耀邦为首的改革派对此比较宽容。1986 年 12 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因不满合肥市西市区人大代表选举问题，联合安徽大学等高校 4000 余名学生走上街头发起“要求进行民主选举”的游行，由此引发全国范围的第一次学潮。学潮从合肥发端，在上海、武汉和北京等地扩展开来。中科大副校长方励之公开站出来支持学生。总书记胡耀邦主张宽容、冷处理，受到老左派激烈攻击。1987 年 1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当时媒体发表大量文章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其中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的言论受到重点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被视为“八六学潮”的主要思想根源。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被开除党籍。1987 年 1 月 10-15 日，中央召开民主生活会，批判胡耀邦，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

借助 89 学潮发起反攻。到 80 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问题越发明显。贪污腐败的官员越来越多，高官子弟通过双轨制搞官倒大肆敛财，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日益增加。在这个背景下，1989 年 4 月-6 月，从北京发端，爆发了 1980 年代的第二次大规模学潮，最后以学潮被镇压、赵紫阳下台告终。1989 年 6 月，江泽民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因为资本主义导向的改革导致了 89 事件，老左派趁这个机会发动了又一波反击，这个阶段老左派的领军人物是邓力群。这段时间，以《人民日报》为首的中央媒体及各种杂志，发表了大量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市场经济的文章。江泽民也在不同场合中提出，要将损害社会主义的私营企业罚的倾家荡产。这段时间是老左派力量的一次短暂回潮。

2) 1992-2001 年间的老左派

1992 年初邓小平南巡，政治形势急剧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老左派很快失去了体制内的阵地。随着陈云、李先念、王震、邓力群等人的年老及故去，老左派从外部影响党和国家政策的能力也基本消失。但老左派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而是利用《真理的追求》、《中流》、《当代思潮》等杂志开展理论斗争。

这个时期老左派利用三个杂志长期坚持反对私有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在 1995-1997 年发布四封反对资本主义导向改革的万言书；同时，还在 1997 年发起反对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关于所有制观点文章的斗争。

杂志方面。邓小平在不同时期说过一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三个杂志的主要斗争方法是，用邓小平的一部分话反对他的另一部分话。主要斗争方向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私有化，反对国有资产流失。因为失去了体制内的力量，这几个杂志一开始办的格外艰难，缺少资金，发行渠道也不畅。杂志主办人想了非常多的

办法，征集网友捐款，在全国自办发行站。各地的杂志发行站团结了一大批前文革造反派和国企老工人，这些人后来成为各地的左翼积极分子，在杂志被停刊之后仍然坚持活动。

1995 年-1997 年，老左派发出四封万言书，反对资本主义导向的改革。万言书在各级干部和社会上广泛传阅。1995 年，第一份万言书《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在全国流传，作者未知。万言书的主旨是论证，中国已经出现了新生的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且同党内的走资派沆瀣一气，对国家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1995 年秋季，第二份万言书《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在社会上传开，仍然匿名。这份万言书结合苏东剧变，分析了我国有可能和平演变的形势。文章认为我国已经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1997 年 1 月，第三份万言书《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问世。这份万言书提出：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是要保住几十万个大中小国有企业的“国”字头，小企业也不能放。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抓大放小”方针是私有化的主张，是错误的。1997 年 2 月邓小平去世后，第四份万言书问世。这份万言书作为其他三份万言书的补充，开列了一个很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学者、作家和媒体的名单。万言书认为，1992 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头越来越健，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步占据了一大批重要媒体。万言书指控这些媒介和学者、作家主张培育一个资产阶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求有关方面加以惩处。老左派失去了体制内的阵地，又不能发动群众，并且不能将阶级立场贯彻到底，这几封万言书未能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自然归于失败。

批评厉有为。1996 年秋，中央候补委员、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到中央党校学习。他在学习中写了《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文章认为全民所有制为主的公有制是拔苗助长；主张我国的所有制应以私有制为基础；认

为国有资产的产权经过市场流通和交易，有买有卖，不是私有化。1997 年 2 月 10 日，《历史唯物主义通讯》第 28 期发表批判厉有为的文章《厉有为意欲何为》。文章指责厉有为提出的股份制改革方案说，厉有为的文章"包含有严重的理论错误和极有害的政治主张"。要求："厉有为同志这样的思想和政治素质的共产党员，不够共产党员的条件，更不适宜作为中央候补委员进入中央委员会，也不适宜担任任何一级党政组织的重要领导职务。"虽然受到老左派的批判，厉有为仍然在十五大上再次当选中央候补委员。1997 年 4 月，江泽民在中南海单独接见厉有为。

这一波斗争到 2001 年建党 80 周年后当局将《真理的追求》、《中流》停刊为止告一段落。

3) 2001 年建党 80 周年之后的老左派

2001 年 7 月 1 日，江泽民发表吸收资本家入党的讲话，要求把"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这里所说的"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就是指资本家。老左派提前知道江泽民将要在党建方面有所突破的风声，先发制人发表了《工人阶级的政党岂能吸收资本家？》等文。7 月 20 日，邓力群等 17 人实名发表公开信《七一讲话是极其重大的政治错误事件》，以传单形式在社会上广为散发，并上网流传。与这封信问世的同时，还有另外 5 封实名公开信在社会上广泛散发。这些公开信说，"江泽民的讲话向国内私营资本公开投降，等于公开傍大款。""将资本家引狼入室，等于变成全民党。"一些公开信还说江泽民的讲话只代表他个人，不能代表党中央。

这标志着老左派与当政者的公开决裂。2001 年 8 月，《中流》和《真理的追求》被停刊，《当代思潮》转向支持改革开放。老左派失去了最后的体制内阵地。失去杂志阵地后，老左派开辟新的阵地，创办毛泽东旗帜网，支持创办乌有之

乡网，展开新的斗争。

网站方面。经过短暂的蛰伏，老左派转战“毛泽东旗帜网”和“乌有之乡”。老左派为这两个网站提供大量人力、物力帮助，并为其协调各种关系。两个网站发表了大量的澄清前三十年史实、为文革正名，以及反对资本主义导向改革的文章，每年举办各种纪念会和网友线下活动。很多青年受这两个网站文章的启蒙，开始接触左翼思想，还有一些人成为左翼行动派。2012 年薄熙来事件之后，毛泽东旗帜网和乌有之乡网站被封，二者相继创立其他网站。随着网络生态的变化，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兴起，独立网站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这些网站平台也转战自媒体，力图在新的时期跟上社会的脚步，继续传播左翼思想。

除了网络论战外，老左派不失时机地利用各种热点事件掀起舆论旋风，最出名的就是三大旋风：郎咸平旋风、刘国光旋风和巩献田旋风。

郎咸平旋风。本世纪初，MBO（管理层收购）甚嚣尘上，国有资产被大量侵蚀。2004 年 8 月起，经济学家郎咸平发表文章，认为国内 TCL、海尔、格林柯尔等国有企业以产权改革为名，变相侵吞国有资产。当时的背景是，国内经济学家鼓吹 MBO，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将国有企业私有化。郎咸平还分析总结了格林柯尔集团实际控制人顾雏军收购公司的各种手法，揭露其用非法手段侵吞国有资产。这个期间，老左派组织了多次研讨会，并发表了大量文章支持郎咸平的观点，掀起了一波郎咸平旋风，最终导致顾雏军被捕判刑。

刘国光[1]旋风。2005 年 7 月，一篇访谈文章《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在网上流传。刘国光说，

1 刘国光，经济理论家，曾任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改革开放初期，刘国光是市场经济的吹鼓手。1997 年经济学界发动“思想解放”，为产权改革制造理论根据，刘国光说：“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

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缘化，现在有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被西化色彩很浓的人篡夺了，要打教育部的板子。他说，经济学界反马克思主义，鼓吹私有化，已经形成势力。他要求加强计划的指导作用，他认为市场环境是产生腐败的温床。老左派就此发动一波攻势，连续召开三次会议支持刘国光，称之为"刘国光旋风"。在讨论中，刘国光引人注目地再次提出姓社姓资问题。主流经济学界难以回避该问题，也组织人回击老左派的批判，高尚全、吴敬琏、晏智杰和何祚庥等人也相继发表文章批评刘国光。高尚全的意见得到了国务院领导人的支持。

巩献田[1]旋风。2005 年 7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8 月 12 日，北京大学教授巩献田在网上发表致吴邦国委员长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封公开信，指责《物权法（草案）》违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引起激烈辩论，从而掀起了"巩献田旋风"。巩献田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宪法一定要明确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物权法（草案）把公共财产头上的"神圣"二字拿掉了，这是不可接受的；《物权法（草案）》将公共财产和个人财产并列，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物权法（草案）》的立法原则"背离苏俄民法典的社会主义传统"，迎合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老左派借物权法问题，发起了多次签名上书活动，最多一次签名者达 3000 人。然而《物权法》最终还是以 2799 票赞成、52 票反对、37 票弃权，获得通过。

(二) 老左派的主张

老左派是一个庞杂的群体，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主张并不完全一致。

陈云时期的老左派，反对文革，反对群众运动；在农村支持分田到户；在城市反对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主张建立鸟

1 巩献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

笼经济；不承认 76 年之后的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寄希望于党内健康力量，希望最高领导拨转航向，或者开一次新的遵义会议，重新回到社会主义路线。他们主张的路线实际上类似于苏联在赫鲁晓夫、勃涅日列夫时期的路线。

陈云之后的老左派，一部分人开始重新思考、总结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经验。他们愿意承认文革的进步意义，甚至完全赞同文革，但是带有一些民族主义倾向。

老左派在与改革派的斗争过程中且战且退，最终归于失败，主要原因在于老左派思想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

老左派的一部分人，以魏巍[1]和李成瑞[2]等人为代表，在与改革派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学习、思考，思想发生了转变。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肯定文化大革命，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存在和平扭转局势的可能，认为中国今后的命运取决于工人阶级。这些人已经转变为马列毛主义革命派，而不再是老左派。

随着老左派的主要群体逐渐老去、故去，老左派思想在老工人群体中仍然有一定影响，但对新一代工人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

老左派群体不是以年龄划线的思想派别，有一些年轻人也持老左派思想。

第四节　新时代泛左翼思潮

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社会的阶级分化日益明显，

1 魏巍（1920 年 3 月 6 日-2008 年 8 月 24 日），著名作家，军队高级干部。1951 年 4 月 11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谁是最可爱的人》，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影响，该文曾经长期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现在不少版本的语文书已将此篇课文删除）。1978 年，任北京军区文化部长，后来担任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

2 李成瑞（1922 年 1 月——2017 年 2 月 11 日），曾任国家主席李先念秘书，1981 年 10 月-1984 年 5 月任国家统计局局长。

社会不公日益严重。一方面是 90 年代末期的国企改制和国企工人大下岗，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一方面是小农经济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破产，农村土地撂荒严重，粮食产量连年下降，基层矛盾非常严重，每年群体上访事件数万起，三农危机全面爆发。

在这个背景下，诞生了两种站在人民群众立场的思潮：新左派思潮和乡建派思潮。

(一) 新左派思潮

90 年代中后期，一批左翼知识分子在借鉴西方左翼研究成果、反思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关于政治、经济、历史、现实的系统看法，这就是新左派思潮。

新左派大量吸收了詹姆逊[1]及其他西方左翼思想家的思想资源，对中国的资本主义现实展开批判，主要思想家有汪晖、崔之元、杨斌、陈学明、王绍光等。

90 年代中后期，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以几个杂志和新闻媒体为阵地，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他们争论的问题，我们可以大致理清新左派的主要主张。

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社会仍然处于后斯大林时代、后毛泽东时代，即威权社会主义。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活跃的部分。

关于怎样看待全球化。自由主义者则支持中国融入全球化，指出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新左派根据“中心—边缘”

---

1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是杜克大学教授，他在《60 年代：从历史阶段论的角度看》一文中这样评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 60 年代，有那么一段时间，世上万事都变得可能。换句话说，那个阶段是全人类大解放的时机，也是全球性能量大释放的时刻。……在‘文革’中，这个意象促使了旧式封建与乡村结构的粉碎，同时也促使了那些结构中的旧习俗神奇般地消除，进而唤起了一场真正的群众民主运动。”

理论[1]，批评全球化，说全球化导致第三世界受到发达国家剥削，加剧全球贫富分化。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只能是一个梦。汪晖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所谓全球化的历史，也是把各个区域、社会和个人编织进一个等级化的、不平等的结构之中的过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两者其实处于一个中心与边缘、主宰和从属的不平等关系之中。”汪晖反对中国加入 WTO，他发出质问：“我们还要问，中国加入 WTO 和如何加入 WTO 的问题，是否遵循了民主和共同参与的原则？”杨斌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杨斌说：“中国应广泛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共同反对垄断资本鼓吹的全球化，揭露全球化名为促进开放和经济联系，实为变相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为美国谋求世界霸权创造条件的本质。”杨斌反对中国加入 WTO：“美国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主要不是基于经济考虑，而是基于政治考虑。美国政府认为，中国的企业无法与美国和西方的企业竞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势必造成失业狂潮，这样中国社会就会不稳定，政府就可能垮台。”

关于如何看待腐败和社会不公。自由主义者坚决支持改革开放，并认为是权力缺乏制约的旧体制导致了腐败的愈演愈烈。新左派认为，改革开放、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进入中国造成了腐败，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结果。汪晖认为腐败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他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直接后果是大量开发区的出现和期货市场、证券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开放，这些因素构成了当代中国新富人阶层的出现与制度性腐败的政策前提和市场条件，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国内的和国际的）合二而一的历史条件，这是一个在不平等条件下重新制造社会分化和阶级分化的过程，并孕

2 新左派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判，其理论源泉是萨米尔·阿明等人的依附论和伊曼纽尔·莫里斯·沃勒斯坦等人的世界体系论。

育着长远的社会危机。” 陈学明认为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两级分化：“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市场经济的消极面造成的。”他的理由是：（1）市场经济把劳动者推向市场，使劳动者成为工具和商品；（2）市场经济是效率与资本相结合，追求利润最大化，不考虑劳动者境遇；（3）市场经济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竞争关系，造成以邻为壑；（4）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两极分化。

关于怎样看待 1956 年至 1976 年的历史。自由主义者对毛泽东晚年思想持批评态度，并认为人民公社制度束缚和奴役农民，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废除。新左派认为毛泽东当年进行“文化大革命”是要通过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大批判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批判资产阶级，解决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的问题。毛的“文革”虽然失败了，但左派的路线和思想理论并未失败，中国还是应当走出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汪晖赞同文革，并认为改革开放使中国转变为资本主义：“以‘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界标，以不断革命和批判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宣告终结……并在开放的改革实践中把中国逐渐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之中。”王绍光写过一本关于武汉文革的书《超凡领袖的挫败》，研究视角虽然是社会学的，但是对文革的评价远高于官方。崔之元支持文革，认为文革是解决社会主义内在矛盾的有力手段。崔之元在《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一文中，赞赏毛泽东在“文革”中实施的“大民主”。他说，用“大民主”打倒“党内走资派”，是毛泽东文革理论的核心内容，毛泽东文革理论之“得”，在于“尝试‘大民主’的办法解决现存社会主义体制的一系列内在矛盾……‘大民主’是毛泽东的未竟事业，是他的政治遗产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部分。”除此之外，崔之元还在其他文章中说，“文化大革命”有正面因素和积极作用，应该从“文革”中吸取群众运动经验。

关于怎样看待普世价值。自由主义者支持民主、自由、

人权、法治，赞成选举，认为选举有助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并能提供执政合法性。新左派近年来批评民主，特别反对选举制度，认为选举将导致混乱和倒退。从语境上看，他们反对的是资产阶级民主。王绍光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民主从来不是什么好东西。在所有民主形式中，最坏的莫过于一人一票的竞争性选举。“选举有可能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带来更多问题……我并不认为中国的政治的改革、民主改革，突破口在于实现竞争性选举，我并不认为那个可以带来任何好的东西。”王绍光认为真正的民主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主张的群众路线。

新左派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对新一代的马列毛主义者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新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锐利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及必然要发生的社会危机，基本上都被新左派言中。新左派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担忧并未成为现实，加入 WTO 以来，经过将近 20 年的发展，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未如新左派所预料，出现产业被跨国资本控制、失业潮和政府垮台等现象，反而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这个失误，要从新左派的思想源泉——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中寻找根源。

随着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上升，一些新左派也发生了转向，成为“中国模式”的鼓吹者，成为国家主义者，如甘阳、王绍光、韩毓海等人[1]。

新左派的活跃分子多数是比较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主要活动局限于学术领域，与工农群体和工农运动是疏离的。新左派思潮是知识分子的左翼思潮，是一种脱离了阶级和阶级运动的思潮。

1 例如，韩毓海在著作中重新审视 500 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历史，得出结论说，500 年来历史消长，核心就是国家能力的竞争。

(二) 乡村建设派思潮

90 年代中后期的农村出现严重的困境，从 2000 年开始，一些青年学生自发下乡调研，主要成员是来自全国不到 10 所大学的学生，主要目的一是访贫问苦，深入了解农村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二是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在这个时候，《中国改革》杂志社创办了农村版，温铁军任主编。《中国改革—农村版》花了大量的精力帮农民反映问题，帮助农民维权，还评选农民维权先进分子。借助这个平台，民间自发的学生下乡运动规模越做越大。到 2003、2004 年的时候，全国推广到上百所学校。这时候下乡不再是纯粹的凭兴趣爱好，2004 年之前的时候很多学校已经有自发成立的支农社团，学生专门下乡去做一些教员。2004 年底，天津科技大学教师刘相波[1]和数位下乡支农中涌现出来的青年骨干学生一道，注册“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简称“梁中心”或“乡建”），其宗旨是：通过激励和帮助，使农民自强自立，团结协作，用自己的力量建设家乡，最终实现经济、文化、环境的和谐发展。梁中心很快聚集了一批理想主义分子。有不少在校大学生休学一年，专门参加到梁中心的支农活动中来。

梁中心以“生态农业、农业互助合作和农村可持续发展”为主要主张，实际上是代表资本主义体制下受压迫的小农的意识形态，希望通过合作社等方式把小农组织起来，对抗不断侵蚀农村的大资本。

梁中心以志愿者为主，其志愿者大多来自高校，学生们报名后经过筛选与培训，然后被派到全国各地的点，进行调

1 刘相波是梁中心的创始人之一。刘相波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原为天津科技大学讲师，授课之余，从事学生社团辅导工作。2010 年辞去教职，专于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执行总干事工作。刘相波长期跟农民打交道，为农民服务，农民们称呼他为“刘老师”，但他认为自己懂的不比农民多，干脆改名叫做“刘老石”。不幸的是，2011 年 3 月 24 日，刘老石因车祸在天津去世。

研、支教或指导农民建立合作组织。

梁中心最初在服务农民、培训学生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乡建思潮却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首先，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合作社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体制下小农受压迫的问题。合作社本身要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存活，就必须按照资本主义的规律运作。这就注定了，要么合作社内部发生两级分化，合作社被少数人掌握，多数人成为事实上的雇佣工人；要么合作社经营不下去，最终破产。

其次，从农民的现实情况来看，从 1998 年三农危机全面爆发到现在，20 年过去了，农村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一是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大多数农民已经脱离农业生产，成为城市产业工人（农村户籍的新工人，已经无法回到农村，也没有意愿回到农村），农村留守人员被戏称为 386199[1]部队。二是土地规模发生变化，经过土地流转，部分农户耕种面积已经较大，不再是曾经的小农经济。三是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一方面农业生产已经逐渐实现工业化，另一方面大资本瞄准了农业产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下乡运动，农村今后将逐渐成为各类资本的天下[2]。在新的形势下，许多乡村建设活动分子遭遇新的困境——无农可支。到农村做什么呢？原来的服务对象已经不存在了。

在大资本面前，生态农业和合作社举步维艰。这些乡村建设活动分子，热血青年，将何去何从？

第五节　马列毛主义思潮

马列毛主义思潮，是新世纪逐步成长起来的社会思潮。马列毛主义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的伟大实践，是

1 38 指妇女，61 指儿童，99 指老人。

2 事实上，以前农村曾经存在过的产业，如生猪、家禽养殖业，已不再存在，现在从事这些产业的都是大资本，养殖生猪规模都在百万头以上。

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丰碑；当今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新的社会变革，将在马列毛主义的指引下，依靠新一代无产阶级，取得伟大的胜利。

老左派的一部分，以魏巍、李成瑞、马宾、刘实和韩西雅等人为代表，在新世纪逐步转变思想，成为马列毛主义者。

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魏巍发表《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文章回顾了 20 世纪的伟大革命，历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总结了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教训，剖析了现代修正主义的若干特征，批判了"补课论"思想，展望了新世纪即将到来的的新的斗争。

2010 年，李成瑞出版《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李成瑞在书中指出，在我国的经济生活领域，随着阶级矛盾尖锐化，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为了维持现有的统治秩序，运用了一些新的策略，在具体行动上，就是采取一些改良措施，主要是利用二次分配搞一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同时加强扫黄打黑、惩办一些贪污犯，以改善政府的形象。但是，所有这些，决不能逾越一条底线——坚持和强化已经形成的私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坚持和深化已经形成的工人阶级成为雇佣劳动者和弱势群体的地位。

2008 年，马宾出版《纪念毛泽东》。马宾认为应该"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线，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在城市，把在改革开放期间一切公有财产被私有化了的财产，全盘收归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劳动集体化、生活社会化的三农政策。"

2008 年，刘实、韩西雅等人以魏公哲为笔名出版《中国工人阶级社会地位演变实录》，书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基础、社会生产关系等多方面的巨大变化，以及工人阶级由社会主义国家和公有制经济的

主人沦变为雇佣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演变。

以魏巍等人为代表的老一代马列毛主义者已经逐渐老去或故去，新一代的马列毛主义者正在迅速成长，其主体是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和产业工人，其人数目前较少，力量仍然是非常弱小的，他们对中国当前社会性质、今后社会变革的路线，仍在探索和争论中。毫无疑问，这个群体将是今后历史进程中极为重要的力量。

参考资料

1、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杨继绳，Excellent Culture Press，2004 年。
2、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马立诚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
3、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马立诚著，东方出版社，2015 年。
4、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马立诚、凌志军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5、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年。

当代中国左翼思潮中的民族主义

第一节　何为民族主义

民族本身的历史不长，西方大部分民族是在中世纪末期逐步形成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相互间交往范围越来越广，形成统一市场的需求也越来越强，这是民族形成的根本原因。人们在相互交往中形成的共同语言和文化，为民族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对外战争在民族形成中也起到重要作用，往往是民族形成的催化剂。一般而言，民族国家和民族本身往往同步产生，为建立统一市场的需要而创立的，强制推行民族一致性的机关——即国家——政府部门、军队、宣传、教育等保证了民族的稳定性。民族主义是形成民族和民族国家时同步形成的意识形态，是运动的合法性旗帜，基本主张是一个民族应自我统治而不是被其他民族统治，民族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和阶级利益，民族之间矛盾优先于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但基于民族主义口号建立的国家不是超越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掌控政权，民族国家就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民族主义往往用以掩盖国内阶级矛盾、破坏国际无产阶级团结、壮大资产阶级武装力量。民族主义在历史上曾起过进步作用。在西方，它曾帮助资产阶级凝聚人民的力量，冲破封建制度的樊笼；在东方，它曾帮助殖民地人民凝聚力量，打碎帝国主义的统治。但是，当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经建立起来，无产阶级和本国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时，民族主义就成了统治阶级麻痹群众、转移矛盾的精神鸦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均对民族主义（尤其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进行过批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驳斥资产阶级指责说，“工人没有祖国……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

所理解的那种意思”。恩格斯也曾说：“德国反动派无论在波兹南或者在意大利都力图使利己的民族主义情绪复活，其目的的一部分是为了镇压德国内部的革命，一部分是为培养黩武主义以准备内战”。列宁甚至痛斥爱国主义，“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因为“谁采取了民族主义立场，他自然就会希望在本民族、在本民族工人运动的周围筑起一道万里长城，甚至明知城墙就得分别筑在每个城镇和村庄的周围，明知他的分崩离析的策略会把关于让一切民族、一切种族、操各种语言的无产者接近和团结起来的伟大遗训化为乌有，也并不感到不安”。

民族主义在中国也曾起过重要作用。在中华民族八年抗战的伟大斗争时期，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时期，民族主义都曾起过积极的、进步的作用。但是，在资产阶级复辟的今天，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再次成为主要矛盾的今天，宣扬民族主义就不再是进步的而是反动的行为了。

二十一世纪以来，一批曾经的左翼学者，用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词语为民族主义鼓与吹，其本质就是麻痹无产阶级群众，为资产阶级的扩张摇旗呐喊。每一个马列主义者，都应该在理论上认清他们的本质，在行动上揭露他们的行为。

第二节　民族主义在中国的起源及演变

(一) 90年代前：被批判和被边缘化的民族主义

近代以来，应对来自中国外部的压力始终是中国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救亡阶段，民族主义既是尖锐危机激发的自然情感反应，也是团结反抗侵略力量的有力口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革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新气象，其领导的革命突破了民族叙事的狭隘视野，主张中国革命是“无产

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将民族解放作为一个重要环节纳入到整个革命事业之中，如此一来，民族利益不再脱离无产阶级革命利益，信奉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在不同时期也能够成为革命力量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爱国宣传离不开国际主义的大基调，保家卫国保卫的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那个时候，我们在对外交往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我们在高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同时，也高呼“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全面向资本主义世界看齐，对本国经济、制度、文化的态度由自豪转向质疑，从伤痕文学对社会主义实践的宣泄式反思，到全盘否定中国制度文化、要求全盘拥抱“蓝色文明”的《河殇》，再到“六四”的爆发，民族自卑（或称为“逆向民族主义”）成为 80 年代的主流，而执政党需要为其打开国门、融入资本主义体系营造有利的社会环境，故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这一倾向。此外，当时资本主义世界需要与中国联手抗衡苏联，对中国的态度相对友好缓和，这更加给中国民众眼中的资本主义国家蒙上了一层梦幻色彩。

(二) 90 年代至 2008 年经济危机：民族主义之声渐起

90 年代是市场化改革狂飙突进的年代，改革导致的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贫富分化、贪污腐败、国有资产流失、下岗失业等问题突出，相比于将矛头直接指向当局、揭露批判其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本质，将矛头对准外部则更加易于接受，政治风险也更低。另一方面，“六四”运动被镇压后，中共亟需填补共产主义信仰离场后的政治信仰空缺，同时也要尽快将人民的注意力从内部矛盾转移开来，民族主义成为有效的官方政治宣传工具。在此期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联合的动机削弱，其友好和善的光环逐渐消退，中国民众在诸如“银河号事件”、台湾问题上感受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敌意，同时中国外交的趋于软化在民间也激起对帝国主义愤恨的情绪，标志性事件是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以及中美南海撞机事件。这一阶段的民族主义者集中于指责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争抢国内资源、遏制中国崛起、干涉中国内政。

进入 21 世纪，中国重新加入 WTO，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融合日趋紧密，国内资本与国际资本开始正面竞争。但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蛋糕不断做大似乎为所有人（或者说大部分资本家）带来了近 7 年的持续改善，矛盾只是在暗中积蓄。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者主要的担忧在于民族工业（资本）受到国外资本冲击，认为自由开放的市场将扼杀尚不成熟的民族企业，主张对重点领域实施政策保护，限制进口和外资进入，使其在没有外来产品竞争和外国资本挤压的条件下快速发展壮大。

这一时期也是“新左派”声名初起之时，汪晖、旷新年、何新等代表人物均表达了对于资本主义霸权的批判，如“发展中国家这么多的加工工业，等于给西方发达国家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只是很少一部分的利润，大部分利润被西方抽去了，还把自己的生态环境破坏了”（汪晖）；“中国遭遇西方文明的现代时期也许与中古‘五胡乱华’的时候有着某些类似之处：中华文明经受着旧文明解体和被征服的巨大混乱、黑暗和痛苦，印度的宗教征服了中国最优秀的心灵”（旷新年）；“我认为美国对华既有一个短期的安抚政策，还有一个长期不变的根本性战略目标：这就是必须遏制中国走向强大”（何新）。

同时，老左派也强烈质疑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和政治上的挤压。如程恩富所说：“正是在这种认为民族工业已经过时的

流行观点的误导下，有些地区和部门‘招商引资’而不‘招商选资’，大搞国内的无序竞争，利用跨国公司消灭本国民族企业竞争对手，甚至放任外资对我国战略产业的恶意并购。这种只知道赚钱，不知道自主发展，只注重眼前利益，不知道长远利益的短视行为，已逐渐显示出过度依赖外资的依附性危害”。

(三) 经济危机至今：民族主义从民间到官方、口号从“图存”到“崛起”

及至 2008 年次贷危机爆发，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和停滞，中国先后于 2009 年和 2014 年采取两轮大规模刺激计划，对冲外部需求不足造成的冲击。在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业的支撑下，中国经济增速平稳下降，但仍显著高于发达国家增速：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上端的产业如通信、互联网、高端装备制造等也在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经济结构上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在互补之余，竞争色彩越来越强。中国抛弃“闷声发大财”的低调形象，不再避讳展现自身实力，并开始寻求更强的政治存在感，特别是新一代领导核心上任以来，经济上对外投资快速增长，2016 年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 2008 年的 3.5 倍，政治上更加活跃，在南海、日本、朝鲜等问题上更加强硬，并积极参与维和等国际事务，这有意无意中终结了延续二十余年的“去政治化”趋势，培育了一轮“再政治化”的浪潮。浓厚的政治氛围不仅弥漫在国内，也有国际环境内外呼应：“阿拉伯之春”、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事件都标示着民众对政治参与不断高涨的热情。特别是在特朗普上台后，潜在的矛盾集中爆发出来，不管中国是否愿意，不得不与美国正面对抗。

同时，长期经济增长和城市化使得城市中产阶层人数显著增加。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按照拥有 5 万至 50 万美元净财富

的中产阶级标准，2015 年中国中产阶级成年人口占成年人口比例达到 20.1%。中产阶层在稳定的经济发展中品尝到了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持续提升，他们期待中国崛起继续做大蛋糕，同时恐惧经济恶化或政治动荡剥夺他们现有的安稳生活，是“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天然支持者，可以说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更加倾向民族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内民族主义氛围愈加强烈，原本活跃在民间的民族主义被官方认可，成为“主旋律”：电影“战狼 2”“红海行动”“厉害了，我的国”三部宣扬民族自豪的大片接连上映，官方媒体以国际锐评、人民日报“九评”等形式高密度点评贸易战进展，重点批判美国政策措施，表明官方立场，塑造“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舆论氛围。这种氛围在华为任正非接受采访达到高潮，任正非两万字的访谈记录形成现象级传播，“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的豪言壮语使得一个民营企业家成为了“凝聚各阶层共识”的标杆人物。

第三节　左翼民族主义思潮的主要观点

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制度已完成转轨，国际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社会矛盾积聚、外部压力强劲，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成为民间和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之一，不可避免地影响渗透到左翼思潮中，并已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其主要观点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对现实：国家利益优先，坚决打赢中美争霸战

在中美对抗的格局下，左翼民族主义的重心是打赢中美贸易战，突破美国对中国的挤压，扩展中国的资源来源和产品销售市场，为继续发展创造条件：

“美国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本质，以及它的‘逻辑’也不会改变，为了维护霸权，‘争夺霸权’，必须遏制中国发展，这就成了美国的‘国策’”“我们不仅要丢掉幻想，敢于斗争，

而且要善于斗争，务求多胜大胜全胜。这里的关键，是要科学地对准美国的软肋、要害、痛处，‘集中优势兵力’、优势资源，‘打得准，打得狠，打得稳’”。（岳青山：丢掉幻想，敢于斗争，打赢抗美贸易战）

“现在的情况是：北方国家的人一致剥削南方国家的人，大量资源和利润回流到北方国家，才能在北方国家中培养出一个人数居多的中产阶级……避免了阶级斗争的激化”“我们要有分享世界资源的权利，并以此来支持中国的发展。我们的目标是使我们国内的大多数人都富裕起来，也来一个‘工人阶级贵族化’”。（张文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家利益）

而要打赢贸易战，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确保集中全国资源投向重点战略领域，实施扶持民族工业的政策，培育足以在国际竞争中胜出的企业：

“面对美国以‘国家紧急状态’发起对华为、大疆、海康威视的疯狂打击，中国怎样在这场新形势下的中美高科技上甘岭战役中取得最后胜利？当前中国应该给予华为、大疆、海康威视一切所需要的帮助……同时对美国公司发起反击，通过对美国公司发起反击来策应和支持华为等中国公司的战斗”。（李光满：特朗普以国运相赌，华为形势日益严峻，中国怎么办？）

“华为研发的技术与阿里研发的技术之所以不同，在于华为所研发的硬核技术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这种作用影响之大，足以让美国心惊肉跳，让美国担心，总有一天，中国会在技术上超越美国，把美国甩在后面，美国再想利用科技的优势来薅全世界的羊毛，即将成为过去的事了”。（胡懋仁：为什么华为被美国针对，阿里却安然无事）

当然，企业也要以民族利益为重，要与国外资本竞争、与国内资本合作，绝不能与国内企业“窝里斗”：

“衡量当代新资产阶级政治上是不是成熟标志，主要看两

点：第一点，是不是能够对毛泽东主席作为共和国的缔造者（亦即国父）有足够的尊重？第二点，是不是把‘产业报国’作为一条绝对律令置于利润最大化之上？从这次联想事件以及资产阶级此前自鸣得意的种种表现看，他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不及格。”（郭松民|联想事件：资产阶级向何处去？）

“只要自己人不拖后腿，只要全行业都能支持华为这样的企业，我们想做的，总会做成。终有一天，用国产是一件令人骄傲的事情”。（申鹏|华为启示录：做企业，要有决心和战略搞技术的自主创新）

那么对于被资本剥削的无产阶级呢？鼓吹民族主义的左翼学者不敢公然抛弃无产阶级，只能惺惺作态地承认，正是无产阶级“忍辱负重”的奉献才将中国建设成了伟大的国家：

“所有这一切变化，都要归功于我们的人民。正是他们，靠着他们艰苦卓绝的劳动，靠着他们忍辱负重的精神，靠着他们吃苦耐劳的意志，把我们的国家一点一点地建设得更加辉煌，更加强大。……伟大的中国人民，辛苦劳动几十年，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正在兴旺发达的国家”。（胡懋仁：人民的劳动改变了这一切）

他们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的伟大，实际上却不准无产阶级反抗。他们看似不提倡“996”这样不可持续的工作方式，但是却又认为华为的“996”和马云、刘强东的“996”不一样。他们成了资本家的吹鼓手，鼓吹剥削人民、制造 251 事件的资本家，是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来企业：

“从中兴、联想、华为企业发展和对美制裁的不同态度中，看出其企业家的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观的根本对立。前两个企业主要负责人的世界观、价值观还是个人主义、金钱至上为主。而华为就是把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作为企业发展的灵魂和根本”“华为公司名义上是民营企业，但从整个企业

运营管理模式看，完全不像私人企业管卡压的方式，而是社会主义公有企业模式。因为它没有把股票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其管理的指导思想不是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理论，而是毛泽东思想”。（郝贵生：对中美贸易战的反思及十点理性思考）

(二) 对中国革命：强调民族自救，忽略社会革命

如何评价前后三十年的功过是一个敏感的话题。长期以来，官方媒体以“不争论”的方式回避这一分歧，但在左翼民族主义观念里，两段时期的矛盾可以在经济成就上得以弥合，他们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本质，高度赞扬沿袭苏联模式的国有化、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的建设方案，避而不谈改造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政治运动，最终将前后三十年统一为中国崛起的宏大叙事：

“可以说，20 世纪的中国史，主导脉络就是国共两党对苏联模式的学习，但是这两个学生一个建立了世界第一工业国，另一个跑到小岛上搞黑帮，共产党到底学到了什么？”被称为“工业党”宣言的《大目标：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给出了答案：学的是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并总结出苏联工业化的三大特点：前所未有的高速、不依赖外部殖民地、逆势上涨。这些特点非常适合有被殖民历史的落后国家：

“从建国到解体，苏联的生命只有 69 年，……6 岁以前，年幼的苏联病病殃殃……到 35 岁的时候，苏联开启了人类的太空时代。在以前的历史上从来还没有一个大国能以这种速度实现自己的强国之梦”“苏联工业化的另一大显著特征就是不依赖外部殖民地，所以苏联经验更容易被中国这种前殖民地接受”“苏联工业化的最后一个特征是逆势上涨。……每当其他工业国衰退的时候，就是苏联工业化进程高涨的时候。苏联因此摆脱了其他后发国家卖身求生的命运”。（《大目标：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

(三) 对传统文化：将孔夫子和马克思统一起来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封建小农经济，主流的儒家、法家学说是服务于统治阶级“平天下”的政策工具，不管是世界观还是方法论都与马克思主义截然对立，但一些左派通过奇妙的方式将二者统一起来了：

“我今天想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要重新去看我们的中国。可能我们对中国的了解都还只是刚刚开始，我们要重新去了解。包括这 25 年的改革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成就，都需要重新了解。要重新认识中国改革成功与毛泽东时代的联系和连续性，重新认识整个传统中国历史文明对现代中国的奠基性。我们今天要强调，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套用从前中国公羊学的一个说法，就是要达成新时代的‘通三统’”。（甘阳：“通三统”——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的复兴）

这些不伦不类的“统一”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已失去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而过去被批判、被打倒的保守学说摇身一变，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支柱。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都是对西方或资本主义的批判，这就是统一的基础，再通过儒家、法家等对马克思主义加以解释和改造，形成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结合的新学说，赋予了新时代中华民族崛起更加有力的理论指导。

第四节　左翼民族主义批判

(一) 抓主要矛盾：当前民族矛盾不是主要矛盾

一百年前，中国人民在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压迫之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且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相勾结，不推翻帝国主义的大山，就不能将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转变为政治上自由、经济上

繁荣的中国，这是当时民族解放与社会主义革命结合的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因为中国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斗争从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其之所以新，不仅仅是要自强求富，更是要革除旧经济、旧政治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反动旧文化，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和新的国家。若剥离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则偏离了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可能凝聚起强大的革命力量，民族独立也就无法实现，民族主义只能是空洞的口号。

而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早已在中国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成为经济体量第二的大国，甚至可以尝试与世界第一的美国一争高下，民族矛盾已不再是主要矛盾，当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也不再包含民族独立，这使得民族主义丧失了与社会革命结合的基础。中国资产阶级也不再是当年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民族资产阶级，而是能够在世界 500 强中占据 120 多个席位的强大国际集团。所谓的贸易战，不过是中国资本国际扩张的需求越来越大，挤压了美国资本的扩张空间，引发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和新中国成立前的侵略压迫存在本质的区别。

(二) 停止内斗、共克时艰：民族主义在为谁摇旗呐喊？

既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自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左翼民族主义者只看得见民族英雄企业华为足以在国际市场分一大杯羹的强大实力，却看不到“自愿”签署奋斗者协议的普通员工、35 岁被优化裁员的中层、长期加班猝死的码农、因索要赔偿金被拘留 251 天的受害者，对于这些普通劳动者来说，任正非老板究竟应该是被革命对象还是被追捧的英雄？

左翼民族主义者多少还是带有“左”的色彩的。他们并不是总是讳言阶级矛盾，特别是分析欧美发达国家国情时，有

时也不避讳国内阶级矛盾，但讨论止于无产阶级维持形式上的领导地位，似乎法律文本上的领导就是事实上的领导；对于毛泽东的崇拜是必须挂在嘴边的，但也只要挂在嘴边就够了，以至于看到任正非宣称学习毛泽东，就做出“华为的管理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这样荒诞的判断。一旦涉及现实斗争，他们立刻要求所有阶级停止内斗、共克时艰，要求无产阶级无条件承认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确保国内稳定的发展环境，甚至适当给资本让利，“勒紧裤腰带”，保住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提高企业竞争力，在资产阶级领导下，为本国资本扩张添砖加瓦，这不得不令人想起第二国际在一战中的表现。

(三) 中华民族崛起：民族主义将把我们引向何方？

当今的左翼民族主义诉求已不是作为被侵略国的“救亡图存”，而是作为世界第二大国的“中华崛起”，每每激动于中国军事力量的提升，欣喜于中国在国际争端上的强势表现——“看到祖国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可是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以对准国外，也可以在两个阶级搏斗时对准本国无产阶级；中国可以对国外耍流氓，也可以对本国无产阶级耍流氓。

中国资本对外扩张的趋势已经不容忽视，这一趋势为左翼民族主义者所乐见。若听从民族主义的主张，民族利益优先的思想在中美争霸的刺激下演化为更加激进的民族主义，开始追捧悠久文明历史——特别是其中落后的部分，美化所谓民族特色，抗拒民主自由体制主张，要求与民族地位相匹配的生存发展空间，如此推演，在极端情况下可能发展出法西斯主义，当然，不一定是军事入侵，可以采取更加“文明”的方式。这并非没有先例，日本之所以在二战前走向对外侵略的道路，正是从强调日本国家中心主义开始，“皇大御国作为大地最初形成的国家是世界万国之根本”，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就要尽快达成现代化，快速现代化需要倚重国家专制力量，为此放弃政治民主，肯定暴力行径和民族歧视意识，日本对外扩张就是优越征服落后的必然。

第五节　结语

左翼民族主义在中国对外扩张受阻、内部发展动力减弱的背景下显著活跃起来。这些民族主义者虽然号称“左”，然而本质是为国内资产阶级扩张摇旗呐喊，他们将本国无产阶级利益与本国资产阶级利益混为一谈，支持国家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外姿态，要求国内阶级合作、一致对外；他们虽然口头上赞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然而只是将其看作实现中华民族崛起的手段，并将所谓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强行嫁接，意图从“自古以来”天朝上国的历史中寻找民族崛起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不管左翼民族主义如何将马克思主义挂在嘴边，中华民族崛起乃至称霸的愿景多么诱人，都不能忘记《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红色中国网部分错误思潮批判

自 2012 年左翼网站遭遇集体封杀之后，红色中国网作为境外左翼网站，在国内左翼发声困难的情况下，利用其便利条件，在左翼宣传与鼓动方面起到了独特的作用。红中网的一大特色是大量的理论争鸣与思想碰撞，这为左翼思想理论的进一步探索与进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红中网编辑部集中了一批留美背景的左翼知识分子，熟悉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新政治经济学观点，也关注国内的阶级斗争与左翼动态，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问题，并积极参与国内左翼活动。红中网编辑部对于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战略、政策和策略，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这集中体现在以主编远航一号为核心的红中网编辑部的一系列论述中。

但是，红中网编辑部的一些重要论述是违背马列毛主义的，包括对时代特征的错误认识（否认“中帝论”）、对工人阶级力量的错误认识（利润挤压论）、对群众组织的错误认识（工会无用论）、对未来斗争战略的幻想（地方割据论）和对群众工作方法的错误理解（反对灌输论）等。作为进步的知识分子群体，长期生活在海外，脱离实际、主观主义和精英思想等问题若不能有效克服，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严重的局限性，并进一步引起左翼思想的混乱。

第一节　对时代特征的错误认识：否定帝国主义论

远航一号认为：

中国的出口制造业不仅依赖美国和欧洲的市场，而且还依赖在国外进口的能源和原材料。这些能源和原材料虽然不来自美国，但是中国资本主义客观上依赖美帝国主义的海空

力量来保障中东、非洲等地的政治稳定以及印度洋、太平洋的海上交通安全。中国资本主义出口制造业对于美帝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巨大依赖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甘愿在“G2”体制下充当所谓“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资产阶级既无力，也无心，更无胆，去挑战美帝霸权。

当然，在中国资本家争夺非洲等地原材料的过程中，会与具体的欧美资本家发生冲突。但是，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中国所获取的海外原材料，是维持中国资本主义制造业所必需的，而中国资本主义制造业又是当前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中心；通过对中国广大廉价劳动力的剥削，中国资本主义向美、欧、日等核心国家输出巨大数量的剩余价值，保证了后者的超额利润，进而保证了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正常运转。在这个意义上，中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仅没有冲突，而且高度一致。这就决定了，不仅在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即使是在中国和美帝的仆从国（如日本）之间，也不会爆发战争，甚至连武装冲突都不会爆发。（红色中国时评：《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

井冈山卫士认为：

中国的投降路线是“意料之中”的，唯一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它的投降竟然来得如此之快，如此彻底，以至于连美国资产阶级中反对“贸易战”的集团都来不及对它展开支援。（《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

这些说法，在事实判断上是错误的，在理论上也违背了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学说。

说它在事实判断上是错误的，是中美贸易战的最新发展是因无法达成妥协而升级，贸易战早已超出了双边贸易的范围，而上升为以中美两国为主、欧洲国家和其他国家也参与的高科技之战、遏制与反遏制之战，根本不是所谓的“中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仅没有冲突，而且高度一致”、“中国资本主义出口制造业对于美帝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巨大依赖决

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甘愿在‘G2’体制下充当所谓‘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资产阶级既无力，也无心，更无胆，去挑战美帝霸权”。

中美谈判中的妥协在一定范围内是存在的，中美两国的力量也存在很大差异，分工上长期互补，但决不能说明“中美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高度一致”。这种判断与中美“夫妻论”并无二致，只是立场有区别。照马列主义的观点，国际垄断资本之间一定范围内的妥协与合作决不是排斥竞争与斗争，而只能理解为竞争与斗争的特殊表现形式。像中国和俄国这样的国家，无论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美国的遏制政策始终是不会改变的，“中美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高度一致”是一厢情愿的说法。

出现这些奇谈怪论的根源，在于远航一号等同志有意无意地混淆了帝国主义论与世界体系论，并将后者视为对前者的补充与发展。但是，两种理论体系对时代特征的理解有着重大区别。

大致来说，世界左翼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有两种：

一种理论是从马克思到列宁一脉相承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其内部的矛盾，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性质。外部的力量也会起作用，但需要通过改变其内部的生产方式来发挥作用。当某个国家的垄断资本在发展中占据统治地位，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高度结合，这个国家就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即资本主义最高和最后的阶段，也是垂死和腐朽的阶段。帝国主义不能理解为一种国与国之间的特殊的压迫与剥削政策，比如现在时髦的“剥夺性积累”、“帝国主义租”等说法。这些政策可以依据不同国家、不同年代的具体情况而变化。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说超帝国主义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有其限度，随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斗争的升级，无论国

际资本分工细化到什么程度，都不可能解决这个根本矛盾。华为的产品分工涉及 154 家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供应商，其中包括 33 家美国供应商，但是，一旦帝国主义者认为华为可能威胁到他们的长远利益，这种长期的紧密合作关系顷刻化为乌有。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已被列宁时代的理论与现实发展彻底否定，新时代的超帝国主义论（利益一致论）在现实面前同样濒临破产边缘。

另一种理论则把帝国主义体系当作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剥削与压迫，一些地方能够充分发展是以世界大多数地方“不发达的发展”为代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针对许多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失败，一种替代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观念发展起来了，即依附理论（这里说的是广义的依附理论，包括远航一号等人援引的世界体系论），以弗兰克、沃勒斯坦、阿明等左翼学者为典型代表。依附理论认为，分析的单元必须是整个世界体系，不同的地域或民族国家仅仅是其组成部分。与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不同，中心国家与半外围国家、外围国家的地位以及这些国家是否是帝国主义国家，是通过世界资本主义交换体系中的分工地位来确定，是通过某些国家被其他国家的剥削来界定，而不是通过其内在的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来界定，即不是通过这些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程度来界定的。中国、印度和阿根廷等差异巨大的国家被列入半外围国家，前苏联也被列入半外围国家。

依附理论这种重视外因（分工地位）的分析框架存在着巨大的逻辑漏洞。十余年前，中国刚加入 WTO 时，中国的国际分工的地位甚至不如一些东南亚国家，左翼一片“殖民地化”的痛惜之声，但十余年来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是有着显著提高的，说明分工地位只是一个“因变量”，并不是“自变量”。当年流行一时的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逐渐在青年中丧失市场，左翼的注意力已经转到对不同国家的内在结构差异的考察，转向了国内的阶级与阶级斗争。

具体到关于“中帝论”的讨论，列宁主义从来没有从“资本主义强国”的意义上去理解帝国主义（尽管帝国主义国家一般是列强），帝国主义国家与“中心国家”也绝非同一概念，远航一号等同志将帝国主义国家等同于中心国家、等同于强大与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小资产阶级强国派的庸俗看法。我们谈论的帝国主义，是行将就木的资本主义因其内在的生产方式决定的愈来愈走向腐朽、没落、衰老的阶段。资本越来越多地从实体领域流出而转向金融领域，越来越多地从一个国家流出而在全世界寻找增殖空间，在此过程中，资产阶级被迫开辟海外市场、强化国家能力与军事力量、加强地缘政治斗争，这一切正是资产阶级积累危机的表现。而贸易战、科技战和遏制与反遏制战正是帝国主义国家之家矛盾日益尖锐化、不可调和的体现，是现代资本主义体系衰老与腐朽的国际体现。

相反，远航一号等人将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看得十分强大、十分稳固，恐美之情溢于言表：

> 但是，只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不改变，这就是一场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赢得的竞赛。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垄断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技术封锁。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和高科技人才的投入。除了个别领域，社会主义国家在资金与人才方面，不可能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竞争。（《21世纪与共产主义》）

在远航一号等人看来，不仅现在中国的发展由这种所谓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所决定，连过去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也受这种天上掉下来的规律所支配，社会主义的失败在所难免。远航一号等人的唯心史观可见一斑。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被列宁批评为“最精致的，用科学观点和国际观点精心伪装起来的社会沙文主义理论”。远航一号等同志鼓吹的当代超帝国主义理论，如果不能得到有效

的反思，最终会演变为“最精致的，用科学观点和国际观点精心伪装起来的”民族主义甚至国家主义理论，不管其现在的言辞看上去如何革命与激进。

因此，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下问题：今日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本主义不发展，还是资本主义发展过度？是内部的金融垄断资本阻碍并窒息了社会的发展，还是外部势力（所谓的中心国家）决定并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对这些问题的判断，对时代特征的认识，马列毛主义者与远航一号等同志有着重大的分歧，这些判断进一步影响着我们对于社会主要矛盾、政策和策略等方面的判断，不可不察。关于“中帝论”相关问题，本书“时代篇”有更详尽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第二节　对工人力量的错误认识：利润挤压论

远航一号认为：

……如果要考察工人斗争的效果，还是要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分配，看无产阶级通过斗争是不是从自己劳动创造的价值中得到了一个更大的份额，从而缩小了资本家可以得到的剩余价值的份额。

……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提高，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斗争力量的增强。由于中国工人斗争力量的增强，在中国工人所创造的价值中，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转化为了劳动力价值，而资本家和官僚所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份额缩小了，这样资本家的利润率就下降了。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利润。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资本家的投资就要下降；或者，在一个时期内，有些资本家会企图通过举债投资的方式来维持积累，从而为将来的债务危机埋下祸根。利润率下降到一定程度，资本主义经济就会陷入危机，而资产阶级国家也会陷入政治危机。（《中国资本

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这里产生了两个问题：工人工资的上涨会造成经济危机吗（利润挤压论的核心观点）？工人阶级力量表现在劳动份额的上涨吗？

首先，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论不同，利润挤压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产业后备军人数下降将提高"实际工资"，从而会导致利润日趋下滑，进而导致经济危机。这种说法和新自由主义者将经济危机归咎于工人福利太好不谋而合。这种理论在西方左翼中也只能算是一家之言，招致了激烈的批评，一些西方左翼学者认为利润挤压论不仅不是一种发展反而是巨大的倒退。比如在卡莱茨基看来，劳工增加工资的要求并不是对资本的主要威胁，因为公司拥有定价权。安瓦尔·谢克认为这一假说在理论上是无效的，它只考察了事物的表象。关于这方面的理论争论不赘述。

更重要的是，说工人阶级力量表现在劳动份额的上涨，这种说法也是既不符合中国现实，也不符合马列毛理论。

远航一号认为：

2010年是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开始明显出现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变化。2010年，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大约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到了2013年，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已经上升到 41%，而资本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已经下降到28%。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份额基本恢复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水平。

以上数据说明，当前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与以往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目前的基本形势，是无产阶级在进攻，资产阶级在退却；无产阶级在节节胜利，资产阶级在节节失败。当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处于暂时稳定，资产阶级仍然占统治地位，但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已经开始动摇了，而统治基础的动摇是其走

向垮台的第一步。（《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正发生对无产阶级有利的变化》）

高调的口号固然能得到一片赞赏，却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工人的自发力量固然可能在劳动力价格的涨跌中发展壮大，但这远远不能说明远航一号津津乐道的“无产阶级在节节胜利，资产阶级在节节失败”局面已经出现了，也不能证明远航一号所谓的“相持阶段”论能够成立。如果事情有这么简单，那社会主义革命真是件很简单的事，劳心费力的组织工作也成为多余的了。

首先，工人的力量体现在组织上，如果没有组织起来，劳动收入份额的涨跌没有实质性意义。

2010 年之后所谓劳动收入份额的上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快速城镇化进程。2004 年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民工荒，即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表现，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工资开始上升。这种增长更多是补偿性的，即由于长期以来农村新工人劳动力供应过剩导致工人工资严重低于维持城市正常生活的劳动力价格，工人工资增长的速度长期低于 GDP 增速，也低于物价上涨速度，导致新工人产生“用脚投票”的情况。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 年，一个农村居民中等收入户人均消费总支出，仅相当于城市中下等收入户的一半左右。这在种大背景下，2008 年《劳动合同法》实施。这些因素推动了劳动者工资的快速增加，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开始回升。如果从工人数量增长这个角度来谈工人力量增加是可以的，这个时期的工资上涨显然是由资本高速扩张期工人的被动防御（用脚投票）造成的，远远谈不上“无产阶级在节节胜利，资产阶级在节节失败”。

另一个极端的反例是 1978—1984 年间，劳动收入份额曾一度增加：在这段时期，劳动收入份额的产业内效应（主要职工收入增长造成的）增加了 1.8 个百分点，产业间效应（主要农民收入增长造成的）增加了 2.2 个百分点，两种效

应叠加推动劳动收入份额增加 4 个百分点。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为收买农民，国家一度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致使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另外，企业的工资制度及经营制度改革也在润物无声地进行，为顺利推行改革，提高工人工资，实行奖金制度，也一度促使收入分配格局向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变动。但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企业工资制度及经营制度改革，这两项都是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手段，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增长没有半毛钱关系，相反，是牺牲劳动者的政治权利来换取短暂的经济利益，对资产阶级而言，这个买卖十分划算。政治权利丧失后，经济利益也就没有任何保障了，这很快就被历史所证实。

贝弗里 • J.西尔弗在其名著《劳工的力量——1870 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中将劳工的力量分为两大类：一为组织性力量，即劳工结社产生的力量；二为结构性力量，即劳工由于生产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而获得的与资本对抗的力量，结构性力量又分两种，一为市场谈判能力，即劳动市场中劳工相对于资本的优劣地位，二为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即劳工在工作场所中，由于自己在生产流程中所处的位置而产生的相对资本的优劣地位。这种分类法颇有参考价值。

在工人力量中最重要部分——组织性力量的获取过程中，劳动份额的上涨并非是必要条件。工人在繁荣时期容易得到经济斗争的胜利，这对于经济斗争而言是一个有利条件，工人在萧条与危机时期则很难争取到经济利益，但是，如果引导得当，这个时候工人政治意识与阶级觉悟可以得到飞跃发展，而这比获得一点随时可能失去的经济利益，显然要重要得多。

所以，远航一号所津津乐道的劳动份额的上涨，即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谈判能力的增强，且不说有多少是事实，这部分恰恰是工人力量中最不重要的、最易失去的部分。

列宁说：“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不组织群众，无产

阶级就一事无成。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就无所不能。组织性就是行动一致，就是实际活动一致。”（列宁：《同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离开了无产阶级的觉悟与团结去谈力量，十分空洞无力。

远航一号的上述论断发表于 2015 年初。2010 年至 2012 年，在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全国范围内经历了第一次新工人的大斗争。此时无产阶级的力量比现今更强一些，阶级斗争的战线推进得更靠前一些。以本田为代表，成立了大致数十个工人自己的工会。但是，从 2013 年经济持续衰退以来，资产阶级发起进攻，这些聚集起来的零星的组织力量再次被打散，阶级斗争的战线被再次推了回去。远航一号在 2015 年初罔顾事实，断言无产阶级在进攻，资产阶级在退却，是非常轻率的。

第三节　对群众组织的错误认识：工会无用论

远航一号认为：

……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剥削，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命根子。这就决定了，只要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还在“正常”运转，资产阶级还在“正常”统治，就决不可能听任工人阶级普遍地、大量地、公开地、合法地组织可以作为工人经济斗争有力工具的工会。资产阶级是不可能那样愚蠢的。一些小资理论家自欺欺人地宣传说，发展工会、保护工人权益，可以有助于“劳资和谐”、可以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长治久安，这只能欺骗自己，也许还能欺骗一些尚不觉悟的工人，但是资产阶级是不会上这个当的。

当然，如果未来中国出现了革命形势，从而资产阶级的正常统治无法再维持下去了，普遍发动起来的工人阶级是有可能大量地、自发地提出组织工会与资本家开展斗争的要求的。但是在那样的形势下，工人阶级的要求就绝不会以工会

为界限，而垂死的资产阶级也绝不会幻想靠工会等有限的让步就可以维持其阶级统治。

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来看，工会这一组织方式确实曾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一部分国家中为工人阶级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提供了适当的历史工具。但是这一历史经验，其主要起作用的时期是二十世纪中期（在此之前，即使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会运动也常常被镇压 ，或者限制在少数熟练工人范围内），其较为成功的地理范围，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中心国家，即北美和西欧，以及后来加入核心区的日、韩、港、台等。即使在有组织工会的鼎盛时期，工会充其量也只是曾经起过一定的社会改良的作用，而并没有发挥充分启发工人阶级觉悟、促进社会革命性转变的作用。而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即使在老牌的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工会也已经普遍衰落。目前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都不是工会会员（其中，在北美，工会会员数量已经沦为工人阶级中的极少数；在除北欧以外的西欧诸国，也已经下降为相对少数）。

在世界范围的工会以及社会改良都已经普遍衰落的大环境下，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在中国这样的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政治条件下，工会反而会成为工人阶级提高斗争力量、发展阶级觉悟的有效工具呢？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方式，不是照搬外国的经验，也不是照搬社会运动的教科书，而是根据中国工人运动自己的传统，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不断地争取局部的进步和胜利。以往的斗争经验证明，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条件下，常规的、公开的、永久性的工人组织方式是不适合中国工人阶级斗争需要的。实践也证明，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没有必要照搬资产阶级民主条件下的那些组织方式。比如通钢工人的斗争，就是在表面自发的形式下而形成的有高度组织性的斗争，并给资产阶级以沉重打击，违反了一切资产阶级法律，

当局还不敢打击报复。只要局部条件有利，工人斗争有力量，“违法”也不妨碍工人斗争的局部胜利。反之，如果当时当地条件不利，工人没有发动起来，最“合法”的请愿也会被资产阶级无情镇压。在新工人斗争中，也有大量的实际例子。在日常劳动和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逐渐产生一些在工人中有威信的优秀分子；当出现对工人有利、对资本家不利的特定时机时，这些优秀分子便将工人发动起来，通过采取一些能够给资本家带来实际损失和代价的行动，迫使资本家做出让步。由于这种发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隐蔽、半公开或公开等不同方式，又可以最大限度地限制资本家打击报复给工人斗争带来的危害（在现阶段，要完全避免这种危害，仍然是不可能的）。（《2019 年，进步青年向何处去？》）

这几段文字比较系统地表述了远航一号的工会观，其主要观点是错误的、形左实右的。

首先，因为“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剥削，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命根子”，所以“就决不可能听任工人阶级普遍地、大量地、公开地、合法地组织可以作为工人经济斗争有力工具的工会”，这是将工人斗争的主动权完全交予资产阶级。但是，任何国家的工人组织权都不是资方恩赐的，包括资格最老的英国工联在内。英国议会在 1799 年和 1800 年通过了全面禁止工人在一切行业里组织工会的法令，在该法令存在的 20 多年中，工会不仅未被消灭，反而数量不断增加，规模日益扩大，组织也越来越健全，直到 1824 年这项法令被迫取消。资产阶级不会听任工人组织工会，工人也不会听任远航一号的说教而不组织工会。事实上，不论是产业工人，还是其他行业的工人，都已经自发走上组织工会的道路。他们数量虽小，但却代表着工人自发运动的方向，只有无视现实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其次，工会不必然就是公开的、合法的。列宁在《怎么办》中就曾论述怎么搞地下工会。在一个专制的国家，也就

是说在一个人民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权力的国家，本身就不必然有合法工会存在的空间，但是，工人却必然要在为争取经济利益而斗争的过程中组织起来，这是由雇佣劳动制本身决定的。2010 年-2012 年间，在大的斗争背景下，工人成立了数十个公开、合法的工会，作为自身争取经济利益的工具。从 2013 年经济持续衰退以来，这些曾经建立起来的工会出现分化，一部分被资本家打压后收编（广州汽配行业），一部分成了中高层管理人员手中每年加薪的工具，还有一小部分举步维艰的坚持。在公开、合法的工会难以为继的时候，2018 年塔吊工人罢工后成立了俱乐部，事实上执行着工会职能，它没有名义，但却公开的存在，它是典型的灰色工会。能够公开就公开，能够合法就合法，不能公开合法，就地下，就非法，俄国人这么搞过，中国也有工人在这样搞。机械地认为工会一定是公开、合法的，是远航一号的又一错误。

远航一号认为，“当然，如果未来中国出现了革命形势，从而资产阶级的正常统治无法再维持下去了，普遍发动起来的工人阶级是有可能大量地、自发地提出组织工会与资本家开展斗争的要求的。但是在那样的形势下，工人阶级的要求就绝不会以工会为界限，而垂死的资产阶级也绝不会幻想靠工会等有限的让步就可以维持其阶级统治。”这是典型的自发性崇拜，幻想工人能跳过公开的、群众性的组织训练过程，在所谓的“革命形势”中迅速超越工会斗争阶段，达到与资产阶级势均力敌的地位。英国工人在能够公开合法地建立工会之前（1825 年），已经地下非法地搞了几十年工会。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力量利用出现的短暂的有利形势，快速大规模地建立工会。俄国工人难道不是这样吗？俄国工人在 1905 年之后才能合法、公开建立工会，但是他们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搞地下工会。难道列宁会因为 1905 年工人提出超越工会范围的要求，而反对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准备时期搞工会吗？不会的，列宁在《怎么办》中就明确说到，“工会组织不

仅能大大促进经济斗争的发展和加强，并且能大大帮助政治鼓动和革命组织工作。”

至于说到资产阶级是否让步，远航一号更是糊涂。资产阶级当然不会幻想靠工会的有限让步就能维持其统治，正如沙皇也从来没有这样幻想一样。但是，迫使资产阶级让步的，不是他们的幻想，而是现实的力量。1905 年前，俄国的工会基本都是地下的（除了祖巴托夫这些宪兵搞的黄色工会外），1905 年革命爆发后，不以沙皇意志为转移，工会爆炸式地增长。试问远航一号，俄国工会的建立，是沙皇有了什么幻想吗？

远航一号认为，“工会这一组织方式确实曾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一部分国家中为工人阶级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提供了适当的历史工具。但是这一历史经验，其主要起作用的时期是二十世纪中期（在此之前，即使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会运动也常常被镇压 ，或者限制在少数熟练工人范围内）”。

这个观点是极其狭隘的，这说明远航一号历史知识匮乏，且战略眼光短浅。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来看，工会最大的作用根本就不是帮助工人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工会是党联系工人的纽带，是党在退却时期保存力量的地方，是党在相持时期积蓄力量、训练工人斗争的学校，是党在进攻时期动员最广大工人的工具。至于起到最大作用的工会，更不是二十世纪中期发达国家的工会，而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工会，以及 1905 年后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工会。这类工会的活动极其丰富，社会主义者通过工会中的支部开展工作，搞小组学习，请布尔什维克做政治报告，搞秘密集会，发动经济斗争，搞固定节日的示威游行，等等。《苏共党史》第二卷第六章有一段讲述这种工会的日常活动：在布尔什维克影响下，活动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以郊游为幌子搞群众集会，以讲座为

名头搞政治报告，利用其工作地点组织党小组学习，等等。这还只是日常活动，至于斗争时期的活动，那就更为丰富了。工人在这样的工会带领下，极富战斗性。眼睛就盯着资产阶级游戏规则内的合法工会，并把这种工会视为工会的唯一形式，当然只会得出工会无用的荒谬结论。

远航一号认为，而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老牌的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工会也已经普遍衰落，因此，在中国这样的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政治条件下，工会更不能成为工人阶级提高斗争力量、发展阶级觉悟的有效工具。

这更是逻辑混乱、倒因为果。“老牌的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工会运动的衰落，正是国际工运低潮与资产阶级反扑的结果，丝毫不能得出工会无用的结论。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西方各国政府的打压下，工会成员率持续下降，罢工受到进一步限制。英国保守党恢复了反工会立法，要求提前向警察提交举行示威活动的申请，禁止会员通过网络投票来决定是否采取罢工行动。这说明，无论工会斗争低迷到什么程度，资本仇视、敌视工会的本性不会改变，比如沃尔玛一直坚决抵制工会。资产阶级的政治敏锐与阶级觉悟要远高于远航一号。

而“老牌的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工会运动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国家所谓“新中间阶层”的崛起，传统产业工人比例逐渐降低，工会运动面临新的挑战。而当代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于这些国家。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农民经历了快速无产者化的过程，工人阶级占劳动人口比重已近 70%，产业工人数量迅猛增长，无论是相对数量还是绝对数量，工人阶级的发展与西方国家经历了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权利意识、团结意识与斗争意识相比老一辈工人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工会意识呼之欲出，这正是启蒙工会意识、开展工会斗争的肥沃土壤。

远航一号将希望寄托于“在日常劳动和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逐渐产生一些在工人中有威信的优秀分子”，“采取隐蔽、半公开或公开等不同方式，又可以最大限度地限制资本家打击报复给工人斗争带来的危害”的斗争形式，这是不了解工人斗争的一般规律和中国工人斗争的发展趋势，坐在书斋与酒桌旁产生的完美臆想。

如果说单次的罢工是工人“战争的学校”，是工人临时和非松散的形式，那么随着工人斗争的发展，这种临时的联合形式必将发展成为持久和紧密的联合形式，这种联合形式就是工会（而不管它叫什么）。罢工不是万能的，上访更不是万能的，“有威信的优秀分子”也绝不能替代群众化的组织趋势，否则工人运动将永远处于手工作业阶段。无论工人的单次罢工组织得多么出色，罢工的规模、影响有多大，如果没有某种紧密的联合形式，没有某种长期的斗争手段，工人斗争就很难上新的台阶。在过去的国企保卫战阶段，的确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工人领袖（多为退休或下岗职工），在长期的上访斗争中成长起来，并一度取得了不凡的成果，但随着私有化进程的基本结束，这种斗争已近结束。而在新工人中产生的相对长期和紧密的联合形式的渴求，反应了新工人阶级意识的成长和斗争形式的升级。幻想用过去的、已逐渐式微的斗争形式来指导未来的斗争是行不通的。至于是公开还是秘密或者半秘密，这个视情况而定。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应该帮助无产阶级积极争取公开建立工会，因为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组织起来，把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团结起来；在不具备条件的时候，布尔什维克自然不会强行建立公开工会，给敌人树立打击的目标。

远航一号称，“以往的斗争经验证明，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条件下，常规的、公开的、永久性的工人组织方式是不适合中国工人阶级斗争需要的。”这是对工人斗争理论与历史的无知。俄国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的、成功的群众

观是“哪里有群众，我们就要到哪里去”。旧俄国与旧中国哪个不是专制统治条件？共产党人照样可以进入黄色工会、反动议会中进行工作，并成功地掌握群众、有效地开展公开的群众工作。布尔什维克的工作，本就是合法和非法结合，公开和秘密结合。在明知是专制统治条件下，藐视“合法”工作，抛弃合法工作，只强调所谓“违法”的工作，这是貌似革命实则幼稚。列宁将这类口头激进、回避实际行动的人称为形左实右的“召回派”，即另一个方向的“取消派”。这的确是深刻的洞见。（召回派是 1906 年俄国革命低潮时期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产生的“左”倾机会主义派别，出现于 1905-1907 年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以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为代表。因要求从杜马中召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故名。他们反对列宁，坚决拒绝在工会、合作社和其他合法、半合法的群众组织中进行工作，竭力主张进行秘密活动，力图取消利用合法团体的机会，使党脱离工人阶级，反对党对非党群众的领导。列宁称它为“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1909 年 6 月，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组织。）

第四节　对未来斗争战略的幻想：地方割据论

远航一号认为：

如果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深刻的危机，资产阶级的中央政府也将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目前，中国的财政总收入中，中央政府收入、地方政府收入大约各占一半，但是，地方政府支出大约占全部政府支出的 90%。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大约有一半的支出要靠来自中央政府的拨款。一旦中央政府陷入财政危机，将无法再补贴各地方政府的日常开支。如果这样，各个地方政府也就无法再满足教育、医疗、治安等起码的公共需要。

资产阶级的地方政府不管群众了，群众就坐在那里等死吗？肯定不是。当许多地方政府无法维持的时候，这些地方

的群众将不得不自动地组织起来。群众中的优秀分子将会站出来，把积极分子、普通群众团结起来，用革命委员会、苏维埃、群众代表大会、群众民主管理委员会等方式自己把地方管起来，以解决地方的各种迫切需要。在无产阶级占优势的地方，这样的群众自治组织就会发展为事实上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

这样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其迫切的任务，还不是马上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立即着手解决群众的各种迫切要求，培养干部，扩大和巩固在群众中的影响，将自己变为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这样的星星之火，必然可以燎原。

……

有了“天时、地利、人和”这些有利条件，只要马列毛左派能够实行正确的政策和路线，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又注意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就不仅能得到巩固，而且还可以得到发展。按照这样的办法，坚持下去，发展下去，地方的工农民主政权就可以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然后连成一片，占领一大块地方，直至在全国范围取得优势。（《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真是奇谈怪论。远航一号认为分属不同民族国家的国际垄断资本是铁板一块，中美大资产阶级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而早已形成统一市场、统一交通网络和统一中央集权的资产阶级国家内部，却会因为经济原因而分裂，在经济危机来时还会出现割据的局面，给无产阶级以可趁之机，甚至在“无产阶级占优势”的地方，群众自治组织就会发展为事实上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在远航一号看来，一旦中央政府陷入财政危机，各个地方政府无法再满足教育、医疗、治安等起码的公共需要，“地方政府无法维持的时候”，“这些地方的群众将不得不自动地组织起来。”

可惜的是，在漫长的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个政府因为无法满足群众的教育、医疗和治安等公共需要，就会放弃政权，

让这些地方的群众“不得不自动地组织起来”。这是异想天开，是最粗陋的经济决定论。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再失败的统治者也不会主动放弃镇压之权。

而远航一号幻想的“一些资产阶级的地方政府也可能不反对工农民主政权的存在（以牵制其他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灵感应来自于西南某市 2012 年之前的短暂实践。从“统一战线”的策略考虑，远航一号称这位市委书记为“同志”，视之为“资产阶级左翼”。远航一号等主张“团结”中国的“资产阶级左翼”，可是这种所谓的资产阶级左翼真的存在吗，有何进步意义？且不说这位“资产阶级左翼”对无产阶级是什么态度，即便他真有占山为王的想法，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统治集团的分裂与割据，而回避手头具体可行的工作，称为无用、过时、不可行，远航一号口口声声所谓的“自信”，原来是寄希望于资产阶级分裂的“他信”。不错，统治集团内部的确有矛盾，但面对无产阶级时却是统一的整体，尤其是无产者还处于一盘散沙的情况下。没有先进阶级的强大组织而去奢谈所谓“统战”，结果只能是投机，这是历史反复证明了的。

第五节　对群众工作方法的错误理解：反对灌输论

远航一号说：

马列毛主义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的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一个社会或者一个社会的某个阶段，其产生、发展和灭亡，要从其内在矛盾中去寻找规律。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主要是中国资本主义矛盾在客观上发展的产物，而不是少数“先进”人物从外面灌输的结果。

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实践方面的工作，要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与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相结合，但这种结合的主要目的，不是“启发”、“领导”、“发动”工人斗争，而是努力学习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在实际斗争中发展出来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和经验，与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中的优秀分子相互学习，先当学生，然后才能当先生。要认识并且相信，阶级斗争的主要推动力不是来自少数知识分子的“灌输”，而是资本主义客观矛盾发展的结果。（《2019 年，进步青年向何处去？》）

在灌输论问题上，远航一号等人的自发性崇拜更是暴露无遗。

“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主要是中国资本主义矛盾在客观上发展的产物”，完全正确。但是，自称马列毛主义者的远航一号同志，其主要工作也并不是在等待资本主义矛盾的“客观上发展”，而是在孜孜不倦地做着宣传鼓动工作，也即列宁所说的“灌输”工作。我们也十分赞赏远航一号同志这样的工作态度。列宁说得好：“根据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这一点，决不应当作出经济斗争具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总的说来，各阶级最重大的、‘决定性的’利益只有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经济基础与政治灌输，客观条件与主观努力，不知道远航一号为什么要对立起来。

远航一号同志提倡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这也完全正确。但是，据此来反对“灌输”，这就混淆了作为马列主义原则的“灌输”和通常理解的作为工作方法的填鸭式“灌输”的区别。坚持灌输论与反对简单粗暴的灌输并无任何矛盾。我们无从得知远航一号同志想要表达什么，或者等待“中国资本主义矛盾在客观上发展”就可以了？或者远航一号认为只能自己去“灌输”，别人不能去“灌输”？

第六节　结语

本文就红色中国网编辑部的一些重要观点进行了批判。这些观点包括红色中国网对时代特征的错误认识（否认“中帝论”）、对工人阶级力量的错误认识（利润挤压论）、对群众组织的错误认识（工会无用论）、对未来斗争战略的幻想（地方割据论）和对群众工作方法的错误理解（反对灌输论）等。无论红色中国网部分编辑的动机如何，这些看似革命的、精致的话语体系客观上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左右倾机会主义留下了后门。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斗争中成长巩固起来的，过去是这样，今天和未来也一定是这样。所以，学会辨析形形色色的左翼思潮，是我们提高马列主义水平的必修课，也是左翼与乃至整个无产阶级进步成熟的必修课。红色中国网部分编辑的这些观点，在一些左翼青年中有一定影响力，但尚未对群众运动产生直接影响，这只是因为目前群众运动发展水平低下。在运动发展起来后，红色中国网的这些观点及与之类似的形形色色的变种一定会顽强地冒出来，并试图掌握群众，影响运动的方向。而统治者也会充分利用这一点。为此，从现在开始，未雨绸缪，提高我们的理论上的免疫力，是十分必要、十分有益的。